

杜 诗

研究丛稿

• 钟树梁 •

天地出版社



杜诗研究丛稿

钟树梁 著

天地出版社

1998年9月

目 录

自序·····	(1)
读杜甫早年诗札记·····	(1)
试论杜甫长安十年诗·····	(22)
读杜甫《秦州杂诗》评析·····	(40)
读杜甫自陇右赴成都纪行诗·····	(57)
论杜甫两川诗·····	(83)
读杜甫《夔州歌十绝句》·····	(99)
论杜甫荆湘诗·····	(114)
论杜甫的五言排律·····	(143)
杜甫诗中的妇女形象·····	(171)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再辨析·····	(194)
试析《寄李十二白二十韵》·····	(214)
一言为智，千载犹新·····	(222)
——读杜诗《送陵州路使君赴任》	
一往情深，千秋论定·····	(227)
——读杜甫吟咏诸葛亮的诗	
万古云霄一羽毛·····	(241)
——读杜甫诗《蜀相》	
杜甫与文天祥·····	(246)

陈子昂与杜子美·····	(263)
锦江春色来天地·····	(294)
——纪念杜甫诞生 1250 周年	
不废江河万古流·····	(304)
——纪念杜甫诞生 1270 周年	
天下朋友皆胶漆·····	(316)
——纪念杜甫诞生 1280 周年	
简谈杨升庵论杜甫诗·····	(329)
《仇注杜诗引文补正》序·····	(334)
稷契方知稷契心·····	(338)
——读《小平同志来草堂》书感	

附 录

有关诗词

念奴娇 成都杜甫研究学会成立·····	(345)
南歌子二首 为杜甫纪念馆 30 周年作·····	(346)
浪淘沙 纪念杜甫诞生 1270 周年·····	(346)
高阳台 杜甫研究学会第四次年会·····	(347)
浪淘沙 悼念成善楷先生·····	(347)

学杜诗 杜甫学会成立 10 周年时作	(348)
壬申暮春, 杜甫诞辰纪念会及杜学讨论会在河南巩义 市召开, 纪盛	(349)
巩县谒杜少陵先生墓	(350)
访巩县杜子美故里	(350)
步少陵秋兴韵八首	(350)
再步秋兴韵八首	(352)
临危莫爱身 悼锦州市委书记张鸣岐	(354)
湘月 次刘孟伉韵	(355)
丙子人日集工部祠步杜公《送高三十五书记》十六韵	(355)
木兰花慢 四川杜甫研究会第九届年会	(356)
东西二祠行	(356)
草堂茅屋重建歌	(358)

自序

我在少年时期，父亲少泉公教我始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即南宋后所称为《四书》者。全读全背诵。继读《诗》《书》《礼记》《左传》，皆选读，亦须背诵。同时读唐诗，选读诸家，专读杜诗。家有湖南刻本《杜诗镜铨》一部，自《游龙门奉先寺》起，父亲依次讲授，亦必背诵。我十二岁后，父亲去世，仍读杜诗不辍。有不解者则请教于余姨父潘公。就读于四川大学中文系时，先师庞石帚先生授业。故于杜公诗童而习之，长亦讽亦必背诵，兴趣极浓，领悟大增。于杜公崇高品德、爱国爱民精神及沉郁顿挫风格，最萦于怀。遂以学习、研究杜诗作为终生志向，读其书，师其人。新中国诞生后，成都百花潭北之少陵草堂建立了杜甫博物馆，收藏杜集甚丰，得资研究，并泛览时贤研治杜诗之作。“文化革命”后，1980年4月成都杜甫研究学会（后为四川省杜甫研究会）得以建立，时复参加研讨。今撮以往岁月中所撰有关杜诗之论文，成为一册，以就教于世。余以为研究杜诗自应独立思考，百花齐放，义理、词章、考据皆善，而弘扬杜甫伟大精神实为要道。我在1994年10月在奉节县召开的一次学术年会上曾说：“我们学会本来就有负责推动精神文明建设的重任，自然应当也更乐于为《爱国主义

目 序

教育实施纲要》的贯彻执行尽到自己应尽的力量。应使杜甫爱祖国、爱人民、爱正义、疾邪恶、深恶痛绝一切腐朽、荒谬的这种伟大精神得到更多、更好的发掘、研究、宣传，成为今天‘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重要部分；他的1000多首诗篇成为今天对全国公民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最好教材。同时精研诗圣杜甫诗歌艺术的特点、优点，以为今天文学发展的借鉴。”这也就是我的治学宗旨。又曾有诗云：“云门曲可奏，齐心阙杜学”，心向往之，无时或释。拙文录入册者略分几类皆论文稿，未必有当，尚望规正。其中有3篇是三次纪念杜公诞生所开纪念会的纪念文章。因欲于文中对研究会之开展情况及草堂之景物有所反映，故以论说与叙述结为一体写之。又曾以诗词表见对杜诗研习、体会之衷怀，诗文虽殊，其用则一，若干年来有关诗词约数十篇，今附部分于卷内。1997年初春成都钟树梁自序。

读杜甫早年诗札记

自己巳年除夕至庚午年人日，重读杜甫早年时期之诗，从《杜诗镜铨》之次。自《游龙门奉先寺》至《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共24首。此谓早年诗，主要是指诗人南北漫游时间之所作。泰山毫芒，今所见者止此。因就诵读时所感，写此札记。

《游龙门奉先寺》 此诗杜诗编年诸本率列为第一首，浦起龙《读杜心解》则列为第二首，以为杜甫游东都在开元二十九年后。其《少陵编年诗目谱》亦谓杜甫“下第游齐赵”，“但有齐鲁间诗”。故浦氏列《望岳》为第一首，自成其说。

此诗开头两句，明明提出“游”“宿”二字，是为一篇诗的骨眼所在。然“已从招提游”自是白日之事，一笔撇开，全诗乃是专写夜晚宿招提之境。“已从”，“更宿”，说得十分明白。盖省去白日游招提时所见之景，而着重夜晚宿招提时所感之境。当然宿也在游之中，题目为《游龙门奉先寺》，自无抵牾。杜公此诗境象高超，不同于唐人诗中颇多泛泛写寺中景物之作，而是更深一层地写夜晚留宿奉先寺时所感受到的一种境界，遗貌取神，写出清虚之境。“心清闻妙香”（《大云寺赞公房四首》之一），清虚之心乃能感受到

清虚之境，而清虚之境又益我清虚之心。近人王国维提出境界之说，似比一般所称形象之说更有深诣。清人金圣叹解杜甫此诗已能领会到境与景的不同。他说“‘境’字与‘景’字不同，‘景’字闹。‘境’字静；‘景’字近，‘境’字远；‘景’字在浅人面前，‘境’字在深人眼底”。亦有所得。故读杜甫诗者，必当知杜公之善于写境、造境，而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由虚入浑、由客观地分析而返为主观地感受之。或许这也是古今喜读而又善读杜诗者之所同感。

“天阙”一词，前人议“阙”字者不少，《仇注》谓“诸家聚讼约有八说”，可谓多矣！“天阅”“天阙”“天阔”“天开”等，不一而足。王安石、杨慎都参加了这一议论。议者固然都是好心，欲求一最的当之字以为杜诗之原本，各有理由，各执一词，但是终不免近于臆测，信如施鸿保所云“似皆未妥”。也因“天阙”与“云卧”属对，涉及“卧”字之虚实，故更莫衷一是。其实“天阙”本有所据，并非误字。朱鹤龄从蔡僚等之说定为“天阙”，说较圆融。施鸿保则以为如作“天阙”则是实词，与“云卧”“虚实不对”，终莫能决。其实“卧”虽动词，亦可作名词用，与“天阙”本可成对，不劳改字。沈德潜亦云“不应改天阙”（《唐诗别裁》）。清人郭曾忻从朱鹤龄说以为“两山相对若阙”见《水经注》，本极明白。又引张缜说“云卧犹言云室”，此解即是动词作名词用，其疑自释。

由此可见对杜诗之一字一句，不当轻易议改，应对诗句反复研求，以免误以本来不误之字而以为误，即使旧本有不同之处，亦当反复寻绎，期求其当；如无确证，宁可两存

(郭氏《读杜札记》也说：“杜诗各本异字如此类者，正不妨各存其说”)，更不必辄立新说，反滋纷扰。又，“阴壑”以下数句“不用禅语而得禅理”(《杜臆》卷一)，亦是佛门胜境。

《望岳》 杜公早年短篇五古，前诗与此首足以代表，精于选理而又不为选体诗所囊括，且为选体诗中所不易觐。严沧浪谓少陵诗宪章汉魏，而取材于六朝，但也指出少陵诗有其自得之妙，即前辈所谓之集大成(《沧浪诗话》)，甚是。王士禛《古诗笺》其“五言诗卷”中不录杜五言一字，“七言诗歌行”则选杜诗甚多，所嗜不同，似未知杜出于汉魏六朝而又有变于汉魏六朝之佳，故仅录陈子昂、张九龄、李白、韦应物、柳宗元之五古，于杜无所取。姜宸英为《古诗笺》作序曰：“唐贤风气自为畛域，成其为唐人之诗而已”。能得王士禛之恉，然此所谓“自为畛域”正足以见杜五言古诗之优异。

《登兖州城楼》 《杜诗镜铨》谓“此集中第一首律诗，气象宏阔，感慨遥深，公少作已不同如此。”张缙谓“考公作此诗时，年甫十五，而所作已如此。”黄生以为“与岳阳楼诗并足陵铄千古。”观此诗气象之宏阔，格律之谨严，感慨之深远，确乎为并世诗人所难企及，吉光片羽，已见于少年之时；沉郁顿挫，亦已植根于趋庭之日。若与《岳阳楼》并观，《岳阳楼》苍莽横绝，感慨万千，又非此诗之可比拟，年岁不同，经历大异，自有深度广度的一定差别。但此二首前后照耀，足可显示诗人一生之理想与遭遇。“临眺独踌躇”亦与晚岁《南征》诗中之“但恨少知音”有相似之情，此公

之所以独绝也。又杜甫登楼之作，篇篇皆感人甚深，倘亦刘勰所云“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登高临远容易动人心魄的缘故，然亦因人而异。

《题张氏隐居二首》 其一为杜集中第一首七言律诗。写得很蕴藉，为和平雅正之音。杜公七律，波裔云丽，变化无穷，匪特一代之宗，直是宏开百世。此诗或许可以说是滚滚江流之滥觞，“青鞋布袜从此始”。

此诗之“张氏”，旧注为“竹溪六逸”之张叔明，无确证。四川文史馆所编《杜甫年谱》以为此“张氏”为张建封之父张玠，亦乏明证。陈貽焮先生之《杜甫评传》据杜甫《杂述》一文（见《全唐文》卷三百六十）中所述张叔卿（即张叔明，明卿一字之误）、孔巢父生活穷困之状，似与二诗中“张氏”之情况不侔。而张玠任侠，轻财重士，人品高洁，似与“张氏”较近，以为《杜甫年谱》之揣度不为无因。按《旧唐书·张建封传》载张建封谏官市事甚有节概。“又礼贤下士，无贤不肖游其门者皆礼遇之。”更看张建封诗《竞渡歌》，其结尾云：“吾今细观竞渡儿，何殊当路权相持。不思得岸各休去，会到摧车折楫时。”亦有远害之情，“不贪为宝”之识。虽然父子并不一定风格相同，但也不能说没有关联。详建封之为人可能也有助于对张玠的理解。则与杜诗中之“张氏”为近。又杜甫晚年所作《别张十三建封》长诗，情义甚至，称建封“风神荡江湖”，卢世澹以为“建封自奇士，只‘风神荡江湖’，谁能当此五字耶”（《仇注》引）！赵次公谓杜别建封诗“以建封为羽人，其所望深矣”（《九家集注杜诗》）！此亦可以为四川文史馆《杜甫年谱》之

间接参证。

第二首为五律，其第一句云“之子时时见”，则与题中“张氏”之交谊本深。此诗写得很活泼，杂以笑谑，亦足见杜与张之亲近。则此隐居之主人张氏，与张玠较近，而去张叔明较远。

《房兵曹胡马》 此诗为杜公咏物诗今所能见者的最早一首。虚实并写，形神兼胜，精力弥满。“挽弓当挽强”，咏马咏鹰皆如挽强弓，杜甫此一咏马，能挽强弓，且如“有大力者负之而趋”，其用笔亦如马之一往无前。四十个字有尽而诗意无尽，却把马的精神写尽了。前人于杜甫咏物诸诗（如此首咏马及下面咏鹰），每逐字逐句注其出处，以明其无一字无来历；或指出乃源于古人同题之作。但杜甫绝不是巧于因袭，而是“读书破万卷”，能破善用，古人诗赋诸作，供我驱遣，实则自创新意，托己之情。我以为此诗的最大优点即在于神完气足，声宏格高，以伯乐识马爱马之心来咏马，亦即为马作赞；以敬爱英雄人物之心来相马赞马，故写得愈有感情，愈为沉雄。其刻划之精，对偶之工，犹为易见。此诗写出马之气骨，马之形体，马之能力，马之德性，马之功劳，马与御马者之不可分，皆笔到意到而神显。屈原《离骚》曰：“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写出了马的血性，读《离骚》至此，往往催人泪下，读杜公“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之句亦不知涕之何从！“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论语·宪问》），“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论语·子罕》），杜公此诗之咏赞重点，尤在马德。于此亦足以规杜公少年时之志趣节概。“一洗万古凡马空”（《丹青引》），

杜甫咏马此作，也应是“一洗万古凡马空”了。

《画鹰》王阮亭云“五字（按指首句‘素练风霜起’）已摄画鹰之神。”良然。但此诗之要旨尤在末联“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孔融《荐祢衡表》“鸷鸟累百，不如一鹗。使衡立朝，必有可观。”杜公以“必有可观”之热望而荐贤亦思自用之心，溢于辞表。

《过宋员外之问旧庄》杜甫怀人之诗，总见真情；而评人之作，必定公允。由于他宅心忠厚，识见卓绝，能服人之善，知人之长，故绝不为偏执之辞，刻薄之论。其于初唐作家，四杰，则赞以“不废江河万古流”；陈子昂，则评以“有才继骚雅，哲匠不比肩。”“名与日月悬”，“终古立忠义”。对杜审言，杜甫的祖父，更是敬慕，谓“吾祖诗冠古”，“诗是吾家事”。宋之问与杜审言同时，对近体诗的奠基和开展同样能尽其力，有过作用。昔人以为宋与陈子昂、沈佺期、杜审言是杜诗诗法渊源。杜、宋也很有交情，杜审言存诗不多，未见赠宋之作；宋之问则有《送杜审言》诗五律一首，颇有情致。杜甫之写《过宋员外之问旧庄》诗，对宋之问与杜审言之交谊未曾道及，于宋之问及其诗也未说任何评论性的话。前人或以为“之问为人实不足道，诗无讥词，以其契家前辈也”（见《仇注》赵沅语）。或许如此。无讥亦无褒。于此足见杜公之审慎，不轻诋亦不轻扬，对人自有分寸。但此诗徘徊瞻顾，从池馆之零乱来写，亦颇感慨系之。“吟诗许更过”一语，也提到了诗，尊宋为前辈诗人。一个“许”字，敬重之情可见。正如《仇注》引杨守阯所云“亦许我更过而题咏乎？”且末联“更识将军树”，古今读者

或谓指之问弟之悌，或言指之问之父令文。后者似较当。但无论所指为何，均足见杜公对之问是重于世交之情的。此诗中之“淹留问耆老，寂寞向山河”亦与咏怀宋玉诗“舟人指点至今疑”有同样的感慨。总之，读此诗使人感到写得恰到好处，既不空泛，也有真情。题材和感情掌握得很好。

《夜宴左氏庄》 此诗以清新之妙笔写清幽之夜景，庄中乐事多有，扁舟远意难忘。对仗工整，情趣深长。“暗水流花径”一联，前人谓为“语甚精切”。此亦诗人善于捕捉住一瞬间之所感，内心与外景相合而构成唯妙之境，于是调以抑扬之声，出以骈俪之辞，乃能移人之情，引人意远。不仅是“写景则豁人耳目”。如果说写暗景甚佳，其他还有类似的诗句，如“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春夜喜雨》），“野船明细火，宿雁聚圆沙”（《遣意二首》之一）皆是。

《文心雕龙·丽辞》说：“反对为优，正对为劣。……反对者，理殊趣合者也；正对者，事异义同者也。”并举例云：“仲宣登楼赋云：‘钟仪幽而楚奏，庄舄显而越吟。’此反对之类也。”唐时日本弘法大师所撰《文镜秘府论》其《论对属》说：“凡为文章，皆须对属；诚以事不孤立，必有配匹而成。至若上与下，尊与卑，有与无，同与异，去与来，虚与实，出与入，是与非，贤与愚，悲与乐，明与暗，浊与清，存与亡，进与退，如此等状，名为反对者也。”此之所言，即属于刘勰所说的“反对”（当然“反对”也并不一定必须在两句中出现相反意义的字，如弘法所举之类）。弘法举出了十四组相反的字义，自然还远不止此（如刘勰例中之“幽显”，弘法就未列出）。《夜宴左氏庄》的第三联“检书烧

烛短，看剑引杯长”以长、短为对，即是“反对”。杜甫诗中的“反对”对句，所在多有。即如以“长、短”属对者，大概还有三处，即：“红漫珊瑚短，青悬薜荔长”（《观李固请司马弟山水图三首》之二）；“礼乐攻吾短，山林引兴长”（《秋野五首》之三）；“赐浴皆长缨，与宴非短褐”（《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皆称道于人口的诗句。“反对”如用之得当，相反相成，能收《文心》所云“反对为优”的艺术效果。特别是以“有、无”属对，一正一反，一肯定一否定，两相比附，表意更透。杜甫运用“有、无”属对而成诗，有特殊的才艺，高妙的手法。我曾经就记诵所及并缙检杜集，看他用“有、无”成对者究竟有多少处，一一钞撮，竟得三四十联之多，令人惊异。现在读《夜宴左氏庄》诗，谈到“反对”问题，我把杜诗以“有、无”属对之诗列 35 联于此，作此摘句图，以便观览，此亦谈杜诗诗艺所当注意者。其次序大抵依杜诗写作时间先后：

贝锦无停织，朱丝有断弦。

《寄岳州贾司马六丈巴州严八使君两阁老五十韵》

神仙才有数，流落意无穷。

《敬简王明府》

江山如有待，花鸟更无私。

《后游》

莫思身外无穷事，且尽生前有限杯。

《绝句漫兴九首》之四

交新徒有喜，礼厚愧无才。

《徐九少尹见过》

日兼春有暮，愁与醉无醒。

《又呈窦使君》

身无却少壮，迹有但羁栖。

《春日梓州登楼二首》之一

远水非无浪，他山自有春。

《鄠城西原送李判官兄武判官弟赴成都》

传灯无白日，布地有黄金。

《望牛头寺》

漂梗无安地，衔枚有荷戈。

《征夫》

有径金沙软，无人碧草芳。

《陪王使君晦日泛江就黄家亭子二首》之二

雪山斥候无兵马，锦里逢迎有主人。

《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之二

近泪无干土，低空有断云。

《别房太尉墓》

书成无过雁，衣故有悬鹑。

《赠王二十四侍御契四十韵》

久待无消息，终朝有底忙。

《寄邛州崔录事》

竟无室室召，徒有茂陵求。

《过故斛斯校书庄二首》之一

不是无兄弟，其如有别离。

《伤春五首》之二

飞腾知有策，意度不无神。

《奉寄李十五秘书二首》之二

秦州驿使无消息，蜀道兵戈有是非。

《黄草》

事主非无禄，浮生即有涯。

《暮春题瀼西新赁草屋五首》之四

林中才有地，峡外绝无天。

《归》

有猿挥泪尽，无犬附书频。

《雨晴》

地下无朝烛，人间有赐金。

《骊山》

塞俗人无井，山田饭有沙。

《溪上》

井屋有烟起，疮痍无血流。

《奉送王信州荅北归》

殊方听有异，失次晓无惭。

《鸡》

对月那无酒，登楼况有江。

《季秋第五弟纘江楼夜宴崔十二评事韦少府侄三首》之三

号山无定鹿，落树有惊蝉。

《夜二首》之一

领郡辄无色，之官皆有词。

《有感五首》之五

无钱从滞客，有镜早催颜。

《闷》

翰林名有素，墨客幸无违。

《宴胡侍御书堂李尚书之芳郑秘监审同集归字韵》

有喜留攀柱，无劳问转蓬。

《上巳日徐司录林园宴集》

巨海能无钓？浮云亦有梯。

《多病执热奉怀高尚书》

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

《登岳阳楼》

无人竭浮蚁，有待至昏鸦。

《对雪》

观此我以为有几点可言：一是杜甫早期诗中几乎没有这种以“有、无”成对者，愈后则此种“反对”愈多。这种现象是否也可以认为这也属于“晚节渐于诗律细”是一种显现？二是杜甫此种“反对”，率皆如刘勰所言“理圆事密，联璧其章”，而绝无“碌碌丽辞，则昏睡耳目”之弊。“有、无”成对，正反相成，说理愈透，表情益密，三十几联，并皆佳妙。其中有不少为百代称诵的警句，如“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江山如有待，花柳更无私”；“远水非无浪，他山自有春”；“竟无宣室召，徒有茂陵求”；“近泪无干土，低空有断云”等等，不胜枚举。都是“反对”艺术手法运用得宜，大有助于诗歌感染力增强的例证。三是杜甫诸多“反对”中，句法也常有变化，也很生动。如“日兼春有暮，愁与醉无醒”；“久待无消息，终朝有底忙”；“不是无兄弟，其如有别离”；“对月那无酒，登楼况有江”等皆是。四是“反对”的运用，对感情的表达有时有特殊的效果。如《别房太

尉墓)之“近泪无干土，低空有断云”，辞语既佳，尤其是以一正一反之词，“无”干土，“有”断云，紧凑写出，墓地之凄凉，友情之诚挚，不言悲而悲愈见。使读者感到非常真实，令人感动。联想到清人孙子潇的悼亡诗：“是我心知天必忌，为卿泪滴地无干”，后句自然是杜诗“近泪无干土”的化用，也可以从《九辩》“后土何时而干”来。杜是别墓，人在墓前，故“近泪无干土”，非常自然，愈见杜于亡友交情之深。孙诗就不免泛泛。五是“反对”虽优，但也贵在用之得宜，前后连属、自然。如果强用“有、无”而成对，不管辞义是否允洽，篇意是否连属，而欲争奇于一联，奏功于二字（例如有无、轻重、长短、高低等字），此种情况，古今皆有，则往往会适得其反了。

《临邑舍弟书至，苦雨，黄河泛滥堤防之患，簿领所忧，因寄此诗，用宽其意》 此五言排律诗多用水族之名，并及禽鸟，安排皆当。《镜铨》谓“写景如画”，良然，读之如看民间戏曲“水涌金山”场面。

“青天失万艘”，一本“失”作“矢”，应以“失”为当。一则“失”与“留”相反成对，此一联亦是“反对”；二则“失”乃合于情事，河水泛滥，船皆远避，故曰“失万艘”。由此联想到毛泽东同志咏雪之《沁园春》词，最初发表之稿为“大河上下，尽是滔滔”。“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语出《论语》，用于此似不甚合于情景。黄河冻结，岂能尽是滔滔。《说文》释“滔”字为漫漫大水之貌。《诗经·小雅》：“滔滔江汉”，《大雅》：“武夫滔滔”，于实则表漫流，于虚则表广大，皆有飞动流荡之义，似不宜用以形容严冬黄河。故

以后此词改为“大河下上，顿失滔滔”。则合于情实。杜甫此一排律，所用动词、形容词很多，细审之皆与客观景象不离。此诗为杜集中第一首排律，其紧凑而不散缓，灵动而不板滞，已深得排律之要领。惟“用宽其意”一语，也惟有“戏为大言以慰之耳”（朱鹤龄语），则杜公早年之作，自与己饥己溺之怀抱稍有不同，然亦是无可奈何故为豪语。王嗣爽解末四句之前二句为杜公自道；后二句则瞩目于其弟，“公思远引，而望弟以济世”，其说较善，可从。盖前二句明言“吾”，后二句暗指“弟”；朱氏谓皆指杜甫自己，似不如王说。

《李监宅二首》 此种应酬诗本不易作，也很难作好。杜公此二诗亦似随俗酬酢。好像是无话中找话说。但气度雍容，修辞安雅，不落尘俗，亦见高才。旧说谓“起语与五六俱含讽意”（《杜臆》），亦有所见。我以为“尚觉”便有言外之意，“豪家”又何殊于“朱门”？五六一联又岂不是“酒肉臭”的别一写法？不过此诗作在安史之乱以前，尚寓有规戒其奢之意：“朱门”二语，作于乱离之际，则直斥无隐矣。帝室、豪家，从诗人看来本是一体。

《赠李白》 “岂无青精饭，使我颜色好。苦乏大药资，山林迹如扫。”此与《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之“非无江海志，潇洒送日月。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比较观看，则此诗尚言神仙不易求，而《奉先咏怀》则更深一层，即可求亦不欲求，不忍遗世独往。由于公诗甚真，往往剖心而言，无所隐饰；而公之思想认识也正随着时世之变移而有所发展，故读其诗者常觉有迹可寻，思想脉络甚为清楚。

元遗山“心画心声总失真”之言，于杜公毫不相干，于杜应改为“心画心声尽是真！”读公诗使人常有肝胆照人之感，虽历百世皆然。

此为杜甫赠李白诗十余首中之第一首，蕴藉而非慷慨，与以后诗中之愤激沉痛者迥异，杜甫对李白的感情，对李白的关心和担心也是逐渐加深的。友情随日月而加深，心情也因时世而变易，故愈见其真切。

《陪李北海宴历下亭》“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一联，传诵千古而愈新，短短十字，成为齐州及历下亭的定评，无可移易。至今杜诗此二句尚作为对联悬挂亭前为湖山增色。联为何子贞所书，易“海右”为“历下”二字。此联之重点在于“名士多”。按：“名士”，古有种种解说，或引《月令》、《汉书》、《史记》谓指名家、法家之士。或以为“名士”意义，后较宽广，不外文章风范，为世所仰，迹遁山林，或身兼吏隐之人物。济南多名士亦系实据，非泛泛称道之谓。公另有诗云：“全蜀多名士”（《行次盐亭县聊题四韵奉简严遂州蓬州两使君咨议诸昆季》），旧注引《蜀都赋》之语为说，其实杜甫此语是兼赅古今，不是只就汉代司马、王、扬数人而发。于齐州亦然。但人才每随时世之不同而有隆替。杜公“名士多”之言，也反映了唐代鼎盛时期之济济多士。后世或不尽然。晚清名宦张之洞咏大明湖之诗曾有“十里明湖成苇荡，百年名士等晨星”之句，寥若晨星，名士当然很少了。故知诗歌必当切实，当清廷衰败、万马齐喑之时，抱冰此诗，自不能如少陵陪李北海宴厅下亭时的乐观。言必切实，词无空泛，这正是吾国诗歌优良传统的重要

方面。否则，或为无病呻吟，或为信口颂赞，则皆非。

这首诗也是属于五古诗之多偶句者，不同于律体，故“重”字读平声即可，不一定如王元亭所说，“以平读去”。“从公难重过”，五字皆平，古体本来容许。如谢灵运诗“清晖能娱人”（《石壁精舍还湖中作》），陶渊明诗“欣然方弹琴”（《咏贫士》）皆是。不过这种五平之句在古诗中也不多见。

《赠李白》 此诗旧注多以为杜甫于李白有规讽之意，主要见于后二句。但现在有的同志研究此诗，以为旧注未安，另立新解。我反复研读这首诗，还是以为旧注于义较长。不久前读《杜甫研究学刊》1989年3期所载马文同志《李白杜甫相讥之我见》一文，谈到《赠李白》这首诗，认为“诸家所注，不宜轻易否定”，作了较详的论证，比较可信。我以为主要的问题就是：一、这首诗对李白是否有规讽之意；二、“飞扬跋扈”究竟如何解释；三、杜甫会不会规讽李白。这三个问题马文同志的文中都已谈得很多。这里再作一点补充。

从全诗四句连属的语气看来是有一定的规讽、劝戒的意思，丹砂既然未就，有愧葛洪，神仙之事本渺茫，还应正视人世。杜与李虽同有济世之志，用世之心，但两人气质本有差异，杜“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理想早有所立，在有过一段“裘马颇轻狂”的生活之后，翩然思返，欲伸其志，不能不有所自励而励人，也是很可能的。“空度日”，“为谁雄”，这也有可能是诗人经常自思自问的问题。但李白往而不返，其狂尤甚，杜甫赠以此诗，意含规劝，词意还是

比较显明。志士惜日短，痛饮狂歌，岂非空度日月；任重而道远，飞扬跋扈，究竟是为谁称雄。“以意逆志”，杜诗此二句自是讽喻、讽劝、讽戒之语，励人亦自励。从此诗的语气及诗人的胸怀来探索，两句诗意有所讽，表现得也是很自然的。似乎不会是单纯赞美之辞。如果只看“痛饮狂歌”一语，自然不一定是讽刺的话，例如《醉时歌》的“得钱即相觅，沽酒不复疑。忘形到尔汝，痛饮真吾师！”其下又云：“但觉高歌有鬼神，焉知饿死填沟壑！”又如《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的“白日放歌须纵酒”等等，都是一片天真（“嗜酒见天真”）、放纵自恣之词。但是这里的“痛饮狂歌”之下而接以“空度日”，则一片怅惘之情溢于言表了。“飞扬跋扈”一语，经史解释其义者不少（这里不具述），用这几个字入诗文的也多。一般都不具褒扬之意。考“跋扈”之语原，《诗·大雅·皇矣》：“无然畔援”，《郑注》以为“犹跋扈也”（但今人亦有解“畔援”为“徘徊”者），“畔援”“跋扈”，一音之转，亦无褒意。至于后汉质帝目梁冀为“跋扈将军”，梁冀恨而酖杀质帝，当然纯是贬词。不过在昔人的诗文评语中，有时确也用来状所评的作品的放纵不羁，有魄力，有霸气，亦可转为赞美之词。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评陈其年词的地方很多，陈所用词语，尽有与“飞扬跋扈”意义近似者。如“雄跨一时”“目无一世”“横霸”“怒貌俊鹘”“熊啼兕吼”“不嫌自负”“何其横霸”“论其气魄，古今无敌手”，如此等等。朱祖谋《望江南·杂题我朝诸名家词集后》其题陈其年一阙云：“跋扈颇参青兕气”。凡此种皆是评论作品。至如张孝达咏万柳堂诗有句云“跋扈毛甡曾烂醉，凄凉

才甫已来迟”。这倒是用跋扈来形容人，不是评论作品。清钱泳《履园丛话》二十《万柳堂》云：“国初为冯益都相公别业，……当时如毛西河、乔石林、陈其年、朱竹垞辈皆有诗文记之。”毛西河即毛甡（毛奇龄字大可，又名甡），世称西河先生，这是一个博学善辩，负气自喜的人物。《清史稿》本传说他“淹贯群书，所自负者在经学，然好为驳辩，他人所已言者，必力反其词。”诗话上也说他不以苏轼“春江水暖鸭先知”句为然，他说，难道鹅就不能先知。朱疆村《望江南》词“题毛大可”起句云：“争一字，鹅鸭恼春江”就是指的这件事。所以称他为“跋扈毛甡”。这是咏万柳堂而涉及前人，用了“跋扈”一词来形容其人，也并无恶意。杜诗却是直接投赠李白，当然也是善意，寓规劝之旨是可能的。观山东大学中文系《杜甫诗选》于此诗之下注云：“飞扬跋扈，指意气举动，狂放不羁，逸出常规（与现代汉语中“横行霸道”的意思用法，不完全相同）。”当然“不完全相同”，今所用“横行霸道”一语就只是贬义。”飞扬跋扈”则不然，有时相当于放纵、傲岸等义，否则清人张孝达就不会用来形容前辈大儒毛奇龄，1000多年前的杜甫也更不会用来投赠李白，这是毫无疑问的。但由此也不能说一点规劝之意也没有，纯系赞扬或愤懑之词。

再从杜甫的为人来看，上谏于君、中规于友，他的诗歌中是常有的。这里不必举例。有时直，有时婉，随着具体情况的不同也有所不同。爱之深故望之切，杜甫在这首诗中对李白有所规劝正见其交情之深厚，对李白关心至切。“友直、友谅、友多闻”（《论语·季氏》），首在于直。又《论语·颜

渊)记子贡向孔子问朋友之道,孔子说:“忠告(读“鹄”音)而善道之……”这就是说对朋友要出以忠心告知其过失或缺点,还必须善为劝导。杜甫信奉儒教,对这些道理当然熟知而且能够力行。我觉得杜甫在这首《赠李白》诗中所蕴含着的对李白的感情,正是至可宝贵的直友也是挚友之情;这首短短的七言绝句所表现出的正是孔子所说的对朋友应当“忠告而善道”的范例,也应当视为历史诗坛的佳话。

《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 “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阴铿是南朝梁陈间人,善五言诗。今所见阴铿之诗仅三十多首,属新体诗,颇工丽。似与李白诗不太近,但杜甫仅从佳句言。《解闷十二首》之七,诗人也说自己“颇学阴何苦用心”,何则何逊。盖皆“转益多师是我师”之旨。

此诗在杜诗排律中为比较平近易读之作。“向来吟桔颂”二句前人解说也不一致。徐仁甫先生《杜诗注解商榷》引何蕴若之言,以为“向”字为“自”字形近之误,杜集中“自”与“谁”为对者很多(例略)。“谁与”或作“谁欲”皆否定句,而“自来”是肯定句。诸例皆前句肯定,后句否定。故“向”为“自”之误。其说甚是。这又是杜集中“反对”句的一种。“自、谁”相应,与“有、无”,“短、长”等相应同(即使“向”非“自”字之误,此二句仍是“反对”)。《杜诗注解商榷》还说别本(蔡本)有作“惟欲”者,观其注解之意,则仍应作“谁欲”,“其说乃通”,否则“正文与注自相矛盾”。亦是。

读杜甫早年诗,清新之咏,沉郁之思,二者兼备。体裁

以五言诗为多，五古、五律、五排皆有，七言律、绝各有一首。开卷便见清新，意无肤廓，辞多精警。许多首五言古诗、律诗都使人感到如一阵清风拂面吹来，意新、句新、结构亦新，豁人耳目亦沁人心脾。此大不同于齐梁以来的古诗，意多重复，有佳句而乏整篇精善者，辞语也往往陈陈相因，使人耳目为之一新者甚少。杜公虽不薄齐梁，与有渊源，然而戛戛独造，跨越前朝，公之早年诗篇已显然可见。初唐王绩及四杰之诗，颇多佳什，其后陈、宋、杜、沈诸人之作亦复名篇不少，而陈子昂尤为杰出，为杜公所景仰。四杰及沈宋诸人皆是五言律诗的奠基者，于杜为先导，“不废江河”之喻极表尊重之情。但杜公早年的成就已不低于盛唐以前诸家，而其沉郁之处已见端倪，至如《房兵曹胡马》、《画鹰》诸作，感慨横生，固已度越四杰之上。“从来多古意，临眺独踟躇”。“不愿论簪笏，悠悠沧海情”。皆意境深远。《望岳》、《游龙门奉先寺》之精警高浑，在公平生诗中亦是上乘之作，为唐人诗中极罕见者。杜甫此一时期之诗，不能说有异于王孟高岑之处，更不能说殆有过之。但是已可方驾诸人。至于高迈等伦，独兼众美，却在旅居长安以后二三十年间之所造诣。而此早年之作则“朝发轫于苍梧”也。方向正，勇力加，风急马良，日行千里，则公之“夕余至乎悬圃”矣。

杜甫此一时期之律体已经十分成熟，虽廊庑还不很大，变化还不算多，但气度已隆，工力甚深。律诗中之对偶句，其胜处固已突破古人而完全不亚于杜公本人以后几个时期之所写。不过此时期作品数量甚少，可以称道者自然不及以后

诸期之多。但是欲研杜律，还须先河后海，寻踪追迹，原始要终，不可或忽。此一时期之绝句仅见一首，七律亦仅一首，难于比拟。但格高气沉，已足窥豹一斑。七律、七绝，杜公入蜀以后方多，盖早期诗歌尚未尽力于此。

杜甫垂老之年在夔州所作《壮游》一诗，确如浦二田所云“乃公自为列传”。其少年时期之行迹与心迹，实已表露无遗，大有不劳旁人再为探述之概。“每趋吴太伯，抚事泪浪浪”；“枕戈忆勾践，渡浙想秦皇”；“气劘屈贾垒，目短曹刘墙”；“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射飞曾纵鞚，引臂落鸢鹞”等等，因已豪气盖世，壮志存胸。至如《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之“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愈是少年心事，曲曲传出，以天下为己任，继风骚而日新。读公中情激荡地回忆少年时生活及怀抱诸作，更有助于对公早年诗歌的理解。一为卓犖不群，峥嵘自励，已奠定平生稷契为怀，以诗报国、以诗拯世的思想基础。一为早年之诗多零落，绝不止现今所能看到的这二三十首。以公之气概非凡，历经南北漫游，其作必夥；且观后来杜集，凡所经山水、古迹之处，必有赋咏，则早年所作，仅就山水诗而言，也绝不会如此寥寥。韩愈“泰山一毫芒”之叹，绝非夸大之词。一为杜甫早年之作，已臻上乘，已尽全力，“毫发无遗憾”，自昔已然，气劘屈贾，目短曹刘，赋料扬雄，诗看子建，自许甚高，自信甚切，故杜公亦不会如扬雄之悔少作。一为观杜甫早年之诗，“转益多师是我师”，承继古

人，而不拘束于古人；集古人之所长而又力求超迈古人之壮志热情，已可窥见。清人陈廷焯于杜甫最为知音。他说：“或问杜陵何以不学骚。余曰：‘此不可一概论也。大约自风骚以迄太白，皆一线相承。……至杜陵负其倚天拔地之才，更欲驾风骚而上之，则有所不能；仅于风骚中求门户，又若有所不甘，故别建旗鼓，以求胜于古人。诗至杜陵而圣，亦诗自杜陵而变。顾其力量充满，意境沉郁。嗣后为诗者，举不能出其范围，而古调不复弹矣。’”又说：“若杜陵忠爱之忧（应补充“下悯万民疮”之忧），千古共见，而发为歌吟，则无一篇不与古人为敌。”还说：“自风骚至太白同出一源。杜陵而后，无敢越此老范围者，皆与古人为敌国矣。”“不知古者，必不能变古，此陈隋之诗所以不竞也！杜陵与古为化者也！惟其与古为化，故一变而莫可复兴。”（均见《白雨斋词话》卷七）杜甫早年之诗虽多散失，然其弥天大志，固可觐知；而其发展脉络，亦略能窥见。谨述一己之点滴体会如上。时庚午立春日。

1990年春

试论杜甫长安十年诗

杜甫齐赵漫游之后，回到咸阳，即《壮游》诗所述：“放浪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快意八九年，西归到咸阳。”则回咸阳当在天宝五六年间。《杜诗镜铨》所载《杜工部年谱》系在天宝五年丙戌下。自此下及天宝十四载乙未十一月返家往奉先，适历十年之久。论者称此一时期为诗人一生中的“长安十年”。“长安十年”、“西川（或者说成都）五年半”，“东川两年半（包括夔州两年）”，这些都是诗人毕生生命中的几个重点。而“长安十年”是为诗人“朝发轫于苍梧”这种性质的重要时期。先河后海，原始要终，则此一时期与前此的齐赵漫游，皆为理解诗人思想与诗歌发展的重要标志，而此一时期尤为重要。因为长安十年之居才真正是诗人他的政治理想与他的诗歌写作密切结合的诗歌生命的“朝发轫”。至于长安十年后到入川前，这时二京未收，白头搔更短，诗人的生命遭受着更加巨大的折磨、考验，从而迸溅出了诗歌史上极其璀璨的火花，这便是至德元年到乾元二年这四年间的情况。这应当另文评论。现就长安十年的诗歌写作浅谈学习中的一些体会和对一些问题的辨析。

长安十年，各体诗约 100 首。计为：五古 25 首，七古 23 首，五律 33 首，七律 4 首，五排 16 首。除绝句外，皆

备。七古中有句句用韵近于柏梁体者 1 首，即《饮中八仙歌》。又有五句成诗的创新 3 首，即《曲江三章章五句》。若论内容，则赠人、怀人、忆旧、与人酬应、寄人乞助、写示后生诸作约占半数。也就是说在长安十年所写诗歌，对人而写、因人而作、为人而吟，写作对象是具体的人的篇章占居多数，很突出。篇章既多，方面又广，内容丰富，感情充沛。此外则咏物之作也不少，约十之一，而以咏马诗较多。流连景物、感于节令、咏怀古迹之作也有十数首，比一般咏物为多。直接抒情、咏怀、自叹之作也有一小部分。兴感于皇朝、系情于战争、边塞之作也在 10 首以内。以上不过是就诗篇的主要内容及其题旨大致划分。其间自有互相交叉，亦此亦彼，不可胶柱鼓瑟，强为分列者，这些诗篇不少。正可见杜诗之浑涵万状，决不可以一端窥。

杜甫各个时期的作品都不可截然划分其差异，指其特点。盖诗人数十年间的为人，实在是始终一贯，信念早具而终身以之。几十年的生涯，国事家情、民生世运，当然都有不少的变异，诗人的思想意识、诗歌艺术，当然也不可能完全没有变化，查其异是需要的，观其无所异也同样需要。诗人在主观信念、立身行事、爱国忧民、忠于诗歌，作为一个社会人的根荄、本质上面经得住外界的考验和历史的检验，是生死以之，无所变异。这大不同于古代与今世不少人朝三暮四、随波逐流、胸无定守、唯利是图，世俗所讥为“变色虫”、“风信幡”或如雅讽所言“长乐老”者的变异多端。这正是杜甫精神伟大之处。大同是诗人的根本，大纲大节；小异是诗人的枝叶，可以因时因地因事而有所不同。故不同时

期也存在着不同的一些特点。

长安十年诗，我以为从思想感情方面说，有这几点可言。一是胸中有国，眼中有人。其他时期自然诗人的思想感情也都是这样，但由于诗人在齐赵漫游之后，步入中年，政治见解和民生疾苦都所知更深、所见弥实，国家的观念就更强，期为国用之心更切，而初发轫的豪情壮志乃益显著，所谓每饭不忘君国在这十年中就更为执着与坚固，由感性而更臻理性。向玄宗进《三大礼赋》正是诗人回长安后五载，正当不惑之年。杜甫之献此赋既也是应朝廷对士人之召，决不仅为干禄，而更是想得到知遇，作为进身之阶，达其素志。虽然在这一时期的较多作品中并未明显地称说国事，多所评论，不如后二十年那么炽热，但他是在许多待人接物、与人们相与周旋之中而显示其爱国爱民之情。如《饮中八仙歌》，古今人对此诗论得最多。但应特别注意的是，诗人对于他所歌唱的这“饮中八仙”充满着热爱之情，实蕴含着为国爱才尊贤的崇高思想。出自内心，形于笔底。若不是深爱深敬这几位“酒仙”，不会写得如此的神情毕露，顾盼生辉。李白与贺知章不用说了，“汝阳三斗始朝天”的李璡，即唐玄宗称之为大哥的让皇帝李宪之子。李宪与璡，父子皆有谦让之德，是唐自太宗以后其家人互相残杀中而能谦谨自守的佼佼者。《饮中八仙歌》写出了他的天真。杜之《特进汝阳王二十韵》，为集中按时间先后之第三首长律，也是很有代表性的一首。前人评为“铺叙匀称，波澜老成，要自不可及”。这首诗是全面地写出了李璡而赞美之。特重其德。所云“天人夙德升”“服礼求毫发”。尤其是“晚节嬉笑间，平

居孝义称”这两句写出了一个人身居显贵地位又较年青的特进汝阳王的高贵品德，其下还以事实为证。同时也扬其才学，“学业醇儒富，词华哲匠能”以下几句就是。杜所标举皆与史传相合，并非谀夸之辞。诗之后半叙述交情，也并无干求之语。显然全诗宗旨是希冀李璡善葆其真，有益于国。其后约二十年，公在夔州作《八哀诗》，其第四首即哀悼李璡。一开始即是“眉宇真天人”，表其爱慕之诚。接着数语，“爱其谨洁极”，从唐玄宗之垂爱其侄李璡，间接地表示诗人对他的尊崇，并且写出了玄宗与璡特别亲密的关系。又书“匪惟帝老大，皆是王忠勤”。继又赞其进谏、重才、礼贤、好学、多艺，著明其实为贤王。而旧游磨灭，衰谢酸辛，惟增诗人之哀。又如“左相日兴费万钱”之李适之，亦是文学中人，彼自称“不工文”（见《全唐文》卷三〇四，李适之《请宣付太子诸王词翰表》），但他的《大唐蕲州龙兴寺故法现大禅师碑铭》，若非他人代作，亦是文章高手。史传称适之为官以强悍见称，性简率，不务苛细，雅好宾友，为李林甫中伤，后坐与韦坚等相善获罪，卒以仰药死。适之亦善诗，其罢相后有诗云：“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为问门前客，今朝几个来？”可以想见其品格。杜咏李适之的诗句“衔杯乐圣称避贤”，即出于适之本人之自咏。适之为恒山王承乾之孙而人乐与之交，没官架子，也是很难得的。再如“宗之潇洒美少年”之崔宗之，与李白诗酒唱和，人品亦高，“举觞白眼望青天”，想见其不同流俗。长斋绣佛的苏晋，史称其“数岁能属文”，作《八卦论》，吏部侍郎房颖叔、秘书少监王绍宗“见而赏叹曰：‘此后来王粲也。’”后为崇文馆

学士，每为玄宗作制令，能“数进说言，深见嘉纳”。又能厚抚友人之子如己子，为营婚宦，甚饶风义。挥毫落纸的张旭，自是最负盛名。高谈雄辩的焦遂，名不甚著，注家据袁郊《甘泽谣》，明其为陶岷客，亦高士。论者谓其高谈雄辩惊四筵于醉后，非沉缅于醉乡者，甚是。观人必观其所交往的朋友及其所敬重、忻悦的人。仅从“饮中八仙”这几个人物就可窥见杜甫的重贤、爱才。这与他念念不忘国家的兴衰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唯其深爱国家就更注意于国之贤才，他们或居廊庙，或在草野，诗人皆能或皆欲与之纳交或致其仰慕之情，情之所系，在水一方。有时也根据具体情况进其期冀或规劝之忧。这一点在入川以后的诗中尤为显著，这也是此一时期与以后稍有不同的地方。盖愈到以后诗人对国事的隐忧更甚，而希望国治民安更为迫切。再则，饮中八仙本不同于竹林七贤，七贤是已经形成的一个集体，相与交游。而饮中八仙本没有一个已形成的集体，前人已说：“八仙歌当是综括前后言之，非一时俱在长安”这就更是由诗人的综括、识鉴，更显出他对人物的善于品鹭。所以说胸中有国，眼中有人。处处注意到人。这又与某些惟知自重而不能重人、惟知洁己而不知为国，甚且傲慢自高、目中无人的人，大异其趣。这正是诗人伟大之所在。如果仅以为八仙歌是诗人喜爱酒人、一时有兴之作，这就小看或浅看了这篇诗。

更有以后诸作，如《赠比部萧郎中十兄》首先重德：“由来积德门”。后面寄韦济的排律，也归结到“讴歌德义丰”。识人在德，爱人亦以德，这从杜甫的许多诗篇中都可看到。至于赠韦济诗中的“饥鹰待一呼”虽是请求之辞，然

亦因韦济对诗人甚为关切，自可求其援引。此诗之后，五言古诗《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更见激情，也更显自然。是杜诗的代表作之一，古今评论甚多。这篇诗也正是胸中有国、眼中有人的很好例证。虽从字句上看来是陈一己之情，但它紧密联系着世情国政。此诗开头两句“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就笼罩全篇，显示诗人对于社会上存在着两种不同位置、不同遭遇的人有了更明确、更深刻的认识。随之感情上的同情与憎恶也更鲜明。诗人以斩钉截铁、确定不移的语气写出这两句，作为这一篇诗的发端，也是作为他洞察社会大有文章可作的发凡。愤激不平之情溢于言表。诗人固然爱国，但决不喜爱当时那样的国，他已经意识到。所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就是他爱国家民族、爱人民原本思想的必然发展。诗中所叙自己的一切遭遇，这不正是写他一个人而是写他这一类的人。然而“青冥却垂翅，蹭蹬无纵鳞”一个人的力量无济，必须眼观众人，心中有人，寄希望于更多更广的人。长安十年中，诗人对国对人已达到这种思想高度。“甚愧丈人厚，甚知丈人真”，“厚”与“真”这不仅是知遇之言，感激的话，更不仅是颂扬之辞。如果这样看，那就小看了杜甫，也小看了丈人。其意是：像韦济这样的“大臣”对于诗人在篇首揭示出的这种极不合理的社会现实，而这种现实又当然与朝政臧否分不开，那么，应当如何？所以此诗决不是个人的发牢骚、表感谢、乞怜悯，而是把不合理、不稳定的现实揭示于“大臣”之前而在朝政上有所期望。这便是诗人于篇末所云“况怀辞大臣”的本衷。试看尾联：“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岂是个人乞怜之语。

爱国与知人方是主旨，而这篇诗所赠的人是“大臣”。前人曾说，“此诗全属陈情，‘赠’似宜作‘呈’为是”。这便是理解杜甫是通过现身说法的陈情来作语重心长的赠言并寄望。所以题目是“奉赠”二字，一点也不错！此诗之首联与《赠陈二补阙》首联同一意思，“世儒多汨没”即是“儒冠多误身”。不过陈为儒中之较有幸者，故“夫子独声名”。但既是幸者，应当更有作为，老不吝老，故末语勉其“自到青冥里，休看白发生。”精神仍是一致。此时期之怀李、赠李二首，与前此有关李白之诗意境相同，仍是怀念、勉励、期望之情。杜甫对李白爱之深而望之切。诸作都可见。仍是为国怜才，“世人皆欲杀，我意独怜才”二语尽之。“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重”为反覆之词，“细”是缜密之意，二句包括的方面广，正见杜甫对李白期望之大、要求之高，胜过他人。送孔巢父也兼及李白，“今何如”也包含甚多。孔意在遁世，故杜之诗中言及神仙之事，但并无附和之词。“富贵何如草头露”，自是同感，杜公也从不希求富贵，“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亦是儒冠本色。但正如陶渊明所说“富贵非吾想，帝乡不可期”，并无出世飞升之想，此其所以为杜甫。至于《投简咸华两县诸子》、《病后过王倚饮赠歌》、《示从孙济》诸作，皆属着意于人，为国家而厚望于后生。“乡里儿童项领成，朝廷故旧礼数绝。”此联最精警。乡里儿童身体日见其成长；朝廷故旧礼数则日见其绝，庶而无教，最为不堪，也最以为忧。所以浦二田说：“语太愤激矣”。不是愤激，是沉痛。以最留心、最期望于人才成长的杜甫而所见所遭如此，故最沉痛。“长安苦寒谁独悲，杜陵

野老骨欲折”篇中自伤之语较多，皆不仅自伤而是伤世，伤人之不济。过王倚饮赠歌有类于此，感于王之交情而叹世之索漠。“但使残年饱吃饭，只愿无事长相见”，以无可奈何之语作结，于国于人，希望不绝如缕，是为《同谷七歌》的先声了。《示从孙济》，敦于族谊，无意权门。诸孙虽贫，自有志气。期其德，勿受嫌猜勿浇薄，皆有关于世风国政之言。赠郑谏议诗，亦冀其尽职责，直望其“宜忧阮步兵”，留意人事，言婉旨深。杜位宅守岁，感慨殊深。四十倏过，暮景飞腾，在于己者似已无可为，在于人者又未必可期。“谁能更拘束，烂醉是生涯”。虽一时愤激之语，但已青冥垂翅，无可如何。语语真切，不为矫饰，不作欺心之谈，弥为可贵，亦至可悲。《元都坛歌寄元逸人》，芝草琅玕，铁锁高垂，“致身福地”虽佳，但自己不欲如此。《贫交行》虽短，短而意长，昔人谓为“唐人所绝少者”。盖自社会实践所见所闻所受中高度概括而来，力度极强，头两句短短十四字及“弃如土”三字，形容尽致，感喟至深，鞭挞力度极强，欲起沉痾，故下重药，也不能仅视为绝望之呻。赠高适的十五韵，仍是一贯爱人以德之旨，朋友赠言，不嫌纍纍。义归于期其有为，勉其慎行。另一首寄高适的五言律诗，为高有功而喜，喜朋友之所喜，正是为国家喜。因高系诗人，故不离论诗。《奉留赠集贤院崔、于二学士》诗，也是历述自己身世的坎坷。首句“途穷乃叫阍”，“穷”为穷达之穷，欲有所作为，思致君尧舜，而无进身之阶，此之谓穷。乃献《三大礼赋》冀君之一顾，诗人其时已是不惑之年，故不能不有急迫之感。但事与愿违，虽蒙一赞，终未能行其志。归结到

“儒术诚难起”，所遭挫折、所受教训益多。空有三赋之献，唯余二公之恩。诗人对朝廷、社会之认识由此而益进。《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与上诗略同而颂人者多，谈己者少，最后不得不发出“有儒愁饿死”之痛切呼声。其后乃有《醉时歌》之作。此诗又为杰作之一，足以惊风雨而泣鬼神。仍本“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本意，两相对比，尖锐突呈，愤慨之极亦透彻之至。所写不止广文先生和自己二人，盖有广泛意义。“儒冠”二语，早已作了概括，指出本质。当然也充分写出了二人交情之深，相濡以沫。诗句是精粹极了！回环自如，丽绮多姿，见沉郁之气，无酸楚之音。末句“儒术于我何有哉”云云，论者纷起，或惜诗人不当以盗跖与孔丘相侪，大异于平时之言；或谓杜甫阅历既多，对儒术已感失望，故作齐一之论，或谓总属不平之鸣，非真谓儒术可废，亦非真欲孔跖齐观。大体后者比较接近诗人之情意，然亦未允。我以为首先要弄清楚“何有于我哉”的语气与意义。《论语·述而》：“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反复体会，当是孔子谦逊之意。如云：“……我何曾有这些品德啊！”更观朱熹《四书语类》卷二十一，朱子答问说：“此语难说，圣人是自谦，言我不曾有此数者。圣人常有歉然不足之意。”朱子另又答问：“恐是圣人自省之辞……亦谦己以勉人之意。”再如《论语·子罕》：“子曰：‘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何有于我哉！’”朱熹答问说：“寻常有三般说话：一以为上数事我皆无有；一说谓此数事外我皆复何有；一说云于我何有，然皆未安，某皆阙之。”可见朱子也以为难解，但朱子

也已作了解答。我以为细味杜诗此句，当合于朱子回答《述而》中的“何有于我哉”的解释。即：这是自谦之辞，言我不曾有此。也合于“恐是圣人自省之辞。”朱子答《子罕》中的问，则第一条亦合。若然，那就是杜甫自谦或自省说：我哪里有（懂得）儒术。接着下句“孔丘盗跖俱尘埃”是说孔丘、盗跖都是逝者，都已过去，今人未必能辨别圣人与大盗，言之无益。试思以诗人尊奉儒术之诚，岂会突然说出“儒术与我没有有什么关系，孔丘、盗跖还不是一样，都成了尘埃。”这种类似庄、列所说的话。即使酒后狂言，诗人也不致如此。应当是自谦也含愤激之言，仍是叹其道之不行，其志之难于实现。不仅不是轻视儒术或对之失去信心，而是更为儒术痛惜，为儒者鸣其不平。此篇读来更为沉痛，也更感诗人忧思之深化。又，人问朱子，孔子欲居九夷，又说乘桴浮海，是否戏言？朱子回答说：“只是见道不行，偶然发此叹，非戏言也。”对于杜公这几句诗，似乎也应当从此一思路来领会。《醉歌行》属望于后人，“以半老人送少年，以落魄人送下第，情绪自尔缠绵悱恻”（浦二田语）。为之增一语曰：“以‘诗是吾家事’，‘下笔如有神’的老诗人送‘已见唾成珠’的从侄（原注：别从侄勤落第归）”，褒语皆是期勉，自伤为希继承，故开头即以陆机勸之。人才是多方面的，词林后进，也是杜公所最萦心者。《投赠歌舒开府翰二十韵》自是集中大篇，惊心炫目，前人评说累累。直是一篇当朝俊杰的小传。颂其功，颂其遇，颂其贵，尤望其汲引人才，为国储贤。观篇末几联不能只视作杜公之自荐，求其援引。“军事留孙楚，行间识吕蒙”可知，赞其已然而希其尚

未及然，天下遗才多，杜公所身受。故欲为国效力的诗人，对此贤明开府，自必有“欲入戎幕”（前人语）之思，而其结语甚壮。观此诗及《赠献纳使起居田舍人澄》七律，“扬雄更有河东赋，惟待吹嘘送上天。”备见公用世之心极切，年逾四十而“心雄万夫”。我在另一篇论文中曾经说过，杜甫是像伊尹一样的“圣之任者”。杜甫自己说过“独耻事干谒”，但他有些诗句又形同干谒，以此受到一些古今论者特别是今人的指说。其实是未通观全人，自己不甚了解杜甫的心迹行事（当然杜甫有些在生活上求人的事也似可不必，也不必为之讳）。这可以仿照孟子所说的一句话而变更其中一字来回答说：“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妄也。”杜公正是生在唐世而有伊尹之志之人！其《九日寄岑参》，除抒写朋友系念之情外，亦望在官之人能念民瘼。“吁嗟乎苍生，稼穡不可救”、“君子强逶迤，小人困驰骤”，述情于友，冀其有为。仇注论此较详，援引史实，以杜此诗谓“禄山恣横”、“君子小人贵贱俱不得所”、“言国家危难将至，恐有载胥及溺之忧也。”甚合杜心，盖杜于无可诉说之时，趁节日对朋友而一吐之。其心良苦，其志可悲！此一时期尚有一些赠人怀人之作如寄沈八丈东美、寄汉中王李瑁、赠太常卿张垆、上韦左相、魏将军歌、赠田九判官、送蔡希鲁等皆是。体裁或近或古，人物或“席上珍”或“华岳秋隼”，皆是针对其特点，铺陈其事迹，扬其善而促其前，可以说是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士人、民众向这些杰出人物、朝廷官宦表示了肯定和勉励。胸中有国、眼中有人。唯其念念不忘国家，所以篇篇有其人物。为国常观于人。因人而制其题，为时为事

都离不开人。而爱国愈坚，望人愈切。阅人愈广，知国愈深。也可以说是这一时期的作品是以写人物为中心，其成就也甚大。

二是急欲有为，终嗟无用。诗人正当壮游多有所见之后，又当“英年”大有可为之时，“博闻强志”、“志洁行廉”（与屈原无殊），原期致君尧舜，丕变风俗。却贡举受欺，献赋无闻。《今夕行》反映了诗人情绪索寞，强颜欢笑；《杜位宅守岁》，更感飞腾暮景，逼人而来；《登慈恩寺塔》于豪情极目、为国忧心之际，也竟不免作黄鹄的哀鸣，“叹谋生之不若阳雁”（朱注。愚按此诗末二句有别解）以致“但使残年饱吃饭”（《病后过王倚饮赠歌》），“此老无声泪垂血”（《投简咸华两县诸子》）。乃有“自断此生休问天”、“看射猛虎终残年”（《曲江三章章五句》），“恐惧弃捐仍羁旅”（《白丝行》），“有儒愁饿死”（《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少壮几时奈老何”（《溪陂行》），如此种种的感慨歔歔而悲吟！此正唐王朝由盛转衰，国事愈紊之时，诗人愈思有所施为，急切之情屡见，而愈不能有所作为，终嗟无用。急切、嗟叹，愤激、酸辛，苦闷、悲哀，是十年中诗人的基本心情。对朝廷由希望到失望、绝望，自己则由满腔热情、满怀壮志而热情冷却，志气消磨。昔曹子桓以贵公子而叹“已成老翁，但未白头”，杜老的难堪难耐，益可想见。在这一时间的诗篇中也都有所透露和反映。但是诗人的伟大也正正在此，虽然终嗟无用而终冀有用之日，故此后仍有“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的辉煌形象：并非狼狈，实是坚强。而且即使自己终无所用，更备受颠沛流离的苦难，己无所为，也希望友能有

为；身居下僚无可展，也希望身在高位者大有所展。“不必出于己”，务期有所为。此所以杜甫许多赠朋友、赠王侯将相的诗篇，屡以正面颂扬之辞，表殷切瞩望之心。或者不察，以为贡谏，这是未能细读、深读、通读杜老的诗而产生的误解。三是识其两端，伤于万事。前面已引证了一些诗篇说明长安十年的生活，诗人对朝廷政事、对社会人物的认识更为深入，能达其本质。诗人能从两个相反的方面来看人看事，“儒冠”与“纨绔”之别即是一例。虽然唐以前也有些诗歌提出了类似的问题，如“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左思《咏史》）“积善云有报，夷叔在西山。善恶苟不应，何事立空言。”（陶潜《饮酒》）“金张藉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左思《咏史》）司马迁早在《伯夷列传》上就说得很痛快：“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耶？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盗跖……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都是提出了对“天道”的疑问亦即对客观现实的不满。杜甫是更深一层地认识到社会人的两端，而且是不能调和的两端。他在长安所写《有怀台州郑十八司户》——这是一篇血泪写成的友道诗。“从来御魑魅，多为才名误”（其后在怀李白诗中又写“魑魅喜人过”）。接着更写：“夫子嵇阮流，更被时俗误。”爱、惜兼有，但泾渭分明。在长安十年之后的《石龕》则更借题刺世，“熊黑咆我东，虎豹号我西。我后鬼长啸，我前狻又啼”，就愈有豺狼当道、狐鬼成群的明确观念和深恶痛绝之情。入川以后的“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则不止于认识，而是彰善惩恶、树德务滋、除恶务尽

的战斗精神的显现了。伤于万事：约略言之，由于诗人事事从国家人民的利益出发而周览天下，所谓“天视自我民视”，故视野广阔，视力敏锐，苹末微风，亦所警觉。所触有感，所见多伤。约略言之，不外边危、主逸、戚横、将骄、兵苦、民贫。这在长安诗中，特别是后几年诗中历历可见。《后出塞》中“古人重守边，今人重高勋”，一语指出要害，公心、私念判然。“渔阳豪侠地，击鼓吹笙竽”边庭昏乱如睹。“气骄凌上都”，“将骄益愁思”明皇黷武，禄山以边功蛊惑，将骄凌上，兵民皆苦。《兵车行》一篇尤为具体写照。世人皆称《奉先咏怀》，“朱门酒肉臭”二语尤其震撼人心，但稍前所作的《奉同郭谏事汤东灵湫作》，此首写温泉情景的诗，既历历如绘又语语有芒，写得隐微，刺得扎实。前人谓为奇文。综上所述，长安十年之作，实已识其两端而伤于万事。其识愈深，其伤益重。

长安十年诗，从写作艺术、继承与创造方面说，也有这一时期的特点。一是树其规模，穷其变化。初唐时期，中国诗歌的发展，论其体制，已到了各体纷呈的时候，譬如六辔并驱，各行其是。到了杜甫才以自己的写作实践，为唐以前诗体开辟了新的道路。尽管有人说，唐人自有其古诗，但唐人古诗，还是唐以前各个时代的古体诗顺流而下、一脉相承之作。在唐以前，体式已有变化，亦即时有新体出现，随着声韵研究的深入，新声迭著。但总的说来，变化不大。若论风格、韵味则变化较多，因时因人而异，但这不是体制的问题。杜甫所写古诗，这一时间有二十几首，约占十年诗总数的四分之一。自初唐以来，写五古者多，不仅杜甫一人，但

结合着内容来看，则杜甫为独造，他家皆有不及。如奉赠韦左丞、登慈恩寺塔、前后出塞、汤东灵湫等等，都是戛戛独造，初唐前后所未有。但仍不离五古的特点而是更加发挥了这一体裁的妙用，更使他筋骨开张、廊庑阔大。在新的意义、新的需求上树其规模。七言古诗亦复如此，继前人之成就而树其新模。五言长律也有源流，但大力开拓，运用入神，极其变化，不可控抟。此时期的作品已经显示出了此一新体裁的生命力，为五排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入川以后迄于夔州，就更是千门万户，牢笼百世，可以说是后来难继了。这一时期五律较多，约为三之一，体裁固定，诗人以其新作为这一新体扎稳了阵地，而且每联缀为组诗出现。此一创造，更增其容量与表达力。如游何将军山林及重游，前、后出塞等都是。单篇、连组，是为了各应其需亦各得其宜。否则如果对待五律只像王、孟那样，高妙则有之，博大则不能，屈从于体裁，难于开展，这是诗人所不愿意的。七律，此时期仅数首，虽都佳，但承、转关系不甚大。《曲江三章章五句》，前人认为是杜公的变调，题则仿“三百篇”三章连属。但“三百篇”往往三章有重句，杜公此诗则无重句。其体前三句及第五句都叶韵。第四句不叶韵，句尾平仄与另四句相反。一、三两首是仄韵，第二首是平韵。各句皆属拗体。因三章形式划一，亦见整齐之美。《饮中八仙歌》又似柏梁体，句句叶韵。所写八人，人各二或三或四句，有如美术之“剪影”或如国画之“大写”，突兀几笔便勾勒出一个形象鲜明的酒徒。仿佛妙手偶得，实是良匠功深。《兵车行》与《丽人行》为乐府诗，不离命题本意，如《陌上桑》、《羽

林郎》，叙事穷相，真得乐府精髓似更为警策，而题旨也大，皆涉国家盛衰之大事，并世诗人，难于企及。王闾运《唐诗选》于其所选作品偶有评点，对《兵车行》也评了几个字：“学古乐府，杜诗少见。”也认为杜甫的这种诗比较少。其实自此以后，杜亦每有乐府之作而加以变化，一方面诗人固无所不能；一方面更足以说明，诗人选题定体多本于社会国家现实的需要，何种题以何种体来写更为适宜，那就用何种体来写，主要不是出于个人的爱好。为时为事为诗教而写诗，这也是诗人令人崇敬、为人楷模之所在。

二是磅礴有势，毫发无遗。杜公之诗常常是大气盘旋，故磅礴有势。有人称之为旋乾转坤，得天地之元气。固然可以这样讲，但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大气盘旋能与精心雕刻密切结合。大与细相结，磅礴不忽毫发，既是所向无空阔（咏马句），又是下笔无粗率，足为千古效法。杜诗之气势磅礴，在长安十年中已更多地显示出此一特点，紧接其后的《奉先咏怀》及稍隔一时的《北征》出现，就更苍莽横绝，如崇山峻岭、大江长河不可究诘了。但细按此种大篇又无一不是细针密缕，禁得住检验。“毫发无遗憾”这一句就出在这一时期，出自《敬赠郑谏议十韵》。“毫发无遗憾，波澜独老成”。王士禛以为“十字尽学诗之秘”，良然。“波澜独老成”，昔人以为主要指篇章结构；那么“毫发无遗憾”应是兼指义理、词章。义理上应该没有差错，合于诗教，有益于世；词章上一字一句，音韵、格律，都应该是“安排妥贴”，无懈可击。准此而言，试看《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直是一篇绝好游记。“不识南塘路，今知第五桥”与《岳阳楼》

的“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都是第一次来和初到的口气。这里的“不识”是仄起，《岳阳楼》的“昔闻”是平起，故第二句此曰“今知”，彼曰“今上”。写得平易、亲切。第二联的“依”与“上”，极有情趣，皆很自然。其先点郑广文，次说到自己，绝不板滞。结句“为”与“惜”相反相成，幽兴良多，第二首的“卑”与“低”，“接”与“暗”针线细密，不可移易。细细看去，无一字不稳，无一字须更换。“碾涡”二句，刘须溪云“极幽僻”。也由于遣词造句，极能体物，故能写到极细微处，豁人眼目。诸首景物则毕呈眼前，心思则如出肺腑。读之又如与作者偕游，且又清游与絮语相合，步随而心通。十首相连而层次井然，其间也有波澜起伏，不是平铺直叙。尤其令人感觉诗意琴声画景三结合，融为一体，给读者以幽美的感受与享受。但诗人也并没有遗忘主、宾的相结，人在景中，情溢景外。末二语“只应与朋好，风雨亦来过。”其游无憾，其诗也无憾。读之舒爽之极。昔人举杜诗“身轻一鸟过”，“过”字移易不得，惟此字为胜，以明杜诗无一字不稳洽、精当。此论甚是，较之“无一字无来历”尤为必要，尤不可忽。所谓“毫发无遗憾”，也正由于毫发不忽，责任感强，艺术手法高，诗才大。

三是读万卷书，造众生相。昔人问王荆公，杜诗之美何由？荆公答以由于读万卷书。诗人自己也说过：“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这自然是一个根本问题。但读万卷书决不只是一个词语、典故、故实记得多的问题，更重要的还在明于事理，依德据仁。试看杜公此一时期的诗歌，更觉比初期之作更饶经史义蕴。诚于中，形于外，著于诗歌，更使人

读起来趣味盎然，如菽粟水火之不可须臾离，不仅是词章之美动人。这也有着如陆游所说“功夫在诗外”的道理。杜甫是诗中的司马迁，不少论者早就有这种评论。司马迁善于写人，杜甫也是。所不同者一以文章一以诗，也可以说一为无韵之诗，一为有韵之文。准此而言，杜甫之被称为“诗史”，则司马迁也可称为“史诗”。“诗史”一词，含义甚广，但善写人物，持之以正，运之以情，应是一个很重要方面。只看杜甫长安十年所写到的人物，也就数不在少。长安以后，更是展开了人物的画廊。长安十年为写人物奠定了基础，也积累了经验。这也是此一时期杜诗的特色。不知道有人作过这样的统计没有，即杜甫的诗笔究竟写出了好多人物，或者是说他写过的有好多人物。试作一分类和比较，探其心源，寻其手法，这对于今天文学作品的发展也会有帮助，对于今之作家，无论诗歌、小说或其他品类的作者都会很有启发的。

我虽然写了以上这些对长安十年杜诗的体会，虽然也有一些心得，但如尝鼎一脔，毕竟有限。深感对于杜诗必须逐篇精读，反复咏味，庶有更多的领悟。尤其是在今天，更应弘扬杜甫精神，使之与今天的爱国主义教育密切结合，为国家培养有用而可靠的人才，树德弘仁，发扬光大，庶可无负于杜甫及其诗歌的学习、研究。

1994 年秋

读杜甫《秦州杂诗》评析

杜甫的秦州诸诗，虽系短短半年中之所作，但在杜公平生诗歌吟咏史中还是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秦州所作，上继长安十年中的辉煌大篇，下启《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发同谷》组诗诸作。在半年中写出了《秦州杂诗》20首及其他题目36首，共以近60首的五律进一步扩展了杜诗五律的廊庑、奠定了五律的基石。又以几首三十韵及五十韵的五言长律率先走出了玉佩铿锵的排律大篇的步履。即以《秦州杂诗二十首》论，已是杜集中应当列在前茅的精华作品。同谷本是秦州的附邑，同谷所作亦属于秦州时期，《同谷七歌》又一巨制。《发秦州》（12首）和《发同谷》（12首）这两组五言古诗又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就质与量言）的斋皇大著。所以在长安十年以后中经华州、东都、乾元二年秋客秦州以后到上元元年年底入蜀以前，论时间共约二年，论作品约百首，实为杜甫诗歌史上又一光辉时期。此时期有其独特性质和创造及其深远影响。本文仅就《秦州杂诗二十首》谈一点浅见。

《秦州杂诗二十首》的第一首（满目悲生事）

首联“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古今读者多以为是全诗20首的发端。如《读杜心解》说：“其一为二十首之

冒，前言‘生事’‘因人’笼后‘藏身等篇’。”《杜诗详注》引《顾注》：“关辅大饥，生事艰难，故依人远游。非谓因房瑄而致此远游，公必不以一滴怨及故人。”《杜诗镜铨》亦谓“时公以关辅大饥，弃官西去。”他如近人高步瀛《唐宋诗举要》亦引张上若言：“时大饥，生事不可问，故言曰悲生事。”杨西河曰：“时公以关辅大饥，弃官而去”。又如山东大学中文系所编《杜甫诗选》亦云：“‘满目’二句，写赴秦州原因是关中大饥，加之安史叛军再度猖獗，华州又面临战火，无法生活，所以远行投奔亲友。”解说又多一层意思。但是据《通鉴》所载“时天下饥馑，转饷者南自江淮，西自并汾，舟车相继。”又云：“……由是诸军乏食，人思自溃。”乃是乾元二年二月所载（《通鉴卷二百二十一》）。杜甫赴秦州是在秋日，不宜云“时”关辅大饥，诗人乃离官赴秦州。1992年巴蜀书社出版的《杜诗繁诂》（郑文著）对此辨析甚为详明。

余以为诗人之赴秦州不由于“时公以关辅大饥”，因为与事实不合，而且把“满目悲生事”理解为由于关辅之饥，也缩小了诗句更大更多的涵义，浅化了诗人沉忧而历久的悲情。“满目悲生事”这五个字如果一定要说在什么时间，那应当是自安史之乱以来；如果说所包含的地方，那应是自丧乱以来诗人所已到或尚未及到的许多地方。“万方声一概”。诗人是这样看的。事实也正是如此。岂仅关系到关辅是否大饥。即使关辅无此天灾，人民已经早就是陷身水火，不可终日，包括诗人在内“生理焉能说！”诗人自乱离以来的许多诗篇，无一不是哀叹国事也哀及民生。本来国事民生

就分不开，民生也不只是粮食方面问题。“路有冻死骨！”“何以为蒸黎！”“存者且偷生！”等等描述，触目皆是，不可细数。生事即人民生存、生活之事，即生民之事。诗人感之至深，蓄之已久，故言之至痛，写为秦州诸诗的发端是很自然的事也愈见其史笔之真与悲怀之实。试问，如果那年收成还好，诗人就不会写出这句诗，也不应该这样写吗？读其诗应知其人，应从相当的历史背景和作者的基本情怀来把握，才不致附会其事与浅化诗情。

“因人作远游”，注家也有不同意见，但倾向诗中所指的人就是诗人的侄子杜佐的为多。《杜诗繁诂》也持此说，解得确切。从情理推想，满目堪悲，行旅必艰，要决定携家远行，也不是容易的事。体会诗人心意，似乎是：尚有人依，何惜远游。人当指具体的人。《说文·六下》：“因，就也。”《段注》：“就高也，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基趾”。《说文·五下》：“就”下，《段注》：“《广韵》曰：‘就’，成也，迎也，即也，皆其引申之意也。”是则“因”有“因依”“因趁”之意。因趁众人——随着众人而远游，也可兼有此意。“远游”，也是自屈原《远游》篇名来，杜公用以表忠悃之诚。屈原文中有句云：“步徙倚而遥思兮，怵惆怅而永怀。意荒忽而流荡兮，心愁凄而增悲。”屈杜时隔千载而同其衷情。又，亡友黄彦硕在数十年前曾向我说，“《秦州杂诗》的发端‘因人作远游’，‘人’当系‘民’之避讳（避唐太宗讳），杜甫1400首诗中用‘民’字仅有几处，有些地方显然是以人代民，此句也有可能，意谓随众民而远适。”此亦一说。

“迟回度陇怯，浩荡及关愁”。《读杜心解》释为“关谓边关，比已透到蕃警。”不确。山大中文系选本以为“关”是一般所用“关塞”之语，“关指陇关，即大震关，在今陕西陇县西。”似较允。其下“鱼龙”“鸟鼠”自与地名有关，否则“鸟鼠”尤为空泛不成语。兹不具论。

尾联“西征”实指，与“北征”亦遥遥相对。北征，“苍茫问家室”；西征，则亦心折而问烽火，总见世事艰难，民生凋弊而“道途犹恍忽”（北征）之状。意浮于辞，情弥于意。固不可以一端窥，尤不宜浅释曲解。

第二首（秦州城北寺）

前人已言，杜诗不是诗史也是图经。此作长篇 20 首，逐处有山川城郭、古迹奇景、风物民俗的描绘，见流连之情，叙哀乐之感。藉外物而表内心。这比徒发感慨与议论者大相径庭。藉物表情，情景交融，最为上乘。此诗颈联十字“苔藓山门古，丹青野殿空”，便写出了隗嚣旧宫的荒颓景象。与至德间所写《玉华宫》之“溪回松风长，苍鼠竄古瓦”“阴房鬼火青，坏道哀湍泻”同工。晚清王闿运所编《唐诗选》是唐诗选本中选得精严的一种，《秦州杂诗》20 首全选入。王选偶加眉批小评。此 20 首未加评语，唯以圈点寓意，对此首的后四句加了密圈，即“月明垂叶露，云逐度溪风。清渭无情极，愁时独向东”。王翁自视甚高，对其唐诗选本亦甚自喜。此选除首卷是王翁的仲子所书外，都是他的孙女少春手写，王以为字亦甚佳（见《湘绮楼日记》）。杜甫这四句诗清新沉郁，兼而有之，不能不令湘绮钦佩。尤以末二句情至语浑，勿庸细剖。李后主词：“自是人生长恨

水长东。”辛弃疾《菩萨蛮》词：“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读之皆使人有惊心动魄之感。杜与李、辛，可以说是情至者必有所同然，或者有所相承。有所同亦有所异，杜之“独”，李之“长”，辛之“毕竟”，则又是各自的心境与情思。

第三首（州图领同谷）

《读杜心解》谓此首将秦州地势总写。《详注》谓“今降卒多而居民少，势可危矣。”《镜铨》亦以为“尤见此邦可忧”。以为后数句写出强弱之势。杜公所忧，正在于此，非示讽实以示警。此种心境在以前作品中每有显示，盖“谋及子孙”，大臣之道，公以斥遣之臣而念念不忘及此，愈见公爱国爱民之至情至性。但如《杜臆》所引范德机云：“谓水无情而知东向，为臣子者，有人性而不知尊主之义，此子美愁时便有取于水也。”则太迂执，视杜甫为只知尊主忠主的愚暗之人了。

第四首（鼓角缘边郡）

此首结构井然。首句承上首来写角声之起，边郡即指秦州。三四句分承鼓角，“秋听殷地发”写鼓声之动地；“风敛入云悲”写角声之入云；合写鼓角声之既大且高，本不必以雷为说。《仇注》云：“殷地发，鼓声震动；入云悲，角吹凄凉。”即足。川大成善楷同志《杜诗笺记》不同意《杜甫诗选》“如雷声在地中而发声”之言，以为“殷”当为“震”之借字，说详《说文通训定声》屯部“殷”下注。《说文》“震，辟历振动者。”引雷有震动义。《尔雅·释詁》“震，动也。”秋听震地发，就是秋听动地发。与白居易《长恨歌》

“渔阳鼙鼓动地来”的“动地来”同一意境。直解以为雷声，误。树梁按：必欲以“雷”对“风”，又以《诗经》“殷其雷”为据，故有此误。又，《杜诗繁古》不以《杜臆》所云“鼓角声悲，故蝉为之静，鸟为之迟，亦以自寓”为然。引《文献通考·乐考》为证，“则鼓角声起，日之夕矣。由条件之反射，故蝉因鼓角声而静，鸟因鼓角声而迟归矣。”说便通达。故知说诗者自应“以意逆志”，顺其自然，不宜强为之说。

此诗主要写鼓角声起，益增人悲。边事难靖，万方一概，则吾道竟何所往乎！“道”兼有所行之路及所奉之道的意思。“欲夜”二字，自是写实，但黄昏时候，已易寂寥无绪，鼓角声发，尤易增感。李易安所云“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成为千古动人之句，闺情如此，国情尤然，杜公此诗，实为千古震撼人心的至情文字，尤见诗人之情深。令读者掩卷而悲思。杜公在夔州所作《秋兴》：“山楼粉堞隐悲笳”；《夔府书怀四十韵》：“中原鼓角悲”；《宿府》：“永夜角声悲自语”，不同时而同情，声声沁入心肺，令人心痛。

第五首（南使宜天马）

此首诗之中心意义，明显地是悲战马并因悲马而悲国悲人。“哀鸣思战斗，迥立向苍苍。”最为沉痛。但首联“南使宜天马，由来万匹强。”自来多以西汉“天马”为说，似是而非，不切实，与诗人当时思路难合符契。对“南使”二字多臆测，或迳以“南史”释之。钱谦益注杜引证《水经注》《寰宇记》等地理书，落实了在秦州之属地某某郡县产马、养马，早是事实，则杜甫之所感慨愈为有征，愈有针对性，

决非泛泛怀古，汗漫无所归。《杜诗繁诂》申明钱旨，复加考证，贯通无碍，乃得“即此二句，乃就秦州所牧之马而言，非指西域之来马言也。”的可靠论证。对于体察此诗的思想内容、领悟诗人之所悲感者益有助于深入，避免惆怅无根之论。

“浮云连阵没”一联，即指九节度之师溃于邺城的近事。钱云：“战马万匹，惟存三千”。《读杜心解》于“没”字有别解，殊觉牵强。而“哀鸣思战斗”一联又指军中战士虽老残而思为国戮力的近怀，士气犹振，国事战事非不可为，是在朝廷之何以自振罢了。哀鸣思战，迴立苍苍，即曹霸之画亦难如此神似，真悲壮之极。较魏武之“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千古昂扬的诗句，唯有过之。王壬秋对此一联亦加密圈，自不得不心服。王氏曾评《春望》一首“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云：“此等悲壮句，杜所独擅”。“独擅”一语，说明湘绮楼于杜确有真知，非对杜有精研深会者不能道。此首之“哀鸣”二语，弥觉悲风飒然，公所独擅也。

第六首（城上胡笳奏）

《镜铨》云“围不曰溃而曰解，讳之也。”此首诗前数句写征兵、出防之往事，后数句深有憾于邺城之败而为战士哀伤。“士苦形骸黑，林疏鸟兽稀。”二语尽之。后之《搗衣》诗：“亦知戍不返，秋至拭清砧……”，前之《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忧端齐终南，涸洞不可掇。”都是充满着对悲惨军民的同情心。盖死不足畏，为国征战尤应“努力事戎行”（借新妇口说出）。而最可恨可伤者则为视民命如草芥，指挥失策，进退失据，驱战士如犬

羊，乃有“根解邺城围”及“百万化为鱼”之创巨痛深。

第七首（莽莽万重山）

此诗首句起韵，是二十首中仅有的两首之一。此一大组诗在第一句通常不起韵的几首诗之后，突然首句起韵，与次句铿然相击，愈显突兀、挺峭。所用又系“删”韵，响亮高昂，于前一首音响较为低平的“微”韵之后突然出此，有如金戈铁马，匝地而来，令人为之震动。试读“莽莽万重山，孤城山谷间。无风云出塞，不夜月临关……”非一气读到底不可。阳刚之美，大声镗鞳。声音的妙用于兹可省。但也必须其中有物，充实而有光辉（情意内容），斯能免于虚枵、叫嚣之弊。故音调之高昂紧密又与沉郁顿挫之高格不可分割。杜甫近体诗中往往有此，甚需极意探索。

“莽莽万重山，孤城山谷间”气象阔大无比。二句与王之涣绝句“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景象约略相同。但诗体不同，韵味亦各有特异之处。王句流动飞扬，杜句浑厚凝重。杜公此诗继之以三四两句，律对精严，景绘清空，奇思壮采，合沓呈现。后半继之以叹惋，令人神往心折。

第八首（闻道寻源使）

正如赵汭所言：“因秦州为西域驿道，故汉以一使穷河源，且通大宛，如此其易；而今以天下之力，不能定幽燕，至使壮士几尽，一何难耶！是可哀也。”昔易今难，今不如昔，是此诗主旨。公自天宝乱后，以亲身的今昔经历，深感今昔之殊；复以唐代开国史实与当世相较，更感今昔大异，政治、学术、军事、财政、民生都远不如昔，而且难于振

兴。此种痛苦感情在诗篇中时有流露。如《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有儒愁饿死”，《奉留赠集贤院崔十三学士》：“儒术诚难起”等稍早一点的诗已有此感。《桥陵诗三十韵因呈县内诸官》其结构分作两截，颂古而叹今。虽出之以自叙，实有较为广阔的代表性。《行次昭陵》尤为显著，前半颂古，后半慨今，两两对照，不知涕泗之何从。以“寂寥开国日，流恨满山隅”为结，正如《镜铨》所言：“叹太宗之功，无人能继”，已明显地不止叹今、哀今而是遣今、责今了。《北征》以“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为极其凝重的结语，又是明显地以开国大业、煌煌盛世来期今励今，吞服强心剂，加强自信力。实亦显示出无可奈何、束手无策之悲感与绝望。至于几年后在蜀中所作的《忆昔》二首，特别是第二首（忆昔开元全盛日），今昔对比，极为鲜明，感情强烈，直述无讳，著诗史，行诗教，褒贬兼具，垂戒后人。这正是杜诗的极则。这对于今天执政、参政，读诗、写诗的人，研杜、学杜的人说来，都有很大的学习、参考、宣传的价值。惜乎现在注意及此的人似乎尚不为多。

第九首（今日明人眼）

此首咏秦州驿亭景物连及对自己住所的叹息。即景流连，暂得心舒。杜甫《秦州杂诗》总的心情当然是不舒畅的，但暂对景物流连，并念及自己居处，以反语出之，自合当时心境。决不是兴高采烈，乐以忘忧。故末联以假设之语出之“老夫如有此，不异在郊垌”。如有此等住所，则无异居住郊垌，惜乎不是。浦氏谓杜“用意甚曲”，杨氏谓“反看亦好”皆有体会。次联“丛篁低地密，高柳半天青。”自

是佳句，论者无异辞。

成善楷《杜诗笺记》说：“今日明人影，临池好驿亭。”李继祖等《杜甫陇右诗注析》：“明人影，使人眼明，等于说使人兴奋，大开眼界。今按：《说文》：‘明，照也。’‘今日明人眼’，今日照人眼。似较以‘明’为使动词，更富诗意。”其说较胜。但诸本皆作“明人眼”，《杜甫陇右诗注析》作“明人影”，成氏未作说明。

第十首（云气接昆仑）

此首写秦州雨景，淋漓尽致。短短篇章从几个方面来写，布置安排，恰得其宜，读者最宜留意。末联落在己身，仍见索寞之情。对“羌童看渭水”二句，注家有不同理解，不免穿凿，《杜诗笺诂》不谓然，考释详明。《笺诂》以为羌童之看渭水“乃看渭水因天雨之涨势。在此大雨之时，使节不负命，仍须前往河源而不辞辛苦也。”义既明，辞亦顺，并指出旧注引师曰：“此句甫自比也”之谬。杜公诗本系活活泼泼的语言，此首写大雨后情景如画，但一经穿凿附会，以主观想像实之，转为不可解矣。

第十一首（萧萧古塞冷）

此首承上，对雨而伤寇乱（《镜铨》）。前四句皆写雨中萧条之景。黄鹂垂翅，苍鹰饥啄，对句甚工。《镜铨》引《仇注》并以为二句亦带兴意。固可。因物抒情，托情于物，杜诗常见。但以为“且燕蓟为梗，谁成北伐之功；吐蕃在边，尚遣征西之将。故听鼓鞀而心厌耳。”则又以辞害意。《笺诂》以为安史乱后“安有命将西征之事。旧注泥于句文，附会为说，而不知此特指借汉将之西征，以见唐兵之东调，

明唐不如汉，而意存不满耳。”其说近于事理，合于事实。实事求是，实理推求，不带主观臆测，不以辞害意，不泥古不化，庶可免于“固哉高叟”论诗之讥。史书记载甚明，其时本无遣将西征之事，何至代杜发此感慨？既忽于事实，又求之过深，故有此失。

第十二首（山头南郭寺）

此首诸种主要注本解说大体相似，无甚歧义。咏寺亦以自慨。老树与空庭相得，清渠自一邑传注，各得其所，各适其宜，不因人事而悲喜。五六句浦氏以为“竟显比不舒畅矣”，似又执着。盖皆写眼前景物，各有所遭。惟人则牵于世事未能如自然物之能忘情而俯仰多悲，安能自己，故溪风亦为之飒然。上数句可以说是未附于情之物，为无我之物。末二句则为己附于情之物，为有我之物。无我之物，尚不带人之主观色彩；有我之物反是。王国维谓有我之景与无我之景，固然有此差别。但出自诗人笔底之景总不免带有作者主观因素，有我与无我也是相对而不是绝对的。读者之体会又往往附有读者之主观因素，又未必能全合作者情意。故诗无达诂，相对说来是如此，又不可一概而论。要看具体情况。

第十二首（传道东柯谷）

此诗覆盖面较广，表现了诗人对人民生活、社会存在的基本的、朴素的理想。“传道东柯谷，深藏数十家。”显示相对安稳的小规模的农村社会的景象。“深藏”而居，与外界有一定程度的隔离，也能生活自给。诗句简要，当然不能与规模具备的桃源相比。然其精神有相近相通之处。接着的二三联，“对门藤盖瓦，映竹水穿沙。瘦地翻宜粟，阳坡可

种瓜”就是这种村民聚居生活的具体写照。诗人以歆羨、愉悦的心情写了这二十个字。传言令人向往，便有往游之思。第四联“船人近相报，但恐失桃花。”是写急于欲往的心情，怕错过了桃花时节。不应如《镜铨》所说“恐如桃源之迷路”。东柯谷是明显的实实在在的山区居民点，虽可以使人把它看作桃源而羨慕，但又何能像桃源的似存非存（世间遥望空云山——王维），令人迷路。如果那样写就太落套了。而且诗人也不会把桃源称为桃花，为了叶韵。桃花源自来有简称为桃源的，却无简称为“桃花”的，从语词上说也不顺。成善楷《杜诗笺记》也已有见及此，他说“以‘桃花’为桃花源的歇后语，非是。”认为没有简称“桃花”的。

第十四首（万古仇池穴）

此首“咏仇池之胜”（《镜铨》）。感情重点在末联“何当一茅屋，送老白云边。”诗人乱离播迁，不遑居处，平生不忘忧国之志，亦不泯赤子之心。虽在乱离之中，行迈靡靡，如《北征》道途之艰危，但“菊垂今秋花”那一段诗仍然有“幽事亦可悦”之感。岂徒“嗜酒见天真”，爱山水而每见幽情：“山果多琐细，罗生杂橡栗。……缅思桃源内，益叹身世拙。”后来在成都草堂居住数年，东下之后，仍念念不忘。在三峡《怀锦水居止》云：“万里桥西宅，百花潭北庄。……惜哉形胜地，回首一茫茫！”感情之深，眷念之切，实所罕见。这首秦州诗的“何当一茅屋，送老白云边”与前后有关诸语皆显示了诗人对生活的热爱和最低限度的合理的生活要求。——茅屋足以送老，白云自可幽居，何求于它。这种“茅屋”思想，推己及人，扩而大之，便成为最伟大的

理想和最感人的诗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诗人的思想轨迹，清楚可见；其诗歌发展的万斛泉源随地而出也斑斑可考。

第十五首（未暇泛沧海）

此首与前首意境同然。起联“未暇泛沧海，悠悠兵马间”，《读杜心解》以为“翻乘桴浮海意”，亦是。“非无江海志，潇洒送日月。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已先言之。“不忍”，出自忠忱；“未暇”，亦迫于世势，总是心存家国。虽系翻乘桴意，但孔子之言是“道不行，吾将浮于海”。而道之能行与否，总是鸡鸣而起，孳孳为之，辙环天下，并未真作泛海之计。苏轼《临江仙》词“扁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虽偶生此想，抑又何能“忘却营营”（何时忘却营营）？其所营营，自非个人名利，原不待言。清代民族英雄林则徐的诗：“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正是写在鸦片战争后受屈蒙冤之时，志益励而心益坚，又安有江海之思。吾国古代圣贤、英雄豪杰其精神面貌都是如此。亟欲用世，屡挫不移，一脉相承，至今有光。“休镊鬓毛斑”，注家已注明典故出处。但杜甫年甫四十六七岁，非必如《镜铨》所言“谓无心出仕”，适以见其心情之抑郁。

第十六首（东柯好崖谷）

此首再赞东柯，有定居之计。以“不与众峰群”突出之，更以第二联“落日邀双鸟，晴天养片云”描写之。大笔开阔，佳句从未经人道过。“邀”字“卷”字，皆有情趣。

既真实又清空。诸本“卷”“养”并存，郭知达本、浦本、仇本、杨本皆作“‘卷’，或曰一作‘养’”。钱本作“‘养’一作‘卷’”。王氏《唐诗选》本只作“养”，且两句每字加圈，想亦经选择而定。其他不一一举。但见仁见智，或推或敲，无用执着。“水竹会平分”句有多解，亦可各是其是。唯《仇注》以“映竹水穿沙”释“水竹平分”，难于理解，《繁诂》已驳之。末句“儿童未遣闻”，浦以为“结言此意非儿童所知”，如此解说亦可，乃又曰“言下有装聋做哑，由他背后啧啧之慨。”此是以意度之，未必有当。“含不尽之意在于言外”，亦何用其事事说明说尽。

第十七首（边秋阴易夕）

此首写山居苦雨，《镜铨》之言是。《集注》与《杜诗言志》释“鸬鹚”二句为有所讥刺，实太穿凿离奇。眼前写景语，明白如话，岂用深求。杜公平生写景咏物之诗至夥，有寄托者，亦多无所寓意，直书所见者，岂可句句附会，浅语求深，活语求死。且如“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等传颂千秋佳句，又有何种讥刺隐含其中？解诗最在细意探求，务求其当；求之不得，不强为之词；更不应乐以己意强加作者。纵是好心，亦无助于研读反有防碍了。

第十八首（地僻秋将尽）

此首抒吐暂得安宁中亦复忧及国事的苦闷心情，写出迄无宁日的边警状况。末联意旨深远。和亲不足恃，皇帝舅、外甥等等亲昵称呼不足以安枕高卧。旧注以为末语反言“以见和亲之无益”。符合杜公情意及识见。读杜公诗，稍有窥知于公之政治见解：天险不足恃是其一，《剑门》诗显示其

旨。和亲不足恃亦其一端，此首诗可领会。夫和亲与外族友善相处，自是好事。通婚之好，也有利于国家民族之安宁，历史上也曾产生过效益。但是，不应有所恃于和亲而不修政治，不整军经武。历史教训也不少。公所熟谙。故此诗明著外甥犯舅，“何得”而竟得（拿现在的话说，就是语颇幽默）。故作不解之词而隐含至痛。也唯有责以正义而无可奈何。其后在成都所写《登楼》，益著忧愤。“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也唯有谴以正义，杜其野心。然亦无济于事。此种诗之可贵，正在其有很大的、很深刻的垂示后代的诗史借鉴作用与价值。

第十九首（凤林戈未息）

此诗意承上首而寄望于得良将而靖边。表达了众人愿望。故曰：“故老思飞将”。“飞将”如《镜铨》说以指郭子仪为是，非如旧注指李广。郭是过去征吐蕃有功者。这里的“故老思飞将”与第五首末句的“哀鸣思战斗”对比着看，一面是借马喻人，哀鸣的是真龙种，老骥骊，哀鸣思战，欲为国效力；一面又是故老思有飞将如郭子仪这样的人出挽颓势。写出问题所在在于朝廷，筑坛无时，良将无用，难于靖边而兴国。意至明而情极切。诗人对郭子仪这样早立战功的忠良大将，有认识也有好评，如《洗兵马》中之“郭相谋深古来少”，备见推许。但所颂也不止一人。今则边事有无人之叹愈可悲耳。惜人才之不得其用，国无宁日，后顾眈眈，是为二十首之中心思想，逐处显露。

第二十首（唐尧真自圣）

首联语气紧接上首，未容断割。上首以疑问语气结，此

首发端，有如应声回答：“唐尧真自圣，野老复何知。”意谓“还是请问皇上吧，我野老复何知”。首联自然不是仅为前一首的回应语，而是这一大组诗篇的总结词。

二十首诗中多少忧伤与恐惧，失望与希望，慨叹与愤懑，忆古与哀今，运笔至此，自不能不有一归结。不能不接触到一切问题的根源所在，那就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皇帝。诗人从其对漫长历史兴衰成败的认识及其对唐王朝数十年中治乱的感受与观察，认识到国乱由上不由下（盗贼本王臣），在君不在相，昔帝今帝，各有其责。诗篇言外之意屡见，直陈之词亦在。此处的“唐尧真自圣”即属于直接陈述的一例。当然其词较婉，不可能像孟子在泛论君责、君罪时赤裸裸地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那样。明知其非尧非圣而曰“唐尧真自圣”，这岂能是颂辞，当然是讽语（这又并不是在上书不得不称尧呼舜，这是自己在写诗）。接以“野老复何知”，其不满之意愈见。从伟大诗人杜甫说来，这正是他的这二十首诗必然要在最后接触到也必然会揭示出的一个根本问题。注家如浦二田所云：“首联言圣主自宁国步，野人何用杞忧，结完悲世等篇。”如浦氏所解，那是头脑昏昏，无所用心的庸愚学究、伴食大臣才会有的思想，岂能放在杜甫身上！《心解》还说：“‘仇注’，以‘自圣’为说言不入，是为腹诽矣，公不然也。”似觉可笑。试问连这一点“腹诽”都没有，还成其为诗史、诗圣，还会有如此众多的辉煌诗篇吗？人有头脑、头脑中如果还有一个是非之辨，其所以为非者便是“腹诽”，这也是很自然的。只腹诽而不口谏这自然不对，但杜甫是曾以直谏获

罪的人，其忧怀家国，刺讥时政又屡见诗篇，直言以陈，垂涕而道，又何曾只是腹诽。这里的“唐尧真自圣”已经明著诗首，又以之结束全诗，已不属于“腹诽”范围（如有的人只敢在心头不满那样）而是彰著其辞，无所隐晦了。《杜甫诗选》说：“这里说‘真自圣’，言外之意就是不愿听从朝臣的谏议了。……这两句表面上是颂扬皇帝，自认无知，而实际是牢骚话。”至少是如此。但作为20首诗的总结性的语言，又不止是发点牢骚，而是深有慨于其中，深有忧于其里，深有指于其间。

其下数句，自然是“野老复何知”，这一思想发展而来，既不能进而裨补于国，也唯有退而安置其家，“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罢了。浦二田在其注末写道：“愿学者逐首看毕后，再整精神，连章覆诵数过。”这倒是很有益于学杜诗者的话。

秦州杂诗，自是杜甫述志之作。但也是他深入乡邑、周览山川、俯察民情、细观社风的宏伟诗篇。是诗史也是图经。仇注引昔人诗云：“少陵诗卷是图经”，信然。其中边患殷忧特浓；匡时方略，亦有所表见。20首大篇是诗集中纪程碑式的作品，关系很大。这一组诗从诗艺方面探寻，也还有许多可以领会的地方。

1996 年秋

读杜甫自陇右赴成都纪行诗

唐玄宗天宝末年至肃宗至德、乾元之间，唐王朝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大变动，诗人杜甫也几度播迁，尤以乾元二年十二月自陇右赴成都为诗人一生中的一大转折点。《发同谷县》诗原注：“乾元二年十二月十一日，自陇右赴成都纪行。”这一组诗以《发同谷县》始，以《成都府》终，共12首，在诗人1400多首诗歌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论其体裁，为五古之佳作、大篇，论内容为旅途、山水诗之翼翼独造者。在很大程度上足以显示诗人在此一变动时期中的基本思想感情，而且发展了旅途、山水诗自晋宋以来的优秀传统。很值得学习探讨。但古今的论杜诗者对这12首纪行诗都还重视不足，对它们的特殊性及其成就谈得较少。本文试图对杜甫这一组纪行诗从分观到综论谈一点己见。

杜子美是一个最爱游历的人，入蜀以前，其经行之处几乎遍历南北重地。“东下姑苏台，已具浮海航”“忧戈忆勾践，渡浙想秦皇”（《壮游》），“寒芜际碣石，万里风云来”（《昔游》）。这种快游，有友朋，有豪气，有睥睨一世之慨，这是一种情况。另一种是行路所经，羁旅所在，目击山川，心忧家国，“泰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登慈恩寺塔》），“东山气鸿濛，宫殿居上头”（《奉同郭给事汤东灵湫作》），

这又是一种情况。或者登山临水而开怀，或者睹物感世而增愁，诗人的思想感情都通过这些山水行旅之作而反映了出来。安史乱中《北征》诗中的山行一节更是写山水的佳构，深沉而曲折地借山水以见意，为后世所喜诵。接着在“三吏”“三别”之后的《遣兴》3首，“下马古战场，四顾但茫然”“高秋登寒山、南望马邑州”诸作，虽不是专写山水的作品，但因地兴感也很显然。至于《发秦州》到《凤凰台》这一组五言古诗12首，则是杜甫前所未有的专以山水为题、特借山水发兴的连篇纪行的要作。《发秦州》原注：“自秦州赴同谷纪行”。这12首前纪行诗（包括不在这12首之内的《万丈潭》），处处描述秦陇山水，处处也表现了对国家、蒸黎的忧痛。既是图经，也关世运。王船山《姜斋诗话》说得好：“不能作景语，又何能作情语耶？”“以写景之心理言情，则身心中独喻之微，轻安拈出。”还说：“情语能以转折为含蓄者，唯杜陵居胜。”^①前后纪行诗共24首都具有王船山所说的这个特点和优点。《唐音癸签》说“无天宝之乱，鸣候止写承平；无拾遗一官，怀忠难入篇什，无杜诗矣。”^②这指出了杜甫后期诗歌特别是在自秦往蜀这段时间的特殊感受下所写诗歌的内在因素，这是值得发掘的。

但是后纪行诗又有它的独特之处。这组诗写在诗人寓居同谷，生活上极端困苦，俯仰身世，感时伤乱以“七歌”的形式表达了他痛苦、矛盾的衷情，回顾既往，重定行止，不得不决心去蜀之后。时艰益以家困，路难加上岁残，悲观复有壮观，失望还含希望，如此复杂、矛盾的主客观诸种因素的揉合，构成了诗人近20天旅途生活和12首纪行诗篇的基

本情调，成为诗人入蜀以后诗歌亦即占诗人诗歌总数的十分之七的作品的辉煌前奏曲。从诗人本身的创作生涯和中国诗歌史的发展来看，都是不易产生的文学珍品。

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山水诗文的兴起，有其历史的和社会的必然性，诗人们自觉地热爱祖国河山，为之倾倒，形于篇什，产生了山水诗的代表作者和不少优秀作品。但由于主客观条件的某些限制，在唐以前，还缺少多样的风格和表现方法。以山水地区而论，蜀中山水虽然号称雄奇，但写蜀中山水的作品特别是自陇入蜀以达广元、剑阁这一段艰险途程的作品甚为寥寥，可以说还是山水诗史上的一页空白。不仅诗歌阙如，即如左思《蜀都赋》也只有“于后则却背华容，北指昆仑，缘以剑阁，阻以石门。流汉汤汤，惊浪雷奔。望之天迥，即之云昏。”这些概括性的赋咏。初唐王勃的《入蜀纪行诗序》，是一篇写得很好的文章。其中“若乃采江山之峻势，观天下之奇作，丹壑争流，青峰杂起，陵涛鼓怒以伏注，天壁嵯峨而横立，亦宇宙之绝观者也。”^③再如中唐时欧阳詹《栈道铭序》也有几句描写：“秦之坤，蜀之艮，连高夹深，九州之险也。奔崖峭壁，千里无土，亘隔呀绝，巉巉冥冥，麋鹿无蹊，猿猱相生。自三代而还，蹄足莫之能越。”^④也都只能是一种概述。王勃有一首名作《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他自己也曾来蜀，却没有这方面的诗。卢照邻、杨炯、蜀人陈子昂、岑参、高适以及后来的欧阳詹等，都有蜀中的篇章，但对由秦陇入蜀道路的奇景，却都没有留下什么，或者寥寥数语，如“陇阪长无极，苍山望不穷。石径萦疑断，回流映似空”（卢照邻《入秦川界》），“南下斯须

隔帝乡，北行一步掩南方。悠悠烟景两边意，蜀客秦人各断肠”（欧阳詹《题秦岭》）。李白《蜀道难》自然是一篇横绝古今的煌煌大作，但历来对这篇乐府诗说者不一，多以为《蜀道难》是因人而作，这且不论，胡震亨谓此诗言蜀道之险并为恃险割据与羈留佐逆者著戒，比较近是。^⑤《蜀道难》言蜀道之奇险，确实令人惊心动魄。但它是通言蜀道之难，重在宏观的唱叹不在局部的刻划，与杜甫纪行诗的寸寸雕镂者自然是两回事（大抵古往今来写剑阁的诗文较多，且多从议论著笔）。像杜甫这样在艰难蜀道上日日纪行程、处处留题咏、足踏实地、步步走过来的诗人确实极少，而且能像他这些情满意溢，言近旨远，具范兼裕的作品更是千载罕有，所以十分难能可贵而弥足珍视了！

以下就后纪行诗次第分别作一些疏解和辨析。

发同谷县

贤有不黔突，圣有不暖席。况我饥愚人，焉能尚安宅。
始来此山中，休驾喜地僻。奈何迫物累，一岁四行役。
忡忡去绝境，杳杳更远适。停驂龙潭云，回首虎崖石。
临歧别数子，握手泪再滴。交情无旧深，穷老多惨戚。
平生懒拙意，偶值楼逋迹。去住与愿违，仰惭林间翮。

此诗前四句不仅为第一首之纲要且为纪行 12 首之总纲。旧注诸书皆未着重论及。杜甫之离秦去蜀，一以关中丧乱，畿辅饥荒，迁播秦州，生活也十分困难，托长镵以为命，终不能保一家之安。就食远道，随众西行，固其所宜。一则朝政混乱，正人多被贬黜，华州一官也不能自保，不得不离秦

州，冀谋暂时之安；但朝政日非，决难回返，又不得不作远游之计。而尤为重要的是希望实现他平生的抱负。早年许身之际，就已“窃比稷契”，晚岁膺拾遗一职，更是自觉地冀能贡一愚之诚对朝廷有所匡救，对民生有所裨益。而在秦陇之间无所可为，远去成都，依倚故人，或者能有所施展。所以这首诗的发端即以圣贤自励，意谓孔墨尚且席不暇暖，突不得黔，四处播迁，期行其志，像我这样计拙生困而以圣贤之志为志的人又何畏再一次的远道徼征呢？如果仅是为了生活问题而远适蜀门，那就决不会有此诗开头数句的深切著明之辞。《仇注》云：“以古人自解”，窃以为不仅自解，直是自励、自誓之辞，关系甚大。读杜公秦州前后的许多诗篇，更可知此诗的用意。前纪行诗关怀国难与民瘼者，比比皆是：如“胡马屯成皋，防虞此何及。嗟尔远戍人，山寒夜中泣”（《龙门镇》），“奈何渔阳骑，飒飒惊蒸黎”（《石龛》），“白马为铁骊，小儿成老翁”（《泥功山》）等。其《凤凰台》结句“再光中兴业，一洗苍生忧”更恰好是《发同谷县》起句的注脚。杜甫说他“深衷正为此”，诗人蜀道之行也正是为了此物此志啊！

“一岁四行役”的四次，旧注自明。赵次公举《诗经·陟岵》以明行役用语的由来^⑥。按《陟岵》的旨意是“夙夜勤劳，不得止息”，杜公正足以当此。再此诗末句“仰惭林间翻”，旧以陶潜“迟迟出林翻”为注。现代也有人以为即渊明“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之意。按杜诗此句与陶句形似而实异，陶意在“心念山泽居”^⑦，重在不能遂其隐；杜意在不如林间翻心到翻随，重在不得行其志。重点不同，心

迹各异。观“偶值棲遁迹”之“偶”，杜公之意固不在于遁世。至“去住与愿违”一语，又重在无论去与住皆未能达其稷契之志也。

木皮岭

首路采亭西，尚想凤凰村。季冬携童稚，辛苦赴蜀门，
南登木皮岭，艰险不易论。汗流被我体，祁寒为之暄。
远岫争辅佐，千崖自崩奔。始知五岳外，别有他山尊。
仰干（一作看）塞大明，俯入裂厚坤。再闻虎豹斗，
屐踖风水昏。高有废阁道，摧折如断辕。下有冬青
林，石上走长根。西崖特秀发，焕若灵芝繁。润聚金
碧气，清无沙土痕。忆观昆仑图，目击玄圃存。对此
欲何适，默伤垂老魂。

旧注皆引《方輿胜览》，木皮岭在同谷郡东20里，杜甫发同谷，取道经此入蜀。《钱注》云：“黄巢之乱，王铎置关于此，以遮秦陇，路极险阻。”以后证前，亦足见道路之艰险。此为杜甫行程之始，诗中着意刻划山川形势，层次分明，描绘入微，突现其险之状。先以“不易论”概言之，继从俯仰之间来观察，极言天之高，地之厚，不言山高谷深而自见。再以虎豹之斗为渲染，写出惊恐万状。更掌握山水间的特殊景物已废的古代阁道和经冬不凋的冬青林。“石上走长根”，备见大山石上盘根错节的形象；“摧折如断辕”，足见年代久远，遗迹犹存。这里的废阁道，《钱注》引《水经注》以诸葛亮与兄诸葛瑾书所云“其阁梁一头入山腹，一头立柱于水中。”又云：“顷大水暴出，赤崖以南，桥阁

悉坏”，即是杜甫诗中所言。按诸葛亮与兄瑾书还说：“前赵子龙退军，烧坏赤壁以北阁道。”^⑧杜诗当即指此。

此诗既写山川艰险之观，也兼及山川“清润”的一面，这就把木皮岭的特点更为周至地写出，完全可作图经看，可补《水经注》等书之所不及写，但又是一幅有声之画。至于汗流被体，祁寒为温，以视《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中的“霜严衣带断，指直不得结”，都是写真实，异曲而同工。结语“对此欲何适，默伤垂老魂”，蕴含许多情意，也开启了下面的篇章，结构上有重要作用。

白 沙 渡

畏途随长江，渡口下绝岸。差池上舟楫，杳窕入云汉。
天寒荒野外，日暮中流半。我马向北嘶，山猿饮相唤。
水清石礚礚，沙白滩漫漫。迥然洗愁辛，多病一疏散。
高壁抵崑崙，洪涛越凌乱。临风独回首，揽辔复三叹。

钱、仇两家注皆据《方輿胜览》以白沙、水会二渡俱属剑州。《读杜心解》及《杜诗镜铨》则以为剑州在剑门南，此去剑门尚远，当即成州渡嘉陵江处。按浦、杨之说为是。剑州在剑门南。在唐属剑南道北部，成州属陇右道东部，白沙、水会尚在成州境内。从纪行诗次第看，二诗远在《剑门》之前，可证。

此诗着重写水行情景，格韵高绝。世多称《北征》中山行一节，如晚清张廉卿曾说：“就途中所见随手生出波绪，兴象最佳，须玩其风神萧飒闲淡之妙。”^⑨这固然不错。但如《白沙渡》《水会渡》这些诗则少经人道。白沙诗亦自风神萧

飒，韵美而旨深，不仅以辞采见长。此诗初读，俨如读到谢康乐的作品，一种“窥情风景之上，钻貌草木之中”（《文心·物色》）的意趣爽人心目；再则全诗几乎皆以偶句出现，一种排组整齐之美也如读谢诗的许多篇章。谢诗如《七里瀨》写旅途秋晨情景，幅短韵长，辞新气逸，与杜甫白沙诗颇有类似之处。这也使人感到杜甫善学古人，写山水便能吸取六朝山水诗的精华。但以白沙诸篇而论，流转自然，并没有灵运诗篇往往存在着的板滞之失。意境也更深美。这又是杜甫在山水诗方面也大有发展的地方。现代有人说谢灵运的“对待山水，也是以统治者的姿态出现的，他认为山水是供他赏玩的。”“他笔下所写的山水，如‘江山共开旷，云日相照媚’，就和写生画家画面上的风景素描一样，画里看不到作者的存在，作者和山水间有着一定的距离。”^⑩这是说到了谢诗的要害处。经历不同，遭遇各异，思想、抱负也大有差别，此所以终成其为老杜之诗。

杜甫此诗纯是一幅由陆转江、深冬江行的长卷画图。首云“畏途随长江”，不免踟躅；继而“杳窅入云汉”，暂得舒畅。“云汉”一词很精当，既切地理（《仇注》已云，“长江”乃嘉陵江，即西汉水，故比之云汉），又逗神思（《诗》“倬彼云汉”，云汉乃天河）。天寒荒野，寂然无人；日暮中流，为时已晏。而“我马向北嘶，山猿饮相唤”是写“声”的上乘，也是写“心”的妙品，物声、心声已达不可分辨之境。这里使人想到《北江诗话》：“‘静者心多妙（杜诗）’。体物之工，亦惟静者能之。”^⑪究其根源，更在于情深之故。《姜斋诗话》说：“含情而能达，会景而生心，体物而得神，则

自有灵通之句，参化工之妙。”^⑩杜公这些诗句是最好的例证。昔人曾以“胡马依北风”来释“我马向北嘶”，这也是得其神理的。“水清”二句，的是冬水渐枯之景。“愁辛”二语，直抒胸臆，本欲疏散洗愁，而其结语乃只能临风回首，揽辔三叹。盖景可移情，但终究是情支配着景；诗可遣愁，而愁不免仍见于诗，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当然这也是因人而异的。钱钟书同志《管锥篇》谈陆机《文赋》有云：

“信情貌之不差，故每变而在颜；思涉乐而必笑，方言哀而已叹”。按情动而形于言，感生而发为文，乃“乐”而后思“涉”，“哀”而后方“言”；然当其“涉”也，“言”也，哀乐由然复从中来，故“必笑”、“已叹”。既兴感而写心作文，却因作文而心又兴感。其事如鲍照《东门行》：“长歌聊自慰，弥起长恨端”，杜甫《至后》：“愁极本凭诗遣兴，诗成吟咏转凄凉”，杨万里《己丑上元后晚望》：“遣愁聊觅句，得句却愁生。”此一解也……^⑪所讲甚为透彻。再则杜甫此诗的末句，与《离骚》结尾“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又何其类似！虽然屈、杜的时代背景和己身遭遇都各有不同，但一则眷怀故国，欲他往而不可；一则心存魏阙，将远适而兴叹，这同样是极其自然、极为崇高也极端感人的！

水 会 渡

山行有常程，中夜尚未安。微月没已久，崖倾路何难。
大江动我前，汹若溟渤宽。篙师暗理楫，歌笑轻波澜。
霜浓木石滑，风急手足寒。入舟已千忧，陟岵仍万盘。

迴眺积水外，始知众星乾。远游令人瘦，衰疾渐加餐。

《浦注》引《一统志》，“嘉陵江过略阳，会东谷等水，恐即此处”。《镜铨》亦采此说。诗写拂晓行船情事。写得很精采的是：一，“迴眺积水外，始知众星乾”。前人如朱鹤龄已言其妙，朱云：“言水势汹涌，星汉之行，若出其里，非登岸而迴眺水外，几不知天水之为二也。”^④一个“乾”字用得新鲜、精切，有了这两句诗，也更见前面的“涵若溟渤宽”句确从实感中来，并非泛泛夸大之语。二，“篙师暗理楫，歌笑轻波澜”，既逼真地写出了拂晓行船，天未大明，一时水声笑声并作的真实景象，又对勇敢、熟练的篙师发出了由衷的赞美。试把杜甫此诗与李白《秋浦歌十七首》“其十四”的“赧郎明月夜，歌曲动寒川”比着读，当更会感到两位伟大诗人跳动的心多么接近，而又与被压在下层的广大劳动者的心灵有多少相通之处啊！

飞 仙 阁

土门山行窄，微径缘秋毫。栈云阑干峻，梯石结构牢。
万壑欹疏林，积阴带奔涛。寒日外淡泊，长风中怒号。
歇鞍在地底，始觉所历高。往来杂坐卧，人马同疲劳。
浮生有定分，饥饱岂可逃。叹息谓妻子，我何随汝曹。

飞仙阁之地理位置，注家引《水经注》《华阳国志》《方輿胜览》诸书为说。今按《重修广元县志稿》所载：“飞仙岭二里许有阁巍然，三面绝壁，俯临关门，有飞起之势，所谓飞仙阁也。”^⑤《全唐文》载欧阳詹《栈道铭》云：“维北则秦，维南则蜀。地缺其间，坤维不续。斗起断岸，屹为两

区。秦人路绝，蜀火烟孤。”^⑩正是飞仙阁一带的栈道。其《序》写栈道之艰难设置有云：“故有为舟以济川，为梯以逾山。唯兹地有川不可以舟涉，有山不可以梯及。粤有智虑，以全元造。立巨衡而举追氏，缒悬纆以下梓人，猿垂绝冥，鸟傍危岑。凿积石以全力，梁半空于木栅。斜根玉垒，旁缀青泥。截断崖以虹矫，绕翠屏而龙蜿。坚劲胶固，云横砥平。”^⑪这是在杜甫以后写栈道的很好文字。杜诗《飞仙阁》首数句，着墨不多，也写出了阁道的建造之难和形势之险。“栈云谓高栈连云，梯石谓垒石为梯”（《仇注》），均见用字之精审。其下数语写从栈阁中行进情况，日照之所不及，风怒而不能止，并以万壑疏林、积阴奔涛缀其间。昔人谓“非身历者不能形容”（朱鹤龄语），良是。后数句写险后思险之情，末以叹息作结，自在情理之中。后面四首续写栈道，而《飞仙阁》开其端。清王士禛《飞仙阁》诗：“仰眺飞仙阁，鸟道危一线。弯环历三朝，向背穷九面。”^⑫又蜀人李调元《飞仙阁》诗：“上有连云愁，下有沈潭黑。”^⑬也都是亲身经历之所得。

五 盘

五盘虽云险，山色佳有余。仰凌栈道细，俯映江木疏。
地僻无纲罟，水清反多鱼。好鸟不妄飞，野人半巢居。
喜见淳朴俗，坦然心神舒。东郊尚格斗，巨猾何时除？
故乡有弟妹，流落随邱墟。成都万事好，岂若归吾庐。

旧注引《一统志》，五盘岭又名七盘岭，在保宁府、广元县北170里。按《重修广元县志》云：七盘关，在“县北

150里，五盘岭上，杜甫咏‘五盘虽云险，山色佳有余’是也。界邻陕西南羌县。”此诗写淳朴风俗如画。经行险道，不忘观赏佳景，鱼鸟亦有可乐者，可见杜老心怀的坦荡。但潜存胸臆深处的家国之忧，于精神稍舒之时，便又冒出，不可遏止，终发“成都万事好，岂若归吾庐”之叹。盖归乡之念与望治之情本是一回事，时清方可言归。岑参有《早上五盘岭》诗：“平旦驱驷马，旷然出五盘。江回两岸斗，日出群峰攒。”可参。

龙 门 阁

清江下龙门，绝壁无尺土。长风驾白浪，浩浩自太古。
危途中萦盘，仰望垂线缕。滑石欹谁凿，浮梁袅相拄。
目眩陨杂花，头风吹过雨（一作飞过雨）。百年不敢料，
一坠那得取。饱闻经瞿唐，足见度大庾。终身历艰险，
恐惧从此数。

旧注据《元和郡县志》《寰宇志》，龙门山在利州绵谷县东北82里。一名葱岭山。有石穴高数十丈，其状如门，俗呼龙门云云。按《重修广元县志稿》谓广元“县北八十二里，实百一十三里。即龙洞背。府志谓在千佛崖洞，似误。考《方輿胜览》云‘其地阁道虽险，然在山腰，只有微径。独此关石壁陡立，虚凿石窦而架木其上，较他处更险’，则非千佛崖侧也。”^⑩又清王士禛《蜀道驿程记》：“上龙洞背两山夹峡，一山如犴龙奋脊，横跨两山之间，下有洞似重城，门可通九轨，水流其中，下视烟雾蓊郁，不测寻丈，自是盘折而上，骑龙背行，四望诸山，如剑芒牙戟。”据此益可知

龙门之险峻。王士禛尚有《龙门阁》诗云：“乱水趋嘉陵，波涛势交汇。万壑争一门，雷霆走其内。……咫尺剑门关，益州此绝塞。”足见龙门之险还在于水。浦二田云：“飞仙之险在山，龙门之险尤在下临急水。”可见杜甫《龙门阁》诗早已掌握住这种山水特点而又重点地雕镂呈现。《蜀道驿程记》所谓“两水夹峡”，《方輿胜览》所云“石壁陡立”，即杜甫此诗之首联“清江下龙门，绝壁无尺土”也。王所云“门可通九轨，水流其中”；“乱水趋嘉陵，波涛势交汇”，即杜甫此诗之“长风驾白浪，浩浩自太古”也。他皆类此。独杜甫此诗之“目眩陨杂花，头风吹过雨”为未经人道之言。此等诗尤“非身历者不能形容”。而遣词之妙，状物之工，又早在苏轼“光摇银海眩生花”之前了。赵次公云：“目之昏眩，如见杂花之陨；头或生风，如过雨之吹，皆言其地险绝而然也。”^②由险思险，预思他日，所以篇末四句正如利箭在弦，不得不发，诗人高立龙门阁上的一枝箭直射到将来或当历险的瞿唐、大庾之札。诗心超越了时间、空间的界限，即“神思”之为用。杜诗常有此种笔力，攢万里于眼前，缩百年于一瞬，这真是伟大诗人的观世“法眼”。而“终生历艰险”亦在所不辞，这也足瞻诗人知难而进的坚毅精神。岑参《赴犍为经龙阁道》诗所指即此龙门阁。较杜甫此诗稍早。岑诗有“汗流出鸟道，胆碎窥龙涡……江路险复永，梦魂愁更多”^③等句，所写之险也重在水，亦甚精警。

石 柜 阁

季冬日已长，山晚半天赤。蜀道多早（一作草）花，江

间饶奇石。石柜曾波上，临虚荡高壁。清晖回群鸥，暝色带远客。羈棲负幽意，感叹向绝迹。信甘孱懦婴，不独冻馁迫。优游谢康乐，放浪陶彭泽。吾衰未自由，谢尔性所适。

石柜的得名，杜诗各家注均未提到。据《重修广元县志稿》，石柜关在“县北十里，千佛崖南首。石壁峭削，秦汉架为栈。唐韦抗乃凿石成道，立阁如柜，因以为关。”^⑧据《新唐书》韦抗传，石柜阁的建成当在开元之初，杜甫于数十年后经此。此诗前半写景，后半书怀。游赏之余，感慨系之。写景仍然是句句生新，扣住了季节和地区的特征，不可移易。感慨就比前数诗更为深沉。谢灵运，公以优游目之；陶渊明，公以放浪称之。对谢、陶都显示出羡慕的意思。谢灵运的优游，还是形迹上的自由，谢诗“既笑沮溺苦，又哂子云阁。执戟亦已疲，耕稼岂云乐。”旨在不劳心力，潇洒自然，可为佐证。陶渊明的放浪，是不欲心为形役，希望纵浪大化，不喜不惧，任性乐天，是一种精神上的大自由（当然陶潜也有他的另外一面），更为高级的一种自由。但是二者虽然都为杜公所羨，却又不欲为。而以“吾衰未自由”为解。“终愧巢与由，未能易其节”（《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飘蓬踰三年，回首肝肺热”（《铁堂峡》），杜公固已屡屡言之。这也就是杜甫自知不同于陶彭泽也更不同于谢康乐之所在。道不同，不相为谋，所以终究只能说“谢尔性所适”罢了。此诗是因山川而思谢陶，借古人而明己志。

桔 柏 渡

青冥寒江渡，驾竹为长桥。竿湿烟漠漠，江永风萧萧。
连竿动袅娜，征衣飒飘摇。急流鸂鶒散，绝岸鼉鼉骄。
西辕自兹异，东逝不可要。高通荆门路，阔会沧海潮。
孤光隐顾盼，游子怅寂寥。无以洗心胸，前登但山椒。

桔柏渡已渐近剑门，在今昭化县境，亦作吉柏。《旧五代史》卷五十一《宗室列传》第三《魏王继岌传》：唐同光三年，庄宗下制伐蜀，“以继岌为都统……时伪蜀主王衍率亲军五万在利州……王衍闻其败也，弃利州奔归西川，断吉柏津浮梁而去。”此即杜诗《桔柏渡》所写的津渡，王衍所断的浮梁，即杜诗中的“竿”，今称竹索桥。杜诗描写长长的竹索桥，能再现其姿态，使读之者觉索桥宛然在目。诗句不仅以竿湿竿动清晰地触动读者的视觉。而且使人恍如听到寒风萧萧之声，寒江滚滚之声，行人征衣飘摇之声，长长连竿闪动之声，还有桥下波中鸂鶒、鼉鼉飞游之声一时并作，构成了索桥渡口美妙而特异的音乐。马克思曾经有这个意思，如果没有懂得音乐之美的耳朵，那么最美的音乐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这样说来，如果能以审美之耳来读这种有声之诗，则琴弦乍动，乐声并作，都附丽于这音调天然的字里行间而无所隐藏。否则也便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了。鸂鶒、鼉鼉、《王状元集百家注编年杜陵诗史》注为“鸂鶒、喻舟舫；鼉鼉，喻桥梁。”^⑧仇注不从，以为二者“皆桥下所见之物”，甚是。盖鸂鶒散是因水流之急，鼉鼉骄是因水流之大，绝岸谓不见崖岸，指水大也。杜诗下字皆有理可寻。

此诗下半，赵次公以为“言我西往于蜀，自此分异，而水则东逝而通津门、会沧海，为不可要挽也。”^④连日缘江而行，至此与江告别，江不可挽，人也不可留，即将陆路长驱，直叩剑门而望成都，离家愈远，心事愈烦，不免惆怅，但心胸无可洗，烦忧无可解，也惟有寂寥长往，登向山椒而已。纪行诗至此告一段落，后面又是一种新的境界和一篇新篇章。

剑 门

惟天有设险，剑门天下壮。连山抱西南，石角皆北向。
两崖崇墉倚，刻画城郭壮。一夫怒临关，百万未可傍。
珠玉走中原，岷峨气凄怆。三皇五帝前，鸡犬莫相放。
后王尚柔远，职贡道已丧。至今英雄人，高视见霸王。
并吞与割据，极力不相让。吾将罪真宰，意欲铲叠嶂。
恐此复偶然，临风默惆怅。

杜甫行踪至于剑门，这是西蜀门户之地，故又以“蜀门”视之。山川变易，心情也为之一振。入蜀纪行诗前数首主要描写大自然景色，蜀道艰难，这首《剑门》转而以为议论为主，一抒安邦之见。《杜诗镜铨》说：“以议论为韵言，至少陵而极，少陵至此等诗而极，笔力雄肆，直欲驾《剑阁铭》而上之。”这是很有见地的话。到剑门以前所经之地，历来诗文皆少，独杜甫以组诗写之，为山川增色。但剑门一地，则历代诗文至夥，多半是以写景为主，加上一些身世之感；也有鉴古思今，借此发出一些议论的作品。好诗自然也不少。但纵观剑门形势，从政治上立说者，多半是因依晋人

张载《剑阁铭》的观点，以“在德不在险”为其中心思想，含警戒的意思。也有别具识见者究属少数。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对杜甫《剑门》诗的理解，自来注家和评论者又大体有两种不同的理会。一是把《剑门》看作与《剑阁铭》同一思想，意在警戒负固割据的人，告以险不可恃；一是认为《剑门》思想与《剑阁铭》不同，旨在劝戒朝廷要以安抚边邑为重，而使险不足虑。《读杜心解》说：“孟阳之铭，是一篇喻蜀文，有德不在险意，故其词曰‘凭阻作昏，鲜不败绩。’为反侧子告也。子美之诗，是一篇筹边议，有怀远以德意，故其词曰‘后王尚柔远，职贡道已丧。’为当宁者告也。”^⑧今按浦氏之说实当，但语焉不详，尚未能扣紧诗句阐明杜公的旨意。

现在先谈对《剑门》诗的拙见，杜公身丁丧乱，目击时艰，安史之乱未平，藩镇之忧渐萌，但是唐王朝还是个表面上大一统的国家，如何加强朝廷力量，振兴政治，使平乱筹边，两有所成，这是杜甫朝夕思虑的事。他又岂能在这个时候以警告地方势力为主要宗旨来写《剑门》诗？尊王救乱是其素志，当然会从贡愚诚于中央政府为出发点来写《剑门》。再则乱之所生，在上而不在下，平乱于已然和防患于未然都应是责在朝廷君臣，杜甫许多诗篇都表现出了这种思想。所以他认为为朝廷进一言才是务本之论。《剑门》的篇幅虽然不长，但还是“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珠玉走中原，岷峨气凄怆”（《仇注》谓曾见旧人手卷，此二句上有“川岳储精英，天府兴宝藏”两句，可信。蜀地富饶，杨炎《请留崔宁以收蜀奏》亦言之。^⑨，是全诗的核心。“岷峨”，指蜀民；

也可以说，连岷峨之山都含凄怆之气，更何况蜀人。观《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的诗，至谓“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战慄”以及入蜀以后的“哀哀寡妇诛求尽”“已诉诛求贫到骨”及“有同枯棕木，使我沉叹久”等诗足以明了杜公实深致恨于诛求之政和聚敛之臣，并认为是致乱之源。此诗的“职贡道已丧”一语，《镜铨》解释甚洽，即“职贡修而淳朴道丧”，欲回复三皇五帝前已不可得（此即儒家之怀念先王），但能稍纾民困、力葆淳朴也不致分崩离析了。杜以为“并吞与割据，极力不相让”的局面皆由剥民而生，给公孙述辈以可乘之机，并非天险所造成。至于“吾将罪真宰，意欲铲叠嶂”，浅言之，是指剑门之险，有时可以资乱；“一夫怒临关，百万未可傍”，有利于割据势力。深言之，则所欲铲者还在于朝廷与黎民之间的“叠嶂”，即残民之裨政是也。末语恐蜀乱偶然复有，诗人已有这种预感和隐忧了。朱鹤龄说：“蜀为财赋所出，自明皇临幸，供亿不辍，民力尽矣，民力尽而盗寇乘之，晋李特流人之祸，可为明鉴。此诗故有岷峨凄怆与英雄割据之虑也。”亦是此意。

再言历代有关剑门诗文，多形容天险，或言在德不在险。张载《剑阁铭》、李白《蜀道难》不用说了。唐玄宗诗《幸蜀西至剑门》，“翠屏千仞合，丹嶂五丁开……乘时方在德，嗟尔勒铭才。”岑参亦有入剑门诗，论其工力，足与杜诗相掎。诗云：“双崖倚天立，万仞从地劈。云飞不到顶，鸟去难过壁。速驾畏崖倾，单行愁路窄……刘氏昔颠覆，公孙曾败绩。始知德不修，持此险何益。”^②殊鲜新意，较杜自

有逊色。他如李德裕、薛逢的诗都只在剑门形态上刻划罢了。宋人作者也不少。陆游“自昔英雄有屈伸，危机变化亦逡巡。阴平穷寇非难御，如此江山坐送人。”亦险不足持之意。明清人咏剑阁的诗尤其多，但有思想分量者殊少，蜀人李调元《剑门》五古亦是佳作，归结到“天栈不足恃，修德乃弭凶”。张之洞《剑阁》七律：“刘宗北去李雄来，纵辟昏狂衍昶衰。几见一夫当道守，徒怜双剑倚天开……”^②甚有气势。总之，好诗也不少，但古今来有关剑门之作求能与杜甫《剑门》诗识见、襟怀、气韵、辞采相匹敌者实难其选。至于“连山抱西南，石角皆北向”诸句，前人已多赏之，兹不具论。

鹿 头 山

鹿头何亭亭，是日慰饥渴。连山西南断，俯见千里谿。
游子出京华，剑门不可越。及兹险阻尽，始喜原野阔。
殊方昔三分，霸气曾间发。天下今一家，云端失双阙。
悠然想扬马，继起名碑兀。有文令人伤，何处理尔骨！
纡余脂膏地，惨淡豪侠窟。仗钺悲老臣，宣风岂专达。
冀公柱石姿，论道邦国活。斯人亦何幸，公镇逾岁月。

《四川省志》，鹿头山在德阳县北30里。据《太平寰宇记》，鹿头山自绵州罗江县迤迳入德阳，昔有张鹿头居此造兵，因以为名。唐高崇文破刘辟于此，后人因建鹿头关。又按《德阳县志》卷六，唐高崇文破刘辟于此，盖即汉之绵竹关也。又县志卷十一，鹿头关即汉之绵竹关，唐之鹿头关。关凭绵江为险，地势雄峻，自汉迄唐，屡为战场。

晚唐郑谷有《蜀中》3首（《全唐诗》卷六七六），其第一首云：“马头春向鹿头关，远树平芜一望间……”盖即指此。“远树平芜一望间”，的是山行已尽、畅望平原之景。又苏轼《送贾讷侔眉二首》有句云：“鹿头北望应逢雁，人日东郊尚有梅。”皆指此地。又《德阳县志》载清人张怀泗《鹿头关》诗，“岌岌危峰尽，荒荒大野开”，也写出了鹿头关的特点。

杜甫这首《鹿头关》，早已点明鹿头特色，“连山西南断，俯见千里豁”。似更优于郑、张之作。此诗首联“是日慰饥渴”，《仇注》云：“应璩诗：‘以副饥渴怀’。”今按“以副饥渴怀”是应璩之兄应瑒的诗，其题为《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末句为“凡百敬尔位，以副饥渴怀”（《文选》卷二十）。《仇注》误引。但杜诗首联，确与“以副饥渴怀”意近。“是日慰饥渴”者，意谓山行至此，俯见平陆，目的地的成都已在望中，行役多日，可得安息，也足慰饥渴之苦了。写得何等真切！故下面以“连山”二句点明足以慰饥渴之由。其下四句，重言以申明之，前此之艰苦一扫而空；今日欢愉之情可见。

中间八句为忆古之辞，浦二田以为乃“凭古以庆今……伤往以悼己”。按凭古者，指先主霸业炳然，天下三分，今为一统；伤往者，谓扬马文章，今无所用而只令人伤。将到成都，便兴怀于蜀都之古人，语语落实，所思者大。赵次公云：“以二人文章之祖，故思之耳。”亦是。

篇末八句首言蜀郡之霸业、文章及物产、人才，脂膏言物产的富饶，豪侠言人才的英俊。旧注引《上林赋》、《华阳

国志》为证，自是。惟“惨淡”一词，旧注未及。按“惨淡”早见于《世说新语·言语》，杜诗屡用此词，如“惨淡苦士志”（《送从弟亚赴何西判官》）“惨淡向时人”（《寄张十二山人彪三十韵》），“惨淡风云会”（《谒先主庙》）等。有辛苦凄凉之意，这句诗还有人才未必尽得其用的意义。次言治理重镇，端在老臣。接着明白点出冀国公裴冕，以颂扬之词寓勸勉之意，为蜀民的庆幸即对裴冕的瞩望，不仅遣词得体，也可规杜公之来成都正带着满怀希望。此末尾数句回映着12首的发端“贤有不黔突，圣有不暖席”，愈见诗人操心之苦和诗篇光焰之高。

成 都 府

翳翳桑榆日，照我征衣裳。我行山川异，忽在天一方。
但逢新人民，未卜见故乡。大江东流去，游子日月长。
曾城填华屋，季冬树木苍。喧然名都会，吹箫间笙簧。
信美无与适，侧身望川梁。鸟雀夜各归，中原杳茫茫。
初月出不高，众星尚争光。自古有羁旅，我何苦哀伤。

此为后纪行诗12首的末章，诗的结尾处真可说是“篇终接混茫”。12首诗浩浩瀚瀚，曲折往复，终于音响既绝而情韵不匮。含不尽之意，见初始之心。末联是旅途生活20天的结束语，也包含着面对新的生活的无限情思。“我何苦哀伤”是自宽之词更是自励之语，愤悱之意显然。准此而言，则前面的“初月出不高，众星尚争光”很可能有一种寓意，不会是写月终夜景的一般诗语。即使是写眼前天空景色，也多半蕴含着藉表对朝廷、对国家十分关心之意。因此

很想振奋有为而不欲苦伤羁旅。从文理说来是如此，从时世看来也大致相合。当时肃宗初立，左右尚多小人，世乱未平而地方势力渐已钳制不了。所以王伯厚《困学纪闻》提出这种解说，以为二句“谓肃宗初立，盗贼未息。”^⑧师尹也认为“初月喻肃宗初即位，众星喻安史之徒与天子抗衡。”^⑨虽然朱鹤龄不赞成此说，以为二句是本曹植《赠徐干》诗中之句。但联缀上下句来看，朱说未必为当。《读杜心解》说：“不知不借喻，则结联如何缀属？”正是如此。读诗不可附会，例如昔人有谓杜诗《月夜》“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为指肃宗与张后，这自然不免穿凿。但结合历史情事把诗句放在诗中而细绎深探，得出合于情理的解释，这应当说是以意逆志而不是师心妄解了。其上有“鸟雀各有归，中原杳茫茫”（自然也含有望乡思乡之情），其下有“自古有羁旅，我何苦哀伤”，则“初月”二语也可意会了。

此诗写初到成都所见的情景，素描几笔，确实画出了1200年前成都这一个“名都会”的繁华景象。房屋、树木、音乐、气候、无不如实写出而又臻于化境。“喧然”有应接不暇之势，“信美”则由衷赞叹之情。既多愉悦，复杂哀愁。

此诗前段，如果与《羌村》比较，都是形象鲜明，语言如话。《羌村》是写乍返旧居，这首诗却写的是初临新地，这又大有不同。两首诗也正符合各自的景情而一字不可移动。

12首诗以《发同谷县》起，以《成都府》结，绘出了陇蜀山川的长长画卷，使我们今天读起来还觉得好像随着诗人也亲身经历到一样，甚至比我们今天坐着火车许多次走在

宝成铁路上的所见所感（当然除铁路工程外）还更清晰与亲切，这不能不深致景仰和感谢我们的伟大诗人！

……

自陇古赴成都纪行诗 12 首在诗歌艺术上的成就很高，这里略从几点来说：

一是牢笼山川草木，图其貌，摄其神，发天地之奥秘，纪道途之艰辛，使其凝结在十余篇有声之画的文字中而呈现于千百世读者的耳目前。诗人不仅不畏跋涉崎岖蜀道的困苦而努力遍征，而且不畏以诗歌形式刻画奇特蜀道的大不易而穷力追摹。这是一种勇士的精神。可以说后纪行诗十二首是勇士加诗人的产物。历历蜀道，特别是剑阁以北，在多少年代中多少地方都还未经人道。“江山如有待”，正待像杜甫这样的无畏诗人来寸寸行之，一一道之，且用连篇诗歌的新形式来道之。走熟路易，走生路难，闯出新路尤难。从艰难蜀道来说，诗人走的是生路，从山川行旅的诗歌历史说，诗人更是自己闯出了一条新路。当然这也包含着继承前人的某些创作经验在内。观察不易，表现尤难，用连篇歌咏来表现更是难乎其难。诗人填写了蜀道山川的一段空白，开启了诗歌史上的一页新篇。有人曾经说过：“游山诗，永嘉山水主灵秀，谢康乐称之；蜀中山水主险隘，杜工部称之；永州山水主幽峭，柳仪曹称之。”^④还有人说：“游山水者，秦蜀诗学杜老，江浙诗学康乐，滇粤诗学仪曹，边塞诗学嘉州。”^⑤这当然是各有所主和所成，但杜老蜀道诗不仅写出山川的险隘，而且往往于平凡中见出奇突，更于山水诗中备见性情。王嗣奭说：“公之游，自发秦州以来而始奇。”^⑥后纪行诗 12

首应视为杜甫诗卷中的《蜀道难》，其写法不同于李白之作，正是各有所能与不能。但杜甫的纪行连篇，无论各首的细部描写或全诗的前后联缀，都充足细细寻绎而余味无穷。诗人之所以取得艺术上的高度成就，这与他严肃刻苦的创作态度和勇敢、敏锐的创新精神分不开。“意匠惨淡经营中”，正应细察其惨淡经营之处。这是最值得后人体会和学习的。

一是激发爱国热情，热爱国家的感情居于全诗的统帅地位。诗人前行蜀道，回望故乡，或喜或愁，或忧虑，或赞叹，都根源于对国家热爱的肺腑之情，这是纪行诗的灵魂。没有一片赤诚之心就没有纪行诗的高度艺术成就也就失却了它对读者的感染与震撼的力量。诗人写纪行 12 首，既是全力赴壑也是全我输心，绝不同于某些为写山水而写山水刻画虽工而情感淡漠的诗作。那只是一种机械式的照像师的技术表现罢了。王国维《人间词话》谓“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虽然是论词，于诗也相通。有我、无我是相对而言，各有其造诣。但文学艺术总要表现出作者的个性，绝对的“无我”之作恐怕没有，但相对的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之别则是存在的。杜甫纪行，所写多是有我之境，某些地方则有强烈的我。12 首纪行诗可以说是以我的思想感情为经、以山川途路为纬，交织而成。全组诗有一条若显若隐的线，贯穿其间，即作者内在的感情、思想，或发为议论，或不发为议论；或有感叹之声，或者寂然无所闻，但这一条线是始终存在的。洪亮吉曾说：“皮陆诗，能写景物而无性情。”这是值得注意的。杜甫的感情是爱国的有志之士的感情。从纪行诗也可见到杜甫的学识，如

《剑门》一首，颇有卓见，这绝不是如有人所论杜甫只是好为大言。《文心·体性》云：“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情、才、学、识杜甫均有过人之处，故其成就也很高。严沧浪“诗有别才非关学”的议论是有片面性的，于学习杜诗而益信。

一是艺术风格多样而表现技巧特精。12首纪行诗给人总的感受是瘦硬清奇。但写不同境界的不同章句也有各殊的风格。如《白沙渡》的幽峭，《飞仙洞》的突兀，《桔柏渡》的飘萧，《剑门》的精警，鹿头山的蕴藉，《成都府》的温厚等等，都不可以一端窥。至于双声、叠韵、五平五仄（如有人所论）等有关音韵方面的运用精妙，夸饰、比拟、对偶、形容等修辞手法的调遣得宜，这些例子都俯拾即得，不必列举。诗歌艺术技巧的充分发挥其作用，在诗人或出于无意，或属于有心，但都与诗人生平“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艰苦创作实践有关，故“他人不足，甫乃厌余。残膏剩馥，沾丐后人多矣！”^⑤纪行诗或用工笔雕绘，或则大笔挥洒，也都肖物而不泥于物，通变之极，神思之至，绝不是诗坛文苑中的记诵之学者所能企及。这又是谈杜诗纪行或其他篇章的写作方法时所当留意的。

1984年8月

注：

①②《姜斋诗话》二四、二六及二七。

②⑤〔唐音癸签〕卷二十五及卷二十一。

- ③④⑬⑰⑱《全唐文》卷一八〇、卷五九八、卷五九八、卷五九八、卷四二一。
- ①②⑤均见《新刊校定集注杜诗》卷六。
- ⑦陶渊明集《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诗》。
- ⑧《诸葛亮集·文集》卷一。
- ⑨见高步瀛《唐宋诗举要》《北征诗》所引。
- ⑩见叶笑雪选注《谢灵运诗选》的《前言》。
- ⑪洪亮吉《北江诗话》卷二〇。
- ⑫钱钟书《管锥篇》一三八。
- ⑬《杜诗镜铨》《水会》诗注引。
- ⑭⑮⑯⑰《重修广元县志稿》卷二十一、卷三、卷二十一、卷二十一。
- ⑱见王士禛《精华录》。
- ⑲⑳均见全唐诗卷一九八。
- ㉑⑳均见《王状元集百家注编年杜陵诗史》第十一卷。
- ㉒“当宁”，谓当权者，宁音贮，并非简笔字安宁的“宁”。
- ㉓见宣统二年四川官印刷局排印本《广雅堂诗集》之第一册。
- ㉔《翁注〈困学纪闻〉》卷十八。
- ㉕清冒春荣《葑原诗说》卷二。
- ㉖清陈余山《竹林答问》。
- ㉗《杜臆》卷之三。
- ㉘《新唐书》卷二百一《杜甫传》。

论杜甫两川诗

杜甫的两川诗共约 470 多首，在数量上占杜甫全部诗歌作品的三分之一。杜甫在两川的生活期间即入蜀以后、到夔州以前共只 6 年多，但这短短的几年实为诗人生平的一大转折时期，生活内容很丰富，政治思想和诗歌理论与创作都有新的发展。杜甫的两川诗，我诵读过若干次，深感这数百首诗汪洋千顷，渺无涯涘，涵育至富，迹象难求，偶然有一点体会，也不过是以管窥天，未必有当，兹就研习所触，略论如次：

其一，杜甫两川诗显示出杜甫在对国家政事的观察上更为敏锐，对具体政治问题常能作出精辟的论断而关心天下治乱、寤寐不忘之情也愈益强烈。

杜甫才到成都不久所作的《野老》诗，其后四句云：“长路关心悲剑阁，片云何意傍琴台。王师未报收东郡，城阙秋生画角哀。”显然可见，虽在暂得安居的环境之中，而念念不忘者仍为王师未捷。赵注云：“去岁乾元二年之秋，史思明陷东京及齐汝郑滑四州，乃京之东郡，今复秋矣，而王师未报收复，所以悲也。”剑阁关系到国之大事，也是杜甫入蜀第一眼所见到的“两川”的形象，《剑门》一诗已反映出诗人的政治敏感（前人及今之论者已有不少评论，杜甫

研究会论文对此诗有不少好意见，我在论杜甫入蜀诗中也曾论及，兹不赘述)。关心剑阁，正是关心国家，关心两川，关心利害祸福之所系的两川与朝廷的关系，而实际形势只足以令人悲。“何意傍琴台”正是诗人处“暂定栖鸟”之境而决不甘心于片云依傍之情的表露。因为他所关心者大！

《建都十二韵》也是诗人到成都不久所作，以排律的严整形式，表示了诗人对这个重大事件的鲜明态度和深刻意见。王嗣爽云：“苍生未息，黄屋莫扶，而作此不急之务，故语有风刺”（《杜臆》卷五），固是，但不止于此。按《通鉴》至德二载，玄宗返京不久，肃宗“以蜀郡为南京，凤翔为西京，西京为中京”。而上元元年九月又改“置南都于荆州，以荆州为江陵府”。杜此诗最重要的几句是“恐失东人望，其如西极存。时危当雪耻，计大岂轻论？虽倚三阶正，终愁万国翻。”这是全面地看问题，权衡轻重，应更以西极为重。西极宜如浦说，即指长安。此时史思明尚据东都，大敌未灭，自然应当“专意北向，以除祸本”（仇注语），如果采纳移建之议，势必“张贼势而惑众心”（浦评语），极为失策。杜于此事，实有卓见，语带讽刺，也写得含蓄，但“时危当雪耻”已明言移建决非当务之急；“计大岂轻论”，则直刺移建之举实属轻率。于此可见诗人所见者大，远胜肃宗君臣。但“永负汉庭哭，遥怜湘水魂”，也唯有自伤而已。《镜铨》以为：“是时庙谟之失，无有以江陵为南都之甚者。”对此至关重大的问题杜能抒其见解，是深有史识之证。又房琯曾建分镇讨贼之议，但时移势异，此时吕諲移建之请却不当，杜甫明于是非和时势，决不拘泥于房琯旧议，不以私交

害正论，正是杜甫大过于人之处，钱笺却以杜甫“终以瑄议为是”，这就有昧杜意了。

杜在两川，对蜀之当政者，于其行事之臧否皆有敏锐的观察，虽身居客位，也决不随缘附和或缄默求安，常有一针见血、鞭辟入里之论，出之于公心，见之于诗歌，这也是深得风人之旨。例如其《冬狩行》一篇，原注云，“时梓州刺史章彝兼侍御史留后东川”。诗的起语便含讽意：“君不见东川节度兵马雄，校猎亦似观成功。”无怪王士禛云“一起便是春秋书法”。其后极力描摩其兵马之盛，射猎之精，连“肉不足登鼎俎”的鸚鹄小禽也被他羁于虞，也算是耀武扬威之至了。但是猎获这些东西，究何益于国事，“草中狐兔尽何益？天子不在咸阳宫”两句紧凑在一起，是绝大的讽刺，亦甚大的哀痛。当时吐蕃陷两京，皇帝又跑到陕州去了，而方面大臣，却以狩猎自娱，殃及鸚鹄，国事至此，宁有希望？蜀宦如此，又岂能戮力于王室？妙在中间写一老翁（即作者自道）冷眼旁观，瞭然于心，复垂涕而道，赞其“士卒甚整肃”而劝其“回辔擒西戎”。末尾以周幽王之事为戒，无所忌讳；更以连声疾呼之辞作结：“得不哀痛尘再蒙！”诗人有此种卓见远识，已自难能；而且敢于大胆地直斥其非，不畏祸灾，尤非忠国之极、忧国之深者不能作到。从一般人情说来，位卑者不敢言，客居者不必言，而诗人乃竟言之不足，又长言之！昔人评云：“以流寓一老正词督强镇为敌忾勤王之举，真过人胆力，真有用文章”（《镜铨》引张上若语）。良以杜公远离京阙，身在两川，艰苦备尝，经历亦多，天下未安，蜀亦多故。如“凉风动万里，群盗尚

纵横”（《悲秋》），“天下兵戈满，春光日自浓”，“故国犹兵子，他乡尚鼓鼙”（《出郊》），“跨马出郊时极目，不堪人事日萧杀”（《野望》），“草木变衰行剑外，兵戈阻绝老江边”（《恨别》），是以垂老诗人其心更忧，其情更急，其望治之思更切，其言亦更激，而其诗乃益工。这也是杜甫两川诗的内在因素之一。

杜甫两川诗的忧时，较之从前更为急切，但也有异于夔州以后诗的苍凉悲壮，盖夔州后诗多绝望之音，两川之诗希望犹不绝如缕也。以高度的政治热情关心国事、世事这也见于诗人惜人才、破陋俗诸作。如《送韦讽上阆州录事参军》，韦是成都人，杜已有送韦摄阆之诗，此应是真除后再赠之作。其诗所望于韦者甚殷，一起数句，列举时弊，非关心民瘼者不能道，也非识见卑下者所能洞见症结。接着以“韦生富春秋，洞微有清识”勸勉，又教以“必若救疮痍，先应去蝥贼”为南针之引。“先应去蝥贼”之言，正是诗人浮沉于政治浪涛中几十年经验之所积，得来不易。诗人老矣，眼见富于春秋而又有清识的后进，故寄以热望，侃侃而谈，又倾筐倒篋而告之。可见其对人才属望之隆。又如《寄董卿嘉荣十韵》也是寄托希望于这位防秋边将，故寄诗慰勉。他如《丹青引》也有惜人才而伤之之意。杜公来成都不久，看到石笋，不迷于众人之言，也不把它单纯地作为一个古迹来看，看过就算了，而是看出了问题之所在，形于歌咏，以警世俗。杜甫后在阆中，游了城南的南池，作了《南池》诗，赞其景物之美，出产之富，但也发现了南池中的汉王祠，“终朝走巫祝”。诗人在诗中指出“荒哉旧风俗”，“淫祀自古

昔”，力言其非。杜甫在两川所走的地方很多，随处观览，关心民事，绝不是只娱情于山水。

纵观杜甫两川诗，大雨伤农，诗人以为忧（《大雨》）；绵州观渔，诗人有所叹（《观打渔》《又观打鱼》）。《苦战行》伤战死之将；《去秋行》伤战败之士。《西川》三首，《伤春五首》，《有感五首》，《忆昔二首》，《登楼》，《草堂》，《三绝句》，如是等等，居虎倒龙颠之地（《楠树为风雨所拔叹》：“虎倒龙颠委荆棘”），值天地流血之秋（《岁暮》），丁此时艰，诗人当然也想到自己的责任，“天地日流血，朝廷谁请缨？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同上）仇注云，“可见公济时之念，至老犹存”。安史乱后，世变无已，两川作客，其心情当更苦于入蜀之前，而济时之念，未曾或忘，这正是诗人两川诗作的基本诗心。

其二，杜甫两川诗显示出杜甫对朋友之情老而弥笃，既由国事之所关，亦为私谊之所重，缠绵悱恻，俯仰咨嗟，直是前无古人，感及后世。

杜甫一生笃于朋友之交，心热而情厚。辗转两川，感时伤乱，叹老嗟病，出之于爱国的至情，更怀着对朋友的热望。老而弥笃，生死以之。两川诗中有关朋友故旧的诗篇不少。

“身老时危思会面”（《奉待严大夫》，在两川作），“时危思报主”（《江上》，此是夔州诗，但此心在两川亦然），“艰危深仗济时才”（《送王十五判官扶侍还黔中得开字》，在梓、阆间作），为国思才的急念与垂老恋旧的深情交织在一起，使诗人对严武，对诸故旧，对远方的李白都写出了许多名

篇。诗人与严武的交谊是奠基在一种共同的政治目的之上，非他人所可离间，也不是偶有龃龉便尔乖离者可比。杜甫和严武之间是存在一些矛盾，在严武幕中杜甫也有一些很不愉快的事，心情不佳，所以有“白头趋幕府，深觉负平生”（《正月三日归溪上有作简院内诸公》）的慨叹，这在杜甫的作品中有所反映，但他与严武的交情和对严武的瞻望则是建立在重大的政治目的上，诗人对严武是一片诚心，坦率真挚，在两川中为严武所作的诗竟达二三十篇之多，从《奉酬严公寄题野亭之作》到《严仆射归梓》，彰彰可见。诗人对严武是以道义相要，是希望严武能作出诗人平生所欲作而无从作和作不到的事。诗人听见田父野老赞誉严武“说尹终在口”，（《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便十分高兴；在梓、阆间听严武复节度剑南便为之再返成都，写出了“得归茅屋赴成都，直为文翁再剖符”如此深情的诗句。尤其是《奉送严公入朝十韵》直以圣贤之道期望于严：“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孟子曾经说过“我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于王前，故齐人莫如我敬王”（《公孙丑下》）。准此而言，杜甫对严武期冀之高，正是深爱故人，此种高谊深情尤足风世。但是“常恐性坦率，失身为杯酒”，此种恐惧，也很自然，身处危邦，不得不有所警觉。在梓、阆时亦是如此。尽管“当面输心背面笑”者不乏其人，诗人也并不因此而削减其对入、特别是对故旧浓挚之情。

杜甫之于李白，深爱之也深信之，杜在两川，抚时感世，尤其思念李白，写了《寄李十二白二十韵》五言排律一篇，直是为李白辩诬之作。从这首诗不仅可以看出杜甫对李

白的关心、相信，直欲为之叩阍鸣冤；而且可以看出诗人对永王璘之事自有其正知正见，非人云亦云者可比。杜赠送朋友的诗，很少泛泛酬应之作，大都是寄与勗勉之情，爱人以德。

在两川时虽然没有《八哀》那样的大篇，但长律诗也不少，旧交新知，长言短咏，也都有为而发。杜在两川送人之作，论其精神实质已开韩愈赠序诸作的先例，每篇各有特色，辞意诚笃，言之有物而逸韵悠然。

诗人在两川，往来的地方多，接触的各种人物不少，除了那些豺虎之流，诗人总是对人以至诚，期人以正谊，服人之善，扬人之美。什么“文人相轻”，什么“以己之长，轻人之短”，这些往往在许多人性格上存在着的缺点和弱点，完全与杜甫沾不到边。

其三，杜甫两川诗显示出杜甫游神于微观世界而为诗有更新的成就，以赤子之心观物，一草一木，一山一水，皆各有其生趣而皆为我之友，借物寄兴，与物为俦，驯至物我两忘，于境为最高。

伟大的诗人杜甫，系心家国，无时或忘，全部杜诗，写大题目，记大事件，发大议论的诗篇，数不胜数；或者题虽小而旨大，借物抒怀，多有关于国计民生，有切于政事。所以杜甫有诗史之称，杜甫诗有政治诗之誉。但是“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孟子·离娄》），一个伟大的诗人亦复如此。以赤子之心观物，则无论宏观、微观，都能执着而无失，求真而去伪，许身愚而不可改，持身洁而不欲污，出处大节，凛然无愧于心，此正不失其赤子之心的展现。不失

其赤子之心，并不是只有赤子之心，敏而好学，博学于文，识见阅历还须从学问中来，从锻炼中得到。一个不失其赤子之心的诗人，固然是常着眼于大者，远者，常写大题目，但在诗人眼底的许多小事物，小题目，亦可取、多可观。“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这是宋儒张载的话（《西铭》），以赤子之心观物、接物，则只觉其可亲可喜，看得愈真。

杜甫入蜀之后，居天府之国，息清幽之地，虽然两川祸乱也时起时伏，少有宁日，但锦城一隅，百花潭水即沧浪，也足以暂时安居。草堂经营，虽不易，亦可乐。至秦入蜀，来此幽棲，算是换了一个天地。诗人于暂得安居之中，得以静观锦江春色，蜀都景物，则凡一草一木，一花一柳，一莺一蝶，皆足以使人流连，供人观赏，足以逗引诗心而引发诗兴。譬如虫鸟，则有黄鹂，蜻蜓，鸂鶒、蛱蝶、白鸥、蝉、鸬鹚、燕、江鹤、鸳鸯、蜜蜂等等；花木则有樱桃、桃花、桤木、松、楠、棕、柏、桔、丁香、栀子、丽春、红蕖等等，他物类是。又蜀中山水，本自雄奇，几年之间，诗人游踪所至，几遍两川。虽在避乱之中，也不废游赏之乐。此所以杜甫的两川诗中颇多山水花鸟鱼虫的吟咏，而每咏皆新。

首先使人感到的就是诗人体物的精细。王国维曾说过，“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何遽不若“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以其同为有境界之作，而境界不以大小分优劣（《人间词话》）。以此论诗，杜甫两川诗中像“细雨鱼儿出”这样的诗实在是举不胜举。仅在草堂所作，这样美好的诗句几乎触目皆是。“风含翠筱娟娟静，雨浥红蕖冉冉香”（《狂夫》），“桤林碍日吟风叶，笼竹和烟滴露梢”（《堂成》），“暂

止飞鸟将数子，频来语燕定新巢”（同上），“细动迎风燕，轻摇逐浪鸥”（《江涨》），“圆荷浮小叶，细麦落轻花”（《为农》），“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绝句四首》之一），“芹泥随燕嘴，花蕊上蜂须”（《徐步》），“啜枝黄鸟近，泛渚白鸥轻”（《遣意二首》），“野船明细火，宿雁聚圆沙”（同上），“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春夜喜雨》），“落景阴犹合，微风韵可听”（《高楠》）等等。工细之至！这不能只说是由于观察得很细致，观察细致，自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只是观察得细致，不一定就能写出如此佳句，正如摄影师可以拍出层次清楚、须眉毕现的照片，但不一定是好艺术品。以赤子之心观物，爱之而莫能释，有时倒并不一定纤细皆察，而是捕获着一瞬间之所感，于以成咏。游神于物，物与人俱，景象呈于眼前，而美妙浮于心上。物中有我，或崇或庠，皆有作者主观方面种种因素在内。上面那些诗句还应放在全首诗中来看，才更能看到诗人游神于微观世界其小无内的诗心。

再则，更使人惊叹的是诗人那一种物我两适也两忘的高浑。陶渊明的诗“不觉知有我，焉知物为贵”（《饮酒诗》）。这种境界，在杜甫的景物诗中也常常可以看到。《江亭》诗“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寂寂春将晚，欣欣物自私”这与“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迥不相侔，而宏观微观，各显其妙。前二句人与物乍离乍合，难于言说；而“寂寂”二语，与陶渊明的“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又何其相似。诗人游新津修觉寺，其《后游》诗云：“江山如有待，花柳更无私”，这不是一般所说的拟人手法所可解释，

游神于物，物我两忘。“有待”亦不必是待我，“无私”亦不必是为我，我一瞬之间有此感觉，于江山花柳未必有合亦未必不合，但是读到这诗的人都不禁为之神往，盖诗人当此“后游”之时，江山、花柳、物各欣欣，早就为之神往了。入蜀前的游何将军园林诗，写花写鸟，辞句虽工，但似乎还不是游神于微观世界之中，就外物而刻画之，犹觉人工多于自然，两川的花鸟草木诗则更由人工而返于天籁，皜皜乎不可尚矣。

花鸟草木虽然相对地是小小的题目，但作好它很不容易。人人可作，随地能作，如果没有高尚的情操，高洁的志趣和游神于微观世界的赤子之心，则往往会浮而不实或大而无当。那种充满了庸俗气、淫邪气或迂腐气的作品自然是不能与杜甫相提并论的。试读诗人《绝句漫兴九首》、《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江头五咏》、《绝句六首》、《绝句四首》等诗但觉一派情光，一片天机，前所未有。

有些草木花鸟之诗当然是有寓意的，如《病柏》《病桔》《枯棕》《枯楠》这一组诗，又如《除草》《百舌》也显然是讽刺诗。这方面的诗也是大有开拓，极为警策。但并不能说只有这种有寓意、有寄托的诗价值才大。其实那许多无所寓意、漫兴而作的诗境界是很高的。“不是爱花即欲死，只恐花尽老相催。繁枝容易纷纷落，嫩蕊商量细细开。”昔人评云“深情无限”，良然。

鲁迅曾经说过，不能说陶渊明浑身静穆，他的诗还有“金刚怒目”式的一面，不能认为他“整天整夜的飘飘然”。一个大作家的风格和题材也总是多方面的，杜甫两川诗就有

他极意于微观世界的一面，也产生了不少非常新颖的诗。

杜在两川游履所到之处不少，入蜀初的那12首五言诗，其中已经写到雄奇的蜀中山水。其后成都、新津、梓州、涪城、阆州、嘉州、戎州、渝州、忠州、云安，除不见嘉州诗外，皆有作。虽然没有像李白《蜀道难》那样的长篇巨制，雷霆震惊，但往往篇短而意长，词清而趣永。如《丈人山》诗，短短八句，意味无穷，其末句“扫除白发黄精在，君看他时冰雪容”尤为兀傲自喜。浦起龙云“结作游仙语，而带诙谐出之。”恐非是。又如《阆山歌》《阆水歌》，语皆独造，极细极峭，为山水诗别开新面。陈师道《后山诗话》云：“世称杜牧‘南山与秋色，气势两相高’为警绝；而子美才用一句，语益工，曰‘千崖秋气高’（按“万壑树声满，千崖秋气高”系杜甫送十一舅往青城之诗）也。”后山又云“子美之诗奇常工易新陈莫不好”，“杜诗无不有”。读杜公两川诗，愈觉后山之言深有所见。

其四，杜甫两川诗显示杜甫在诗歌创作上跃上了一个新的高度，对前此的诗歌经验，有所总结，诗风有较大的变异，诗律与诗心更细。

杜甫到达西川，有了稍为可以缓一口气的时间，虽然激于事势，其心终不得闲，但是总有了可以粗安的生活，故入严武幕时，也赋了“强移栖息一枝安”的诗，使他在忧心世事的同时，得以思考诗歌写作上的一些问题。诗人入蜀以前，已经有了长时期的从事诗歌写作的实践。即使从20岁算起，到达西川时已快满30年。30年间，诗人积累了大量的优秀诗歌作品，早已在盛唐诗坛上放出了万丈光芒。30

年间的写作经验，也只有诗人自己才能回顾与总结。所以在两川所作的诗，有些篇目，应认为是诗人总结自己的作诗经验，进一步提出自己的写诗主张，极为宝贵。

诗人是认识与实践相结合，他以自己进一步的写作实践以新的大量作品来印证他的理论并发展诗歌历史。

《戏为六绝句》应是诗人重返草堂后所作，这6首诗的写作自然有它的历史背景，有所为而作。古今评论者对这几首绝句已作了许多研究，谈了不少体会，虽然所见也各有不同，但是这几首诗是诗人对历史上诗歌作者所作的公正而深刻的评议；表达了诗人对诗歌的继承、发展问题的正确见解，其中也就包括诗人自己从诗歌写作实践中所得来的经验在内，这却是古今论者所公认的。“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清词丽句必为邻”，不仅看翡翠于兰若更应掣鲸鱼于碧海，尊重前贤也应作今之出群雄。凡此种种是诗人数十年宝贵经验的集结，也是他进一步开展诗歌写作活动的珍贵意见。再如《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这首七律，简直是作出了诗歌的宣言和誓词，作诗必须有此“僻”，有此“耽”，不耽于佳句，不耽于杰构，不耽于惊人之语，四平八稳，庸庸碌碌，则死也不肯罢休！这正是诗人数十年来胸中所积一朝迸发而出的惊人之语，也是最能益人的经验之谈。“焉得思如陶谢手”（同上），“公生扬马后，名与日月悬”（《陈拾遗故宅》），这仍是“转益多师是汝师”之意。“位何足伤，所贵者圣贤。”“终古立忠义，感遇有遗篇”（同上）。这又是作诗先须作人的伟见，也就是后来陆游所说“功夫在诗外”之旨。

从杜甫在两川所作各种体裁的诗来看，其数量如以下的计算：五言古诗自《五盘》至《别蔡十四著作》为 59 首。七言古诗自《石笋行》至《狂歌行赠四兄》为 36 首。五言律诗自《酬高使君相赠》至《子规》为 218 首。七言律诗自《卜居》至《寄常微君》为 55 首。五言排律自《建都十二韵》至《敝庐遣兴奉寄严公》为 30 首。七言排律自《释闷》至《寄岑嘉州》为 5 首。五言绝句自《因崔侍御寄高彭州一绝》至《答郑十七郎一绝》为 15 首。七言绝句自《肖八明府实处觅桃栽》至《三绝句》为 63 首。可以看出杜甫两川诗以近体诗为多，五律、七律、五排、七排、五绝、七绝（有一些绝句应算作古绝）共 267 首，占两川全部诗作的绝大多数。就中又以五、七言律作得最多。诗人入蜀前，二三十年间五律 150 多首，而两川短短几年中所作五律竟有 210 多首。七律入蜀前所作仅 30 多首，两川所作达 55 首。五、七言排律入蜀前所作比两川所作数量稍多，大量五言长律那是在夔州以后所作。五、七言绝句入蜀前共只 3 首，而两川所作有七八十首之多。当然，杜甫的诗有些不一定留传了下来，韩愈已有“流落人间者，泰山一毫芒”之叹，但是可以看出大体的情况。由上面所计数字可见，诗人在两川是有意地多作近体诗，尤其是五、七言律和七言绝句，他在入蜀前，近体比较作得少，入蜀之后，有意地加强近体诗创作的实践。所以一到成都便作了许多七律、七绝。当然，诗体的选择与题材有关，但是，两川几年间作了那么多的律绝，这应当看出诗人是有意地在近体诗的发展上下了很大的功夫，为近体诗的发展奠定了更加深厚的基石，作出了很大的贡

献。

这不只是数量的增大，更重要的是诗人在七律和七绝的写作上创造了许多“新体”，这是两川诗的一大特点。在成都所作《和裴迪登蜀州东亭送客逢早梅相忆见寄》，其音调已有变异，在夔州所作的《阆山歌》《阆水歌》，音调就更新，是新的尝试也是新的开拓，后来杜公在夔州所作《愁》诗亦是此体，原注云：强戏为吴体。夔州所作益多，影响甚大。王嗣奭评《愁》诗云：“愁起于心，真有一段郁戾不平之气，而因以拗语发之，公之拗体大都如是。”说固有理，但是有些以拗语写成的律诗，如《阆水歌》等，其音峭劲、跳脱，又与“郁戾不平之气”不相应。总之是诗人有意创新之作。七言绝句尤可见，两川诗中，除一部分合于七绝诗通常格调外，好多首都是不按照平声仄声的固定格式而变易其音调。如“黄师塔前江水东”、“黄四娘家花满蹊”、“不是看花即欲死”、“二月六夜春水生”等都是。但读起来不滑不滞，丰韵特佳，正是这种似乎是漫不经心的诗句却更易入人之心。昔人有谓这些诗是吸取了竹枝的韵调，当然也有关系。还有人谓杜公为了避短扬长，故不作那种正规的七绝而创为变体，这种说法却不一定对。试看杜甫的七绝，正格者也不少，而《赠花卿》和后来所作的《江南逢李龟年》等诗也无异于盛唐王、李等诗人所作的七绝高格。所以不存在着避其所短的问题。这还是诗人求变求新不规规自守的表现。

再则五言古诗，也有异于入蜀前五古之作的地方。也是有所发展。五言古诗入蜀前有《北征》《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大篇，到夔州以后有《八哀诗》大篇，而两川诗

的五古未有相埒者，这也可能由于诗人更多地致力于近体诗的缘故。但是两川的五古别有其甚为成功的地方。评论家有谓少陵入蜀以后古诗多率意为之，鲜有可观者，例如沈德潜在其所选《唐诗别裁》中说杜甫到成都“以后五古，俱横厉颓堕，故所收从略”（《唐诗别裁》卷二）。这种看法是不符合事实的。到成都以后的五古，如《病柏》等四首精警深密，篇无赘言，句无浅意，不仅讽刺得当，其艺术手法也自然高妙。如“忆昔南海使，奔腾献荔枝。百马死山谷，到今耆旧悲。”（《病桔》）“有同枯棕木，使我沉叹久，死者即已休，生者何自守？”（《枯棕》）较之“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似更进一层。“种榆水中央，成长何容易？截承金露盘，裊裊不自畏！”（《枯楠》）末语丹青妙手，亦冷隽之极。“横厉、颓堕”，真不知从何说起！另如《大雨》拗折屈曲，潜气内贯，语老而意诚，在入蜀前的古诗中也不多见。再如《寄题江外草堂》，好像是信手写去，有如覩面对谈，但句句话既凝炼又自然，散句中偶有骈辞，阴阳翕合，读起来给人无限美感，其结尾数语尤其激荡人心。洪容斋说：“读之凄然”，足见其感人之深。其《述古》三首又老辣练达，以诗为论，开启宋人。其他许多篇章也都各臻其妙。至于《将适吴楚，留别章使君留后兼幕府诸公》，则辞气慷慨，任意而谈，旁若无人，学问道德，斑斑可见，其蓄之已久，故言之也长，比等诗篇在杜集中也是上乘之作，惜乎有的论者以浅近目之，这就难以同日而语了。七言古诗亦有类似之处，不具论。

窃以为杜公在两川所作诗，如一些律、绝、古诗等，不

拘一格，称心而言，不知者或以为颓堕，或訾为浅拙，其实这些诗，正是极高极好的作品（也有确实无甚意味之作，如《徐卿二子歌》，绝少），正是诗人“老去诗篇浑漫与”而挥洒自如，无不佳妙，已达“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杜甫两川诗 400 多首，汗漫汪洋，不可以一端窥，仅就自己所学，述之如上。

1986 年 4 月

读杜甫《夔州歌十绝句》

杜甫在夔州的诗，在诗人一生诗作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宋人早已注意及此，对杜甫夔州诗十分推崇。有的从思想品格上级为赞仰，如王十朋说：“夔州三百篇，高配风雅颂”，^①陆游则更抉杜甫之深衷，他在《东屯高斋记》中说杜甫“比至夔，客于柏中丞、严明府之间，如九尺丈夫俯首小屋下，思一吐气而不可得。余读其诗至‘小臣议论绝，老病客殊方’之句，未尝不流涕也。嗟夫，辞之悲乃至是乎！荆卿之歌，阮嗣宗之哭，不加于此矣。”更多的是从杜甫夔州诗技巧上的极其熟练和风格上的极为多样方面来肯定夔州诗并致其倾慕之忱。黄山谷认为杜子美到夔州后诗“不烦绳削而自合”，且“欲属一奇士而有力者，尽刻杜子美东西川及夔州诗，使大雅之音久湮没而复盈三巴之耳”^②。又如苏洵以为“君看夔州作，大冶金百炼”^③。也有人虽未专论夔州的诗，但以为“句法理致，老而益精”；^④“少而锐，壮而肆，老而严，非妙于文章不足以致此”，^⑤这也当然包括杜甫夔州之诗在内。但宋代朱熹首先对杜夔州以后诗提出异议，他说：“人多说杜子美夔州诗好，此不可晓。夔州诗却说得郑重烦絮，不如他中前有一节诗好。”^⑥还说“杜甫夔州以前诗佳，夔州以后，自出规摹，不可学。”^⑦按“郑重烦絮”语

意不明，即使夔州以后诗有失于“烦絮”之作，也只能是一小部分，又何能以偏概全。而“自出规摹”是一种创新，更不能认为不佳。明胡应麟则径以杜甫夔州后诗与“献吉江西以后”、“仲默秦中之作”、“于鳞移疾以后”、“元美郎台之后”的诗相比，说“老杜夔峡以后，过于奔放”，“世反以是为工者，非余所敢知也。”^④这就未免脱离具体历史条件而强为比较；且夔峡以后过于奔放之说也不确切。再如清人赵翼《瓠北诗话》也有异词。他说“今观夔州后诗，惟《秋兴八首》及《咏怀古迹五首》细意熨贴，一唱三叹，意味悠长；其他则意兴衰飒，笔亦枯率，无复旧时豪迈沉雄之概。”说杜甫夔州诗“意兴衰飒”，实非知言。杜甫之在夔州，年老身衰，愁病侵袭，诗多萧瑟之音，但并不是意兴衰飒。见仁见智，评论固然可以不同，但夷考其实，细观夔州之作，结合当时社会情况和杜公身世来探索，则夔州之诗实为精金粹玉、不可多得之作。虽然这一时期的作品直接写民生疾苦的较少；也好像不如往昔的意气飞扬，但这一时期的作品思更深、心更苦、识见更超越，虽少拔剑高歌之概，实多伏枥长鸣之声。而且深厚、细密，也并非一味放纵者可比。庾信平生最萧瑟，五更鼓角声悲壮，杜甫夔州之诗或可作如是观。当然，也并不能执夔州之诗而轻抑从前各个时期的作品。清人有云：“杜公早年晚年，皆有极意研练之诗，亦皆有兴到急挥之诗”，^⑤其意是不必把早年、晚年的诗强加区别，认晚年之诗为枯率之类。今人也有夔州诗为又一个高峰之说，^⑥亦有见地。所以夔州诗并不是意兴衰飒，也并非率尔命笔或过于奔放。我在这里不打算全面论述杜甫夔州诗，但有几点

可以略为一说。

杜甫移居夔州时，从他自身来说是既老且病，而病增其老；从国家来说是国乱加蜀乱，可说是乱之极，不仅恢复“开元全盛”的幻梦完全破灭，而且稍为安宁的日子也竟不可得。世乱漂荡，民生多艰，益增其愁，也益增其病。在这种病愁交困的日子里，欲归不得，欲诉无门，“萧条病益甚，独在天一隅”（《遣怀》）。但可贵的是，我们的老诗人并没有被病愁所压倒，他所念念不忘的还是国计与民生。“击柝可怜子，无衣何处村。时危关百虑，盗贼尔犹存？”（《西阁夜》）“乱世诛求急，黎民糠粃窄。饱食复何心，荒哉膏粱客。富家厨肉臭，战地骸骨白”（《驱竖子摘苍耳》）。真是惊心动魄，字字千金！他念念不忘的是“时危思报主，衰谢不能休！”（《江上》）金圣叹说此诗云：“末言应休不休”^①，是这个意思。应休而不能休，也不欲休。有时是自我宽慰而内含着愤激之情，“安危大臣在，何必泪长流”（《去蜀》）。而更多时候是垂老自励，“尚想趋朝廷，毫发裨社稷”（《客堂》），“冯唐已老听吹嘘”（《寄岑嘉州》），《杜诗镜铨》解此句为作者自谓，也符合事实。诗人在涕泗交流之中对于唐室的振兴也还抱着一线希望，“赋诗独流涕，乱世想贤才”（《昔游》）。而《往在》一诗，自“安得”以下数句则表达了诗人的政治理想。但是这种希望和理想只有落空，他唯一藉以自遣、自励并藉以为国自效的，就只有他的通于性命的诗歌。他说“不敢废诗篇”，其情可见。但是，“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南征》），诗人也唯有抱疾东下，抱恨而终。读其书尚友其人，贵在知心，这是后之读者的责任了。

以上简略地谈了杜甫在夔州时的境况、心情，在这个基础上，下面就杜甫到夔州不久所作的一组七言绝句《夔州歌十绝句》谈谈学习中的一点理解。

《夔州歌十绝句》应是作于杜甫到夔州之初，时为唐代宗大历元年（公元766年）。诗人初到夔州，暂定居处，上白帝城，瞻诸葛庙，览滟滪堆。巫峡胜迹，蜀道兵戈，万里秋风，三更白首，感情当然容易激荡，这一组七言绝诗《夔州歌十绝句》直可看作《秋兴八首》的先声，同为缘物起兴之作。当然《夔州歌》的思想内容，不如《秋兴》的海涵地负，但它也表现出诗人在这一时期中的思想倾向和基本感情。在艺术手法上出色地吸取了巴蜀民歌特别是夔州一带地方民歌的特点，好像是东迎爽气，无比清新。这在诗人一生的诗歌创作中也似乎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初到夔州，既得到了江山启助之力，也收获了民歌营养之功。此后所作的绝句如《解闷十二首》、《承闻河北诸道节度入朝欢喜口号绝句十二首》、《喜闻盗贼蕃寇总退口号五首》中的一些章句都带有这种来自民歌的韵味和色彩。这应该说是唐人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件较大的事。陆游在他的《思夔州》诗中曾有“愁思宾客竹枝歌”的句子，指的是刘禹锡的竹枝词10余首，但在刘禹锡之前，杜甫这10首绝句，也已经是竹枝词的一体，它对民间竹枝词有吸收也有变化。所以《夔州歌十绝句》是“秋兴”的先声，也是“竹枝”的别唱，饶有兴味，深可玩读。历代对《秋兴八首》的评论甚多，对《夔州歌》的评说却较少。这里把《夔州歌十绝句》逐首写出，并谈一些管见。

中巴之东巴东山，江水开辟流其间。

白帝高为三峡镇，瞿塘险过百牢关。

第一首领起全组诗，七平声为起，对句为结。音响亮而意沉着。写出山川形胜，以“高”和“险”揭示了夔州山水的特点。全诗虽只四句，而气势浩瀚、辞旨深远。“开辟”一词，自然是作天地开辟以来解。如《峡口》诗：“开辟多天险，防隅一水关”，就是说此地自开辟以来便多天险。《杜诗详注》引杨炯诗“自古天地辟，流为峡中水”为注，按杨炯此诗题为《西陵峡》，其前还有《广溪峡》、《巫峡》2首，都是五言古诗。三诗写夔州、三峡山水，都很精工，是唐人写夔州、三峡诗最早之作，对杜甫的诗显然有影响。其《广溪峡》诗有云：“汉氏昔云季，中原争逐鹿。天下有英雄，襄阳有龙伏。常山集军旅，永安兴版筑。池台忽已倾，邦家遽沦覆。庸才若刘禅，忠佐为心腹。设险犹可存，当无贾生哭。”也写得很好，于杜公的尊重诸葛早有同感。

又，杨炯《广溪峡》中“山路绕羊肠，江城镇鱼腹”句也与“白帝高为三峡镇”意义略同。鱼腹即鱼复，春秋时庸国之邑属楚，秦为鱼腹县，三国时刘备改为永安，即唐之奉节县。旧解谓鲤鱼至此而复洞庭。一个“镇”字也显示出白帝城地理位置的重要。“白帝高为三峡镇”，不仅指地势之高，也写白帝城有高屋建瓴、控制三峡的优势。宋杨安诚《白帝庙》诗：“蜀江万壑俱东奔，瞿塘喧豸争一门。惊涛骇浪建瓴下，颠崖仆谷相吐吞”。^①就是这个意思。

百牢关，各家注解多引《唐书》、《图经》为说，钱牧斋引《寰宇记》并说“按百牢关为入川之隘口，但不如瞿塘之

险”，益见杜句之准确，并非泛泛相比属对。

夔州山水高而险的特点，已为杜公指出。险不足恃，读“公孙仍恃险”^⑩诗可理会诗人旨意；但是险须重视，读“西蜀地形天下险，安危须仗出群材”^⑪诗，更可启人深思了。

白帝夔州各异城，蜀江楚峡混殊名。

英雄割据非天意，霸王并吞在物情。

第二首为第一首之开发，三、四句提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显示了诗人朴素的唯物的历史观点。政治上的成败兴衰非关天意，实由人力。这一思想也与以下诸首的一些诗句有关联。

此诗的一、二句旧注自明，三、四句旧注也大体相近。仇注及《杜诗镜铨》都用朱鹤龄说：“英雄割据，谓公孙述、刘焉辈；霸王（去声）并吞，如汉高以巴蜀收中国。”《读杜心解》谓霸王并吞“如蜀先主、李特辈”。这里有几点可说：一是三、四句系互文见义，意谓：无论英雄割据也好，霸王并吞也好，都非关天意而在于物情。“非天意”和“在物情”从反正两方面立言，意义显著。二是“英雄割据”与“霸王并吞”着重在“割据”与“并吞”，“割据”这里也没有贬的意思，而“并吞”则含有统一天下之旨，分别指两种情况，两者都非天意而在物情。如果以古事为证，则朱说较长。浦解以蜀先主例“并吞”，恐非是。杜诗“三分割据纡筹策”，明指蜀汉。朱注避开蜀先主不提，盖有以正统归蜀的这一自宋以来的传统观念在胸，这不一定合于杜甫本意。所谓割据非天意，是指造成割据形势有主观、客观原因在。至于割据者之臧否，那是要看他的具体政治情况而定。杜甫缅怀诸

葛，深致景仰，但并不赞成肃、代之后那些割据一方、诛求人民、祸乱中国的寇盗。三是旧说以为“借论古以警蜀寇”，当然也包含着这个用意。但是也兼警唐室，能否中兴，端在人事。

群雄竞起闻前朝，王者无外见今朝。

比讶渔阳结怨恨，元听舜日旧箫韶。

这一首诗和前一首相为表里，承前首所提出的“非天意”“在物情”的道理而论及唐之有天下及其由盛到衰的变迁，慨乎其言。

旧解有歧义：仇注以“群雄”为“指前代据蜀者”，不指安史陷京；浦起龙谓为指安史。杜甫对安史深恶痛疾，恐怕不会以“群雄”称之。而“指前代据蜀者”，这也仅就蜀地而言。窃以“前朝”与“今朝（今日）”并不是指玄宗时期及其以后，也不是仅指蜀地的今昔。此诗首句当指隋末时期，群雄并起，逐鹿中原。“群雄”即是《行次昭陵》诗中的“群雄问独夫”的“群雄”；亦即李百药《皇德颂》中的“定群雄之逐鹿”的“群雄”，系指唐有天下之前，“前朝”即指隋末。次句则指唐有天下之后，“今朝（今日）”亦即本朝，贞观、开元，同为盛世，王者无外，正在今朝。但是贞观之治，久已寂寥；开元全盛，不可再见。第三句“比讶渔阳结怨恨”，著明祸乱之始，比者，近也。一个“讶”字，以不可理解的惊讶之辞表至当痛恨的愤懑之情。君臣昏暗，人谋不臧，实堪讶异；固不止安史的忽尔叛乱为可讶也。第四句“元听舜日旧箫韶”，则系抚今思昔之语。这里的“舜日”也不是如旧注所说“指明皇入蜀时”和“惟蜀中无恙”，

因为蜀中正是有恙。“舜日”即是指杜甫所及见也曾经见到的“开元全盛日”。“比讶”是近讶，“元听”是曾听，所讶者是数十年的国事变迁竟有如此之甚者，若从唐太宗之世来比较，就更不堪言。所以这首诗短短数语而感慨极深。试读《行次昭陵》的结句“寂寥开国日，流恨满山隅”。再读夔州所作《又上后园山脚》：“于时国用富，足以守边疆。朝廷任猛将，远夺戎马场。到今事反复，故老泪万行。”尤可知《夔州歌》中此首诗正是同一慨叹，不过写得较为含蓄、简约罢了！这一首诗也是杜甫以煌煌大笔写唐王朝从无到有、由盛到衰的一百多年的历史。

“闻”字一作“问”。《新刊校定集注杜诗》作“向前朝”。赵次公云：“师民瞻本作‘闻前朝’极是。”^④宜从赵说。

赤甲白盐俱刺天，闾阎缭绕接山巅。

枫林橘树丹青合，复道重楼锦绣悬。

前二首缘物起兴，即地抒情，所论甚大。以下数首，又就夔州景物凡眼底所见者，一一纳于笔端，所写又甚细。此首写山水、树木、楼阁，如一幅夔巫图画。夔州景美，本是可称之地。但从前也有人不是这样看。如宋人孙奕说：“天下可称之地有四”。他所举者为谢玄晖《鼓吹曲》所说的“江南佳丽地”；杜甫《祠堂夕望》所说的“湖南清绝地”；又《怀锦水楼止》所说的“惜哉形胜地”的锦水和张载《剑阁铭》所说的“形胜之地”的剑阁^⑤。如按此说，夔州就不为可称之地了。又如宋人关耆孙更说：“夔江山元粗恶”。^⑥这都和杜甫眼底所见而写于诗篇者异趣。但宋人费士戮却

说：“杜少陵游蜀凡八稔，而在夔者独三年。平生所赋诗见于集凡千四百六篇，而在夔者乃至三百六十有一，得非爱其山川奇壮、风俗淳厚，故其寄寓之久、赋咏之多如是哉！”^⑧杜甫爱夔地之山川奇壮及其景物幽美，著于篇章，本是历历可数的。宋于贞还说：“计一草一木，尽入诗句中矣。”^⑨即如此诗首句写夔州主山之高，次句写夔地人烟之盛，“间阎缭绕”又宛然是山村景象，与王勃《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之“间阎扑地”不同。三句写树木色彩之浓丽，四句写楼阁布置之精妙。即使未曾去过夔州的人，读杜公此诗也仿佛可以想象。

关于赤甲、白盐，旧注大抵相同。唯赤甲之称，《读杜心解》以为“土石皆赤，如人袒臂，故名”。缪荃荪校辑的《元和郡县图志阙卷遗文》卷一《夔州》：“赤甲山，在城北三里。汉时尝取邑人为赤甲军，盖犀甲之色也。”白盐山，则《水经注》云：“土人见其高白，故因名之。”杜甫《白盐山》诗：“他皆任厚地，尔独近高天。”白盐、赤甲，两山相对，形势甚佳，常见于杜公吟咏中，如“奔峭背赤甲，断崖当白盐”（《入宅三首》）。宋范成大《瞿唐行诗序》云：“白盐、赤甲皆峡口大山。”清王士禛《白帝城》诗：“赤甲白盐相向生，丹青绝壁斗峥嵘。”又，陶澍《登白帝城》：“苍烟红树不知暮，赤甲白盐相向开”。都以两山相对为辞，亦可想见其风景佳胜。

浪东浪西一万家，江南江北春冬花。

背飞鹤子遗琼蕊，相趁凫雏入蒋牙。

此诗承接上首，益见夔州风物之佳美，人烟稠密，春冬

花繁，地暖而禽乐。前人已云，三、四句当系季夏之景，由鹤子、凫雏可知。《夔州歌十绝句》每首末二句皆对偶成咏，如七律之一联，这又是杜在夔州尝试的一种新体，与竹枝不离，但不完全同于竹枝。这也是与刘禹锡竹枝词不同之点。《夔州歌》中的这些对句都工稳而新鲜。背飞鹤子，相趁凫雏，遗蕊，入蒋，备见活泼自由之状。比于杜在成都草堂所作的“笋根稚子无人见，沙上凫雏傍母眠”，又别是一种动态的美。

东屯稻畦一百顷，北有涧水通青苗。

晴浴狎鸥分处处，雨随神女下朝朝。

此诗继写稻苗丰盛之象和晴雨皆宜之景。后代写景诗文多从晴雨两方面着笔，如范仲淹之记岳阳洞庭，苏轼之记杭州西湖，并为世所传诵，而杜诗已开其先。晴浴狎鸥分处处，日光水色，沙鸥点点，一片空明；雨随神女下朝朝，又是一片空濛迷离景象，带有神秘色彩。

宋叶梦得说：“诗下双字极难，须使七言、五言之间，除去五字、三字外，精神兴致，全见于两言，方为工妙”^④。《文心雕龙》对双字之用，早有研论，《物色》篇说：“故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杲杲为日出之容，漉漉拟雨雪之状，啾啾逐黄鸟之声，嘒嘒学草虫之韵”。杜甫的诗歌在双字运用上常常出色生新。清人管韞山曾说：“七言用叠字近凑，独工部‘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江天漠漠鸟双去，风雨时时龙一吟’转就叠字生色。”杜诗此二句的“处处”“朝朝”本来是极寻常的词语，但因为一则用来形容晴鸥的狎浴，散见于多方；一则用以描述神女的

行雨，朝朝暮暮皆然。从空间、时间上恰当地摩写，既自然又不肤泛，所以看似容易，实则难得。正如叶梦得所说“精神兴致，全见于两言”。也符合《文心》所言“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这种功夫和技艺对于后世作者是有所启迪和沾巧的。

蜀麻吴盐自古通，万斛之舟行若风。

长年三老长歌里，白昼摊钱高浪中。

这是第七首，承上由农田写及舟楫之便和商旅之利。自第三首至此首，条理井然，逐层展现。构成了夔州地区山川城郭人民风俗的长卷丹青。仇注云：“真西南一大都会也。”持比王维的诗中之画，觉老杜的画面广阔得多。三、四句点染了长（上声）年、三老的江上生活，长歌所以舒其心胸，摊钱无非溺于赌博（赵次公说，摊钱乃蜀人赌钱之名）。有声之曲如闻，无聊之状备见，写得朴素而逼真。仇注以长歌者舟子，摊钱者贾客，良是。长年三老，则陆游《入蜀记》说得很明白，自无异义（杜之《拔闷》诗已有“长年、三老遥怜汝”之句）。这里还可说的是，蜀麻、吴盐，不过泛举进出的商货，当时已是巨舟大贾，来去如风。但四川不一定依赖吴盐之入，《读杜心解》以为诗意在于夔当孔道，蜀地自有盐，不仰吴产。这当然不宜拘执。

忆昔咸阳都市合，山水之图张卖时。

巫峡曾经宝屏见，楚宫犹对碧峰疑。

此首在夔州景物铺叙之后，忽然插入，颇有跌宕之姿。在意义上结合今昔，甚饶意趣；结构上连通前后，以“楚宫

犹对碧峰疑”句引出九、十两首之以古鉴今。《杜诗镜铨》云：“上数首均用实字，插此一首，令前后都觉飞动”。实则不止“飞动”而已。

忆昔咸阳市合，即是说以前见之于咸阳市张卖的画图上的景象与今日眼中亲见的夔州诸景相合。昔年画图中所見者，不意今日成为眼中真景。但巫峡曾经见于宝屏（即屏风、画图），固然可以指数；而楚宫如何，今虽身在蜀楚江山，对碧峰犹然怀疑而不可遽定。如仇注所云“楚宫谁觅，终成疑似，即真境亦同幻景”。真可谓“思深哉”！

杜甫对宋玉最是关情，以其才高冠古，文曲能谏，深致景慕。“摇落深知宋玉悲”，直以异代相知自许。《雨》诗云：“楚宫久已灭，幽佩为谁哀。侍巨书王梦，赋有冠古才。”又，“最是楚宫俱泯灭，舟人指点到今疑”，弥有“是耶非耶”之感。合读诸作，可以觐知诗人彼时彼地的思想感情了。

武侯祠堂不可忘，中有松柏参天长。

干戈满地客愁破，云日如火炎天凉。

第九首由楚宫写到武侯祠堂，这是杜甫必然要写到的诗。杜甫初到成都，便游丞相祠，写出了著名的《蜀相》。移居夔州，“屡入武侯祠”，连续写了《武侯庙》、《八阵图》、《诸葛庙》、《古柏行》等名篇，自有其必然性。杜之对于诸葛，直是念念不忘，一往情深。其所以如此，这不同于杜甫之对宋玉和庾信。对宋、庾有身世相似之感和同为一个文士、诗人异代而相望的悲愁胸臆。对诸葛则主要是出自政治上的要求，千载之下，冀有其人；也有引诸葛而自慨的凄楚

心情。朱熹在《王梅溪文集序》中曾说：“于汉得丞相诸葛忠武侯，于唐得工部杜先生、中书颜文忠公、侍郎韩文公，于本朝得故参知政事范文正公，此五君子，其所遭不同，所立亦异，然求其心，则皆所谓光明正大、疏畅通达，磊磊落落而不可掩者也。”这就是看到了诸葛与杜甫有其共通之点。不过看得还不够全面。陆游在《东屯高斋记》中说：“盖尝慨然以稷契自许，及落魄巴蜀，感昭烈、诸葛丞相之事，屡见于诗，顿挫悲壮，反复动人，其规模志意岂小哉！”则指出杜之仰慕诸葛，屡形吟咏，正在于他本人的规模、志意之非小！王嗣爽也说：“公平生极赞孔明，盖有窃比之思，”^④也有同见。黄生之注也说杜甫《诸葛庙》之所云“皆以武侯自况”。

所以这一组写夔州的诗自必写到武侯祠堂，由于七言绝句篇章之短，不可能如其他写诸葛诗篇之较能尽意，故以“不可忘”三字深表衷情。“事有不可忘”，则对于诸葛孔明是也。浦起龙就这首诗的三、四句解说“不可忘”之义：“想‘武侯’之神，而‘干戈’之‘愁’可‘破’；承‘松柏’之荫，而‘云日’之‘炎’可‘凉’”。就诗论诗，自是如此。但纵观杜公对诸葛怀念和评论之诗，细绎“不可忘”之义，则略有数端：一为诸葛之能与刘先主遇合，复能得到后主信任的可贵的君臣关系，一为诸葛鞠躬尽瘁、之死靡它的忠贞大节，一为诸葛度越古今、出类拔萃的奇才伟略。比之于张九龄、房琯之不得终其任且以罪贬终，则刘备、诸葛君臣之间大有可思。“君臣当共济，贤圣亦同时”“先主武侯同閤宫”，鑑古观今，深有隐痛。杜甫于当时大臣属望甚殷，

“只在忠良翊圣朝”，“安危须仗出群材”，“大夏如倾要梁栋”，“凄其望吕、葛”，反复致意。但王侯第宅，文武衣冠，只能兴“诸君何以答昇平”之叹。而伯仲伊吕，万古云霄，求如诸葛之才之德的人更渺不可得，既得之而又不能用，国事不可为，老臣也惟有议论皆绝，想到诸葛也只有暂时愁破罢了。对诸葛及诸葛祠堂之“不可忘”，正见杜老始终未能忘情于唐王朝的国计民生啊！

阆风玄圃与蓬壶，中有高唐天下无。

借问夔州压何处，峡门江腹拥城隅。

这是《夔州歌十绝句》的最后一首，有总束全篇的意味。极意推崇夔州的美好，以神仙境界阆风、玄圃、蓬壶相比，而且突出高唐，以为天下所无。高唐，楚台观，在云梦泽。这里用于咏夔州诗中，承前“雨随神女下朝朝”而言，用宋玉高唐赋“朝朝暮暮，阳台之下”而云然。浦起龙说推崇高唐即是推崇夔州，良是。但推崇高唐亦即推崇高唐一赋，推崇宋玉。末二首怀思诸葛及宋玉，以平生所仰慕之人作结，弥有情韵。此首最后的两句以实景结束，既觉意远，又是力足，顿束得住。“压”字与第一首的“镇”字相应，而又与“拥”字结合，写景如此，都是戛戛独造。

《夔州歌十绝句》是杜甫到夔州后不久的作品，实为夔州诗中的佳构。诗人登山临水，怀古观今，言在耳目，情寄八荒，酌取民歌，谱成新曲，故可说是《秋兴》的先声，竹枝的别唱。无意求工，风致独胜；^②有心哀时，兴寄遥深。自应精研细读。

1984年清明

注:

- ①《梅溪先生后集》卷十四《夔路十贤·少陵先生》。
- ②《豫章黄先生文集》卷十六。
- ③《冷然斋诗集》卷一，转引自《杜甫卷》上编 784 页。
- ④李纲《重校正杜子美集序》，转引自《杜甫卷》277 页。
- ⑤吴可《藏海诗话》。
- ⑥《朱子语类》卷一百四十。
- ⑦《诗人玉屑》卷十四《晦庵论杜诗》。
- ⑧《诗薮·续编》卷二。
- ⑨潘德舆《养一斋李杜诗话》卷二。
- ⑩见朱东润《杜甫叙论》第九章。
- ⑪金圣叹《圣叹选批杜诗》卷三。
- ⑫《奉节县志·艺文》。
- ⑬—⑭杜诗《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及《诸将》。
- ⑮《新刊校定集注杜诗》卷第三十二。
- ⑯孙奕《履斋示儿编》卷十四。
- ⑰见《全蜀艺文志》卷六十四。
- ⑱同上，卷三十四。
- ⑲同上，卷三十九。
- ⑳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上。
- ㉑《杜臆》卷七《古柏行》条。
- ㉒《唐宋诗醇》说杜甫的绝句“无意求工，而别有风致”。

论杜甫荆湘诗

杜甫荆湘诗，为诗人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之所作，亦为诗人“百年歌自苦”一生诗歌吟咏中的重要部分。杜甫今存全部诗作共1400多首，实为一整体，未可分割，尤未可任意抑扬于其间。杜甫各个时期的诗皆有其特点，有其胜处。各时期之诗特点或有所不同，但决无因时期之不同而优劣相去悬远的事实。古今之论杜诗者，有谓杜甫夔州以后诗为不足观，或谓荆湘之作大都粗率，意境颓唐。例如清赵翼《瓠北诗话》说杜甫“入湖南后，除《岳阳楼》一首外，并少完璧。即《岳麓道林》诗为当时所推者，究亦不免粗莽。其他则粗涩者十之七八矣。”再如宋刘辰翁认为“天下能读杜诗者几人！”（《题刘玉田选杜诗》）但也竟说“子美晚年诗多杂乱，无复语次”，且以杜甫湖南诗中的《岁晏行》为证，并以原谅的语气说：“老人语态不可拘以常格”（转引自郭曾炘《读杜札记》）。这些评论，或由于未曾反复探求杜甫晚年之作，尤其是离夔州以后之诗，或者由于自己的诗风与杜甫晚年之作相去甚远，如赵云崧的诗多属乐观、滑稽之作，对杜甫入湖南以后诗已所不喜，从而轻之。皆不切于事实。还因为有些评论者，心中先已横梗着荆湘诗是杜甫接近死时之作，衰老颓放，自无足观。或者以为湖南之作仅在两度春秋

的时间内，似乎在杜甫全部诗作中占不了重要的地位，无足轻重。这些都是主观臆测之论，倒是不免于轻率了。

今观杜甫全部荆湘诗，如从《大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唐峡，久居夔府，将适江陵，漂泊有诗，凡四十韵》这首五言长律算起，至《风疾舟中，伏枕书杯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这首五言长律止，共为 100 多首，约占杜甫平生之诗今所能见者十分之一。其时间自大历三年春迄大历五年夏。仅仅两年的时间能有 100 多首诗，按比例言，不低于以往任何一个时期。故仅从数量上看，诗人此一时期的写作欲望与能力也未稍减于昔。尤其是在长期漂泊而又体衰年老的情况下能写出这样多的诗，就更为可贵。岂可认为诗人的身体既衰其诗亦必衰，诗人在湖南的时间既很短其诗亦必无可观？从诗体看，此一时间中所作以五律（50 多首）、五古（30 首）和五言长律（31 首）为多，七古（15 首）、七律（13 首）较少，七排甚少（2 首），绝句亦少（五言一首、七言 3 首）。在一百几十首诗中，当然不可能没有平平无奇之作，但绝大多数篇章皆精力弥满，意境深幽，在诗人一生的诗歌实践中，于此又有所创造和发展，决无颓丧之音，粗率之作。其题材自不同于安史之乱中密切反映现实，直写民生疾苦之什，亦不同于《八哀》《秋兴》等密切关联朝政，连缀成组的大篇；也有异于抒情、论政与叙事相结合，上干朝廷，下伤身世的长篇史诗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诸作。但是风格是多种多样的，美也是多方面的。岂可如杨慎之论杜诗，以《诗经》各篇之言简而意婉，多含蓄之美，而讥杜甫之诗言直而意显，多悲壮之辞。且杜诗本

不可以一端论，有直而切者，亦有微而婉者。而且时间不同，环境有别，诗人之心情与意向也常常会随着时地的不同而有差异。又岂可执荆湘以前诗来绳墨荆湘之作。胶柱刻舟，未必有当。

我曾经反复阅读杜甫荆湘之诗，恬吟密咏，深以无论就思想内容抑或诗歌艺术言，都有其感人至深和寻绎不尽之处。较之荆湘以前所作，有前后相当者，也有后异于前者。我觉得有几点可以述说。

其一，贫贱不移，至死不衰，鞠躬尽瘁。

前人早已说过，自古诗人之穷未有过于子美者。杜甫，特别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漂泊荆湘，老病孤舟，穷之至极。但是爱国爱民的至情与热肠，却未稍减损。自古诗人，其穷困也可能有与子美相似者，但我以为除陆放翁、文文山、顾亭林外，很少有人不移其志，不减其热如子美。或者其志虽坚，其境虽穷，又未能有杜甫这一枝“语不惊人死不休”之笔，沉郁顿挫，慷慨激昂，发之于宝贵的诗篇，为社会写照，为苍生乞命，为后世留遗则，为人生发浩叹，至死不衰而能如子美者。杜甫入蜀以后，于前代诸葛，特为崇敬，冀当世能有其人，于诗歌反复咏赞。今观杜甫一生事迹，虽与诸葛不相侔，但善师者在心不在迹，杜甫盖有以诸葛为师之心，他的长留诗卷，即是诸葛的千秋政典；他的匡时济世之志，即诸葛兴汉除奸之衷，时异迹异而心同。尤其是杜甫在荆湘漂泊的生涯中，明知唐室之未易振兴，仍在诗篇中往往贡其一得之见，期冀于当政者，勗勉于后生，无时或忘。他“不敢废诗篇”，以诗歌为谏书，以诗歌当史册，

以诗歌献一己之悃诚，以诗歌挥天下苍生之涕泪，直到最后一口气。李商隐诗云“春蚕到死丝方尽”，温庭筠诗云“捣麝成尘香不灭”，“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杜甫于诸葛无以异也！所不同者，杜甫还在古今诗坛上树立了千秋典则，遗留下了辉煌裔丽的不朽诗篇。

杜甫的荆湘诗，从时间、地域言，自应以出瞿塘峡时所作《大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峡，久居夔府，将适江陵，漂泊有诗，凡四十韵》这一首五言排律为第一篇，前面已经说过。但从思想脉络来看，则在大历中所作《虎牙行》《锦树行》二诗，已可认为是荆湘诗的前导。两诗都是七古，是姊妹篇，诗人身在夔州，遥望荆湘，舟虽未发，气已先往。其起句云“秋风飏吸吹南国，天地惨惨无颜色。洞庭扬波江汉回，虎牙铜柱皆倾侧。”又云：“八荒十年防盗贼……征戍诛求寡妇哭！”其千里远怀之意与一腔忧时之心相交织，仍是杜老平生怀抱，但已显示出又一时期的开始。至云：“自古圣贤多薄命，奸雄恶少皆封侯”“五陵豪贵反颠倒，乡里小儿狐白裘”。《杜诗镜铨》评云：“愤激终嫌太直”，不知此正二诗可贵之处。盖入蜀既久，将去荆湘，有回顾从前生活而加以总结之意，故直言写下多年来的人世体验，慨叹出之而无所瞻徇。我以为此二诗即可视作荆湘诗之先导，杜公临歿二年内之志趣意向于此二诗已可窥之。又如往荆湘前之《写怀》二首有云：“无贵贱不殊，无贫富亦足。”虽本阮籍之辞，也见杜老“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用心。又“达士如弦直，小人似钩曲”，虽皆有所本，但也可见杜公多年来惨淡生活中所得到的观人经验。这些思想都在杜甫的荆湘诗中起

着主导作用。其《喜闻盗贼总退口号五首》，直关国事，直发议论，备见壮怀，全无衰意，这种精神直贯到荆湘诗一百几十首之末。

大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这首长达四十韵的排律，更可窥见诗人远适荆湘时的心情。一“不乐”，一“长吁”（“入舟翻不乐，解缆独长吁”），包含了许多沉重的心事。“却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当时那种闻战乱初定，回家有望而大喜欲狂的炽热之情，经过五六年间世情翻复的刺激与冲洗是一点也不留存了，所以入舟应乐而反不乐，应长笑而反长吁，写得非常真实，决无半点做作。但是热望可以转成失望，而关怀家国、忧在苍生之念则“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此诗前一部分历写山水名胜之景观，逐处生新，但是篇末忽然结以“回首黎元病，争权将帅诛”，则杜公平生大节、满怀怅恨、至死不移之情岂不昭然尽见！

如果说到诗人的身体，那的确是愈老愈衰，世事的刺激，穷困的侵迫，卫生条件之差，漂泊流离之苦都在摧残他的身体，使他旧病未愈，新病又增。荆湘诗中每有记述。单看《水宿遣兴，奉呈诸公》中“耳聋须画字，发短不胜篔”这两句，已画出了衰老之象。直至绝笔诗《风疾舟中伏枕书杯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这首排律，昔人比之为“曾子易箦之词”，犹不能不对衰愁病苦转侧哀鸣，如“羁旅病年侵”“犹伤半死心”“愁来遽不禁”诸语。所以衰病侵袭，愈老愈衰，这是毫无疑问的，诗人的伟大精神正在于他身愈衰、病愈重而志益坚。诗人愁苦愤激之音也常有，如“残生逗江汉，何处狎樵渔”（《将别巫峡，赠南卿兄瀼西果园四十

亩)“飘萧将素发,汨没听洪炉”(白帝城放船这首排律)“浮名寻已已,懒计却区区”亦甚颓放,但是又说“文章敢自诬”,则又一振(同上诗)。所以一篇诗中也显示出了心情的矛盾。又如“青眼高歌望吾子,眼中之人吾老矣”(《短歌行赠王郎司直》)，“卿到朝廷说老翁,飘零已是沧浪客”(《惜别行送向卿进奉端午御衣之上都》)，“白发甘凋丧,青云亦卷舒”(《秋日荆南送石首薛明府辞满告别,奉寄薛尚书颂德叙怀斐然之作三十韵》)“年过半百不称意,明日看云还杖藜”(《暮归》)，“自吟诗送老,相对酒开颜”(《宴王使君宅题二首》)，“处处是穷途”(《地隅》)，“宇宙此生浮”(《重题》)，“扁舟空老去,无补圣明朝”(《野望》)等等。有颓唐语,有愤激语,有悲愁语,亦有故为旷达语,杜公心情之抑郁、矛盾斑斑可见。至于“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登岳阳楼》)，“偷生长避地,适远更沾巾”(《南征》)，“贾生骨已朽,悽惻近长沙”(《入乔口》)，“途穷那免哭,身老不禁愁”(《暮秋将归秦》)，则哀而已伤,惨惨悽悽,真如宋刘辰翁所云,此等诗不忍卒读了。心情如此沉重,生活无比艰难,身体又日益衰病,但是诗人壮烈之志却不稍衰,特别是一想到朝政不振,世乱不已,民生不堪,就更激发愤恨之情而且始终保持着对朝廷谏诤的“权利”,一如其作拾遗之时。虽然谏书未具,也无由上达,但形之于吟咏,望之于朋友,此心固无时或已。同时对那些狐狸、豺虎(“狐狸何足道,豺虎正纵横。”《久客》)之流,也始终保持其史笔斧钺之权,如此种种,在杜甫的荆湘诗中是屡见不鲜的。按肃代之朝,其乱离、瑕垢,不外乎来自藩镇之内忧及吐蕃、回纥之外

患。杜甫荆湘诗，皆作于代宗朝。史家称代宗为阴狠之人，然戡乱及御侮皆无能力，卒致中兴无望，颓势难挽，蜀乱自亦无法平定。观严武卒后，郭英义弟兄，崔旰等人之乱，反复无所止，蜀民之痛苦可知。戎马关山，天下骚然，观独孤及的谏书有云：“自师兴不息十年矣。万姓之生产空于杼轴，拥兵者第馆亘街陌，奴婢厌酒肉，而贫人羸卧以役，剥肤及髓。长安城中白昼椎剽，京兆尹不敢诘，加以官乱职废，将惰卒暴，百揆隳刺如纷麻沸粥，百姓不敢诉于有司”（《全唐文》卷三八四）。恐怕较之“三吏”“三别”所反映的乱残之状更有甚焉！至若柳伉直谏之辞，历数代宗朝“将帅之心”“公卿之心”“三辅之心”“四海之心”皆“叛陛下”，“近自京辅，远至海隅，文武百寮，志皆离叛，虽有朝恩（按，指鱼朝恩）戮力，陕郡坚城，陛下独能长守社稷乎！”（《请诛程无振疏》）柳伉之论极痛切。代宗朝政如是，夫复何望，故诗人不得不发出“天意高难问，人情老易悲”（《暮春江陵送马大卿公恩命追赴阙下》）的浩叹。上句里的“天意”即指“天阙”之意，谓朝政多令人不解，下句里的“人情”，则又不只自道，而有同于《离骚》中的“终不察乎民心”，皆示对朝政批评之旨。其《遣闷》中的“妖孽关东臭，兵戈陇右疮”，一指藩镇，一指吐蕃，诗人对国家的忧患所在看得很清楚。《秋日荆南述怀三十韵》之“蛟螭深作横，豺虎乱雄猜”，皆为深恶之而严予斥责之辞。《遣闷》紧接着说：“时清疑武略，世乱蹶文场”，此二句实指朝廷于用文用武之道两失两误，无可裨补，意义深刻。而“是物关兵气，何时免客愁”（《归雁》），借归雁而发，显示出诗人对西南战乱之

厌弃而又关心。王嗣奭于此诗说杜甫有如后世的邵雍在洛阳闻杜鹃而先知兵乱，这又不免近于附会。盖借雁而发，非因雁而知。《秋日荆南述怀三十韵》还说“不必伊周地，皆登屈宋才”，乃讥朝廷不能用贤。其他各语，亦皆有所指评。对于这首长律，明胡震亨以为专为房琯而作（《唐音癸笈》卷二十二），清浦起龙则谓此诗“与房有关会”，但非“通身主房琯言”，此为“放废远臣，评论国是”之作（《读杜心解》卷五之四）。按浦言较当。杜甫此诗是比较全面地评论朝政之作，牵涉者多，必非专为房琯言。细读杜诗此篇尤可知杜于国事之卓识说见。政治、文学，诗人兼备。杜又于五言古诗《咏怀》二首中慨叹其欲济时而无路，欲兼善而未能的痛苦心情。他评论朝廷说：“本朝再树立，未及贞观时，日给在军储，上官督有司。高贤迫形势，岂暇相扶持。疲茶苟怀策，棲屑无所施。”末语谓“意深陈苦词”，直是涕泪纵横了。又此诗第二首“虎狼窥中原，焉得所历住。葛洪及许靖，避世常此路”云云，备见其亟思有所作为而又终于天涯漂泊，一筹莫展，断难甘心的情意。而且，诗人还引以自责，“愧为湖海客，看此戎马乱”（《舟中苦热遣怀》），又何尝须臾自安。总之，杜甫荆湘诗，时时处处，可见其忧国哀时之心，而邪正不容，无可调和，诗人亦认识至深。如云“因知邪干正，掩抑至没齿”（《种莴苣》），他在种莴苣时都想到这些大问题。但方正不容，哲人其萎，诗人也就只能以“泪尽湘江岸”（《逃难》）而终其身。

综上所述，诗人至死不衰，至穷不移，不在其位，亦谋其政，为国劳心，为民挥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伟大精

神，实为读杜甫荆湘诗所必知的第一义。

其二，寄热望于知交，托未契于后生，伤一身之已晚，冀来者之有人。杜公于朋侪、故旧及年少于己者素来就是肝胆披露，心胸开豁，待人以至诚，期人以高义。特别是自己已身处穷途，年当迟暮，欲有所作为而不可得之时，鸡鸣风雨，愈思故人；托未契于后生，把一腔热望寄托在朋俦故旧特别是年少有为者的身上，而见之于他的许多诗篇。于此益可知杜老其心之苦、其情之切。我在论杜甫夔州诗的文中已就管见所及谈到了这个问题。杜甫的荆湘诗，更是诗人生命最后一个时期之所作，此种瞩目于故旧及后生之情，更常常见于此两年内的不少篇章中。为国家，为朝廷，为人民，千言万语，嘱托于人。当然有些是径直之言，有些是委婉其词，因人而异，又绝非一个模式。但一片肺腑恳切之情常常溢于楮墨之间。这里举几个例子。

《送顾八分文学适洪吉州》，这是一篇长达310字的五言古诗。顾文学是杜甫的老朋友，擅场八分书，杜甫当时在江陵之公安送顾文学（名戒奢，见欧阳修《集古录》）去洪之吉州。诗篇首叙顾之书法曾见重于朝廷，与工八分者之韩择木、蔡有邻相埒。次序顾文学与诗人相交之深，“文学与我游，萧疏外声利。追随二十载，浩荡长安醉。高歌卿相宅，文翰飞省寺。视我扬马间，白首不相弃。骅骝入穷巷。必脱黄金辔。一论朋友难，迟暮敢失坠。……”心魂相许，声情并茂。难怪《镜铨》评曰：“此段极沉郁顿挫之至”。但是精义尤在后半。自“我甘多病老，子负忧世志”起，瞋目杀伐之世而勉顾以安邦之责。告以“邦以民为本，鱼饥费香饵

(意谓厚施于民)”之至理，促其“请哀疮痍深，告诉皇华使”（谓洪州刺史）。更谓“使臣精所择，进德知历试。恻隐诛求情，固应贤愚异。”总是一片痴情，为民请命之言。结语更以极其高亢之音警戒、期冀于顾文学：“烈士恶苟得，俊杰思自致。”爱人以德，勸人以正，此种赠行之作，真足炳耀千古。友直、友谅、友多闻，杜公有之！“赠子猛虎行，出郊载酸鼻。”猛虎行即孔子“苛政猛于虎”之意，非据陆机《猛虎行》，浦起龙之说是。杜公于说理之外更以情动顾，冀其常念“苛政猛于虎”之言，鼻酸而政可为。此等诗自当令人感泣。杜公别张建封诗《别张十三建封》以“风神荡江湖”赞建封，首告张建封以史乘，历叙开国之兴盛并谈张之家世渊源，更道知己之情，篇末乃勉以今当内忧外患严重之时，不可息肩，当戮力王室。“君臣各有分，管葛本时须。虽当霰雪严，未觉栝柏枯。高议在云台，嘶鸣望天衢。羽人扫碧海，功业竟何如！”这些倾心而道的话，既是爱人以德，又是为国期贤。一个飘泊江湖、疾病缠身的老诗人而能如此，其爱国望治之心皎如日月矣！

对年岁小于自己的奇士，一行一善，皆加以肯定和揄扬，而且期以远大。《敬寄族弟唐十八使君》诗即是如此。唐曾为刺史，此诗则赞唐之介立，有杀身成仁之节操。盖能不畏死而敢于忤时，勇于济世者。故得罪于永泰末年，而被放谪于五溪之滨。诗人安慰他“一失不足伤”“鸾凤有铍羽”，并勉以“先儒曾绝麟”“念子孰（同熟）自珍”，而又以坚松喻之“雷霆劈长松，骨大却生筋”，直是不怕挫折，不屈威武之意。末以“慰此忠良臣”为结。杜公此种高谊，

足令凉薄者愧赧无地，而使受其关注者感奋前行。另一王郎亦为英年俊才之人，将往游西蜀，干谒诸侯，诗人在荆南赠以《短歌行赠王郎司直》。此诗最为读者传诵，诗为前后各五句组成，前用平声韵，后换仄声，头一联各为九字长句，此在杜甫七言古寺中又为创新之作。此诗语句不多，但自来解说者纷纭，其实前后两个“歌”字都谓王郎，前劝其莫哀，（“王郎酒酣拔剑击地歌莫哀”）大才必当有用；后望其青眼高歌（“青眼高歌望吾子”是一种倒装句，即“望吾子青眼高歌”），勿堕其志气而大有作为。至于吾子眼中之人如吾者，则已老矣——“眼中之人吾老矣”！以己之无可为，衬王郎之大有为；以己之黯然励王郎之奋然，但求后来有人，不惜自身冥漠，其歌虽短，其义则长，固可以质天地而泣鬼神。《仇注》引卢世澹评此诗云：“待少年人如此肫挚，直是肠热心清，盛德之至”，所论固是，但似觉尚未深达杜意。其他如《醉歌行赠公安颜少府，请顾八题壁》之“酒酣耳热忘头白，感君意气无所惜”，《重送刘十弟判官》之“年事推兄忝，人才觉弟优”，均为脱略形迹，披沥肝胆之言。

以上所举的几个例子可以看出杜甫对年少而有德行、有才干、有作为或有一技之长者都无不奖誉有加，瞩目至切，似乎要把自己毕生的愿望和人世的将来都托付在这些青年人身上。特别是期望他们能济世用时，安邦定国，惠及生民。诗人把自己一生执着追求而终于不能实现的理想都企望于他们，诗人自己的生命也似乎因此便有所延续。所以总是一往情深、毫无保留地“托末契于后生”，寄攀望于来者。我们如果深体杜公这种心情，那对于杜甫在他与苏涣的一番交往

中对苏的倾倒备至就不会以为甚奇而认为是当然的事了。苏涣的人品高，杜甫称之为“静者”。郭沫若同志以杜诗“静者心多妙”（《寄张十二山人彪三十韵》）来释“静者”的含义（《李白与杜甫·杜甫与苏涣》），说：“也就是说有思想的人”。我们看杜甫用“静者”一词的地方还有“蔡侯静者意有余”（《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蔡梦弼谓“蔡侯为人恬静而意气有余”；“贫知静者性”（《贻玩隐居叟》）；又，“虚白高人静”（《归》）也应是对“静者”的形容，《庄子》：“虚室生白”，旧注云：“人能虚心游世，则纯白备于内”。足见“静者”的含义是不慕声华，善用思考，虚其心而能纳物这些意思，自然不是“隐者”的别称。杜用“静者”来褒扬苏涣，的确不是泛泛称赞之词而有它特定的意义。苏涣既是杜甫心目中的静者而又是一个出色的诗人，“才力素壮，辞句动人”，杜甫在迟暮之年而一遇，故对他倾倒备至，赋八韵以“纪异”。杜自以为能见到苏是平生的奇遇，故对苏倾箱倒篋，畅吐胸怀。杜这首赠苏涣诗尤其有它的特点，用了许多比拟、譬喻的词语来形容苏涣的诗和他诵诗之声的美妙。如“雷出”，如“金石声”，能令人“白发变黑”，能令“湘娥悲”，能使“百灵未敢散”。昔人谓苏轼《百步洪》诗，一连串作了许多奇特比喻来刻划水之急，舟之速，甚为难得。今观杜甫此诗及诗题，早在苏轼以前就重山叠岭地一连用了许多比喻之词和夸张的手法来赞扬苏涣。这在杜甫的诗作中确也罕见。至于“突过黄初”“扬马同时”等语。倒是已经成了习用语，杜甫在赞美他人甚至在说自己的时候也常常使用，并没有特殊的意味。因为他所看到苏涣

的诗是五言古诗，所以用“黄初”一辞，又因苏涣是蜀人，所以以扬马为比。此如《醉时歌赠郑广文》诗“先生有才过屈宋”，谈自己青年生活的《壮游》诗“气劘屈贾垒”，一般。杜甫对苏涣的诗充分肯定，为之倾倒，今天仅能看到的苏涣的三首五言古诗，的确是清新、奇特，词警策而意深刻，不同凡响（郭沫若同志对这三首诗的分析较为详细）。杜甫之于苏涣，的确有“既见君子，云胡不喜”之感，故情见于词，也喜溢于言。其后杜甫往衡州避臧玠之乱，苏亦去衡，杜甫于《入衡州》长诗中又提到他，“门阑苏生在，勇锐白起强”，又赞美其武力智略之过人。杜在《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尔遣兴寄递呈苏涣侍御》中表现出对裴苏殷切的政治上的期望，“附书与裴因示苏，此生已愧须人扶。致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其义甚明。杜以自己的一生理想来希望于苏。“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醇”（《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诗人少年时（“甫昔少年日”）便怀抱着的伟大理想，萧条一生（“此意竟萧条”），数十年后更期之于今之少年，不仅意不变，甚至所用词句都大体相同。诗人荆湘诗所蕴含着的巨大热力和恳切热望多半在有为的少年人的身上而得到落实和展示，这应当说是荆湘诗的又一重大特点。

其三，对佛道有暂慕之情，于儒学实终生所仰。关于杜甫信奉道教、佛学，愿为佛门弟子，信佛最久且笃，以至综其一生与其称之为“诗圣”，宁可称之为“诗佛”：如此云云，言之最力者为郭沫若同志在其所著《李白与杜甫》书中之《杜甫的宗教信仰》一章。郭沫若同志的此一论断，近年

来已有同志著文提出相反的意见，作了较全面的论述，例如《草堂》学刊总第六期钟来因同志所写《论杜甫与佛教》一文即可为代表作。我在这篇论杜甫荆湘诗的文章中不可能也不必对这一问题详加阐说，我在这里只是从杜甫的荆湘诗来窥探杜甫即将逝世之年对道教、佛教的态度和感情，而对他一生所尊奉的儒学思想又有没有什么变化。

《杜甫的宗教信仰》一文中，说有些研究杜甫的专家们，认为杜甫和佛教没有发生过因缘，道、佛思想在杜甫思想领域中并不占什么地位，这是主观臆断。因而在文中胪列了杜甫诗中许多有关道教、佛教的诗句并作了分析，其中也举出了杜甫的荆湘漂泊时所写的有关诗句。我认为这些诗句是可以说明杜甫的思想领域中并不是一点佛道思想都没有，但道佛思想究竟占什么样的地位也是值得探讨的。杜的荆湘诗确有一些足以显示诗人思想领域中的道佛思想，但湖南诗中恰恰就有《题衡山县文宣王庙新学堂呈陆宰》这篇五言古诗。我们不妨把这篇诗抄录在下面：

旄头替紫微，无复俎豆事。金甲相排荡，青衿一憔悴。
呜呼已十年，儒服散于地。征夫不遑息，学者沦素志。
我行洞庭野，歛得文翁肆。恍恍胄子行，若舞风雩至。
周室宜中兴，孔门未应弃。是以资雅才，涣然立新意。
衡山虽小邑，首倡恢大义。因见县尹心，根源旧宫阙。
讲堂非曩构，大屋加涂墍。下可容万人，墙隅亦深邃。
何必三千徒，始压戎马气。林木在庭户，密干叠苍翠。
有井朱夏时，辘轳冻阶戾。耳闻读书声，杀伐灾仿佛。
故国延归望，衰颜减愁思。南纪改波澜。西河共风味。

采诗倦跋涉，载笔尚可记。高歌激宇宙，凡百慎失坠。

这是一篇长 200 字、一韵到底的大篇。首四句指出因战乱而使孔庙之礼不修，学校荒废。相接的四句慨叹儒家之道扫地，“壮士耻为儒”（杜甫《送蔡希鲁都尉还陇右寄高三十五书记》），学者素志沉沦，于斯已极。其后八句在凋残败弊的世道中忽喜儒教之振兴，得见学宫的新立。人才得以作育，儒学于兹不坠。其中“周室宜中兴，孔门未应弃”二语，大书特书，其意义是：如欲唐代中兴，国家太平，黎民安乐，那就必行孔子之道，舍此无由。“衡山”四句，赞扬衡山县，虽然是必有之辞，但是赞以“首倡大义”，分量很重。“讲堂”以下一节六韵，写学堂的规模及其环境，而“何必三千徒，始压戎马气”二语，申言文教可以消除战乱，安邦济世，此为治国之根本。“耳闻读书声，杀伐灾仿佛”，亦是此意。浦二田释仿佛为“稀微将止”，是。最后八句，第一联谓归望可延，衰颜为此而减愁，第二联谓南纪（即指湖湘）之波澜已转，将拨乱而返正；“西河”句借子夏于西河教授事，示儒学之兴可待。第三联谓古代辍轩采诗之制已废，倦于跋涉；但是尚可笔之于书，传于遐迩。末联以“高歌”表今日之欢情，以“失坠”戒将来之怠忽。于是结束全诗，其声铿然而止。浦云：“读竟，知其喜动颜面”，良然。这篇诗至少显示出这样几点，一为诗人在最后一段时光里，其奉儒之志无所易，其信仰儒家学说，即古圣先王之道可以臻国家于郅治的信念未尝改变，也表明了儒教思想在杜甫思想领域中始终占着重要的和主导地位。更从诗人飘泊荆湘两年间的政治思想、见解和期望而言，如前面已经一一论到

的那种系心唐室、忧在苍生的思想感情至死不移。如果以道、佛二教的教义为主导思想的人是决不会如此的。例如王维有“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酬张少府》），“终日无心长自闲”（《答张五弟》）这样的诗，杜甫是绝对作不出、也办不到的。正由于他关心的事太多感情常处于激动之中，心不得闲，所以才疾病侵寻，未老先衰，既衰便卒，未能尽其天年。再则，他虽然伤感之事很多，但多半是为了国家，出于公心，所以也并无逃避之思。“平生几许伤心事，不入空门何处消”，这种消极悲观的思想诗人不会有，更说不上入空门而消之，所以这一顶“诗佛”的帽子无论如何给杜甫戴上，头颅与帽子大相径庭，怎么能戴上呢！但这并不是说，杜甫思想上对佛、老的人生哲学及其宇宙观念一尘不染，事实上也不可能。一个人的思想总不会是那么单纯，何况杜甫所处的时代，唐太宗扇扬道教于前，武后又提倡佛教于后，以政治力量来推动二教的流行、散布，自然会产生比较显著的影响。而且一种宗教的产生又自有其种种人世因素，对社会现象不得其解、对人生苦恼欲求解脱之“芸芸众生”，逃之于宗教也是不可遏止之事。即使是很有学问的人也难免有所“入”，不入于佛，即入于道，这在隋唐文人之中几乎难免。杜甫因为操守有素，己饥己溺之心甚重，故于佛、道二教，思想上比较淡漠，他的诗歌虽然也常有佛道的典故和用语出现，那是属于吸收外来文化和继承古代文化遗产的范畴，又多半是语言文字和辞藻上的运用，与宣扬宗教不同。但是诗人虽不佞佛，也不辟佛。中有所主，无可动摇，不入于道佛。但也不必疾言厉色地辟之、斥之唯恐不

及。诗人出峡之后，穷愁已极，疾病缠身，亦自知命之不久，也会自然地想到生命的无常和人生的究竟，“宇宙此生浮”（《重题》），亦不知浮向何方。西汉贾谊，本是儒生，适长沙，鸩飞入舍，自以为寿不得长久，乃为赋以自广。其言有类于道家者流，如云：“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忽然为人兮，何足控转。化为异物兮，又何足患。小知自私兮，贱彼贵我。通人大观兮，物无不可。”“释知遗形兮，超然自丧。寥廓忽荒兮，与道翱翔。乘流则逝兮，得坻则止。纵躯委命兮，不私与己。其生若浮兮，其死若休。淡乎若深渊之静，汜兮若不系之舟。不以生故自宝兮，养空而游。”杜公之到湖南，其心迹有类贾生，则求为通人、超然物外之思也不可能不萌发，触物兴吟，有所显现，这也是很自然、很真实的事。故从《望岳》《幽人》等诗，可以看出杜公对道教亦饶欣喜之情，有仰慕之思。《望岳》当作于大历四年春晚到衡州时。首叙祀典由来已久，联想到舜帝之南巡。次言自己隘于世网（此已是道家之词），如今行迈潇湘。再次则写衡岳奇景。忽又想到神仙中人的魏夫人，群仙翱翔，翩然来集。魏夫人者，据《太平广记·卷五十八》引《神仙传》，夫人任城人，名华存，晋司徒魏舒之女，幼而好道，志慕神仙，遇南极夫人西城王君，授以宝经及《黄庭内景经》。夫人诵经万遍，积修数十年，白日昇天，受天人玉札金文，位为紫虚元君，领上真司命南岳夫人。这自然是道家虚无之言，杜甫望南岳而思及此，使诗歌增添神秘色彩，自是一种艺术手法，然亦可见杜公闻“道”则色喜之情。篇末却以“曷以赞我皇”“神其思降祥”为结，

仍不离杜公爱君匡时之素愿，希望神仙也能为世用。此乃出于礼节，并非祈神求福。《幽人》一诗，钟伯敬谓为“此绝妙游仙诗，非惟无丹药瓢笠气，亦并无云霞山泽气”。卢元昌则说是寓言。不管怎样，此诗表现出对道教亦有歆羨之意，既不必是寓言，亦非游戏笔墨，“内惧非道流，幽人见瑕疵”则已表明自己的身分，但也尊重道流，出于诚意。《忆昔行》提到“衡阳董炼师”，思欲一访，虽是重方外之交，也有慕道流之意。然如《镜铨》所云，“子美则学佛兼欲学仙”，这就未免有失于杜甫之心志了。

荆湘诗中的《岳麓山道林二寺行》这首七言古诗，则又显示了杜甫的慕佛思想。前数句写寺景甚美，庄严宏丽。轩敞清幽，赞礼之声，高闻天宇。于此尤可见出对偶句的妙用，以及诗人对内典词语及故事的纯熟，自非精通佛学者不办。后半写自己欲依道林二寺而诛茅棲止之情。困顿终生，闲关万里，忽值此清凉佛国之地，于是萌发避尘嚣而依禅寂之念，通常人恐怕也在所不免，何况杜甫是长年忧苦，别有伤心怀抱之人。所以，如果说杜甫在这些诗篇里，完全没有流露出一点慕佛思想，以佛寺地区为乐国（“昔遭衰世皆晦迹，今幸乐国养微躯”）的思想，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但是如果拈拾一句两句如“僧宝人人沧海珠”“傍此烟霞茅可诛”等语，便说他“很想出家”，“极端信佛”，这就未免深求而离实际了。至于“不复知天大，空余见佛尊”，《李白与杜甫》执此二语，屡言佛在杜甫心中的地位高于一切，而且形成结论，谓宁可称杜甫为“诗佛”，则更有深文之嫌。这两句诗见《望兜率寺》五律中，这是杜甫广德年间在梓州所

作。关于梓州的山水名胜，诗人写了很多首五言律诗，如香积寺、牛头寺、牛头山亭子、惠义寺等。即景生情，写了这样的诗句：“且欲上慈航”“潇洒共安禅”及上述二句，都是很一般的话，也可以说是口头禅。那两句诗，好像很严重，但通观全首：“树密当山径，江深隔寺门。霏霏云气重，闪闪浪花翻。不复知天大，空余见佛尊。时应清盥罢，随喜给孤园。”对第三联，自来也还有不同的解说。如浦二田云：“三四由彼及此，但见山云远动，江浪近翻而已。此时境界旷阔，宜‘知天大’矣，而心依初地，犹然但‘见佛尊’也。”但《仇注》云：“儒者敬天，佛氏信心。惟敬天，故时时戒惧慎独，求无忝于所生。惟信心，故乍见圆觉妙明，视一切皆空幻，充其说，殆流于无忌惮而不自知也。此诗云‘不复知天大，空余见佛尊’，非推尊释道之大，正言其所见之小耳。”如后说，则杜甫决不是看得佛比天大；如前说，则不过杜甫才游了兜率寺（有《上兜率寺》诗），今当江上开阔之景，回望兜率，心中犹余佛尊之象而不见江天之大大。不过如此。而且这里也是顺便说了彼教之常言，《九家集注杜诗》于此二句就注解：“佛言天上地下，惟我独尊”。怎么能从这首诗截出此二句，不管彼时彼地前游后望之情景如何，也不管此二语有否援引，竟说这是杜甫思想上“把释迦牟尼看得比天还大，天上地下，唯佛独尊”，这未免太武断了！杜甫在湖湘所作的最后一首诗《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其最后几句“葛洪尸定解，许靖力难任。家事丹砂诀，无成涕作霖”。明显地又表现出道家的思想，诗人思想上有道家思想的一些成分也是事实，绝笔之

音，更可佐证。但是，这也只能说有道家思想因素，而不能说杜甫就是道家者流。这几句诗也是排律中惯有的使用典故的写作手法。“葛洪”句，旧注云“言将客死也”就是如此。篇末二语也无非是说丹砂不成，生命难延，伤垂死而志无所成，故只能以涕泪作霖雨罢了。而其中的“许靖”“家事”等词语就更与道家无关，这是说不能像许靖那样安顿好家属。一身莫保，家人难安，不能不悲，如果仅就这篇长诗言，则篇末的“朗鉴存愚直，皇天实照临。公孙仍恃险，侯景未生擒。”这几句及其下数语才是最分量的最表现诗人临歿关念的惨惨心声和煌煌大笔。故从绝笔之作也更能体会到诗人一心系念的是国计民生，其所遵奉的仍是儒家治世之道而非释道出世之法。颜之推《归心篇》曾说：“内外两教，本为一体”。佛家自视其教为内教，视他教为外教。颜所云外教指儒学，南北朝以来，儒生之信佛者不少，援儒入佛是一种时代思潮，欲把儒佛揉合为一而利其行。但是在杜甫的思想上，儒与释道二家却有明确的界限，在他的思想上并不混淆。只不过如《杜诗镜铨》于《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引俞犀月的评语所说：“世乱而不得中兴之佐，故望于郑李之心甚切；垂老而将为出世之人，故皈依曹溪之念特深。”但事物有常有暂，有主有次，思想亦然。杜甫触事而发，有暂慕佛老之情；立身惟谨，存终守儒学之志。大概如此。其在湖南诗，慕佛道之情有所进，但在思想上始终不占主要地位。其于儒家之道则终守勿失。观前面所谈到的《题衡山县文宣王庙新学堂陆宰》诗及诗人在荆湘漂泊中念念不忘的拨乱世返之正的心情和行事而益见。

其四，各体诗均属上乘，五言律诗尤感人心。

杜公荆湘诗一百数十首，寸寸摄录了伟大诗人最后两年的生命历史，又是长留天地一部完整的结构严谨的各体皆备的诗卷。本文的开头已经说到这一百几十首诗各体诗的数量。观看这些诗的组成，诗人虽不一定、也不可能预先有个什么安排。但心之所重和意之所向，自然地形成了各体的比例，而又恰恰是有首有尾，有总括，有分列，似乎预先有所布置一般。荆湘诗一首一尾都是五言排律，遥相呼应，可以看作是引言与后记，都带有总叙与总论性质。其他五排近30首，都极精警，与夔州诗的五排合观，为杜甫五言排律的主体部分，千门万户，波澜老成，最见杜甫在诗歌领域中的创造性，珣玞之讥，实为不当。我在拙作《论杜甫五言排律》文中有所论述。七言排律与荆湘以前的几首比较，亦觉后胜于前。五古、七古并多佳构，有些篇目，关系甚大。至于律诗，五律50多首，占荆湘诗的三分之一；七律只13首。七律多拗体之作，音韵孤峭，如《暮归》，然亦有气度极宏大者，如《又作此奉卫王》。较之荆湘以前七律，变化不大。

荆湘诗中的五律，在数量上既不少，质量上也很高，某些篇题是荆湘漂泊以前所见不到的。由于没有荆湘那种至为愁苦的生活，而其高处也是荆湘以前的五律所未能达到。荆湘五律50多篇，其中一部分尤其令人百读不厌而百感横生。五律属于短咏之体，不贵于铺陈，而贵于精练。诗人百忧所集，取此短体，以胸中之所积喷薄而出，垂涕而道，气在声先，意余言外，故某些五律直是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五律

这种诗体作为一种抒情之具，在诗人更是运之纯熟，操之自然，从心所欲不逾矩，称心而言多可观。今按诗人荆湘岁月的时间先后，录所作五言律诗3首于下，略作评论，以著一愚之见。

江 汉

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

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欲苏。古来存老马，不必取长途。

此诗为大历三年（公元768年）秋所作。以江汉思归之客实为乾坤一个腐儒领起。“腐儒”有贬意，见《荀子·非相》，又汉高祖谓随何为腐儒，“为天下安用腐儒！”（《史记·鲸布传》）。公诗亦有“天下尚未宁，健儿胜腐儒”（《草堂》）、“腐儒衰晚谬通籍”（《题省中院壁》）、“百年粗粝腐儒餐”（《宾至》）诸语，皆系自嘲。《杜臆》云：“公之行事似‘腐儒’者不无一二，若以世法绳之，真腐儒也”（卷九《江汉》条）。王嗣爽可谓知言。以世法绳之为腐儒，则“腐儒”固蔑弃世法者的美称了。而且这一句是“乾坤一腐儒”，更见纵恣壮浪，以自贬自嘲之词，为自傲自负之用。此与李白之“天生我才必有用”的“我才”，实应视为同义语，乃横绝而抗议的宣告于众之词。“但觉高歌有鬼神，焉知饿死填沟壑！”“诗酒尚堪驱使在，未须料理白头人！”皆“腐儒”的注脚。于此弥见杜公至死不衰之情。二、三两联，四句的语言结构相同，清施鸿宝《读壮诗说·江汉》以为四句的前二字“皆以二字起”，下三字的天、月、心、病等皆实字，“在律诗中亦犯沈约八病者。惟情景浑合，读之不觉耳。”按

此四句一气直下，不但情景浑合，更是低昂递进。第二联心情相对地呈低下状态，天、月浑合，笔虽大而有黯然之意；第三联心情陡壮，落日、秋风，本为萧条之象（落日亦喻暮齿），而心犹壮，病欲苏，收相反相成之效，愈见高昂之极。读起来在音节上、心境上给人以继长增高的壮美之感，丝毫不觉得犯了什么“八病”。于此也可见诗与文同，亦应“以气为主”，气盛则皆宜。结语承上而言，亦即李白“我才必有用”之意，老马应用其智，岂可责以长途之奔驰。《杜诗详注》云：“东坡自岭外归，次江晦叔诗云：‘浮云时事改，孤月此心明’。语意高妙，亦是善摹杜句者”。若就意境言，举东坡这首《六月二十日夜渡海》诗更合。此诗云：“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同为胸襟旷达、气宇高超之作，在历代诗作中也未可多觐。至于杜公这首诗属对的精工，语气的连贯，尚属易见之处。胡元瑞谓二、三两联“含阔大于沉深，高、岑踉乎其后”，亦自有见。但更重要的是胸襟、气度。反复读之，于杜诗沉郁顿挫的胜境当更有所领会，于杜甫飘泊湖湘中的心志也更会觉得可触可扞了。

登岳阳楼

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

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

这首诗当是大历三年岁暮时作。古往今来，读此诗回环往复，对此诗倾倒赞叹，为此诗感慨歔歔的人很多很多。例

如宋唐庚说：“其气象宏放，涵蓄深远，殆与洞庭争雄。太白退之辈率为大篇，极其笔力，终不能逮”（《子西文录》）。标举神韵之说的清人王士禛，对杜甫此诗也说：“元气浑沦，不可凑泊，高立云霄，纵怀身世。”备致其仰慕之忱。这首诗的确是足以横绝千古。为杜甫荆湘诗、也是全部杜诗的代表作之一。王阮亭评以“元气浑沦”，大概也只能这样说。柳宗元记山水的文章有云：“悠悠乎与颢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始得西山宴游记》），可以移作杜甫《登岳阳楼》最恰当和最充分的形容词。原其所以能够如此，其所以能够感人至深，端在其人格之伟大，其胸怀之广阔，其身世之屯蹇及其神化莫测的诗歌创作艺术之超妙。功夫在于作诗以外，这确实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但功夫又见于临事之时，看其是否能够把握得住，用宏取精，书写得出。

此诗古今的评论，大率赞其通首的宏放雄浑和各联的精湛。其中又以论赞第二联者最多。其实第一联也至关重要。“昔闻”，言闻之也久，有不尽的对洞庭向往之情；“今上”则昔日之所向往者今已忽然呈现于眼前，愉悦之情不言而喻。但“昔”“今”二字实已概括了杜甫几十年中的国事家情，有其极为丰富的具体内涵，决非仅仅是时间上的概念。较之“万方多难此登临”，诗人在成都写《登楼》诗时的国难与心忧更有甚焉。这开头两句深深蕴含着无穷的感喟而有力地开启了以下诸联。评论者于第二联或说“三、四雄跨千古”（沈德潜《唐诗别裁》），或说“只吴楚二句已尽大观”（王嗣奭《杜臆》），大抵如此。我以为此二句之佳，一在从

时间上说是紧承上联，早闻岳阳楼于数十年前，今乃得上，乾轩坤豁，毕呈眼底，正在此时。一是从景观上说是紧紧控住了洞庭湖最本质的特征，而把它置于至大无外的宇宙空间来表现。昔人往往用孟浩然的“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或刘长卿的“叠浪浮元气，中流没太阳”来比较，都感到不及杜甫这两句诗。沈德潜说出原因：“孟襄阳三、四语实写洞庭，此只用空写，却移他处不得，本领更大。”我看问题恐怕不在于实写、空写，杜诗这两句其实也是实写。其原因应是杜与孟的写法不同。杜是把洞庭一湖置放在天地之间（它本来在天地间）来看，故愈见其大，坼吴楚而浮乾坤。孟却是把洞庭湖从天地间割下来看，写洞庭就只着眼于洞庭，而忽视其极为广阔的上天下地，乾旋坤转的大背景。其所言就只是气蒸云梦之泽而波撼岳阳之城。也不是全无背景，但较之杜所著眼与感受者就相对地小得多。于是益见杜甫视野与胸怀之广大为无极，相对说来孟的境界就比较小了。而且杜诗中的“坼”字尤为特异，有人认为洞庭是楚地，何能远及于吴，《镜铨》已引董斯张的话有所辨明，以为“杜句所云，皆是紧切洞庭，一语移动不得”。不仅移动不得，更是十分精警。也有注家认为“坼”字出于《史记·赵世家》“地坼东南”，其实不在于出处如何，而在于“吴楚东南坼”这句诗写出了洞庭的地理位置，这还是次要的；更写出了洞庭的气势，也只有这句才能与下句“乾坤日夜浮”势均力敌，合成十个字，写出了洞庭的磅礴、雄伟。“浮”字虽是比较常用的词，但杜甫在这里用得很新鲜、突兀，异乎寻常。这两句诗既是写景铸雄伟之辞，也是言情著象外之

旨。浦起龙已说出了这一点。他说：“然玩三、四已暗逗辽远漂流之象”（杜之《重题》诗已有“宇宙此生浮”句）。这就是情与景合，也可以说有不自知其然而然者。第三联写湖湘漂泊已至途穷日暮之境的痛苦生活，为必然有的诗句。黄生说，“写景如此阔大，自叙如此落寞”，其实这正是诗人“修辞立其诚”的伟大之处，景象本阔大，故写以阔大；生活本落寞，故还以落寞。二者也是相反而相成。杜公湖湘生涯，只有孤舟为家，所以也常常提到，如《追赠故高蜀州人日见寄》也说：“东西南北更堪论，白首扁舟病独存”便是。结语从小我复写到大我，杜老总是如此，往往从一己的悲痛中摆脱出来或联想起来，直写到国家与黎民，《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是如此，其他许多诗篇是如此，这首《登岳阳楼》也是如此。但又很自然。登高怀远，我瞻四方，每依南斗望京华，情不自禁地想到戎马关山而涕泗交流。记得1962年在纪念诗人诞生1250周年时，我曾经写过一篇纪念文章，说过：“晚岁登岳阳楼，戎马关山，凭轩流涕，这是我们的诗人把几十年间家国兴衰之感和千万人民号泣痛苦之情，凝聚在一把眼泪之中而洒向白浪滔滔的洞庭。使人悲歌，使人慷慨，这一把眼泪蕴含着多么巨大的热力啊！”今天我还是有这一种感受。再如孟浩然岳阳诗，雅、正、宏、丽，也是上乘之作，但读起来总觉得不如杜诗感人之深，前人已云：“孟诗结语似逊”，固然如此，但归根结底还是胸襟抱负思想感情的问题，孟不能代替杜，杜也不能代替孟，就诗的流传与影响说，那当然是各有千秋；但就感人之深，啮人心肺而言，那就未可同日而语了。读荆湘诗至《登岳阳楼》，愈有

所感也愈为斯人悲。杜公《泊岳阳城下》五律，亦是杰作。其“留滞才难尽，艰危气益增。图南未可料，变化有鸱鹏”。诸语，极其雄浑，《杜诗摺》谓为“百折不回”。此诗亦不亚于《登岳阳楼》。兹不备论。

南 征

春岸桃花水，云帆枫树林。偷生长避地，适远更沾巾，
老病南征日，君恩北望心。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

这首诗当作于大历四年（公元769年）春自岳州往潭州作。潭州即长沙，在岳州之南，故题为《南征》，也是用《离骚》“济沅湘兮南征”句意。此诗之前有《陪裴使君登岳阳楼一首》，其末联为“敢违渔父问，从此更南征。”《仇注》云：“屈原至江滨，渔父劝其与世推移。公旅况依人，故不敢违渔父之问而更欲南征。”可能不失诗人之心。盖南征亦不过“与世推移”。故此诗第三句有“偷生”一词，“存者且偷生”，不能行其志而苟全其生，心最伤痛，此即《南征》诗的主题思想。此诗所达艺术高度及感人之深不亚于《登岳阳楼》之作，但前人论之者甚少，唯刘须溪云：“此等不忍卒读。”可能因为《登岳阳楼》有三、四两句，容易惹人注目，而此诗看似寻常语言，容易为人忽略。又，《登岳阳楼》其雄浑之气能慑人，此诗平易之辞故未能引人重视。但此诗辞似平易，音调亦不昂扬，而内蕴极深，含情至重，恬吟密咏，方能触及诗心而感叹无穷。

此诗头一联是写景，前人谓首句用秦人桃源事，次句用《楚辞·招魂》事。固然从词语的来源说有如此的关系，但这

二句实系诗人直写实景，“春岸桃花水，云帆枫树林”写湖湘春日行舟如画。杜公的荆湘诗，既写了荆湘之间浊世乱离之状，也写了荆湘山水清幽之景，连篇累牍，不绝于书，千汇万状，美不胜收，如白帝城放船这一首，写出了出瞿塘峡时所亲见的江山奇景，恐怕图画也难绘出。又如“二仪清浊还高下，三伏炎蒸定有无”（《又作此奉卫王》）“大水淼茫炎海接，奇峰崑兀火云升”（《多病执热奉怀李尚书》）及《登岳阳楼》三、四句之宏大；“野流行地日，江入度山云”（《江阁对雨，有怀行营裴二端公》）“风蝶勤依桨，春鸥懒避船”（《行至古城亭泛江作》）之细密；“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雾中看”（《小寒食舟中作》）之俊逸；“影遭碧水潜勾引，风妒红花却倒吹”（《风雨看舟前落花，戏为新句》）之清丽；“寺门高开洞庭野，殿脚插入赤沙湖”（《岳麓山道林二寺行》）之精稳，皆为他人所未能企及。此诗起联虽无奇特之处，但开阔、清新，亦令人神往。次联点出“偷生”与“适远”，语淡而心神之痛苦尽在不言之中。长避地，则漂泊无已时，更沾巾，则泪落无止日，亦唯有至死方休！杜公行屈贾离忧之地，正山河动荡之秋，难于为怀，亦罕有人知。第三联出语极重，几个名词重叠（“南征”“北望”这里皆可视作名词），而千情万感在其中。老病南征之日，君恩北望之心，此日此心，未可言表，弥见情伤。当然这也表现了杜公始终不忘君国之念。去国滋远而忧国滋深。最后一联，其情尤苦。古诗有“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之句，杜公一生以身许国，以诗报国，诗成为他不能在其位而行其志乃以之报效国家、戮力王室、拯救苍生的一种武器。他“不敢废

诗篇”，有强烈的政治责任感；“不惜歌者苦”，有自觉的牺牲精神。但是“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觅解人亦不易得，所以他在荆湘所作《公安送韦二少府匡赞》说：“念我常能数字至，将诗不必万人传”。其意是，你思念我时，可常常寄我几个字；把我的诗拿去，却不必传示多人。这虽似谦逊的话，却也是不易觅得知音之意。杜公诤言“未见有知音”，则是不认为有一个知音之意，其心之苦可知。较远于杜甫者如刘勰所叹：“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文心雕龙·知音》）稍早于杜甫者如刘知几之所伤：“嗟乎！倘使平子不出，公纪不生，将恐此书与粪土同捐，烟烬俱灭，后之识者，无得而观，此予所以抚卷涟洏，泪尽而继之以血也！”（《史通·自叙》）杜公之心，当亦类此。所以此《南征》五律，以含蓄之笔写沉忧之心，以平易之调表不平之情，较之《登岳阳楼》其所以自叙而自伤者尤多，其亦如刘知几所言“泪尽而继之以血”啊！再则，杜公用“侵”韵所写的诗，多半是表感伤之情，写激楚之音，如此首《南征》便是，又如《蜀相》、《登楼》《春日江村五首》之一、《秋兴八首》之一以及绝笔之作《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皆是。足见诗人是有意地运用韵脚来增强诗歌的表现力和感染力，这也是他精于音律、善于以音表情的一个方面。

杜甫荆湘诗可谈和可学的地方很多，仅就管见所及，述之于上。

1988年夏

论杜甫的五言排律

杜甫的排律诗，主要是五言排律，共有 120 多首。加上七言排律几首，共约占杜甫全部诗歌作品 1400 多首的十分之一，数量是比较大的。对于这一部分诗，以唐朝元稹为代表的评论者则备加赞扬，评价很高。元稹在《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序说：“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辞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这应指的是五言排律诗，用来和李白的诗相比，认为“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后来元代的大诗人元好问对此有异议。元好问在《论诗绝句》中说道：“排比铺张特一途，藩篱如此亦区区。少陵自有连城璧，争奈微之识珣玞”。认为排比铺张不过是杜甫诗的一个方面，而杜诗的胜处决不在此，元稹只是识得珣玞而不见连城之璧。这里有几个问题：元好问认为“排比铺张”（即元稹所说的“铺陈终始，排比声韵”的排律诗）是珣玞（石之似玉者），与元稹大异其趣，这当然各有各的看法，不必强同；但杜少陵的这一部分诗同其他的各体诗相比，是不是竟有着珣玞之与连城璧这样大的差异？而排比铺张是不是就等于珣玞？这也是可以研究的一个问题。（姚鼐《今体诗钞序目》谓“读五言至此，始无余憾。”又于杜子美下注云：“有长律如此，而目为

珷玞，此成何论耶！”陈寅恪《寒柳堂集·论再生缘》文中引此，并说：“微之、惜抱之论精矣。”）再则，元稹在他的文章中，明明是首先肯定了杜诗在各方面的成就，即“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这几句话；下面在“至若”之后才说到“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并不是只知道“铺陈终始，排比声韵”这一个方面。应该说元稹对杜诗首先作了全面的肯定与赞扬，在这个基础上才作了重点的标举。他举出了杜诗的排比铺张这一方面来形容李白诗的“不能历其藩翰”，这是不恰当的，因为各有所喜和所长。但不能说元稹就只识杜诗的珷玞而不识其连城璧，这也是应当弄清楚的一个问题。

排比铺张，大或千言，这是杜甫诗歌创作方法及其艺术成就的一个重要方面，虽不必扬之过分，压倒其他，但也不应贬抑过甚，视之为珷玞。因为究竟是否为珷玞或者其他什么不好的比喻物，这要从这些排律作品本身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来实际地看，不能仅从体裁上、形式上粗略地作出判断。杜甫的排律诗确实有些是用之于“干谒”的，为后人所议，有些艺术性也不高，不免板滞。但是像这样的排律诗数量究竟有多大是可以考究的，自不能以偏概全；何况那些思想和艺术方面的缺陷，这是杜甫的其他各体诗也还是存在着的，又不能独咎排律诗。杜甫的排律诗和其他各体一样都是他留给后代的宝贵文学遗产，值得学习、探讨，同样应当吸取其精华而扬弃其糟粕。

为了考查一下杜甫排律诗所写题材的各个方面及其篇幅

大小的情况，我想不妨先把杜甫排律诗的题目胪列出来。我根据《杜诗详注》的顺序把杜甫五言排律的题目，用韵多少以及《详注》本的卷数列表于下，这样看起来更方便些。

杜甫五言排律的题目、韵数、《详注》本卷数表

题 目	韵 数	卷 数
临邑舍弟书至苦雨黄河泛滥隄防之患簿领所忧因 寄此诗用宽其意	12 韵	卷一
与李十二同寻范十隐居	8 韵	卷一
赠特进汝阳王二十韵	22 韵	卷一
赠比部萧郎中十兄	10 韵	卷一
奉寄河南韦尹丈人	10 韵	卷一
赠韦左丞丈济	10 韵	卷一
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	14 韵	卷二
赠翰林张四学士垧	8 韵	卷二
敬赠郑谏议十韵	10 韵	卷二
奉留赠集贤院崔于二学士	10 韵	卷二
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	20 韵	卷二
投赠哥舒开府翰二十韵	20 韵	卷三
承沈八丈东美除膳部员外郎阻雨未遂驰贺奉寄此诗	10 韵	卷三
奉赠太常张卿垧二十韵	20 韵	卷三
上韦左相二十韵	20 韵	卷三
送蔡希鲁都尉还陇右因寄高三十五书记	10 韵	卷三

论杜甫的五言排律

题 目	韵 数	卷 数
遣兴	6 韵	卷四
郑驸马池台喜遇郑广文同饮	6 韵	卷五
得家书	6 韵	卷五
奉送郭中丞兼太仆卿充陇右节度使三十韵	30 韵	卷五
送杨六判官使西蕃	12 韵	卷五
行次昭陵	12 韵	卷五
重经昭陵	6 韵	卷五
喜闻官军已临贼境二十韵	20 韵	卷五
送许八拾遗归江宁觐省甫昔时尝客游此县于许 生处乞瓦棺寺维摩图象志诸篇末	8 韵	卷六
秦州见敕目薛三璩授司议郎毕四曜除监察与二 子有故远喜迁官兼述索居凡三十韵	30 韵	卷八
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	30 韵	卷八
寄岳州贾司马六丈巴州严使君两阁老五十韵	50 韵	卷八
寄张十二山人彪三十韵	30 韵	卷八
寄李十二白二十韵	20 韵	卷八
建都十二韵	12 韵	卷九
赠虞十五司马	10 韵	卷十
奉和严中丞西城晚眺十韵	10 韵	卷十一
奉送严公入朝十韵	10 韵	卷十一
送严侍郎到绵州同登杜使君江楼宴	10 韵	卷十一
送梓州李使君之任	8 韵	卷十一
陪章留后侍御宴南楼	8 韵	卷十二

题 目	韵 数	卷 数
送陵州路使君之任	8 韵	卷十二
王阆州筵奉酬十一舅惜别之作	6 韵	卷十二
与严二郎奉礼别	6 韵	卷十二
赠裴南部六韵	6 韵	卷十二
江陵望幸	6 韵	卷十二
伤春五首	各为 6 韵	卷十三
春归	6 韵	卷十三
赠王二十四侍御契四十韵	40 韵	卷十三
寄司马山人十二韵	12 韵	卷十三
寄李十四员外布十二韵	12 韵	卷十三
寄董卿嘉荣十韵	10 韵	卷十四
到村	6 韵	卷十四
陪郑公秋晚北池临眺	10 韵	卷十四
遣闷奉呈严公二十韵	20 韵	卷十四
奉观严郑公厅事岷山沱江画图十韵	10 韵	卷十四
哭台州郑司户苏少监	22 韵	卷十四
敝庐遣兴奉寄严公	6 韵	卷十四
上白帝城二首	各为 6 韵	卷十五
陪诸公上白帝城头宴越公堂之作	6 韵	卷十五
寄韦有夏郎中	6 韵	卷十五
奉汉中王手札	14 韵	卷十五
谒先主庙	16 韵	卷十五

论杜甫的五言排律

题 目	韵 数	卷 数
夔府书怀四十韵	40 韵	卷十六
奉汉中王手札报丰侍御肖尊师亡	6 韵	卷十六
赠李八秘书别三十韵	30 韵	卷十七
西阁二首	各为 6 韵	卷十七
宗武生日	6 韵	卷十七
哭王彭州抡	20 韵	卷十七
偶题	22 韵	卷十八
别苏徕	10 韵	卷十八
南极	6 韵	卷十八
奉送王信州壶北归	18 韵	卷十九
诸葛庙	6 韵	卷十九
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审李宾客之芳一百韵	100 韵	卷十九
寄刘峡州伯华使君四十韵	40 韵	卷十九
天池	10 韵	卷二十
九日五首（其第四首）	6 韵	卷二十
东屯月夜	8 韵	卷二十
伤秋	6 韵	卷二十
柳司马至	6 韵	卷二十一
奉贺阳城郡王太夫人恩命加邓国太夫人	10 韵	卷二十一
元日示宗武	6 韵	卷二十一
又示宗武	6 韵	卷二十一
远怀舍弟颖观等	6 韵	卷二十一

题 目	韵 数	卷 数
续得观书迎就当阳居止正月中旬定出三峡	8 韵	卷二一
太岁日	8 韵	卷二一
送大理封主簿五郎亲事不合却赴通州主簿前阆 州贤子余与主簿平章郑氏女子垂欲纳 采郑氏伯父京书至女子已许他族亲事遂停	8 韵	卷二一
将别巫峡赠南卿兄瀼西果园四十亩	8 韵	卷二一
大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唐峡久居夔府将适 江陵漂泊有诗凡四十韵	42 韵	卷二一
行次古城店泛江作不揆鄙拙奉呈江陵幕府诸公	六 韵	卷二一
奉送苏州李二十五长史丈之任	6 韵	卷二一
暮春江陵送马大卿公恩命迫赴阙下	10 韵	卷二一
夏夜李尚书筵送宇文石首赴县联句	8 韵	卷二一
水宿遣兴奉呈群公	20 韵	卷二一
遣闷	12 韵	卷二一
秋日荆南述怀三十韵	30 韵	卷二一
秋日荆南送石首薛明府辞满告别奉寄薛尚书颂 德叙怀斐然之作三十韵	30 韵	卷二一
哭李尚书之芳	10 韵	卷二二
舟出江陵南浦奉寄郑少尹审	12 韵	卷二二
移居公安敬赠卫大郎钧	10 韵	卷二二
送覃二判官	6 韵	卷二二
过南嶽入洞庭湖	12 韵	卷二二
北风	10 韵	卷二二
哭韦大夫之晋	十八韵	卷二二

论杜甫的五言排律

题 目	韵 数	卷 数
千秋节有感二首	各为 6 韵	卷二二
奉赠卢五丈参谋琨	16 韵	卷二二
重送刘十弟判官	6 韵	卷二二
湖中送敬十使君适广陵	8 韵	卷二三
送卢十四弟侍御护韦尚书灵柩归上都二十四韵	20 韵	卷二三
冬晚送长孙渐舍人归州	6 韵	卷二三
暮冬送苏四郎谿兵曹适桂州	6 韵	卷二三
奉赠肖十二使君	18 韵	卷二三
奉送二十三舅录事崔伟之摄郴州	10 韵	卷二三
送魏二十四司直充岭南掌选崔郎中判官兼寄韦韶州	6 韵	卷二三
同豆卢峰贻主客李员外贤子裴知字韵	6 韵	卷二三
回棹	14 韵	卷二三
登舟将适汉阳	6 韵	卷二三
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呈湖南亲友	36 韵	卷二三

我列的这个表与浦起龙的《读杜心解》卷五所列五排篇目，次序上有所不同，因为我是根据《杜诗详注》的篇目次序。总的篇数也略有不同。《读杜心解》共列五排篇章 127，我这里所列的只 115，因古诗而多排句者，算作五言古诗比较恰当。就我上面列的表来看，杜甫的五言排律共为 115 题，122 首。共是 1968 韵，19680 字。这是从数量上来看杜甫的五言排律，每首的韵数，都经过查对。凡 20 韵以上的，杜甫大都在题目上写明，都与实际韵数相合，只《大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峡久居夔府将适江陵漂泊有诗凡四十

韵》及《送卢十四弟侍御护韦尚书灵柩归上都二十四韵》这两篇题目中的韵数与实际韵数不合，其实际韵数前者为42韵，后者只有20韵。又从表中可以看出杜甫五言排律的长短篇幅，即韵数的多寡：10韵以内者（即6韵、8韵）56篇，10韵者22篇，12韵者9篇，14韵者3篇，16韵者2篇，18韵者3篇，20韵者10篇，22韵者3篇，30韵者7篇，36韵者1篇，40韵者3篇，42韵者1篇，50韵者1篇，100韵者1篇，共为122篇。这122篇中将近半数的是6韵、8韵的短篇。元稹所说的“大或千言，次犹数百”，如果把20韵以上的计算在内共为27首。30韵以上的长篇则为14首。以上是把杜诗五言排律的篇幅长短作了一个调查，由此也可证明，杜甫的排律诗并非都是长篇大作，至于长篇排律与板滞也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这也是应当实际考察的。

尤其重要的是要看杜甫的五排写了些什么题材，有些什么内容。下面把它们大体划分一下。首先可以看到属于干谒的作品并不多，就连《敬赠郑谏议十韵》这样的诗都算在内也只10首左右。赠郑谏议这诗，王嗣爽、浦起龙都认为并无溢美之辞，王说：“他人赠谏议，必用伏蒲、廷诤等语，公则只赞其诗，盖自李林甫为相，谏诤路绝，故不作虚辞以谀人。”但在这诗的结尾处也表现出望郑汲引之意：“将期一诺重，欵使寸心倾。君见途穷哭，宜忧阮步兵。”也可算作“恳求荐举”的一类诗。而且这些诗多半是在天宝年间所写，如《赠韦左丞丈济》《赠翰林张四学士垪》《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投赠哥舒开府翰二十韵》等，郭沫若同志在《李白与杜甫》中所列出的7首也就是这些，都是那时候所作。这

些诗对别人每多过情的颂赞，近于贡谀；而对自己也不免有失身分之处，近于乞怜。自然是不能算杜诗的佳作。但这也是当时的风气使然，郭沫若同志也说过“以诗文求权位者荐举（干谒）是唐代士子的通习，倒不必以此苛求杜甫”。其实王嗣奭早就对《投赠哥舒翰》这样说：“是对李林甫、陈希烈当国，忌才斥士，无路可通，翰独能甄用才俊，不得已而欲依以进身耳，但称颂之词，不无过当”。仇兆鳌也曾说：“少陵之投诗京兆，邻于饿死；昌黎之上书宰相，迫于饥寒，当时不得已而姑为权宜之计，后世宜谅其苦心，不可以宋儒出处深责唐人也。”（仇注卷二《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注）说得很通达。而且杜甫在当时的急欲进身，主要还是想实现他的“窃比稷与契”之志，不同于一般的干禄。所以不能离开历史条件历史环境以及历史人物的立身行事来评论历史人物的作品。再则这些作品还不到全部排律的十分之一，更未可以部分概全部，以一定时期中之所作而泛论其他时期。

另一部分较为大量的排律作品是对自己所敬慕的前辈及朋友之间的赠答之作。这部分作品大约有 40 多篇。当然这类作品有个严格的界限，一不同于上述的干谒之作，二不同于泛泛酬应之什，总是有所感而发，有所为而作，与杜甫的素志相关，其中有一些简直是至情至性的佳篇。例如《与李十二同寻范十隐居》，这篇是人无异议的排律好作品。《寄李十二白二十韵》，这更是一首震撼人心、古今传诵之作，难怪王嗣奭说：“此诗分明为李白作传，其生平履历备矣。”杜甫对李白知之深、爱之切、重之甚的心情与识见也从这首诗可以窥见一斑。再如《哭台州郑司户、苏少监》，这首诗 22

韵，长歌当哭，老泪纵横，正如仇注所引卢世澹之言：“此诗泣下最多，缘两公与子美莫逆故也。‘豪俊人谁在，文章扫地无。羈游万里阔，凶问一年俱’二十字抵一篇大祭文”。本来郑虔、苏源明特别是郑虔与杜甫交谊甚深，杜也深信其人，屡见之于杜甫的篇章。“广文先生官独冷”，说得何其愤激；“便与先生应永诀”，又说得何等沉痛，交情一贯，生死不渝，至于这首痛哭的诗用什么诗体来写，对杜甫来说恐怕是无施不可，当时觉得要用排律来写才好就用了排律，在作者对诗体是无所轩轾于其间，这篇诗感染力也并不因为由于排比声律而削减，这是可以感受得到的。又如《寄岳州贾司马六丈巴州严使君两阁老五十韵》《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寄张十二山人彪三十韵》《赠王二十四侍御契四十韵》等都是赠别伤逝的长篇大作，都热情倾泻，意余于辞，绝不是敷衍成篇。《寄张十二山人彪三十韵》以“独卧嵩阳客，三违颍水春。艰难随老母，惨淡向时人”领起，这就把张山人的出处，性情及其困顿之状写了出来，接着叙说了彼此的交谊，下面一节是：

静者心多妙，先生艺绝伦。草书何太古，诗兴不无神。
 曹植休前辈，张芝更后身。数篇吟可老，一字卖堪贫。
 将恐曾防寇，深潜托所亲。宁闻倚门夕，尽力洁餐晨。
 疏懒为名著，驱驰丧我真。索居尤寂寞，相遇益悲辛。
 流转依边徼，逢迎念席珍。时来故旧少，乱后别离频。

婉转流利，生动自然，好像面对着娓娓清谈一般。而法度严密，脉络清楚，称道张彪的诗和草书，铢两悉称；称其孝道，要言不烦；谈张彪同自己的交亲，尤为情挚意笃。这

篇长律确如《读杜心解》所说：“极断续安插起伏之妙”，通首是潜气内转，佳句联翩。至于寄贾至、严武这两位被贬谪的阁老的诗，长达 50 韵，前人论者不少。这首诗全篇结构完整，辞意深沉，有慰藉，有规戒，有期勉，双写双承，忽分忽合，在谋篇布局上是颇费了一番苦心的。

写赠严武、崔公辅、李别等人的排律，都应该归入上面这一类，这些诗都处处见出亲故的真情，而绝不同于那些干谒贵人之作。所以写赠贵人的诗并不就是干谒。而且通过这些诗，往往表达出诗人的政治抱负和见解，纵论当时形势，指出潜在危机，并对亲故赞中有勉，深致其殷切希望之忧。如“四海犹多难，中原忆旧臣”、“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奉送严公入朝十韵》），“天子朝侵早，云台仗数移。分军应供给，百姓日支离。黠吏因封己，公才或守雌”（《赠崔十三评事公辅》）。《赠李八秘书别三十韵》尤其是大抒愤懑，藉赠李之作而评杜鸿渐。黄生解此诗甚细，并说“公于赠李诗中，寓词告杜，盖深讽其处事之草率也”。这些诗多作于寓蜀之后，意深旨切，决非偶然。泛泛酬应之作也有，如《同豆庐峰知字韵》《送敬十使君》《送刘十弟》等诗可能是这种，但数量很少，不过几首。

直抒胸怀的排律有《遣兴》、《得家书》、《宗武生日》、《夔府书怀四十韵》、《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临审李宾客之芳一百韵》、《水宿遣兴奉呈群公》、《秋日荆南述怀三十韵》、《大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峡》、《行次古城店泛江作》、《回棹》、《登舟将适汉阳》、《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呈湖南亲友》等，长言短咏一二十篇。而那首 100 韵的巨制虽

是寄郑监、李宾客之作，却是阮藉咏怀之类。杜甫 1400 多首诗中，属于直抒怀抱者不少，仅就五言排律来说也就有这许多，包括诗卷中最长的一首在内。这些诗首首都好，为研究杜甫的为人及其诗歌创作的思想性、艺术性者所应当留意的，特别是探讨诗人晚年的生涯和心情，这些篇幅更提供了许多材料，有着许多启示。就从这首 100 韵的诗来看，不泛，不板，不粗，不庸，称心而谈，放笔自述，确为难得。故昔人评云：“极俚体长篇之变化”（《杜诗言志》），“转换穿插，妙合自然”，“句句精致，字字峭拔”（王嗣爽语）“才大而言足以副之”（仇注引张晋语），诸家所论，大致如此。《杜诗言志》的佚名作者还把这篇长诗分作十节，逐节加以详解，“求其篇法之妙与格律之奇”，亦可资参考。总之，“唐人百韵诗，杜公独倡”（王嗣爽），也是诗人最大的尝试，其笔力之健，气魄之大，安排之善，隶事之精，应是精金美玉。把它推崇得至高无上倒也不必，但摘出它的一些瑕疵，或者认为排律偶切之体与散文不同，不宜作如此长篇（浦起龙便有此意），也肯定作不好，从而忽视了杜诗在这方面所已经取得的成就，甚至讥诮它们是瓠球，是文字游戏，这也是很不恰当的。至于那篇较多的人认为是绝笔之作的《风疾舟中伏枕书怀》，应该说是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以愤激沉痛之语起始，接着是怀古伤今，观景物，写民情，忆宦途之不利，游踪之莫定和生计之多艰，错错落落，一吟三叹。虽然其中用了许多典故，但都不是僻典，用得自然、准确。“春草封归恨”以后，则写得更是惨凄，穷途末路，情见乎辞，进而表示对湖南亲友之感激，对乱离世事之深忧，然终

归于无可奈何，去住都难；丹砂莫就，涕泪作霖，诗篇到此已无可再写而结束，诗人的一生也就一丝难续而从此消逝了！

还有直接书写对唐代基业的歌颂，对世局和国家大事的议论与冀望，表自己一饭不忘君国之情的，如《行次昭陵》《重经昭陵》《喜闻官军已临贼境二十韵》《送杨六判官使西蕃》《建都十二韵》《千秋节有感二首》以及《江陵望幸》《伤春五首》等等，也有十几首。《行次昭陵》与《重经昭陵》作于《北征》之后，最能见老杜对唐王朝及其开基者唐太宗的忠爱之诚。前者全篇皆是颂歌，惟以“流恨满山隅”作结，感古哀今，惜唐室之不振，意义就更为重大。后者写重经昭陵的感受，欲乞灵于昭陵而重睹唐室的兴隆。文辞都很精警。其他各篇都有明显的针对性，皆有为而发。《建都》诗应是作于上元元年，对吕湮建都之议提出批评，慨叹朝廷的失策。“苍生未苏息，胡马半乾坤”“时危当雪耻，计大岂轻论”，足见诗人所见甚正，所关心者甚大；而“永负汉庭哭，遥怜湘水魂”则欲效屈贾的极谏与痛哭而不可得，意坚志决，虽遭贬谴也不欲缄默，真可以惊风雨、泣鬼神了。《千秋节有感》虽是短幅，却把国家盛衰之感与自己流离之所经交织写出，触处生悲，也很感人。《伤春五首》作于阆中，又别具一格。《仇注》以为“《伤春五首》以五排记时事，缠绵悱恻，发于忠君爱国之诚，当与《洞房》八首并传。”可见五排短章，联成组诗，纵论时事，也完全可能。这是杜诗五排的又一种形式。这五首诗前后相连，首尾一贯，于法最密。

此外，也有其他方面的不少作品，或登临兴感，如《上白帝城》《陪诸公上白帝城》；或借古书怀，如《谒先主庙》《诸葛庙》《天池》《过西岳入洞庭湖》等，都各尽其妙，各有所托。或即兴成篇，如《春归》《三秋雨院中有作》《九日五首》《伤秋》《东屯月夜》；小題也能不受排律的束缚而景情交融，点染成趣。如《东屯月夜》八韵：“抱病漂萍老，防边旧谷屯。春农新异俗，岁月在衡门，青女霜枫重，黄牛峡水喧。泥留虎斗迹，月挂客愁村。乔木澄稀影，轻云倚细根。数惊闻雀噪，暂睡想猿蹲。日转东方白，风来北斗昏。天寒不成寐，无梦寄归魂。”黄生说这诗：“妙在先安首五字，觉全篇字字写景，字字写情。”从一个抱病漂萍夜长不寐的老人眼中望出去，月光夜色，山水之间，一片迷离之境，半是真实，半杂想像。“数惊闻雀噪，暂睡想猿蹲”，只觉鸟兽与人相亲，尤其入妙，似乎是信手写去，而句句细微，字字妥贴。结语“日转东方白”则已一夜不眠；而遥瞻北斗，“无梦寄归魂”则又言近旨远。若论造句之工，也正仇注所云，“泥留虎斗迹，月挂客愁村”已先“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而有这种刻画语了。五言排律题画的只有《观严武厅事岷山沱江画图》这一首，前人谓为有初唐人风致。而五排论诗学之作也只《偶题》一首，关系却很大。诗的前半是：“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作者皆殊列，名声岂浪垂。骚人嗟不见，汉道盛于斯。前辈飞腾入，余波绮丽为。后贤兼旧制，历代各清规。法自儒家有，心从弱岁疲。永怀江左逸，多谢邨中奇。驥驥皆良马，麒麟带好儿。车轮徒已斲，堂构肯仍亏。漫作潜夫论，虚传幼妇碑。”这诗前人论

者较多，见仁见智，各有不同。但这诗的基本思想应该是：文章是天下后世的公器，不是任何人可以凭私意抑扬轻重于其间；作品必须出于自己的艰难创造，心有真得，决非徼幸可以猎取名声。这可以说是杜甫诗学的宗旨。这也应当是大家所公认的。其下略论历代作者与诗风，一般解说者没有多大差别，但对“前辈飞腾入”一联体会稍多。然后诗人说到自己作诗的态度与愿望，而又惋惜于后继为难。诗的下半篇，由“缘情慰漂荡”转过，主要叙自己的境遇，与前半也有关合。这篇诗语句虽然不多，但诗人一生创作的经验、体会也大都寓于其中。所以《杜臆》认为“少陵一生精力，用之文章，始成一部诗集。此篇乃一部杜诗总序”，大概是不错的。还有几首排律是为自己的儿子和兄弟而写。这是：《宗武生日》《元日示宗武》《又示宗武》《远怀舍弟颖观》等篇。用排律写家人之情话，运用如此自然也真难能可贵。如“处处逢正月，迢迢滞远方”“赋诗犹落笔，献寿更称觞”“暇日从时饮，明年共我长”“积年仍远别，多难不安居”“对酒都疑梦，吟诗正忆渠”，全似白话。运用得妙，白话又何尝不可构成俚辞，而俚辞又何碍于语句之通俗啊！

从以上的评述，可以看出杜甫的五言排律诗长短多种，题材多样。长短则6韵、8韵、10韵、20韵以至100韵，题材则论政、说兵、吊古、哀今、求荐、赠友、写景、抒情、谈诗、题画……包罗万有。真是无往不宜，无施不可。而这一百多首五排的风格也是豪迈，苍凉，典雅，厚重，轻倩，流利……各极其妙。五排约占杜诗全集十二分之一左右，比唐代有些著名诗人的全部作品还多，由于诗人一生的

努力，使这一种新兴的体裁涌现出了如此多量的作品，其中有不少佳篇，蔚为大国，丰富了历史诗坛。这是我们今天学习中国古典诗歌和论述中国诗史的人所共同感到兴奋和自豪的。

纵观细察杜甫的五言排律诗，其成就的确很大，至少有两个方面可得而言：

第一就是杜甫以他自己辛苦的创作实践尽可能地开拓了近体诗的疆域，充分发挥了近体诗所能起到的作用。

明胡应麟说得好，“诗之体以代变”“近体之攻，务先法律”（《诗薮·内篇卷一》）。自建安以来，五言诗渐渐趋于遵照一定的“法律”，而诗中对偶句的逐渐增多，是一个重要标志，音调的逐渐趋于律句化又是其一端。南朝颜谢的作品，竟有通体骈偶的。如颜延之的《北使洛》、《侍游蒜山作》，谢灵运的《庐陵王墓下作》、《登池上楼》以及鲍照的《登庐山》等都是全为排句的古诗，只是句子的平仄不同于近体，但已可以说是五言排律的滥觞了。永明体，即后世所谓的新体诗，更逐渐形成了五言律诗的格局，成为五律的前驱。而薛道衡的《昔昔盐》、阴铿的《安乐宫》诗，已被后人认为与唐人的排律没有什么差别了。庾信也有数十首全是排句或大部分排句的古诗，这就更是唐人排律的先河。其对句的精工，用典的贴切，对杜甫显然有很大影响；但其内容则远逊于杜甫排律诗方面之广。到了初唐四杰，更加上沈宋等人的制作，五律便完全确定了它的体制，产生了大量作品。在唐人近体五言律诗产生的同时便也产生了严格意义上的排律，不过短幅居多。王勃、卢照邻的排律都只有几首，

杨炯稍多，在 10 首以上，最长的是 25 韵。唯独骆宾王的排律不少，将近 40 首，最长的是 38 韵，即《久戍边城有怀京邑》。沈、宋各有排律 30 多首，沈佺期最长的排律《答魑魅代书寄家》48 韵，宋之问有 1 首《谒禹庙》最长，20 韵。但胡应麟称其首首皆工。杜审言的排律在 10 首以内，20 韵的 1 篇，《赠崔融》；40 韵的 1 篇，《和李大夫嗣真奉使存抚河东》。这篇诗便是杜甫在《赠蜀僧闾丘师兄》中“吾祖诗冠古，同年蒙主恩。”及《八哀诗》哀李邕诗中“例及吾家诗，旷怀扫氛翳。慷慨嗣真作，咨嗟玉山桂。”所提到而引以为荣的（前人已指出）。说排律长达 40 韵是从杜审言开始，这也是事实，但与杜审言同时的骆宾王也有仅比杜审言少两韵的长篇，而且骆的排律之作更多。说杜甫的排律来自祖传当然也可以，但实际上初唐四杰及沈宋诸人对杜甫都有很多影响。《诗薮》就说过：“宾王《幽紫书情十八韵》，精工俚密，极用事之妙，老杜多由此。”又如杜甫为人所讥的“苦摇求食尾，常曝报恩腮”，也似从骆宾王来，骆在《幽紫书情通简知己》诗中早有“入阱先摇尾，迷津正暴腮”这样的句子。

杜甫的近体诗，其渊源远起于六朝，而规格实继承了唐初众多诗人的成就。这是与盛唐诸家大体相同的。所不同的是，杜甫在近体诗方面，包括排律在内，下的功夫最深，发展变化也最显著。他开拓了近体诗的疆域，充分发挥了近体诗所能起到的作用。近体决不应只限于八句，这是不可能由任何人予以规定不许变化的。杜甫继承前人，作了不少八韵至十多韵的短篇，不受四韵的限制，同时又写了 20 韵以上

的许多长律。初唐诸人多是短篇，虽然也有三四十韵（稍后的刘长卿还有 50 韵之作）的长律，毕竟是寥寥无几。而且他们的排律都往往是应制、赠答、哭友、游望之作，题材较窄，骆宾王排律的内容要丰富一些，境界较大；唐初政治家魏徵有一首《述怀》，内容很好，但应属于古诗多排句一类。只有杜甫才不仅在排律篇幅上大有扩展，而且在题材、内容上尽可能地有所扩大。使近体诗这一种代表唐王朝新诗体的体裁尽可能地发挥出它所能起到的作用。一是他所作的五、七言律诗特别多，独步一时；二是他的五言律、七言律和七言绝的组诗特别多，一首太短，如不能尽意，则以两首、3 首、4 首、5 首、8 首、10 首出之；三是用排律的形式来写，不拘多少韵。把律诗八句多首联组成篇的组诗，与不拘若干韵只在一首中写成的排律，也不过是形式上的不同。谁人能说只可以写《游何将军山林》《秋兴》这样的长篇大作，而不能写一韵到底的排律诗呢？谁又能说只有组诗才可以写得好，排律就一定写不好呢？杜甫的排律正回答了这个问题，既可以写，又可以写好。在杜甫的笔下是极尽了近体诗的形式，也极尽了近体诗的能事。他的短排律，题材甚广，这不过是律诗的适当延伸或扩展，应用的范围很大。而且正由于它不限于四韵八句，就比一般五律更好写些，需要多少韵就多少韵，不必削足适履，而可量体裁衣，这当然就增加了近体诗的表达力，适合于杜甫这位古典现实主义作家写多方面题材的要求。然而 20 韵以内的短篇排律对有些题材和内容还是容纳不下，前边说过，写组诗是一个办法，连续若干首。但杜甫也尝试了写不分首的大诗，一气贯注，一韵到

底，大或千言（仅一首），次犹数百，来表达他所要表达的大的主题和丰富的内容，复杂的情思。当然，像《北征》、《奉先咏怀》、《奉赠韦左丞丈》、《壮游》……那样的五言长篇，诗人是写了很多，不胜其数。但是近体长篇他也要尝试。一方面是形式需要多样化，一方面也由于他所想达到的某种写作目的似乎用长律这种形式来写更适当些。比如有些庄严典重的题目如《行次昭陵》《谒先主庙》和某些“呈”“赠”尊长之作，在杜甫这个郑重其事的人来看自以用排律更适宜。有些是他要发议论，纪时事，书愤懑，表忠悃，筹策谋的，事大思繁，当然也需要长篇；而用长篇排句来写，就可以凝铸许多内容于用典的偶句之中，有些长律，几乎一句指一件事，一句评一个人，一句表一个自己的意见，两两比附，联联相承，其势更强，其内容更集中。在形式上看来是排比、铺张；就每句内容细审之，则是浓缩、凝练。例如《风疾舟中伏枕书怀》这篇绝笔，叙述与议论相间，而议论为多；用事与不用事相杂，而用事者不少。“哀伤同庾信，述作异陈琳”，这是自伤不能如陈琳的随军草檄，只能如庾信的浪迹哀时；“反朴时难遇，忘机陆易沈”，这是说河清难俟，陆沈可忧；“公孙仍恃险，侯景未生擒”，这是指叛将的作乱未平，既切湘蜀，又关天下，深表殷忧。又如《送卢十四弟侍御护韦尚书灵柩归上都二十四韵》这首诗，并不是只写哀悼之情，而是发了许多议论。从“戎狄乘妖气，尘沙落禁闱”这一联起，接着好几韵都是议论朝政，痛感唐室的衰微，并且作出了“但促铜壶箭，休添玉帐旗”望侍御转告朝廷的箴规。当然这些诗由于用事较多，有时不免晦涩难读，

但文学作品一般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触眼令人喜爱，一下子就有感受，容易接受；一种是需要反复推求才能有所得，才会生爱；仇兆鳌曾说：“杜诗长篇，铸格整严，如金科玉律；用思精细，若茧丝牛毛。……必宁心静气，从容玩味，方有端绪可寻。但止流目观览，涉猎大概，亦何由窥见作者深意哉！”

“晚节渐于诗律细”，“醉里眉攒万国愁”（黄山谷《老杜浣花溪图引》）。律细与忧深是杜甫晚年生活和创作上的重要情况（对于“律细”有人解释不同，这是可以研究的）。以忧深之情寓于律细之诗，这就使得杜甫在五言排律上也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使近体诗充分发挥出了它的作用，但勿庸讳言，瑜不掩瑕，杜甫的长律有些时候也局促于格律骈俪之中而不能自然，失之板滞或琐碎。《诗薮》曾经指出：“杜排律五十、百韵者，极意铺阵，颇伤芜碎”。但五十与百韵，也仅仅各有一篇，可见诗人自己也感到这样的长篇大律不容易作得很完美，不过聊备一格罢了。但就这两篇的整体看，瑕也不能掩瑜，还是写得成功的。

长律之异于古诗长篇，除句子的平仄外，主要就是全为偶句。《文心雕龙·丽辞》说：“夫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又说：“自扬马张蔡，崇盛丽辞。如宋画吴冶，刻形镂法。丽句与深采并流，偶意共逸韵俱发。至魏晋群才，析句弥密。联字合趣，剖毫析厘。然契机者入巧，浮假者无功。”这里把俪辞产生的必然性，俪辞的作用和俪辞优劣的原因都说到了。对于以俪辞成篇的排律诗，特别是长律，判别它的优劣工拙，是应当对具体的作品作具体的分析。

如果把排律与试帖诗等同起来而加以否定，则不过是遗神论貌，其言未必能中。试帖诗是科举考试的一种诗体，往往以古人诗句命题，按题吟咏，按格就范，五言八韵，不多不少，内容还要含有颂圣之意。这怎么能与五言排律，特别是杜甫的五言排律混为一谈？至于四六文体，因它力求整齐划一，四六为句，音调铿锵，前呼后应，容易流于虚浮滑易（唐末的四六文字也有好作品），这也不能与五言排律等量齐观。五言诗的音调本身就要重朴一些，逐句五言，也与四六交错不同。所以七言排律又难于五言排律，易失之于轻滑，杜甫也只作了几首，这里不具论（陈寅恪《论再生缘》谓陈端生的《再生缘》“乃一叙事言情七言排律之长篇巨制！”那么，用以叙事言情的排律，七言似又优于五言）。

就排律诗而论，对句确是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也是排律的艺术特征之一。《文心雕龙·丽辞》提出了“四对”的规范，即“言对为易，事对为难，反对为优，正对为劣”。而《文镜秘府论·论对》列举了29种对句形式，不免繁琐。如果根据这两书提出的种种对句名称而从杜甫的排律诗中去找，大概都可以找得到，但没有必要这样作。杜甫在俪辞上的确功夫至深，他的排律诗确有大量的好对句。下面不按照《文心》和《文镜》之例，只从一般修辞的道理来看杜甫的排律佳句，随举几个例子，对句极有气势，刚劲，如：“关塞三千里，烟花一万重”（《伤春》），“地平江动蜀，天阔树浮秦”（《奉和严中丞西域晚眺》），“摇动关山势，淹留战伐功”（《陪郑公秋晚北池临眺》），“二仪积风雨，百谷漏波涛”（《临邑舍弟书至（节略）》），“山河扶绣户，日月近雕梁”

(《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写景极为细致，如：“野云低渡水，簷雨细随风”“远鸥随水静，轻燕受风斜”(《春归》)；写景阔大，如：“白屋留孤树，青天失万艘”(《临邑舍弟书至(节略)》)；写景清幽，如：“江清心可莹(去声)，竹冷发堪梳”(《寄李十四员外》)；写景苍凉，如“古城疏落木，荒戍密寒云”(《南极》)；写景很雕琢，如：“竹皮寒旧翠，椒实雨新红”(《遣闷奉呈严公》)；极自然，如：“谷鸟鸣还过，林花落又开”(《上白帝城》)等。用典极稳，如“汲黯匡君切，廉颇出将频”(《奉和严中丞西城晚眺》)。“接舆还入楚，王粲又归秦”(《赠王十二侍御契》)，“流恸嗟何及，衔冤有是夫”(《哭台州郑司户、苏少监》)。上句用《诗经》，下句用《论语》(按此句用《论语·述而》)；“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同时也用《后汉书·伏后传》，曹操逼帝废后，献帝谓郗虑曰：“郗公，天下宁有是邪!”陈后山《别三子》诗：“天下宁有此，昔闻今见之。”任渊作注引《伏后传》，这是后山善用典的例子，但杜老已用之于前)；用极寻常之语，如：“汝啼吾手战，吾笑汝身长”(《元日示宗武》)等。对句甚巧，如：“饮子频通汗，怀君想报珠”(《寄韦有夏郎中》)，“饮子”是说韦郎中开的药物引子，观上一联可知是指柴胡。“饮子”与“怀君”为对，甚巧(按“报珠”《仇注》引张衡诗“何以报之明月珠”；宜用蛇衔明珠报隋侯以药救伤故事，更切合。《舟出江陵南浦奉寄郑少尹审》诗“浩荡报恩珠”之注，即用蛇衔明珠以报隋侯事，此亦宜然)。还有四句构成一联的，如：“得罪台州去，时危弃硕儒。移官蓬阁后，谷贵歿潜天”(《哭台州郑司户苏

少监》，《苕溪渔隐丛话》称此为“扇对格”。又如《寄张山人》中的“曹植休前辈，张芝更后身。数篇吟可老，一字卖堪贫”。也属于此类，葛立方《韵语阳秋》已拈出。总之，杜在排律中所铸造的俚辞，真是伙颐沈沈，美不胜收。

排律长篇结构，最重起始与结尾。杜甫的排律诗有不少经验可探求。仇兆鳌说：“凡排律多在首联扼题；若作长排，必在首段总挈。”他以《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一诗为例来说明杜甫的写作艺术，所论很对。通观杜诗全部排律（特别是长律），几乎每首都在起结上下了很大功夫，总是起句能够挈得起而且善于开拓；结句能够顿得住而且留有余意。比如：《大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塘久居夔府将适江陵漂泊有诗凡四十韵》，一开始以“老”“今”对起，“老向巴人里，今辞楚塞隅。”结束了长期的川中生活，又将翻开出峡远适的新篇章，对过去不免有所留恋；对今后又终觉渺茫，这就表现出了无限情思。接着是“入舟翻不乐，解缆独长吁。”入舟将行，反而不乐；解缆欲去，偏偏（也可作独自理解）长吁。两句只当一句读，只为这两句的意思是一样；两句又要抵许多句来读，因为它是“言之不足，故长言之”的反复咏叹。“入舟”、“解缆”，船已前行了，所见者是些什么？“不乐”、“长吁”，胸怀还展不开，所愁者究系何事？这都有待于挥斥大笔来濡染、宣泄。所以这开始的数句，实开启了后面的数十句大文章。此后的诗句是先写景，后抒情，而情景交融，论述相错；既是水经，又为诗史。结尾数句：“回首黎元病，争权将帅诛。山林托疲茶，未必免崎岖。”还从大处落笔，顿住全篇，意谓

在这种黎元久病，将帅相杀的国事民生之下，还有什么可言，希望固不能实现，愤慨也无从说起；惟有暂托疲茶于山林，但又未必能免于崎岖啊！余意不尽，余恨也无穷。

也有突然而来的起句，《舟出江陵南浦奉寄郑少尹审》的“更欲投何处？飘然去此都！”似乎前面有很多话语尚未说出，突然冒出了茫茫然的这个问语——更欲投何处呀？这与五言律诗中的“亦知戍不返”同样，诗前还有许多话，好像戏剧舞台上的潜台词一般。这样的起句总是很吸引人，感动人。结语引人深思、使人深味者不少，如《奉观严郑公厅事岷山沱江图十韵》的结尾“绘事功殊绝，幽襟兴激昂。从来谢太傅，丘壑道难忘。”表面上是说谢安虽受朝请而东山之志不变，流连山水和绘事，是对严武的赞许。但言下也有虽流连山水绘事也应不忘天下苍生如谢安之意，以此勉励严武，寓意甚深。《哭李尚书之芳》的结尾：“樵苏封葬地，喉舌罢朝天。秋色凋春草，王孙若个边。”前两句很像陶渊明的《拟挽歌词》“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同是“已矣哉！”的意味，不过陶是古体诗，杜是近体排句。后二句与前二句紧接，读之更使人黯然。以上这些都是充满着激情的好诗。“篇终接混茫”，诗人说到了也是做到了的。

第二是杜甫以他自己的排律诗作出了范例，给予了后世以深远的影响。

与杜甫同时或稍早的诗人，李白、王维、孟浩然等都作有排律，但数量都很少，篇幅不大。没有在这个诗体上尽多大的力量。杜审言、骆宾王、刘长卿等虽有长篇但数量也有

限。所以从数量、质量、思想、艺术的统一，和所付出的劳动来看，断推盛唐诗人杜甫为第一。因而他所作的排律诗对后世的影响也最大最正。胡应麟说：“排律近体，前人未备。伐山导源，为万世模。”清冒春荣说：“少陵出而瑰奇鸿丽，一变故方，后此无能为役。元白滔滔百韵，俱能工稳，但流易有余，镕裁不足，每为浅率家效颦”（《葑原诗说》）。正是如此。

白居易的《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就是代表作，元微之也和答100韵，二人的长律不少，百韵大篇都在两首以上，二三十韵以上的长排更是很多。其价值究意怎样，还须从作品本身来看。但题材不广，多系赠答朋友或流连光景之作。也有为了要排比铺张而排比铺张，为了要写100韵而100韵的可能。若论时代意义和沉郁顿挫的精神，是比杜甫大有逊色的。白居易自己的诗“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也说明他自己所最肯定的是他的歌行与乐府而不是排律。这也说明为了排比铺张而大肆排比铺张是不可能成为合作的。写长篇排律事关学力、才力和胸襟，元、白不如杜，故长律也比杜大有逊色，但对杜有继承也有其成就。韩愈是学杜的，《喜雪献裴尚书》《春雪》《春雪映早梅》《和崔舍人咏月》都是较好的排律。但如《咏雪赠张籍》长篇也不免有敷衍的地方，其“随车翻缟带，逐马散银杯，”就更不免为人所笑。韩与孟郊、张籍、李正封等人的长律联句有10多首，斗力斗韵，刻意求工，也有不少佳句。而且用五排来联句这种方式，后代也就层出不穷。李商隐也学杜，奉赠和咏物之作有排律数十首，还是以那些短篇咏物的更好些，他著

名的《井泥四十韵》就不是排律而是古诗，也可见用排律来书怀写意是不大容易作好的，毕竟束缚较大。

苏轼是北宋大家，最善学杜，诗的成就很高。他在24岁时离家出川所写的一首《入峡》，就是五言排律30韵。以“自昔怀幽赏，今兹得纵探。长江连楚蜀，万派泻东南”领头，气象不凡。全篇都自然工稳，这也是善于学杜的，他的前辈张方平景仰杜甫，有一首《读杜工部诗》五排20韵，他写了一首《次韵张安道读杜诗》都很不错（他的兄弟苏辙也作了一首，稍差）。自来学杜，都存在着如苏轼所说“谁得其皮与其骨”（《次韵孔毅甫集古人句见赠五首 [其三]》）的问题，宋代作者至多，作排律者不少，还是要从思想与艺术相统一的观点和“谁得其皮与其骨”的标准来看，不可一概而论。而且古诗与排律也有其相通之处，清人刘熙载说得对：“少陵深于古体，运古于律，所以开阖变化，施无不宜”（《艺概·诗概》）。

明清以来，把排律当作粉饰门面者也不乏人，文集必须有赋，诗集必须有五言长律，不如此好像就不能显示自己的才力、学问，这当然是一种偏问，好的排律也就不多，但这是不应由杜甫尸其咎的。也有的诗人以韵多为贵，常欲突破百韵大关，但没有足够的内容而勉强铺张，当然就不免空枵，虽然像王世贞这样鼎鼎大名的诗人，《哭李于鳞》排律多至一百二十韵，即使如胡应麟所说没有“失于检点”的地方，但也并不全篇匀称精采，所以归根结底是要内容决定形式，要有所为而作，要行其所当行而止其所当止，还要下功夫于诗之外。

在诗人杜甫之后，其为人和处境与杜甫多有相似之处，又善于学杜诗，其五言长律能够与杜甫之作先后辉映的，这便是崑山顾炎武。《亭林诗集》载有五言排律 40 多首，20 韵以上者 10 余篇，好些篇章都苍莽横绝，典重精工。五言古诗和五言排律是他运斤成风的一对武器，各有不少名篇。对于五排，他是有意识地利用它来书写自己所必须大书特书的某些庄严大题目，也用它来三致意于自己所敬重的师友，表爱国之忠悃，寄亡天下之深忧，体在绳墨之中而调出畦迳之外（仇注引胡应麟评太白、右丞等的排律有所不足云：“体在绳墨之中，调非畦迳之外。”），一扫某些“排律原为酬赠设”（仇注引庐世澹的话）的不切实际的评论。当然，顾亭林的诗，无论古近体在不少地方都表现出了他的封建伦理观念，有历史局限，这也是不足为奇的。从沉郁顿挫来看也还不及杜甫，但如他的《禹陵》结句云：“望古频搔首，嗟今更抚膺。会稽山色好，凄惻独攀登。”又《赠孙徵君奇逢》起句云：“海内人师少，中原世运屯。微言重旧学，懿德本先民。”与杜甫的许多长律之作又何其相似啊！由此也可见到杜甫所曾经致力的这一种诗体，其影响既深且远，值得研究。

杜甫的五言排律，无论从数量与质量、从思想特点与艺术特色之结合，从承先而有所发展、启后而能为楷模的关系来看，都有功于古人，无愧于来者，无负于生长、培育他的伟大时代，也应无憾于他所忠实的中国诗歌艺术。兼受众美，不善不休。这种探索精神与实践力量，是特别值得我们很好体会的。当然，也要分清精华与糟粕而决定取舍。

1981 年春

杜甫诗中的妇女形象

唐代伟大诗人杜甫在他 1400 多首诗篇中描绘、塑造了自开元、天宝以来数十年间社会各阶层的人物形象，其所写人物范围的广阔，形态的鲜明，内心世界揭示的真切，社会环境联系的紧密和社会意义显示的深刻，在当时都应是首屈一指，抑且是前无古人（就诗歌言）的。写人是文学作品的重要职责，杜甫在这方面是克尽其责并有着光辉的成就（写人当然也包括写诗人自己）。司马迁以文写人，杜甫以诗，可以说杜甫是诗歌史上的司马迁^①。

本文只谈杜甫诗中以妇女为题材的所描绘和塑造的妇女形象，并对他以妇女为题材的诗在思想上、艺术上的光辉成就谈一点体会。

杜甫以妇女为题材的诗篇不算多，但每首都好。识见和艺术两都高超。散见在许多诗篇中有关妇女的一言片语也往往很有分量，备见性情。虽然它们的总数量不算大，但是通过这些诗篇、诗句已经足以窥见诗人对待妇女的基本态度，这个属于世界观的重大问题。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妇女在以男性为中心的阶级社会里，才成为一个社会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在阶级社会里绝不可能得到合理的解决。在阶级社会里的一般妇女莫不

受着双重压迫，备受歧视、虐待、凌辱。“女子是‘阴类’，是主内的，是男子的附属品”（鲁迅《我之节烈观》），这种“附属品”的地位在阶级社会里无论如何是改变不了的。但是在漫长的旧社会里，无论男子或妇女本身确也存在着对待妇女的不同态度。有的比较正确，表现了世界观上的一定程度的进步，有的则反是。因此，观察一个历史人物看他对于妇女的态度如何这是很有意义的，是有助于对一个历史人物理解得更为全面的。

从杜甫有关妇女题材的诗歌和他所描绘、塑造的妇女形象来看诗人对待妇女的基本态度，那是比较明显的：杜甫尊重妇女，能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妇女，对妇女在社会上的重大关系和重要贡献，能热情地肯定和赞扬；对那些统治阶级中骄奢淫佚的妇女，能予以谴责、鞭挞；而对被压迫、剥削、生活困苦、遭遇不幸的妇女则深致关切之念并深表同情之心。

杜甫以前的著作者，从他们对待妇女不正确的态度说来，基本上有两种，一种是把妇女视为天生卑弱的、理应从属于男子、受制于男子，箝束之唯恐不力，压抑之唯恐不重的对象。约略说来，《孟子》书中，孟子谈礼说：“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汝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孟子·滕文公》）。已经发其端；“以顺为正”成为天经地义。东汉大历史家班固的女弟班昭所作《女诫》，有些道理是对的，但主要是把这种男尊女卑、以顺为正的思想加以发展，认为“男以强为贵，女以弱为美”，“修身莫若敬，避强莫若顺”，“敬顺之

道，妇人之大礼”；还提倡要“曲从”于舅姑，勿得“争分曲直”^②。上面两例虽然不出于诗歌作者，但对于他们仍有较大的影响，而且是代表一种思潮。所以除了采自民间的乐府诗外，很少有从积极意义上以妇女生活为题材的诗，妇女的受到鄙视和压抑可以概见。

另一方面尤为严重的则是从消极意义上以妇女为题材，多半是些无聊的文词，风花雪月，脂粉绮罗，把妇女当作赏玩的对象，刻画闺门秘事以相传诵，而且认为很精工，对妇女实在是一种侮辱。“吟咏”妇女来取乐、开心，这在梁陈之际，尤其泛滥，所谓“吐言止于轻薄，赋咏不出桑中”（《梁书·侯景传》）；初唐之作，也时或不免。

伟大诗人杜甫没有上述两种缺失，他是从积极意义上以妇女为题材，既无陈腐的言辞，也无佻巧的制作，而是满腔热情地颂其所当颂，满怀憎恨地贬其所当贬，对穷而无告的弱者充满着同情心，为她们陨涕挥泪并著于篇章。诗人是积极地继承了自《诗经》《楚辞》以来下逮汉魏六朝乐府诗及文人著作中以妇女为题材的好作品的优良传统，而又有所发展。

首先应当论到的是杜甫诗歌中劳动妇女的形象和诗人对劳动妇女的态度。从一些诗中可以使人清楚地感到，诗人对这些压在下层的妇女是深切地悯其不幸而又深刻地为她们鸣其不平。早在安史之乱前夕，诗人在《兵车行》这篇乐府诗中，在描绘兵车送别、哭声上干云霄的惨状并揭露“开边”野心使人民血流成海的深重灾难之后，由兵事转到农事，由男子转到妇女，突出“纵有壮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

一语，鲜明地指出一切压迫最后还是集中在可怜的妇女身上。男丁全被征调，无论少、老，“黍地无人耕”（《羌村》），家人生计、朝廷赋税，沉重的担子都压在“壮妇”的肩头，但人少任重，田地久荒，虽然“用尽闺中力”（《捣衣》）也免不了庄稼的荒乱。只因“天子有吞四夷之志”（《通鉴·唐纪三十二》），遂令民间骚屑，男丁驱走，其最后恶果还是由妇女来一口一口地吞尝。“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好”就好在还留下一条命，但这一条命的苟存，比随百草埋没的死者还更难受得多。上有爷娘，下有儿女，县官急索租，田地遍生棘！这篇名作虽然不是以妇女为主要题材，但是因为诗人忠实于现实生活，用他的笔真实地反映客观现实，故能看得真切，写得全面，写出了前因后果，尽管着墨不多，却使备受种种压迫、灾难的妇女形象地出现在诗篇上。诗人能看到千斤重担是压在农妇肩头，这尤其难能可贵。其后《秋雨叹》中有“禾头生耳黍穗黑，农夫田妇无消息！”这也说明诗人的两眼是向下的，能见人之所不欲见，而言人之所不敢言。

“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中的这二十个字，又更是直写民间的疾苦，为寒女鸣不平。这与古今传为名句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分量相等，作用相同。“彤庭”数句彰彰著明掠夺的实质。一则曰“本自”，这是追查根本；再则曰“鞭挞”，这是明著罪恶；三则曰“聚敛”，这是指出性质。孔子曾经说过，“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大学》）！诗人当然是深恶痛疾的。虽然“寒女”、“鞭挞”这些

词都各有来源，但杜甫却赋予了深意。

这几句诗虽然并非专为寒女而写，但因透过现象，查究本原，这就必然接触到深受压迫、剥削的人。社会现实生活教育了诗人，诗人也如实地、本质地反映了现实。这几句诗连同它前后有关的诗句也显示了当时唐王朝政治上一个重大问题：王室生活的愈益糜烂，人民生活的极端困苦，阶级矛盾的更形尖锐。据《资治通鉴·唐纪三十二》所记：其上，“国忠既居要地，中外饷遗辐凑，积缣至三千万匹。”其下，州县仓库积帛，“动以万计”。这难道不是天下寒女的血汗、泪水和生命所变化出来的吗？！须知一缣一帛之成，至为艰难，绝不是暂时失宠的杨贵妃“剪发一缭而献”皇上那么轻松容易（引《通鉴》同上）并富于浪漫色彩。如此聚敛，又如此分配：“上以国用丰衍，故视金帛如粪壤，赏赐贵宠之家，无有限极。”虢国夫人也竟一掷“绛罗五百段”，以赏赐为她建造新第的圉工。又，唐玄宗“命有司为安禄山治第”，“敕令但穷壮丽，不限财力。”而权臣杨国忠自知“终不能致令名，不若且极乐”（以上均引《通鉴·唐纪三十二》）。不管他们是志满意得故穷极物欲或日暮途远故倒行逆施的何种心理状态，但他们荒淫无耻的生活却是一致的。而直接受害者则是天下人民，天下寒女。杜甫这些极为愤慨又深抱殷忧的诗句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写出的。当然，杜甫是忠于朝廷的，他最终的政治目的是要维护唐王朝的统治，从而对统治者进行谴责，他对“圣人”“仁者”也抱着一定的希望，但是诗人能从自己的肺腑发出天下寒女诉说无门的痛苦声和愤激语，这就见其伟大了。

《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这些诗句是诗人行经骊山，写耳闻目睹之事。所写者是触目惊心、关系着国家安危的大事。但也有容易使人习焉不察、可以熟视无睹的小事，诗人却能即小见大，见一思百，显现出一个有良心有见识的文学家对穷苦人的同情心和洞察事物根源的敏感性。这里要说的是诗人晚年在夔州所作的《又呈吴郎》：

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
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
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
已诉诛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沾巾。

这首七言律诗在规定的短短五十六个字中，却有着海一般广阔的内容，痾瘵在抱（沈德潜评云“痾瘵一体意”），胞与为怀，从思想境界和艺术造就来说都应该算是杜甫晚年最成熟的作品之一；而以妇女为题材的作品，这首诗也有很大的代表性。

对这首诗的解说，历来于五、六两句颇有参差，主要在于第六句究竟指的是谁，也就是这一句的主语何属。认为五、六句系分指老妇与吴郎者较多。这里且引两例，远者如浦起龙《读杜新解》说：“五、六更曲，妇防远客，几以吴为刻薄人，固属多心也。妇见插篱，将疑吴特为我设，其迹似真也。”近者如山东大学所编《杜甫诗选》对这两句解为“老妇担心你不让她来打枣，虽然未免是太多心了；但你一来便插上篱笆，却很像真的不让她来打枣了。远客，指姓吴的。姓吴的插竹篱自然是为了防范包括西邻老妇在内的外人，而作者反说老妇多心，是故意把话说得非常委婉，以便

姓吴的能接受意见。”解说也比较圆通。但曹慕樊同志的《杜诗杂说》则别具独到的见解，以为“防远客虽多事，插疏篱却任真”两句是说一人（邻妇），故可用“即……便”二字紧密叫应，并举“即从巴峡穿巫峡，便向襄阳下洛阳”也用“即……便”叫应来证明，还列举了其他几项理由。这个问题还可深入研究，但杜甫这首诗所表现的主要思想感情是明显的，论者也没有什么分歧。这篇诗写出诗人对一个穷老妇女的关怀至极和体贴入微，要不是对穷苦人民抱有己饥己溺之心而且对无依无靠老年妇女更悲惨的命运和更痛苦的心情有更深切的理解是写不出来的。题是《又呈吴郎》，肖涤非同志认为，为了替扑枣老妇乞得一点生活，宁可对年青后进语谦而词婉，这个解说能得诗人之旨。

诗人希冀于吴郎的是对这个老妇人能够“任”和“亲”。“任”是希望他能见于行动，“亲”更是盼望他能出于内心，即对这“无食无儿一妇人”，天下之最困穷而茕独者，不仅应该听任其打枣，还应该表现得和颜悦色，与之亲近，发自诚心。“不为困穷宁有此”，这是申说理由，也是表现愤慨，这愤慨的箭头直射到末联的“征求贫到骨”，如此征求，黎元安得不困穷，更何况一老寡妇！第三联语气十分委婉，前人谓为“出脱邻妇”又“开示吴郎”，诗人的用心大体如此。全诗是为了这个老寡妇而对吴郎动之以情，甚且望之以义，绝不是一味乞怜。“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杜甫以此自愧于人民，也以此开示于吴郎，所以这诗对老妇自然是十分关切，即对吴郎也是一种爱护。至于最后一句，更是由此及彼，由个别到一般，由眼面前推到全社会，戎马不休，征

求愈甚，这是诗人所念念难忘的事情而自然地落于笔底，写作尾声。且看杜甫在《为阆州王使君进论巴蜀安危表》中恳切谈到“救天下征收赦文，减省军用外诸色杂赋名目，伏愿损之又损之，剑南诸州，亦因而复振矣。”足见诗人不仅疾恨使天下人民“贫到骨”的无厌征求，而且提出了纾缓民困的具体主张。所以《又呈吴郎》必非偶尔即兴之作。这诗逼真地描写出富有典型意义的穷老寡妇的形象，边扑枣，边窥测，既恐惧，又提防，衣裳褴褛，蹑手蹑脚，诉说她因官吏征求而一贫到骨……这种情景，读者如果细味诗篇定有如同亲见之感。“哀哀寡妇诛求尽，痛哭郊原何处村！”（《白帝》）这是许许多多那样的寡妇在哭诉，也是自愿作她们的义务代诉人的诗人在为她们一诉再诉！

第二，不是如上面所论述的直接写受到严重压迫和剥削的劳动妇女，而是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中某些被压抑的、很苦闷的、默默地消逝的妇女的生活，塑造了这些妇女的形象。例如《新婚别》、《负薪行》以及《佳人》都可以归在这个方面。

《新婚别》这首诗，写起来相当困难。战争给人民带来灾难，祸及老翁老妇，殃及新婚妇女，“三吏”、“三别”，惨绝人寰，千载以下还使广大读者为之心酸泪落。当时的战争虽是正义的、符合人民意愿的、以平乱卫国为目的的战争，但是战祸的酿成则是由于统治者政治上的荒乱，而抽丁赴战又如尽驱犬羊，连老妇和新婚者也不能幸免或稍缓。统治者借大题目来凌虐老百姓。诅咒这样的战争也是应该的，但诅咒它又不能完全反对它，因为人民并不一般地反对这次战争，

而是极为反对那种凌虐人民的兵役。在这当中受害最广、牺牲很大、长时期受着煎熬的还是弱者——妇女。由于诗人对这次战争的基本态度与人民相近，故能深深体会到人民的思想感情，以至对一个新嫁娘既悲己又慰夫，既有所怨又有所励，既不免羞涩又甚为慷慨的十分复杂、细微的心理活动，都体会得到、掌握得准也描写得出。

这首诗（从略未录），古之注家，今之论者，都解说和分析得很细。这里略谈三点。一，这首诗以比起、以比结，寓深宵难状的情意于比兴形象的语言中，俯察仰观，驱遣草木禽鸟以写离情、托哀思，手法很高，情韵不匮。二，通篇略分几段，段中有节，如剥茧抽丝，续出不穷，而又千回百折，前人以为“柔肠九回”。既逐处表现出了那种无可如何的情怀，而最后又更进一步地表现了一定不移的意愿。“不如弃路旁！”愤激之语，理所当然。“无乃太匆忙！”席不暖床，暮婚晨别，身未分明，姑嫜难拜，故愤极而问，“夫何使我至于此极哉！”语婉而怨深。“生女有所归”，“归”，实际等于不 归，乱世婚姻反不如“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这又更深一层。“君今往死地”，不暇自悲，更为君悲，这是一大转折。为君沉痛，誓欲随君，这是必有的愿望。但迫于形势，囿于习俗，严于军纪，这又万万不能，故又转而慰勉，以大义相勸。作为一个贫家女的新嫁娘，处在此情此境之中，凡是她可以做到的都已经做到了，私情既笃，大义复明，无以复加。“自嗟”句后，是转而自伤，但自伤之中，又表坚贞之情。《杜臆》说：“洗红妆，加对君二字，可涕。”实则通篇都是诀别之辞，我心匪石，心如皎日，末句最悲，

是篇首“沉痛”一词的具体化、形象化，前人有解释为“终望夫妇聚合”，恐非。正是由于《新婚别》中的主人，明知君往死地，后会无期，唯有与君永远相望，沉沉终古！其前以飞鸟为喻，又是反衬，弥见人不如鸟，才婚便别，终无可合，唯有永久相望而已，这是悲极之语。大义尽到了，并不等于就不悲，战祸之来，谁尸其咎，是可以令人反复思之的。三，这篇是作者设为新嫁娘对新婚之夫当面诉说的语言，如果不是平时对妇女状况深有了解，对她们的命运深表同情，那是不能写得这样婉转自然，既口吻逼真又心理无殊的。前人云，篇中“频频呼君，几于一声一泪”，良是。“结发为君妻”，何其情深；“君今往死地”，何其悲伤；“对君洗红妆”，何其坚决；“与君永相望”，又何其沉痛！应当感谢诗人，为我们塑造了一千多年前这个可敬可爱的青年妇女的典型形象。但这诗虽写悲情，并不减轻保卫国家自觉的责任感，特别是“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二语，可以与曹植《白马篇》中“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相颉颃。

如果说《新婚别》还有泪可挥，那么《负薪行》则是无泪可挥——泪不知从何而挥，唯有暗暗嚙下了。

《负薪行》：

夔州处女发半华，四十五无夫家。更遭丧乱嫁不售，
一生抱恨长咨嗟。土风坐男使女立，男当门户女出入。
十犹八九负薪归，卖薪得钱应供给。至老双鬟只垂颈，
野花山叶银钗并。筋力登危集市门，死生射利兼盐井。
面妆首饰杂啼痕，地褊衣寒困石根。若道巫山女粗丑，
何得此有昭君村？

此诗与它的姊妹篇《最能行》都是大历元年在夔州时所作，比《又呈吴郎》早一年。杜甫在夔州以后诗，信如宋人苏洵所言：“百年稟忠孝，句法老益练。君看夔州作，大冶金百鍊。”（《夜读杜诗四十韵》）。许多篇都是百炼精金。又如陆游所言：“比至夔，客于柏中丞、严明府之间，如九尺丈夫俯首小屋下，思一吐气而不可得。予读其诗至‘小臣议论绝，老病客殊方’之句，未尝不流涕也。嗟夫，辞之悲乃至是乎！”其实杜公在夔州以后，议论未曾绝，长言短论，比比皆是，尽管“野老复何知”，议论应绝而实未绝，而且生活更为深入，题材更为广泛。虽然僻在殊方，更兼老病，一生抱恨咨嗟，所志未遂；长年忧心战伐，寸步难行，更使诗人深知民生疾苦，民力艰难，触物成咏，比之于“三吏”、“三别”，似乎更有看似寻常实更隐微的地方。《负薪行》与《最能行》都是这样的作品，没有“三吏”、“三别”那种惊心动魄的题材，如果拿后来白居易的《卖炭翁》与《负薪行》相比，白诗有尖锐的矛盾，突出的情节，杜诗则无。所写者是眼前常见的民间生活，但诗人看得深入，写得精要，寓至悲于平淡之中，郁闷、沉默，是其基调。

此诗一起十四个字，初看是平平叙说，仔细一想，却很深至，诗人用作发端，并非偶然。女不出嫁，在那个时代、那种社会里是最不幸的事，无依无靠，又被人轻视，发已半华，年已 50，如何结局，使人不寒而栗。而“嫁不售”——没有人要的原因，主要是遭逢丧乱，无“家”可“归”，“一生抱恨”，也只有自己咨嗟。下面所写不只是未嫁的处女，而是山区的一般妇女（未嫁者也包括在内），习俗

如此，男尊女卑，沉重的担子由妇女承担。“至老”句写的是其中未嫁者。陆游《入蜀记》：“峡中负物卖，常多妇人。未嫁者为同心髻，高二尺，插银钗至六只，后插象牙梳如手大。”可想见其形象。“至老双鬟只垂颈，野花山叶银钗并”，细细咏味，美好的语句中蕴含着多少悲凉！陆文只是客观描写，杜诗则带有主观感情。一生抱恨，年老力衰，劳作不得休息，心事更无可说，但是从来爱好，在心情抑郁苦闷之中，也不肯“首如飞蓬”，还要刻意修饰一番。一连写了几样饰物，野花、山叶与银钗似乎不太调和，实际是很真实的。淡淡写来，既是增益其美，更是显示其悲，无人理睬，聊以自慰罢了。山区里这样的劳苦妇女，辛勤一生，也不过如野花、山叶虚度一秋，而且对着野花、山叶似乎还有“乐子之无知”的慨叹，自愧不如啊！丧乱与男少女多、男尊女卑是他们愁惨凄苦的社会根源，诗人已经作了表述，最后更愤慨地驳斥说她们“粗丑”，当然嫁不出，而且应当作牛马的习见论调，诗人以有力的反问作结，对这些劳苦妇女无限同情，深表敬意，用王昭君来陪衬她们，赞美她们，歌颂她们，“玉环飞燕谁敢憎”（苏轼诗），足以箝制众口了！这是很富人民性的作品。《最能行》与此篇作意相同，不过赞美的是“峡中丈夫”，“何得山有屈原宅？”同样是愤慨而有力的一问。

这篇诗是山区人物画，也是山区风俗画。苏轼说：“海南亦有此风，为诵此诗以喻父老，然亦未易变其俗”（《东坡题跋》），足见山区妇女的不幸命运，自有其社会历史根源，不是几个父老可以改变得了的。

《佳人》诗也同样表现出诗人对遭遇不幸的妇女的深切同情。《佳人》所写，前人已认为“天宝乱后，当是实有是人，故形容曲尽其情”（《杜诗详注》）。所写当是朱门弃妇，不是一般的劳动妇女。妇女无辜被弃，在朱门大户中自是常见的事，也是妇女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诗的基本情调还是郁塞、沉闷，虽然所写佳人似乎有一种林下风度，倏然出尘，但由于夫婿轻薄，本就遇人不淑，又遭丧乱，更被遗弃，不得不“零落依草木”，也就索然寡欢，而且百无聊赖。“摘花不插发，采柏动盈掬”，昔人谓为是写这个妇女的贞节自持，恐怕主要意思是写她的索寞孤寂，神情迟滞，信手采摘，又随手放置，连她自己都不知道是在作什么，真写得入木三分。篇中名句不少：“但见新人笑，那闻旧人哭”，高度概括了历史上这一类事情男子的本质特点。比较《上山采蘼芜》中弃妇问故夫的那几句话，杜甫诗是以精练见胜，一语道破，近于诛心，比之王僧儒的“新人含笑近，故人含泪隐”，也更为深刻有力。

“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前人或谓“在山清”比贞节，“出水浊”比改嫁。恐怕不应这样执着。在山清意即清白自守，甘居寂寞；出山浊当指溷迹人间，同流合污，主要从情操上立言，推广来用，也绝不是说出与隐。这也就是《楚辞·渔父》中“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这个意思。也照应到前面的“零落依草木”，甘与草木为伍，虽然生活清苦，但是心迹清白。杜甫揭示了这个社会上普遍存在着的妇女问题，同时塑造了这个高洁的妇女形象。

写弃妇的诗，《诗经》有《氓》、《柏舟》等千古传诵的

佳作，都是自诉怨情。《氓》诗出于普通女性之口，尤为激昂，足为天下后世妇女之无辜被弃者吐气，应视为血泪控诉之辞。《柏舟》语气较委婉，但骨子里仍是刚强。此后代有名篇，多为民间创作。李白的《白头吟》也是为弃妇鸣不平的作品，由个别到一般，又是一种写法，最后得出“古来得意不相负，只今惟有青陵台”的结论，很是深刻。《佳人》的作者没有在诗中发多少议论，但意境幽深，耐人寻绎，与李白诗可以说是异曲同工，而其社会作用也是殊途同归。

《咏怀古迹》第三首写明妃。自来评解此诗者不少，以欧、王诸人同题之作加以比较论述者也多。杜甫此作还是为不幸妇女抒怨恨之情，郁闷也是它的基调。“画图省识”“环佩空归”，有风刺与感喟，欧阳修诗立意与此有相似之处。再则杜甫以昭君侔于宋玉、诸葛、昭烈这些诗人素所敬慕之人；庾信，诗人借以自比之人，尤为难得。于此也可窥诗人对待妇女的态度是绝不同于凡俗的。

第三，写有才能的妇女，对她们备致敬慕之忱。这一类的诗很少，但也可以看出诗人对妇女并无偏见，凡有一技之精为诗人所亲见者，诗人都为之感动、倾倒，以之入题，赞扬、咏叹。例如《听杨氏歌》：

佳人绝代歌，独立发皓齿。满堂惨不乐，响下清虚里。

江城带素月，况乃清夜起。老夫悲暮年，壮士泪如水。

玉杯久寂寞，金管迷宫徵。勿云听者疲，愚智心尽死。

古来杰出士，岂特一知己。吾闻昔秦青，倾侧天下耳。

一、二句是歌者肖象，三、四句写歌声感人之深，中四句再写声音之感人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后四句加倍形容，有“耕

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遗意（这里同意卢、朱旧注）。进而听者若疲实非疲，无论愚智心尽死，意谓凝神静听，心“死”于歌声而不知其它。也与《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中“观者如山色沮丧”写法相同。黄山谷《奕棋呈任公渐》“心似蛛丝游碧落，身如蜩甲化枯枝”，可以作为“愚智心尽死”的注脚，不过杜所写的是听歌的人，是被感；黄写的是奕者本人，是自感，但也是感于奕棋。唱歌者也只有能深深地自感，才能感人。于此也可以体会杜诗工力之深。末四句以宽慰杨氏作结，直以天下之善讴者秦青为比，“倾侧天下耳”揄扬之至。杜甫服人之善，成人之美，无问男女皆然。这诗对绝代歌者杨氏的倾慕之情并不下于《丹青引》之对曹霸。杨伦认为这诗无寓意，良是。这诗就是专门写来赞美善歌的女子，不是托喻什么。

又如古今喜诵的《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诗并序较长，不录），也表现诗人对妇女之怀有绝技者，称道之若不容口，童稚之观，白首不忘，抚事慷慨，遂成此篇。诗人心情的灼热；使人可以触摸到，而诗人感慨的深沉也可以寻绎出。这诗虽不专是赞美公孙师弟的绝技，但赞美、钦佩之情仍在诗中居重要地位。而且所描绘的公孙大娘的舞姿，也是戛戛独造，句句创新，“燿如”“矫如”“来如”“罢如”运用排比、对偶、比喻等修辞手法，上继楚骚，下开李贺，文情皆至。如果不是对诗中所写人物怀有深厚感情那是写不出来的；即使写出，也达不到那样的艺术高度。

第四，也写所憎恶的妇女，勾画出了她们的丑恶形象。这类诗或者是通篇的揭露，或者是片言的谴责；又往往是寓

憎恶之情于丽藻，寄指斥之意于慨叹。由于铨裁得当，雕镂极精，而且又关系到王朝的兴衰，国家的治乱，所以也最为后人所喜读。

这一类作品可举《丽人行》和《哀江头》为代表。《丽人行》是乐府之遗而有所发展，前面大半部分着意描绘，极写其容貌之美，服饰之艳，食饌之精，当然这也是极言其奢侈，憎恨之意在言外。但是重点还在后面小半部分的反衬，外形之美掩不住内心之污，虽然着墨不多而其情备见。《读杜心解》说“无一刺讥语，描摩处，语语刺讥；无一慨叹声，点逗处，声声慨叹。”能得杜诗之旨。而卢元昌则说，玩“赐名大国虢与秦”，“慎莫近前丞相嗔”二语则“当时上下骄淫，渎伦乱礼，已显然言下矣！”这也是对的。这篇诗隐是主要写法，但也不是无显词。婉刺之中，也有直刺，但比较地少，读起来就更有余意，更能发人深思。《陌上桑》、《孔雀东南飞》也都是极写形体之美，妆饰之佳，但所写的人物，使人深觉可爱，而《丽人行》所写人物，使人只觉可厌，这都是从全篇阅读中传感到诗人的爱或憎的情感而产生的共鸣。杜诗这种描写可憎妇女形象的艺术造就也是很高的。这篇诗大部分句句叶韵，繁弦急管，读起来很有流利感，写人物的《饮中八仙歌》，全篇句句叶韵，也很流利，如珠走盘，当然那篇诗所显示的是喜爱之情。

《哀江头》，这篇有关史乘的诗，自宋代苏辙以来，迄于今世，为之论证者至多。不同的意见大抵在于有刺与无刺、刺玄宗或刺肃宗，不能备论。但此诗对于杨妃不可谓为纯系同情、无所指刺。王嗣奭和黄生的话都不为未见：“公追溯

祸根，自贵妃始，故此诗直述其宠幸宴游，而终之以血污魂，深刺之以为后鉴也”（王）。“此诗半露半含，若悲若讽。天宝之乱，实杨氏为祸阶，杜公身事明皇，既不可直陈，又不敢曲讳，如此用笔，浅深极为合宜”（黄）。祸根、祸阶的说法，虽然不一定符合事实，但从当时的杜甫看来，未必不是如此。不过当时京都甫陷，帝妃播迁，国事阽危，诗人又陷于贼中，面对曲江，息传马嵬，故哀感之情较多，而讽刺之意较微。此诗前半写骄奢之状，后半写狼狽之情，而“明眸皓齿今何在”一语实为之枢纽，寓刺于哀，寓微刺于惋惜之中，对象实指玄宗、杨妃，亦不失公道。这与以后《北征》诗中的“不闻夏殷衰”诸句的意旨显有不同。那几句是对妇女深责，为皇帝开脱，不管是颂扬玄宗或肃宗，都不公平，把一切罪责一概推在女子身上，不脱“女祸”论者的窠臼，在这个问题上缺乏卓越识见，这也说明诗人身上毕竟有着历史的局限性。后来郑畋的《吟马嵬》诗也可能取意于杜甫此诗，前人已论及。朱东润同志在其《杜甫叙论》中认为《哀江头》是对贵妃的同情，“这是杜甫在听到贵妃之死以后的第一个想法”，而《北征》是诗人对问题“深思熟虑”后所写，“有时只有第一个印象是正确的，而深思熟虑反而带来了利害得失的权衡，冲击了第一个印象的正确性”。以不同时间中的不同的创作思想来解说这两处杜诗的差异，也有道理。总之《北征》中的这几句诗，识见不如《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中的有关部分和《哀江头》，《哀江头》也有讽刺，不过比较隐微，上面已经谈到。

至于《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中的这一段：

凌晨过骊山，御榻在嵯峨。蚩尤塞寒空，蹴踏崖谷滑。
瑶池气郁律，羽林相摩戛。君臣留欢娱，乐动殷胶葛。
赐浴皆长缨，与宴非短褐。……况闻内金盘，
尽在卫霍室。中堂有神仙，烟雾蒙玉质。煖客貂鼠裘，
悲管逐清瑟。劝客驼蹄羹，霜橙压香橘。朱门酒肉臭，
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

这一长段诗，句句写实，字字有所指。是抒吐亲见荒淫生活时的愤怒，而不是抒发乱后黍离之悲。其指斥对象为玄宗及其诸臣、杨妃及其诸姊妹，椒房贵亲，卫霍权门，直刺无所隐。从歌舞、宴会、衣着、用具各个方面全面地揭露了他们骄奢淫佚的腐朽生活并指出他们与人民之间荣枯大异的尖锐矛盾。诗中也有为玄宗解说的地方，即“圣人”数句，但这可以视作一种掩饰，并不是杜甫真正以为国君独圣。“君臣”、“赐浴”等词，明明指出“上有好者”，唐玄宗（包括杨贵妃）才是主要人物。从这些诗可以看出，诗人对妇女是憎其所当憎，而且更从有关国家安危和人民生死这样的大题目着眼来揭露这些人的荒淫无耻，但又不是把罪责全部推给她们。

第五，从杜甫对他自己妻子的态度来看，诗人对他妻子是平等相待，患难与共，始终笃于伉俪之情。在杜诗中除《月夜》一首是专为妻子所写，为寄内之作外，其他都是包含在许多诗篇中的一些有关诗句。总的数量虽不多，但情真语挚，弥足感人。

《月夜》：

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

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

这首诗作于天宝十五载八月，身入罗网，心忧君国，时当月夜，也引起思家之情。就月起兴，想念闺中的孤单：对月唯有独看，忆人也无与共语，因为儿女童稚，还不懂得遥念长安啊！自己想念妻子，更想到妻子的想念自己，感情更见深沉。香雾、清辉，的是秋夜月下情景，古今论者甚多，有时说到一边去了，殊觉不必。这不过是想念中妻子的形象，于以见诗人情笃而意切。末联写出愿望，回应前面的独看，尤见伉俪情深，也是诗人把自己夫妇的离合与国家的兴亡紧密联系起来。“只益丹心苦，能添白发明”（《月》），这差不多是作在同一时候的诗，显示出皎皎月影，反增忧愁，而更多的是关心丧乱。

《月夜》写得较为含蓄，在此前一年的《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中，更是激切地道出诗人誓同他的老妻患难与共的衷情：“老妻寄异县，十口隔风雪。谁能久不顾，庶往共饥渴！”如闻其声，如见其自责自誓之状！而把作《月夜》后半年写的《春望》中的“家书抵万金”联系起来看才更觉一语有万钧之重，绝非泛泛的修辞。诗人在任左拾遗后不久，至德二载五月，在有名的《述怀》诗中又极念他的妻子、儿女：“去年潼关破，妻子隔绝久……寄书问三川，不知家在否。……自寄一封书，今已十月后。反畏消息来，寸心亦何有！”把心事曲曲传出，语浅而情至。至于《羌村》和《北征》中“妻孥怪我在”及“妻子衣百结”的许多描述，更全是血泪写出。同遭乱离的悲惨命运使诗人夫妇之情更为诚笃，也如元微之所说“贫贱夫妻百事哀”；而《北

征》中的“瘦妻面复光”，前后数语也算是苦中有乐了。

诗人入蜀，途中备尝辛苦，每首诗都有其妻在内，自不待言；固不止《飞仙阁》中“叹息谓妻子，我何随汝曹”这两句才涉及。寓居成都后生活较为安定，诗中也偶有欢愉之情，写到妻、子的如“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江村》），愁眉得以稍展，宋葛立方《韵语阳秋》谓此诗“优游愉悦之情见于嬉戏之间”，良是。而宋释惠洪《石门洪觉范天厨禁齋》则以为“妻比臣，夫比君，棋局，直道也”就未免牵强了。诗人在蜀，穷困播迁也常常不免，《百忧集行》中“老妻睹我颜色同”一语，尤为镂心刻骨。盖不仅此时夫妻两人饥饿的颜色同，而且几十年穷苦的境遇相同；拂逆之来，一种身受的屈辱感相同，这都见之于颜色而令彼此惊睹。

诗人写他妻子的诗虽然不多，有限的笔墨也描画出了一个贤良妇女形象的轮廓。再如“晒药能无妇？”“老妻忧坐痹”，更见片刻不能相离。《遣兴》诗中有一句是：“家贫仰母慈”，这是向他的幼子讲的，是诗人对他几十年穷困共处的妻子的公正评价。贤妻、慈母、好内助，这是中国封建社会中许多贤良妇女共同得到的美称，这在诗人着墨不多的笔下，却也形象鲜明。诗人对他的弱妹也是关怀备至，读《乾元中寓同谷县作歌七首》之第四：“有妹有妹在钟离，良人早殁诸孤痴……”可知，都见诗人性情之敦厚。

最后应说的是，诗人也有一些类似香艳的诗，如《春日戏题恼郝使君兄》有句云：“细马时鸣金鞵衰，佳人屡出董娇娆……愿携王赵两红颜，再骋肌肤如素练。”直写过去所

见佳人舞姿，并表现望郝使君再携之意；“请君一来开我愁”，也可能是戏言。又如《陪王侍御同登东山最高顶宴姚通泉晚携酒泛江》：“复携美人登彩舟，笛声愤怒哀中流。”这种生活在唐代士大夫的交往中甚为普遍，问题在于诗人对这种生活并不迷恋，作诗很少，也更无“轻薄为文”之处。又如《城西陂泛舟》诗，起句便是“青娥皓齿在楼船”，然亦就此顿住，并未继续在“青娥皓齿”上多所渲染。《读杜心解》说：“其必隐然有所感叹”；《杜诗镜铨》也说：“此诗当有所指，如《丽人行》之类。”又说：“观‘在’字自是望中，不必身与。”总之，老杜并没有在妇女形体上舞文弄墨、评头论足的兴致（《丽人行》的描写意在讽刺），从全部杜诗看，也不过仅有数联象“越女红妆湿，燕姬翠黛愁”（《陪诸贵公子丈八沟携妓纳凉遇雨二首》），“越女天下白，鉴湖五月凉”这样的诗句而已。妇女的美貌，绮罗香泽，也是可以写的，问题在于写的态度如何。杜甫没有那种以女性为戏玩之心，在他的笔下也就没有那种佻巧甚至媒狎的诗句，他写妇女美貌的诗句也是健康的。

从以上的粗略论述，可以领会到杜甫诗歌中的妇女形象是来自社会上各阶层的真实人物，某些人物很有代表性和典型意义。诗人对她们有较多的观察，较深的理解，有明显的爱憎之情，他对妇女的态度是正确的，那种男尊女卑、以压抑妇女为当然、戏玩妇女为有趣，从而表现在诗歌上的某些作品，在杜甫的诗卷中是完全不存在的。诗人写妇女人物的艺术手法也很高，决不概念化、一般化，而是鲜明、生动，从个别见一般，写言谈、啼笑如闻其声，写动作，服饰如见

其形，而且都紧扣住了时代和社会环境所影响和造成的人物心理活动，即她们的思想感情和对具体事物的具体态度。这些诗篇的诗歌特征性也很强，往往集中在一点上，写片刻间的感受，而又富声律之美，出之以咏叹。诗人正是以自己所描绘和塑造的形象来感染读者，引起共鸣，给读者以美的享受的。因此，直到今天它还存在着一定的社会教育意义。

从杜甫的并世作者来看，如李白也写过不少以妇女为题材的诗歌。宋王安石曾说李白的诗“十句九句言妇人、酒耳”（见《冷斋夜话》、《扞虱新话》），但陆游认为：“世言荆公四家诗后李白，以其十首九首说妇人，恐非荆公之言。白诗乐府外，及妇人者亦少；言酒固多，比之陶渊明辈亦未为过。此乃读白诗未熟者妄立此论耳”（《老学庵笔记》）。今按陆游的话是对的。李白以妇女为题之诗之多，只在前数卷乐府诗中，将近五十首；后数卷古今体诗中又约四十多首，绝不能形容为“十句九句言妇人”，而且“言妇人”也并非不可，主要是看怎样“言”。李白“言妇人”的许多诗都充满了诗人对被遗弃的、遭遇不偶的、夫妇生离的妇女的无限同情，如《白头吟》、《长干行》、《江夏行》、《陌上桑》、《捣衣篇》等等，都写得十分佳妙，词美而旨深。其题材多关于妇女的爱情婚姻方面，多是一种怨曲。数量之多，远过杜甫，但其他方面的内容则甚少，画幅不广，且有些篇章内容、词语不免重见。所以从反映社会妇女生活的广度和深度来看，较杜有所不及。王维以妇女为题的诗只有几首，但《西施咏》、《息夫人》、《班婕妤》等咏古之作也多新意，特别是《洛阳女儿行》，描绘一个骄贵女子，能摄其神，而以贫女溪

头作结，感慨不少。孟浩然、高适、岑参亦各有作，孟的几首五律，不出闺情，大体借以寓意；高有《秋胡行》，岑有《长门怨》，借题发挥，亦多感喟。刘希逸《捣衣篇》，崔颢《邯郸宫人歌》，李颀《郑樱桃歌》，元结《贫妇词》，并极精工，但仍不如杜诗方面之广。盛唐诸人所作关于妇女之诗有如翠岭横斜，各显巉峣，而杜甫实为最高峰，值得研讨。

1983年春

注：

①《杜诗详注》《秋兴八首》引陈廷敬所云：“杜合子长、孟坚为一手者也。”则前人已有此见。

②宋朱熹以为《女诫》言有未备，欲别集古语，另立篇目。他说：“如‘正静篇’，即如杜子美‘秉心忡忡、防身如律’之语，亦可入。”（《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五》）。此指杜诗《牵牛织女》中“嗟汝未嫁女，秉心郁忡忡。防身动如律，竭力机杼中”各语。但杜诗此数句只希望女子严于防身，勤于织作，所言皆是，与《女诫》异趣。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再辨析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是杜甫重要代表作之一。1000多年来为人称道，影响很大。直到现在，社会上很多人之所以知道杜甫，对他崇敬，很大的原因是由于从小就读过杜甫的“三吏”（至少是《石壕吏》）、“三别”（至少读过其中一篇）、《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这些最震撼人心、容易引起读者同情的作品。从前社会上的一般人，只要读过《唐诗三百首》以外的一点唐诗，都会知道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解放前后的大、中学生也从中国语文课本上读过寥寥的几首杜诗，其中就有《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印象很深。在六七十年代的“文化革命”中，杜甫被判为应当受到批判的儒家一流。听说一些中等学校语文课本就根本不选杜甫的诗歌；有的课本在高中初中几年中也有一点。只要还有，《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就必然列入。后来又因为《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也遭到专家学者的訾议、批判，把它作为杜甫诗歌理所当然地应当受到批判的例证之一，这时，中学课本上还有没有这篇诗就很难说了。即使有，也没有人敢教；也会感到很难讲。尽管这样，由于杜甫的这首诗，早已家喻户晓，所以短短两三年中的停讲停学，对于这首诗在广大社会人士和青少年中的流传、引用也并没有产生多大的阻力。至于近几十年

中的杜诗选本和唐诗选本或什么唐诗、杜诗欣赏集也往往要选入《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这篇七言歌行。普及面如此之大，给予广大读者（或未读但听熟了的人）的印象如此其深，这在古代诗歌的流传、诵读中是罕有其比的。这当然是很好的现象。

但是，由于对这篇诗历来虽然持肯定态度者多，但阐释的深度还不足，或从维护封建主义而立言，不免有所偏。还由于“文化革命”评法批儒的影响，对这诗甚多曲解，或竟基本否定，一时还未能认真消除其消极影响。致令直到现在，肯定此诗的有些论述还不免于表面化，而对于一些曲说的澄清也显得无力。有些讲杜诗的学校教师也反映对有些问题“拿不稳”。对于这篇诗的诗艺成就也还发掘不足。所以今天对于《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这篇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的七言歌行，还有进一步认真学习、辨析、研讨的必要。

首先对于这首七言歌行的思想内容要有确切的、充分的认定。从清初到近现代唐诗选本很多，这里略举几种很有代表性的来看：沈德潜《唐诗别裁》选了此诗，无评。王士禛《古诗笺》也选了此诗。王氏主要是以诗艺观点来看唐诗、选唐诗。他在《凡例·七言诗》中说：“今钞盛唐五家之作为一卷（按指李峤、王维、李白、高适、岑参），王龙标、崔司勋间取一二附之。”接着说，“诗至工部，集古今之大成，百代而下无异词者。七言大篇尤为前所未有的，后所莫及。盖天地元气之奥，至杜而始发之。今别于盛唐诸家，钞杜诗一卷。”这不能不说王氏是出以公心，且颇有见地。王氏选了

杜甫的七言歌行 68 首，在盛唐诸人中为最多。《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也选了。由此可以窥见，工部此诗，无论从思想性、艺术性哪方面看都是上上之作。王氏也选入了《楠树为风雨所拔叹》，亦当。这两首诗相辅相成，应视为一个整体，有人称之为姊妹篇。观杜公的制题，这两首诗一致，是有一定道理的。王闾运《唐诗选》选了杜甫七言歌行 67 首，偶有批语，甚简，每从笔法上作评。这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却未入选。近人高步瀛的《唐宋诗举要》选入了杜诗这首，是集注性质，未有评论，但是引载了赵彦材的几句话。赵以为白居易的“长裘覆洛阳”出于杜而不及杜，高氏则以为“此语殊泥”。高氏似亦未知杜公此作之极诣。余冠英等所编的《唐诗选》选了杜甫各体诗 71 首，这首歌行也已选入，未选《楠树为风雨所拔叹》。对此诗略作说明：“写风雨中茅屋破坏，从自己一家的窘状，推想‘天下寒士’的生活都是这样。”其他近现代的选本对杜甫此诗的肯定，大率类此。至于《钱注杜诗》《杜诗详注》《杜诗镜铨》《读杜心解》这几种久负盛誉的杜诗全集的清人注本，对这首诗当然比较重视，但理解的深度也嫌不足。钱氏注杜，本以诗、史互考著称，对这篇诗没有什么说的，仅仅对于几个字写下“一作”什么，又引赵氏说“二诗（兼指‘楠树’诗）皆上元二年作”。殊觉冷淡。仇氏也只注明一些词句出处，但在篇末说：“末从安居推及人情，大有民胞物与之意。”这是一语中的，唯觉稍简。浦氏于简略分析此诗内容后说：“末五句翻出奇情，作矫尾厉角之势。宋儒曰：‘包与为怀’；吾则曰：‘狂豪本色’。结仍一笔兜转，又复飘忽如风。”这是文章评

点家仅从作品的写作方法上来谈体会，好像有很多发现，其实对诗意诗旨，除“胞与为怀”说到一点外，其余则不著边际。而且“狂豪本色”，“飘忽如风”就更似是而非，实际是贬低了这篇诗的价值。杨氏于此诗引了蒋、邵、朱几人的点滴评语，于诗义并无发挥。引邵子湘云：“诗亦以朴胜，遂开宋派”，虽然也有所得，但何曾触到诗心。对“风雨不动安如山”这句诗，旁批了几个字：“还说穷话妙”。又对“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句旁批云：“兜转本位，其疾如风”。这是从浦二田来。离开了思想内容的领会而谈“诗法”，如果诗人泉下有知，恐亦哭笑不得。作者是垂涕而道，呕血而呻，论者只在旁边欣赏某一个字用得好，某一语转得妙，这就无怪作者早在1200年前就叹息“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南征》）了。近二三十年来对杜甫诗的研究，颇有新的成果；对杜甫这篇诗的思想性已有较为全面、深入的论析。例如邓魁英、聂石樵两先生的《杜甫选集》对这首诗的结尾评说：“两句表现出推己及人和舍己为人的高尚精神”，就比较准确。再以萧涤非先生为代表，他在《杜甫研究》中说杜甫有着人道主义的思想，其思想有着深远的儒家经典的根源，但杜甫不是一个庸俗的人道主义者。“他的人道主义，包含着以下两种极为可贵的进步因素：第一种是自我牺牲的利他主义精神……另一种进步因素是善恶分明、爱憎分明。杜甫是人道主义者，却不是庸俗的阿弥陀佛式的慈善家”（见《杜甫研究》第50—51页）。在这里萧涤非先生引了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来说明：“所谓‘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和他的另一首诗中说的‘各使苍生有环堵’的精

神实际上是一致的。穷书生和穷苍生在杜甫看来正是一路人”（按：“各使苍生有环堵”，前人在论《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时已经指出）。萧先生能从杜甫思想根源和杜甫的其他作品比并观察，这在杜学研究中大有进展。但是，与此同时或稍后，又出现忽视全诗和全人，摭拾其诗歌中的一言片语，抹杀其处世为人，横加指摘，轻则怀疑，重则否定，未暇深求，辄作结论的种种现象。这固然由于论者主观态度的稍欠严谨，客观上实也由于一时的风势使然。《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也就难免被人曲解，甚至横遭毁谤。

要评论杜甫这样伟大的诗人，必须着眼于观其全人，看其全诗。这才有可能不离真实、符合实际地明其诗心，得其诗旨。谨慎小心地尽可能使作品不致受到歪曲，作者不会受到委屈。由表及里，由卑到高，探索作者深藏中心的本质思想感情和跨越时代的崇高思想境界。杜甫自比稷契，深忧黎元，其所以大过于人者在此。儒家的道理对他影响至深，这是好事，不是坏事。儒的出发点是“仁”，而其所尊重者在“民”。“虽有周亲，不如仁人。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著于《书经·泰誓》。“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载于《礼记·大学》。“民者君之本也”记于《春秋谷梁·桓十四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见于《孟子·尽心》。他如“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孟子·离娄》）“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若此。”（《孟子·万章》，此孟子论伊尹之言）这些童而习之的儒家经典之言，最有感染力和说服力，更由于家庭和社会环境正面

的影响，使一个有志于道，想为国家、民族、人民作一点事情的读书人，深以“为稻粱谋”为可耻，以“修其天爵”为可贵，就莫不胸怀稷契之志，欲使天下义安，黎庶康乐。但又必须通过君主权力以实现自己的宏伟志愿，不可能要求他们鄙弃帝王，揭竿而起，取而代之。孟轲回答他的学生万章所问“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汤”，他在完全否定这一传说以后接着说的那一长段话极为精采、重要，对后世的知识分子最有关系。他的话是：伊尹起初不欲就成汤之聘，“嚶嚶然曰：‘我何以汤之聘币为哉，我岂若处畎亩之中，由是以乐尧舜之道哉！’”但在“汤三使往聘之”之后，伊尹“幡然改曰”：“与我处畎亩之中，由是以乐尧舜之道，吾岂若使是君为尧舜之君哉，吾岂若使是民为尧舜之民哉！”这是说伊尹起初只欲处畎亩中自乐尧舜之道，后经成汤三次敦聘，思想变了，认识到与其我处畎亩中独乐尧舜之道，何如我应汤之聘，奉之为君，使吾君成为尧舜之君，吾民成为尧舜之民更好。这应当是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思想根源所在。杜甫是“圣之任者”。不独杜甫，中国历史上许多伟大的哲人、文人都往往同此怀抱。前如屈原：“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纣之披猖兮，夫惟捷径以窘步！”“恐皇舆之败绩”。后如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他们都是“圣之任者”，都是要“致君尧舜上”。这成为一条红线贯穿着我国两千多年来许多有志之士，有德之材。这倒并不是屈原杜甫等少数人才是如此。但是，这中间有真伪之别，有坚持与不能坚持之分，有执着与不能执着之异，有能不能“不以三公易

其介”，“虽九死其犹未悔”之相隔天渊！此所以像杜甫这样的伟大诗人历史上罕有其俦！至于历史上另有一些人一开始就出路不正，凶残邪僻，极端自私，无所不为，这就不必说他了。明乎此，那么杜甫在他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所显示出的大公无私的光辉思想、民胞物与、己饥己溺的热烈感情，正是显示了先后几千年我国的学者、文人至可宝贵的为人之道。以天下为己任的崇高品德，达到了极高的高度。所以此诗末尾的几句抒情诗句，正是杜公早已蕴积于中而彼时彼地的“必然”流露（或者说爆发），决非偶然，既不是可异，也更无可疑。以为是“狂豪本色”“说穷话妙”等固觉可笑，尤有甚者，在“十年”中有些人说“寒士”仅仅是指的和杜甫一样的读书人这个阶层，决不包括广大人民在内，由此可见杜甫的思想并不见其伟大。我觉得如果不看杜甫这个全人，不察其思想渊源，又不较全面地看杜甫作这首诗时还作了一些什么诗，思想感情有无关联，只是孤立地抓住了这一个词便下断语，不惜毁损古人，那就很有远离事实的危险，贤者（不止一人）不应如此，但也许出于偏见，令人惋惜。至于那时某些“评法批儒”的人，反杜成了他们达到其政治目的的一个手段，抓住了这个词，大做文章，这就更不足谈了，即使仅就此词——“寒士”而言，“寒士”是否只能指贫穷的读书人？杜甫何尝不可用以指一般的男子，即一般穷人呢？《诗经》三百篇，“士”与“女”并称的诗很多，如《郑风·溱洧》“士与女方秉筒兮”，说《诗》者自来都认为这诗写的是郑国民间风俗，士、女是一般男女的泛称。再如《氓》诗中的“女也不爽，士贰其行”，这个“氓”

确是一般群众，不是读书人，但也被称为“士”。可见“寒士”不一定指的是读书人，更不一定指像杜甫那样的读书人。虽然古今词语其意义有时有变迁，但杜甫所用词语也不一定都是今义。再看杜甫《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中“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这些句子。这里的“寒女”毫无疑问指的是劳动人民，那么杜甫中的“寒士”又何尝不可以指的是一般人民，一般穷人？我看现在有些杜诗注本和杜诗的译文把这里的“寒士”注解、翻译为“穷人”，这是完全恰当的。再看杜甫的诗歌，用了“士”字的句子将近三十处之多。有些当然明显地指的是读书人或作官的人，如“时见文章士”“海内知名士”“济济多士新”，“多士盈朝廷”等。或者指兵士，如“念彼荷戈士”“极乐三军士”等。但如《三川观水涨二十韵》中的“因悲中林士”又当何解？按此诗作于《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之后，杜公自白水到郾州，三川县属郾州，是时大水泛滥成灾，杜公遂作此诗。此诗以“我经华原来，不复见平陆”领起，历写雨涝严重状况，哀悯水灾伤亡之悲惨。“应沉数州没，如听万室哭，”分明写的是所有民众沉溺之痛。其下又云“普天无川梁，欲济愿水缩。”接着说：“因悲中林士，未脱众鱼腹。”细玩此二句，“中林”，注家以《诗经·周南·兔罝》之“肃肃兔罝，施于中林”为杜诗此句中“中林”一词所从出。而《诗经》旧注，“中林”即林中。此如前章之“施于中逵，”即是逵中，“九达之道”。又如《葛覃》之“施于中谷”，注为“中谷，谷中也”一样。是则“因悲中林士”即悲林中之众民。此诗一气贯下所指皆被灾之民，岂会在

一句诗中，划个界限，仅指林中的读书人未脱鱼腹？那么读书人以外的人民是能脱鱼腹或已脱鱼腹呢？或者虽然也一样地“未脱众鱼腹”但不在诗人所“悲”之列，杜甫所“悲”的只是和他一类的读书人？道理说得通吗？整篇诗的连属性又说得过去吗？足见杜甫在这句诗中所用的“士”字实指该地林中的全体军民而言。是则杜甫有时用此“士”字并不排斥一般民众在外。若然，《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里的“寒士”一词，就不一定是只指穷知识分子，决不包含其他的穷人。而且从写作心理说来，诗人在雨夜屋漏，长夜不寐痛苦之极时，联想到“天下寒士”他们也同自己一样痛苦，从而产生希望，“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在如此感情激动、愤懑不平的时候，所谓的“阶级意识”“阶级界限”竟会那么强烈，硬要把读书人与一般穷人截然划开，希望得到“大庇”者只是“天下”的读书人，知识分子，决不包括一般穷人、贩夫走卒在内，会有这种心理活动吗？准此而言，上面所引的那首三川观水涨的诗，又会不会在全面写述三川水涨、万室皆哭之后，突然把一般民众撇开而只“悲”与诗人一类的读书人、文人学士之流呢？

严肃探索、领会杜甫这个“全人”从来就植根甚深的思想感情、胸襟抱负；认真理解“寒士”这个词在杜甫诗中的使用意义（有常有偶），当不致再曲解其实际所指了。由于挑出这个词（同时还有其他几个词，但以这个词为重）来否定杜甫此诗的论说过去比较多，甚至包括有些专门研究者在内，不止一二人，故不得不辨。当然这也是学术上的讨论问

题，见仁见智，各有不同，自不妨诸说并存。但不应只据一个可以有别解的词而提高到杜甫的思想感情上来斥责与否定。

还应当对杜甫写此诗时的其他作品比并观之，不必孤立地只看此首。被后人称为姊妹篇的《楠树为风雨所拔叹》自是同时所作。杜集中多连章诗（今或称为组诗），有同一题目下同体多首者，如《八哀诗》《秋兴》《诸将》《春日江村》，有同一题目下不同体数首者，如《九日五首》，也有不同题而同体，内容相近、题旨有关联，往往两两相并者，如《阆山歌》与《阆水歌》，《负薪行》与《最能行》，《白凫行》与《朱凤行》，《石笋行》与《石犀行》，《病柏》与《病桔》，《枯棕》与《枯楠》等。《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与《楠树为风雨所拔叹》亦属此类。此种诗两两相倚，互为补充或互伸其意，譬如瑾瑜相合，读者亦宜比并观之，庶更见诗人旨意。清光绪时郭曾炘《读杜札记》引蒋弱六云：“写楠树耳，不觉写出一篇《离骚》、两道《出师表》。”郭氏说：“此评极有味。此诗‘干排雷雨犹力争，根断泉源岂天意’二句，《杜臆》谓‘天意二字宜玩，恐草堂终非吾有也’，盖以楠树卜之。浦二田云：‘结具有深痛，虎倒龙颠，英雄失路，泪痕血点，人树兼悲。楠叹耶？自叹耶？殷仲文所谓树犹如此，人何以堪也。’炘按：所云犹就身世言之，窃谓干排二语直可为文信国、瞿稼轩一辈人写照，足使古今忠臣义士同声一哭。虎倒龙颠二语，直与‘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者一鼻孔出气，以《离骚》《出师表》当之，真足使读者异世相感，不知涕泪之何从也。”余以为郭氏的评论较为

深刻、充沛，能得杜心，唯尚可以补充者：从诗人作客草堂而言，来成都还不过一年多（二诗作于上元二年），而高楠倒颠，茅屋破漏，几乎无以为家，无以寄志。泪痕血点，淫雨饕风，直是一片昏暗萧瑟景象。二诗皆自哀而哀世。从诗人心忧国事而言，民生疾苦，人才摧残，虽有抗雷排雨的英挺之姿也毕竟不能战胜邪恶的势力；虽有舍己为人的宏伟之愿也未必能够缓解寒士的辛酸。二首比并观之，其愁愈显，其感益深。另外，同在这一段时间中所写的《石犀行》及《石笋行》，还有《百忧集行》，都反映出了诗人本来满怀热望入蜀而入蜀后忧伤憔悴的心情与容颜。“悲见生涯百忧集”，可以说是这一段时间诗人生活的总结语；也可以说是来成都后所作的这几首诗的结句。石笋、石犀二首皆有极强烈的政治思想性，石笋擅虚名，石犀为神羞，藉以表现朝廷政治的昏烟瘴气，也是直对时弊而痛下针砭。这也和后来韩愈的心情一样，“欲为圣朝除弊事”（《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还须注意的是，《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石笋行》《石犀行》这三首诗都以“安得”如何作结：“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惧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安得壮士掷天外，使人不疑见本根。”“安得壮士提天纲，再平水土犀奔忙。”杜甫用了“安得”一词的诗句不少，除这三首诗外，还如：“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洗兵马》），“安得更似开元中，道路即今多拥隔”（《光禄坂行》），“安得送我置汝旁”（《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之三），“安得覆八溟，为君洗乾坤”（《客居》），“安得尔辈开其群，驱出六合枭鸾分”（《王兵马使二角鹰》），“安得务农息战斗，普

天无吏横索钱”（《昼梦》）等等。“安得”者，极其渴望得到或求其实现但又未必能得到、实现，故用以表现既盼且忧此种心情之表达词也。观杜公之用“安得”一词，都是出自热肠，心忧天下，非为一己一家之私，虽有忆妹之作，那也是反映了乱离中人民共同的痛苦。每读杜公“安得”之句，不仅如闻其声，如见其面，而且令人深深感到诗人的心脏正在激烈地跳动！明乎此：则对于《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结尾之大义昭然还应该有什么丝毫的怀疑？

再把范围放宽一点，看看杜甫远远近近的诗，略举数例：“三吏”、“三别”同情到下层人民；“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强烈愤慨地为老百姓的几多枯骨提出控诉；“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同上），勇敢地为劳动人民鸣不平，揭露残酷剥削的现实；“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同上），忧人民之所忧；“无贵贱不悲，无贫富亦足”（《写怀二首》），矛头直指贵者、富者，为贱贫者发出怒斥；“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又呈吴郎》），同情饥饿贫妇；“几时高议排金门，各使苍生有环堵”（《寄柏学士林居》），与“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同一思路，不过彼乃寄希望于朝廷，此为发宏愿于梦寐。这也足以证明“寒士”一词实指天下苍生。附记：为何不说“大庇天下苍生俱欢颜”，而要用“寒士”，可能也与音调有关系。此句前四字是三仄声，末三字是平声，如果在此三平前连用两平或两仄声字都不甚调和，试吟诵之自明。故用一平一仄“寒士”，整个句子音调就很响亮。而且此词之用，有偶有常，不是只有一解，说已见

上。纵观杜公一生行事及其众多作品，则《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崇高思想境界应是十分透明、毫无疑义的了！《杜诗镜铨》笺注者杨伦，他在此书的《凡例》中说：“孟子说诗贵于以意逆志，但通前后数十卷参观，自能见作者立言之意。”说得很好。重在“通前后数十卷参观”，从全观人，以意逆志。如果撷拾一二词语而立说，以为创获，恐差之毫厘，失之或竟千里了。

撷拾一二词语而立说，在“十年”中杜甫及其诗作大蒙其辜。近十几年来，时贤对此已作了许多辩解。例如杜诗《独坐》二首之一（五律），其第三联是：“暖老思燕玉，充饥忆楚萍”。旧注引“燕赵多佳人，美者颜如玉”释“燕玉”为“少女”。“十年”一些论者据此立说，并以之抨击杜甫。曹慕樊先生予以驳斥，他引证多方，从词语的确切意义到杜公的确实为人，证明曲说者之荒谬（见曹著《杜诗杂说·（三）杜诗琐谈·燕玉》），既为无学，又为无德，“他们已经习惯那种腐朽生活，遂以为凡人皆然。”

在杜甫这篇《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有些论者还撷拾了“三重茅”“盗贼”“娇儿”这几个词语来做文章以贬杜甫。说屋上茅草三重可以想见居住条件的优裕。但另有人认为三重的“三”是虚数，就是说卷走了茅草多重（清代学者汪中有《释三九》一文，可以参证）。是指所卷走的面积较大，有几堆茅草那么多。后者的解说较合情理，有实事求是之心。否则，杜甫在公元760年或761年才盖的房子，所盖是茅草“三重”，那么厚实，这年秋天纵使刮起了很大的风，也恐怕不会把三重茅草的屋顶一齐卷走了吧。这本来不是什

么重要的问题，但有的论者偏偏由此推论，说屋顶三重茅草，很像地主之家了。再加上草堂园地较大，花木繁多，更说杜甫一家在成都过的是地主生活，哪会与劳动人民有感情。不知园地较大，当时本来是地广人少，乡村尤其如此；花木繁多，这是由于诗人的苦心经营与栽培，有诗为证。这不是吹毛求疵又是什么。

有些论者拈出“盗贼”一词与诗中“娇儿”一词对比，说诗人称自己的孩子为“娇儿”，骂贫穷孩子为盗贼，使人吃惊，我以为对问题要作具体分析，如果离开了具体情节的把握而只是提出两种不同称呼作比较那是比不出什么道理来的。诗人称自己的儿女为骄儿、娇女，那是见于他自己的许多诗篇中，是一种极其平常的爱称。早在晋代，诗人左思就写过有名的《娇女诗》，称自己的两个女儿为娇女（中唐的李商隐有《娇儿诗》）。这等于现在称“可爱的孩子”“乖娃娃”一样，毫不足奇，更不可贵。那么，为什么又叫贫苦的孩子为盗贼呢？这就要看是在什么情况下说的。从这首诗的描述可以看出，那是在诗人呼喝不得，以至唇焦口燥，而抱走茅草的群童完全不顾，老诗人眼睁睁地看见他们当着自己的面把茅草公然抱走的情况下，在心头冒出了这个“盗贼”字眼而在诗中写出来了的。意思是责备群童竟然如此忍心当着别人的面干出拿走别人至关紧要的东西这样的盗贼行为，这是一种一时气愤的话，好比现在说：“你们当面抢人啦！”怎么能把诗人在特定情况下偶然对于农村群童的责骂之辞与他对自己儿女寻常的爱称作比较呢？孟夫子曾经说过：“不揣其本，而齐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于岑楼。”不问具体情

况如何而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一个偶然的称谓也可以提高到诸如立场、心术、人品等等的高度来看。“盗贼”一词顶多是说重了一些，但所指的是彼时彼地一些儿童的具体行为本身，决不是泛称贫穷的儿童。而且诗人独自归来，也是自己倚杖叹息罢了，并不是愤怒不止，或骂詈不绝。如果再从诗人《戏呈吴郎》《题桃树》等诗来看，杜甫并不是一个想不到贫苦人民的人，更绝对不是一个骂穷苦人民为“盗贼”的人，连当时社会上大家都指斥的盗贼，他还说过“盗贼本王臣”（《有感五首》之三）呢。他还在《戏呈吴郎》中说过“不为困穷宁有此”，所以绝不能把诗人一时气愤之辞，抓住不放，别作深解。

最后，让我们再体会这篇名作的艺术成就。这首诗的体裁是七言歌行。这篇歌行大多数是七字句（少数是九字句）。它与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那种五、七字句并用者有所不同。歌行每句诗没有一定的格调，但押平声韵的句子，它的五、六、七字往往是三个平声，有些押平声韵一韵到底的尤其如此。杜甫这首诗中的“三重茅”“长林梢”“沉塘坳”“俱欢颜”“安如山”等就是如此。后来如韩愈的七言歌行这个特点也很显著。如《石鼓歌》的“挥天戈”“鸣相磨”“皆遮罗”“留山阿”“烦撈呵”“生蛟鼉”“交枝柯”“崇丘轲”“其蹉跎”等等皆是。杜诗在这方面对后世也是很有影响的（当然不是非如此不可。如“风怒号”“千万间”就不是三平）。这是出于长言咏歌的自然要求，也决定于词语的恰当运用。这篇诗的用韵是平仄互转，杜甫的歌行此种较多，而一韵到底不转韵者较少。此诗第一段是押平声韵，即“号”

“茅”“郊”“梢”“坳”这几个韵。第二段转为仄声韵（入声），即“力”“贼”“得”“息”这几个韵。第三段继续用仄声韵（亦入声），即“色”“黑”“铁”“裂”“绝”“彻”等韵。第四段又转为平声韵，即“间”“颜”“山”。最后转为两个仄声韵（亦入声）结束全诗，即“屋”“足”。所用仄声韵都是入声，入声短促沉重，这也与这篇诗所显示的基本情调有关。

第一段一开头就写出了深秋暴风的巨大威力。杜甫无论写风、雷、雨、电的诗都是景象逼人魄力大，真可说是笔参造化。“怒”字显示出了风的感情，“号”字写出了风的声响，好比盛怒的猛兽在咆哮。专门写风的作品，最早的是战国时楚国宋玉的《风赋》，它写风“起于青苹之末”，“盛怒于土囊之口”，声情并茂。八月秋高气爽，本来应该是一年中难得的好天气，却不料狂风怒号，懔懔可怖。紧接着不暇他言，直达于己，气势极骤。一个“我”字把自己摆了进去。全篇都是写“我”在秋风中的不幸遭遇，困窘狼狈之状和起伏变化之情，写自己的真实生活，作自我的真诚表白。高矣迥矣，蔑以加矣！接着几笔，涂抹出大风吹破茅屋，卷起茅草，茅草飞得高，飘得远，洒得宽的图景。杜甫题画的诗特多，定自精通画理。“斯须九重真龙出”（《丹青引》），只在俄顷之间；杜公写此数句亦复如此。“茅飞”三句，一连六个动词，“飞、渡、洒、挂霄、飘转、沉”，极其准确。应当佩服诗人观察事物的细致、运用词语的精当和描写技艺的出神入化。这第一段共五句，诗人是句句在用韵，以急促、紧骤的音调来突出风卷草飞迅猛异常的外在景象和诗人

焦急观看不知所措的内心变动。如果由另外的人来写，不知道要写多少句才表达得出，又不知如何手忙脚乱。“不善为斫，血指汗颜。巧匠旁观，缩手袖闲”（韩愈祭柳子厚文），伟大的诗人也正是这样的巧匠。第二段转为仄声韵，短促沉重的音调谱出了紧张、痛苦的心情。诗人正在注视着茅草的去处，还存在着拣回一点来的希望的时候，忽然来了一群儿童欺负诗人年老力衰，竟面对茅草的主人，公然抱起茅草、跑进竹林。其事出于诗人的意外，“公然”一词特别传神，其情实为诗人所难堪。写心理活动丝丝入扣。一边公然抱走，一边呼喝不住，双管齐下，两面俱到。“归来倚杖”一句写出了诗人自己无可奈何的心境，也写出了他的善良，唇焦口燥，继以叹息，而余意悠然。短短数言把这一老和群童之间的纷争、矛盾，维妙维肖、活鲜鲜地展现了出来。擒其要点，摄其神理，斯为得之。第三段是草飞难拾，屋漏莫补，雨继风来的更为狼狈的情景。本段是第一段的必然发展。诗人以低沉的音调把自己的困苦情、狼狈相抒吐、描绘了出来，写成几句继续押入声韵的诗。人有经络，诗有结构，但经络人人一样，杜甫诗的结构则首首不同，最有讲究。此首风破茅屋，必有后果，何以当之？构成悬念。不幸雨继风来，床床（有的本子作“床头”，关系不大）屋漏。雨脚如麻，未能断绝。此于事理为必然，于诗人的遭遇则困顿之极。结构既自然又有发展变化。“俄顷”二句写出风已止，云愈浓，深黑如墨，大雨即来。“漠漠”是一片昏暗的样子，秋天较短，很快天要黑了。《诗经》上有“风雨如晦”的句子，一个“晦”字，极善形容。这里的两句诗正是风雨

如晦的铺展。心上压抑甚重。紧接着便是“布衾多年冷似铁”，从上面两句到这一句，中间省却了许多笔墨。作诗应作到增之一句则冗，删之一句则歉。读杜甫诗，每有启示。“娇儿恶卧踏里裂”这里的“恶卧”一词，容易写出，而“踏里裂”三字很难想到，自非亲身经历过来的人难于写出。恶卧是睡相不好。冷似铁，已经不能保温；踏里裂，更是必然漏水。两句诗把杜甫自己多年来的穷困处境活现了出来。连一床完好的被盖都没有，难道这能是富裕的地主生活吗？下面四句一气直下，把大雨不住，长夜难明，不知今夜如何过得了的痛苦难忍的心情充分表现了出来。“自经丧乱”加叙了不眠的生活根由；长夜沾湿，补足了破屋、破衾的必然结果，笔力直到十分。这里的“彻”字是“彻晓”的省略语，“丧乱”指安史之乱以来的颠沛流离，也表明了诗人自来就为国事担忧，“不眠忧战伐”（《宿江边阁》），一向睡眠就少，何况长夜沾湿。茅屋为秋风所破情景，写到这里已经是淋漓尽致了。茅屋初破时的急遽之情，茅屋既破后的狼狈之状，有声之叹和无言之痛，诗人都用他饱含激情而又挥洒自如的一枝笔写了出来。真是淋漓尽致！那么，下面又将会是怎样的发展呢？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作者的世界观，所以说：“功夫在诗外”（陆游诗句）。是不断唉叹把自己紧缩在困窘之中而无以自解呢？还是故为旷达，强作欢乐，而把愁苦化为一笑呢？都不是。伟大的诗人是从一人一家的困苦中解脱了出来，不被小我的困苦所压倒；但也不是故为旷达，避开艰窘的现实生活而游神于不可知的天地之外。因为一人一家的困苦可以蔑视；而天下穷人的惨痛不容默然。诗

人是清醒、执着地盯住这亲身经受的生活，不作逃避之想，而是推己及人，化我于众，但又先人后我，进一步理会这种生活的普遍性，从而为普天下与自己有同样生活遭遇的人发出强烈盼望改变生活的呼声。而且由推己及人上升到重人而轻己，只要别人都能不惊风雨，安如泰山，自己就是受冻至死也心甘情愿。于是第四段连带结尾（共只五句）便突兀而出。“安得”一词的渴望之情，上面已经谈到。渴望什么呢？这里是渴望“广厦千万间”。诗人胸怀广博无垠，在关系到天下人居住问题的大事上，诗人既有亲身的感痛，怎会不联想到他念念不忘的天下穷人呢！“风雨不动安如山”，既“不动”，又“安如山”，是热语的强化音，热情的迸射光。从前人称杜甫为诗圣，后来也有人称之为情圣，这正是看到了诗人极其情热、情深这个基本点。杜甫这样的诗决不是只知舞文弄墨的人所能写出的。至于有人说“广厦千万间”之望是“异想天开”，其实“异想天开”也没有什么不对。问题在于为谁而忽发异想。《诗经》“适彼乐土”之句，正反映了劳动者渴望改善生活的坚强意志，只要众志成城，也不是不能办到的。这样的“异想天开”正是社会前进的一种动力。这决不同于秦皇汉武欲求长生不死之药的那种“异想天开”。那是祈求天赐而不是把希望寄托在自身力量上。照上面说来，诗人的这种“异想天开”，是与人民的命运相连。因为不管什么“广厦”“大厦”都是民众修建起来的。秦之阿房，汉之未央，唐之连昌，都是民众劳力的结晶；乃至长城、运河也是民众血汗所开出的永世之花。当杜甫之世的建筑水平已经相当高，既能兴建起那样大的建筑物，那么要作到人人有

间房子避风雨“各使苍生有环堵”也不是不可能，主要是政治上的问题。所以杜公的理想也并不是全属幻想，他自己也可能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他在寄柏学士的诗中说“何时高议排金门”，问题在于朝廷。第三段的几句诗句句紧逼，字字加重，直写到山穷水尽、无可奈何之境。第四段笔锋陡转，别出奇峰，言在蹊径之外（好像突然说到一边去了），而意在情理之中，这样大风大雨的波涛，必然要引起人们思想感情上的波澜，问题是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反应。杜甫有一句诗：“文章曹植波澜阔”（《追酬高适》），杜公本人的全部诗歌写作当然也是波澜壮阔。就是这一篇《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也自波澜不小！正因为诗人有宏阔的胸襟抱负，他的诗篇才会有巨大的笔底波澜。结尾只二句，音韵凝重。气足神完，辞达意举，上升到思想境界的最高峰。前面已经论及，兹不赘述。还有人说此诗运用俗语纯熟、自然，增加了表现力。这也当然是这个伟大作品艺术成就的一个方面。总之，这篇诗在大气包举、大开大落的运笔当中，复见精心刻画的笔触，画面鲜明，豁人眼目，意深旨远，激动人心，艺术感染力极强。这篇诗政治性、艺术性都很高，如何使它充分发挥古为今用的作用，用它来教育广大干部、民众、青少年，这是自上至下大家共有之责，也是杜诗研究者值得深长思之的一个现实问题。

1993 年秋

试析《寄李十二白二十韵》

昔年有狂客，号尔谪仙人。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
声名从此大，汨没一朝伸。文彩承殊渥，流传必绝伦。
龙舟移棹晚，兽锦夺袍新。白日来深殿，青云满后尘。
乞归优诏许，遇我宿心亲。未负幽栖志，兼全宠辱身。
剧谈怜野逸，嗜酒见天真。醉舞梁园夜，行歌泗水春。
才高心不展，道屈善无邻。处士祢衡俊，诸生原宪贫。
稻粱求未足，蕙苾谤何频。五岭炎蒸地，三危放逐臣。
几年遭鵬鸟，独泣向麒麟。苏武元还汉，黄公岂事秦。
楚筵辞醴日，梁狱上书辰。已用当时法，谁将此意陈？
老吟秋月下，病起暮江滨。莫怪恩波隔，乘槎与问津。

这是一首五言长律诗。杜甫怀念李白的诗前后共有十几首，其中五言长律只此一篇。它的写作时间，论者各有推测，当以作于上元二年（760）之说（见《草堂》总第五期王仲镛《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是哪时写的》）较为可信。即杜甫由陇入蜀，到达成都后的第二年所写。这篇怀念李白的诗正如王嗣爽所说，“分明为李白作传”（《杜臆》）。在杜甫许多怀念李白的诗中这篇作得较晚，是作于对李白传说纷纭之后，诗人对李白的近况知道得更为实在的时候。李白参加永王璘幕，本来是反对安史之乱的一种爱国行为，无

可非议（读李白《永王东巡歌》自明）；至于永王璘与唐肃宗弟兄之争则是唐王朝统治者的内部矛盾。永王璘被唐肃宗击败，李白也竟蒙受无罪之罪。世人不察，或者对李白责难，或者为李白惋惜，谣诼繁兴，疑虑莫释。只有杜甫一直是了解李白，相信李白的。他在安史之乱发生后便写过《梦李白》《天末怀李白》寄托他对李白深切关怀和为李白无比悲愤的沉挚之情。这时杜甫在成都，消息易得，对李白负屈含冤的境况知道得更多，作成此诗，其主旨是为李白辩诬，亦为李白立传，一篇诗中，李白的“生平履历备矣”（王嗣奭语）！以诗作传，正是为了显示李白一生高尚的情操和光明的行事而杜悠悠者之口，并且对朝廷有所规讽，希望朝廷对人才应痛加爱惜，陟罚臧否应公正无偏。看人要看全面，观人应观其大节，所以杜甫历举李白一生中几个阶段的大事而作此诗。诗人采用五言排律这种体裁来写，也大概因为以极其谨严整饬的这种诗体来为李白作传才更能显示堂堂之鼓，正正之旗的艺术效能的缘故。

诗篇突兀而起，举贺知章赞扬李白的話发端。贺知章自称为“四明（贺的故乡，浙江鄞县四明山）狂客”，他曾在京师访过李白，见到李白的《蜀道难》，“称叹数四，号为谪仙人”，又吟李白的《乌栖曲》说：“此诗可以泣鬼神矣！”（孟棻《本事诗》）唯狂客乃能深知狂客，李白也以狂者自居，他在《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诗中，便曾比迹卢通，自号“楚狂”；唯狂客乃能无所顾忌，发出真言，其言似狂，其义实正。故狂客之褒，荣于华袞。“谪仙人”是对李白的甚高评价，意谓降谪自天，人间罕有，这也正如《诗经·崧

高》的诗“维岳降神，生甫及申”的意思。杜甫以此发端，也正表明他对李白的倾倒和对幸灾乐祸者的蔑视。继则评定李白的诗才，“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其言虽本于贺知章，而偶句成联，十个字便横绝千古。唐李阳冰赞李白的诗“故其言多似天仙之辞”，又说“横被六合，力敌造化”（《草堂集序》），意思都差不多，但不如杜甫这两句诗精力弥满，形象昭然，而李白也当之无愧。接着以“声名从此大，汨没一朝伸”转入，写出李白早期曾一度得意的事，“文采承殊渥”以下六句都是“伸”字的注脚。文采动人主，李白得到唐玄宗的优遇，诗赋之作，如《清平调》词三章等又广为流传，无人能及。龙舟一语，即是杜甫《饮中八仙歌》所写李白“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的事。《旧唐书·文苑传》说：“玄宗度曲，欲造乐府新词，亟召白，白已卧于酒肆矣。召入，以水洒面，即令秉笔，顷之成十馀章，帝颇嘉之。”兽锦夺袍，是用初唐时宋之问以诗夺得锦袍的典故。白日来深殿，言出入宫廷之无禁，青云满后尘，言李白高置青云之上而趋附之者如后尘常满。这六句诗极写李白一时之伸以对衬后来毕生之屈。而且此所谓“伸”，也不过是一时的邀宠，龙舟、兽锦，白日、青云，无非一时的荣幸，终不是李白平生欲行其志的期冀。虽然白日深殿一语，或如《草堂集序》所说“问以国政，潜草诏诰，人无知者”，即使属实，但是宣室之对，汉文帝并未能尽贾生之才，李白的遭遇也更不如贾生。这几句诗属对甚为工巧，而其意则颇隐微，一朝之伸，不过如此，声名虽大，理想终穷，言外之意有不胜其感慨者。

其下以“乞归优诏许”二句转入李白辞离帝京与杜甫邂逅相遇情事。李白既未能遂行其志，复受权贵之谗，不得不乞求还山。承蒙优诏准许，于是乃得在洛阳与杜甫相遇。“宿心亲”见二人相重相期，为时已久，一朝得见，其快何如！“未负幽栖志，兼全宠辱身”二句关系重大。我国历史上不得行其志的有道之人，总是以“穷则独善其身”自励，不能立功则甘居草野，即使立功当世，也以“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为高。杜甫深知李白的为人，既有用世之心，复具幽栖之志，所以受谗远离，似乎不幸，但能不负幽栖之志，也便是宿志得偿，足以庆幸。至于宠辱毁誉皆身外之事，一个有道有识的人，反求诸身能无所愧怍，便足以自慰自安，能独善其身且能全其备受宠辱之身，这更是难能可贵的事。这中间有儒家居易俟命的思想也包含着道家和光同尘的精神。杜甫用这两句诗来形容李白，赞扬他，安慰他，作出论断，这是诗人在当时社会里立足点很高而发掘人生意义甚深的显示。当然其中也包含着慨叹激楚之音。其后“剧谈怜野逸”四句，运笔有峰回路转之妙，前面写的是宠辱备于一身的李白；而这里，一个天机活泼、天真无邪、嗜酒健谈、能歌善舞的狂者李白的形象又鲜明地突现出来。也点出了这两位诗人“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所在之地即今山东、河南一带地方（梁园为西汉梁孝王所修的兔园，在今商丘；泗水是流经曲阜、兖州等县的河流）。

诗人仍以慨叹之辞为结束，承上启下，尽管幽栖之志未负，宠辱之身得全，“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

(《赠李白》), 终究是“才高心不展, 道屈善无邻”。才纵高而心不得展, 道已屈而善无有邻, 所谓“德不孤, 必有邻”(《论语·里仁》)竟是虚语, 志气不得舒展, 心迹无由表明, 独行踽踽, 狂以终身, “天之报施善人为何如哉!”(《史记·伯夷列传》语)于是诗人引出了几辈古人; 展开了与李白的精神或遭遇有共通之处的历史人物的画廊。其中有三国时才高心傲, 能得名士孔融的推荐而终被黄祖所杀的处士祢衡(《后汉书·祢衡传》); 有春秋时孔门弟子, 隐居草莱, 不辞贫贱的贤人原宪(《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有远征交趾, 为国勤劳, 带回了一些药物薏苡的种子, 竟被人造谣中伤说他满载明珠而归的东汉将军马援(《后汉书·马援传》); 还有才大难用, 被贬长沙, 见不祥的鸛鸟集于屋上, 预感寿命不长的西汉青年文士贾谊(《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还有周游列国, 欲行其道, 见仁兽麒麟的被捉而自伤道穷的大圣人孔丘(《史言·孔子世家》)。李白虽然才俊如祢衡, 志大如贾谊, 终不免穷途末路, 负屈含冤, 被贬遐荒(五岭是广东、广西、江西、湖南几省交界处的一带山地, 酷热; 三危, 是逐罪臣三苗之地, 约在今甘肃敦煌东), 流放夜郎(今贵州地), “人生到此, 天道宁论”(江淹《恨赋》语)! 诗人为他的朋友李白悲痛, 也就是为天下才士之不得其志和无辜蒙罪者一挥涕泪。

关键问题还在于李白究竟是咎由自取还是罚非其罪。为此, 诗人又在他展示的画廊上添上了西汉时两个古人, 对疑虑莫释和妄加非议者作出明白的回答且以表彰李白的忠悃。“苏武元还汉, 黄公岂事秦。”汉武帝时, 苏武出使北匈奴,

被扣留十九年，苏武牧羊于北海，食野鼠，饮冰雪，终不投降（《汉书·苏武传》）。天下人都知道他原本是清清白白地回到了汉庭——这有什么可议？黄公是商山四皓之一，名夏黄公，避秦祸，隐居不出（《史记·留侯世家》），又岂肯为秦所利用？苏武、黄公，节义皎然，岂是流言蜚语毁谤得了的！而且李白的态度很明朗，从他自己的诗可看出，他有《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五言长篇，有句云：“辞官不受赏，翻谪夜郎天”足见永王璘曾欲授以官职，但被他毅然推辞了。又如李白在浔阳狱中有《上崔相百忧章》诗，上于崔涣，有句云：“冶长非罪，尼父无猜。覆盆倘举，应照寒灰”，为自己辩白，望崔救援，简直是泣血喊冤之辞。他一度获释，但不久重被判罪，流放夜郎。李白鸣冤叫屈之声，似乎穿过了长空，为留居四川的杜甫所亲闻。杜甫在这篇诗中便以“楚筵辞醴日，梁狱上书辰”二语作遥天的应答，以昭昭然明白之事、断断然无疑之辞来为李白辩护。楚筵辞醴，是西汉时穆生辞楚王刘戊一事（《汉书·楚元王传》，楚元王刘交尊重穆生，常为他设甜酒于筵上，后来其子刘戊即位，忘记设醴，穆生便辞去），以喻李白辞官不作；梁狱上书，是西汉邹阳因冤入狱，在狱中上书梁孝王以自辩一事（《汉书·邹阳传》），比喻李白本来无罪，曾用文字吁请昭雪。于是，诗人又在他的画廊上增添了两位古人。“已用当时法，谁将此意陈”一联，这是慨叹当时已对李白用法惩处，还有谁敢于冒险犯难为李白上书陈述、营救于他呢？“当时法”是当时所谓的法，不问当否，任意施行，谁还管得了呢！这一声深长的叹息，不仅显示了诗人对无罪

的朋友充满了同情之心，抑且对唐朝政府的黑暗现实作了深刻的揭露。

这一声长叹也唤起了诗人自身的凄凉之感，“老吟秋月下，病起暮江滨”。这两句诗是说诗人自己，不是说李白。地点是锦江，时间是秋季，诗人寄寓蜀都，既老且病，虽然怅望天末，长怀君子，但是空有相怜之意，却无援手之能，其痛心为何如？

但是，诗人杜甫，在自己的茅屋风雨飘摇的时候，却能推己及人，切望广厦千间，突兀出现，大庇天下寒士，又岂能仅以爱莫能助而自解。他为李白写此诗，雪诬、立传，已尽到一片真心，作出千秋公论，似乎可以已矣，但在全篇结尾处却说出了“莫怪恩波隔，乘槎与问津”这样的惊人之语。

宠辱固然值不得计较，但是非不能不弄明白，此二句既慰且励，意谓徒怪无益，要当乘槎问津，直诉之于帝阍，诗人也有为李白而叩阍之意。乘槎问津，这里不是乘桴浮海逃世之意，是古诗“先据要路津”的“津”，这里是指当权者、朝廷，诗人愿为李白剖陈于朝廷，也鼓励李白自陈，直泛仙槎，上诉官阙。当然，客观事实不会那么顺畅，但是诗人其言之壮，其情之殷，其排万难而为一友之诚悃，已足昭著千秋。

这篇诗是五言排律，前面已说到，这是堂堂之鼓，正正之旗，伸张正气，抨击邪人。全篇章句严整，情韵斐然，展示了李白光明而坎坷的一生，胜过了唐宋人所写的好几篇李白的传文。篇中胪列了许多古人，既是比喻，也是陪衬，俨

如群峰耸立，光辉灿烂，白也即在其间。一起一结都寓意深长。全诗辞精义确，决无游移之言，义重情隆，自成浩瀚之作，亦可以惊风雨而泣鬼神了！

1991年

一言为智 千载犹新

——谈杜诗《送陵州路使君赴任》

王室比多难，高官皆武臣。幽燕通使者，岳牧用词人。
国待贤良急，君当拔擢新。佩刀成气象，行盖出风尘。
战伐乾坤破，疮痍府库贫。众僚宜洁白，万役但平均。
霄汉瞻佳士，泥涂任此身。秋天正摇落，回首大江滨。

杜甫的五言排律诗共有 118 首，以 6 韵、8 韵、10 韵的短篇排律为多。元微之所说的“大或千言，次犹数百”，实际“千言”的只有一篇，大量的排律是 6 韵、8 韵、10 韵即“一百言”以内的短篇。杜甫入蜀以后，所作排律渐多，而长律大篇大都是到夔州后所作。足见诗人入蜀后有意地对排律这种诗体多多制作，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来探讨其特性，显示及作用。诗人所作排律无不运斤成风，举重若轻，其短篇诸作更是广泛应用，挥洒自如，兼具严整潇洒之美。以五排为送行赠人之作入蜀后这种诗也多。《送陵州路使君赴任》8 韵即其一篇。这篇诗朴质无华，似乎不易为人注目，前人评杜诗者如王嗣爽《杜臆》、施鸿保《读杜诗说》、郭曾炘《读杜札记》等皆篇议题论，但是都没有提到这首诗。可见它容易为人所忽略。《杜诗镜铨》引邵子湘的评语，“杜此等

诗不必尽有警句，要是深浑难到。”说得很好。此诗无耀眼的光采，意深气浑，于平实中见力量，洵为杜诗五排中的一种代表作。但如“众僚宜洁白，万役但平均”二语，又何尝不是一言为智，千载犹新。今天来读它尤其感到有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

此诗作于唐代宗广德元年秋天，诗人时在梓州。国乱未靖，蜀难不已。这诗是送路使君赴陵州（今四川仁寿县）作官，“使君”在唐代是刺史之称，是地方重臣。对官言官，诗人不作泛泛酬应之辞。立意甚高。亦足见诗人所望于“民之父母”者至殷。

起联概示了玄宗、肃宗时期用人之失，“王室比多难”，“比”为较近之时，因朝廷多难而依赖武臣，卒成尾大不掉之势，形成藩镇跋扈，各据一方。于是“高官皆武臣”，擅军政大权。旧注说“是时诸州久屯军旅，多以武将兼领刺史，法度废弛，人甚弊之，故有高官皆武臣之叹”（朱鹤龄）。此诗一起即是诗史之笔。次联转至当今，“幽燕通使者”，指安史之乱初平，河北已收复，杜在一年前曾写《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一诗，此时已可通使于幽燕，朝廷政令能达。当此之时，朝政有所更新，乃有“岳牧用词人”之举。尧舜时有四岳十二牧之说，后用为疆吏之称。以文臣为地方大吏，国事有望，诗人欣慰之情溢于言表。浦二田谓起四句“综括玄、肃、代三朝之局，令千载了然。读史历数册，不如此四语也。”实在是很有见地之谈。正因朝廷有惩前毖后之意，乃能行抑武重文之策。在这种改弦易辙的情势之下，路君才得被擢用为陵州刺史。故诗人接着说“国待贤良急，

君当拔擢新”，写出了国家需贤的急切，也显示出诗人急国家之所急的忧时望治之情，为国事庆，也为新当拔擢的路使君庆。“一片花飞减却春”（杜诗《曲江二首》），令人凄其；而一枝花发也不能不使人产生天下皆春的热望，老诗人情见乎辞，十字千钧。愉悦之情与殷切之望相结合，于是写出一联“佩刀成气象，行盖出风尘”。此为壮行色且表重望之语，佩刀来自王祥的故事。王祥是西晋第一流大臣，《晋书》卷三十三王祥本传后面的《王览传》所说：“吕虔有佩刀，工相之，以为必登三公，可服此刀。”吕虔自以为非公辅之量，便以刀赠王祥，“祥固辞，强之乃受”。杜甫用此典甚恰，气象光昌。行盖即指作官者的车盖，车盖出于风尘，意谓蜀乱频仍，风尘拢攘，使君出风尘之间，膺当重任，当大有所为。一则以喜，一则以惧，诗人接着指出了当时形势可忧之处，“战伐乾坤破，疮痍府库贫”。战争给社会造成乾坤破乱的巨大灾难，疮痍满目，民穷财尽。于是“穷年忧黎元”的老诗人针对这种客观现实，更为路使君进一言，对他提出具体希望：“众僚宜洁白，万役但平均”。这两句诗应当说是这篇送行诗的主旨所在。”仇兆鳌注云“当洁身以率属，平役以爱民”，杜公用意，大抵如此。所谓洁白，主要还是说廉洁率属之意，“己不能正，焉能正人”。“哀哀寡妇诛求尽”（杜诗《又呈吴郎》），再不能剥民如剥粽（杜《桔粽》诗意）！必须持身洁白，以厉僚属，才能稍纾民困、安民生。万役指劳役、军役等，必须公正持平，才能稍恤民力，活民命。看起来无甚高论，实际都是居官为治的根本大计。诗人当时是如此，1000多年后的今天又何尝不是如此。虽然杜

甫当时意在维护、巩固唐王朝的统治，欲其不坠，但一片为民纾困，为民请命之至情已充溢于字里行间。今天我们正在厉行廉政建设，虽然我们今天的政治目的大大超越了古诗人，但是实行廉政的基本精神与要求也与杜甫的诗意无殊。

杜甫赠人之作，对于“为民上者”都各有殷切的期望，归结于爱国爱民。在送路使君之前一年，送严武入朝有诗，其结句云：“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直以大义相要。王嗣爽云：“公与严公交契厚矣，十韵不及私情，而结以‘临危莫爱身’，道义之交如此。”在送路使君之后，赠王契侍御也有诗，长达40韵，有句云：“要闻除猘獠，休作画麒麟。”《镜铨》注云：“上句勉其立功，下句戒其尸位。”又送高常侍云：“今日朝廷须汲黯”。汲黯乃汉武帝时直臣，汉武帝称之为“社稷之臣”。杜公深感自己生平的政治理想和抱负未能实现，唯有寄希望于国之重臣以及地方官吏。故每当送人入朝或赴任时，无论亲疏，总是或显或隐、或直或婉地通过所赠诗篇而致其恳切期望之至意。故读送路使君诗而联想及诗人在蜀中的其他赠送之作，当更可窥见我们敬仰的诗人其爱国爱民的一片苦心了！今天我们在厉行廉政建设当中来读杜甫这篇诗，更感到亲切和深可玩味感到它是千载犹新。

篇末两联，自是谦己而尊人，感物而寓意。“霄汉瞻佳士，泥涂任此身”。身在泥涂，哪还有什么作为，“诗酒尚堪驱使在”，也只有任运而行；瞻佳士于霄汉，或当大有作为，也可引以自慰了。“秋天正摇落，回首大江滨”。点出了季节和地方，感慨万端，余情不尽，“篇终接混茫”，读者当于反复咏诵之中而有所自得，此诗首四句起，末四句结，中间八

句为腹心，尤以“众僚宜洁白”，一联，至为重要，是诗人最想大声疾呼者。因为如果没有此一联，其他的话都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此诗写出了为国家得人庆，为路使君得官庆，但所当庆的焦点，正在于相信路使君能作到众僚洁白、万役平均，也勉励他能够作到。所以此一联为全诗的重心所在，一言为智，迥异寻常。“一洗万古凡马空”（杜甫《丹青引赠曹将军霸》），我于杜公的这首排律8韵也作如是观。

1993年8月

一往情深，千秋论定

——读杜甫吟咏诸葛亮的诗

“诸葛大名垂宇宙”。自汉末迄今，评论诸葛亮的文章和诗歌极多。从诗歌说，以唐代伟大诗人杜甫歌咏诸葛亮的诗篇数量既大，质量又高。杜甫以人物为题材的诗歌，同时的人，他怀念李白的诗最多；而不同时的历史人物，则他怀念诸葛亮的诗最多。杜甫之于李白声气相通，交谊素重，同为当时出类拔萃的诗人，倾慕爱惜，发为诗篇，篇目既夥，情感至深，这是比较容易理解的。杜甫之于诸葛，生不同时，政事、文学又各异其途，但他对诸葛亮景仰、向往，评价至高，长言短咏，篇什特多，以一往情深之作，见千秋论定之功。我读杜甫的诗，常常感到杜甫对于古人或时人的评价，至为公正、忠厚、恰当、深刻，他既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也是一个伟大的评论家，例如他对于屈原、宋玉、王昭君、曹植、庾信、陈子昂、初唐四杰以及《八哀》诗中所写人物等皆是；写诸葛、李白的诗，尤其可见。他对于诸葛亮为什么比对历史上的任何人物更有不同，屡见于吟咏，又皆刻意精心而成千古独步之作呢？这确实是很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

杜甫吟咏诸葛亮的诗篇或涉及诸葛的诗句，略以作诗的时间先后分，有下面这些：即《遣兴五首》之一、《蜀相》、《登楼》、《武侯庙》、《八阵图》、《谒先主庙》、《诸葛庙》、《古柏行》、《夔州歌十绝句》之九、《咏怀古迹五首》之四及之五、《上卿翁请修武侯庙遗象缺落时崔卿权夔州》等12首。其中《登楼》与《古柏行》，或为感怀所系，或为比喻所主；《谒先主庙》与《咏怀古迹五首》之四，咏先主必连及武侯，不可分，所以都应当算作吟咏诸葛的诗篇。涉及诸葛的诗句有“得兼梁父吟”（《登历下古城亭，亭本北海太守李邕作》）、“诸葛亮贵和书有篇”（《赤霄行》）、“凄其望吕葛”（《晚登灊上堂》）、“诸葛蜀人爱”（《八哀·赠左仆射郑国公严公武》）、“管葛本时须”（《别张十三建封》）、“孔明多故事”（《承闻故房相公灵柩自阆州启殡归葬东都有作二首》之一）等。

杜甫之所以怀仰诸葛，屡见吟咏，必须从唐朝当时的政治形势结合诗人一己的理想、遭遇来探索，我以为诗人的用心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诗人景仰唐代开国之君唐太宗，深体太宗称美诸葛亮以为唐朝丞相树立楷模的旨意而见诸吟咏。这就是说诗人的屡称诸葛是他十分尊重太宗称赞诸葛的指示而通过自己的诗篇来扇扬、阐发。自陈寿、常璩、习凿齿以来，史官宣扬诸葛的德才者不一。一国之君赞美诸葛者如晋简文帝的遗诏，欲其子之对桓温应如刘后主之专任诸葛亮；前秦王苻坚

得王猛，自谓如刘玄德之遇诸葛孔明，但都没有对诸葛亮作出具体评议。唯有英明之主唐太宗，却对诸葛亮作了中肯的评论，据唐玄宗时吴兢所编《贞观政要》载：^①

贞观二年，太宗谓房玄龄曰：“臣比见隋代遗老，咸称高颀善为相者，……又汉魏以来，诸葛亮为丞相，亦甚平直，尝表废廖立、李严于南中，立闻亮卒，泣曰：‘吾其左衽矣！’严闻亮卒，发病而死。故陈寿称‘亮之为政，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卿等岂可不企慕及之？朕今每慕前代帝王之善者，卿等亦可慕宰相之贤者，若如是，则荣名高位，可以长守”。（《贞观政要》第十六）

《全唐文》卷十也载此文，题为《诸葛亮、高颀为相公直论》。按太宗此论虽以高颀、诸葛并称，但重点在诸葛。这篇短论实为帝王推尊诸葛并以之作为臣范，且以昭示后世的第一篇文章。杜甫忠于唐室，敬爱太宗，在他的诗卷中如“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北征》），及《行次昭陵》、《重经昭陵》两篇长律，都备见尊崇景仰之情。诗人师太宗遗训的精神，宣圣意以立臣节；又当他来到四川之后，诸葛的流风余烈犹有存者，所以流连往复，题咏诸葛的诗篇独多。诗人尊太宗旨意而咏诸葛，他是有此深衷的。

二是诗人身丁时艰，夙有抱负，景慕诸葛，欲以为师，向往之情隆，“窃比”之意挚，既咏诸葛，亦抒怀抱，这也是杜甫咏赞诸葛诗篇既多且好的一个原因。借写诸葛来写自己，也是他写作目的之一。孔子常梦周公，孟子欲学孔圣，其后韩昌黎又以孟为师，王安石以诗见志，也有“他日若能

窥孟子”之意。递相祖述，读其书，论其世，师其人，后先仿效，这本是中国历史上士大夫的优良传统。杜甫是一个非常虚心的人，他“转益多师是我师”，对诸葛尤为倾慕。杜甫早年就自比稷契，有“致君尧舜”的宏伟理想，以诸葛为师，有窃比之意，这是很自然的。杜与稷、契时间距离甚远，与诸葛时间距离则甚近，远难稽而近易微，所以诗人对诸葛一生行事，颇有研讨，发为诗篇，语语中的，迹相近，情相通，乃能深知诸葛，发千古论定之言。诗人在很大程度上写诸葛也就是在写自己。杜甫咏诸葛的诗，不仅《遣兴》实为“咏怀”之作，其他各诗也都可作“咏怀”观。王嗣爽早已有见及此，他说：“公平生极赞孔明，盖有窃比之思。”（《杜臆卷七·古柏行》）又说“武侯伊吕之俦，当时未尽其所长也。……公自许稷、契，而莫为用之，盖自况也。”（《杜臆卷八·咏怀古迹五首》）皆深得杜公之心。按杜甫的自况于诸葛，约有几个方面，既以自励、自慰，亦以自伤。杜入川以后，依托严武，本欲有所作为，决不是但谋温饱，聊作闲居，观杜甫寄赠严武诸诗，如“济时敢爱死”（《奉送严公入朝十韵》），又如“尚想趋朝廷、毫发裨社稷”（《客堂》）可知。张戒《岁寒堂诗话》曾说：“少陵在布衣中，慨然有致君尧舜之志，而世无知者，虽同学翁亦颇笑之，故‘浩歌弥激烈’‘沉饮聊自遣’也。此与诸葛孔明抱膝长啸无异。读其诗，可以想其胸臆矣。嗟夫，子美岂诗人而已哉！”“岂诗人而已”的杜甫，在《古柏行》中既赞美孔明君臣遇合，又叹其不能尽其用，也借以自伤。但“香叶终经宿鸾凤”、“志士幽人莫怨嗟”等语，其励己励人、慰己慰人的意思也很显

然。

《登楼》一诗，寓意遥深。此诗通篇写自己的孤怀卓识，忧深而气壮，末语点出诸葛，叹其只能日暮聊吟梁甫也正是表明自己寄寓蜀川，一筹莫展，也唯有如王粲的登楼自伤，学孔明的吟梁甫自遣而已。宋代诗人陆游，他深知杜甫本来是像诸葛亮那样颇有抱负也很有才干的政治家、爱国者，决不是仅仅一个诗人，他在《思夔州》一诗中就径直地把诸葛与杜甫并举，说“略无人解两公心”。杜甫之所以屡咏诸葛，也正因为自己常常是心有期冀和郁结，浩歌激烈，往往借诸葛而一发。

三是诗人欲以诸葛亮的崇高形象来勉励唐朝当时诸大臣和自己的诸故旧。唐室多难，蜀中亦不安，杜甫之所以在许多诗篇中热情颂扬诸葛，也就是他热诚地希望当时能有诸葛亮这样的大才出现，以济时艰；蜀中能有步武诸葛的人安定西南，进而戮力王室，措安中国。这也是他对严武、裴冕诸故旧的殷切期望。杜甫并不是认为唐室无人，玄、肃之际的大臣无一人能比美诸葛，他对于国有功、深得民望的唐朝文武大员也是倾心祝祷的。如《洗兵马》中的“二三豪俊为时出，整顿乾坤济时了”这些热情洋溢的诗也决不是泛泛颂美之辞。但是求能如诸葛亮那样君臣共济，贤圣同时、公忠体国，鞠躬尽瘁，能“与伊、吕争俦”的宗臣，确实是迥乎其难。瞻望两川，尤其没有能够遥继诸葛、大有作为的人。诗人缅怀诸葛，更有“才难”之叹。但他还是以诸葛亮的形象来期望于人，冀有其人。杜甫入蜀，已达汉州时所写的一首《鹿头山》诗有句云：“冀公柱石姿，论道邦国活”，对裴冕

属望甚殷。杜甫之于严武更抱有极大的期望，如“四海犹多难，中原忆旧臣”。“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奉送严公入朝十韵》）。其《奉待严大夫》云：“殊方又喜故人来，重镇还须济世才”。此诗作于广德二年，诗人在阆中听到严武再镇剑南的消息时所作。这些诗虽然没有明白提出希望严武等人效法诸葛，但从诗人咏怀诸葛的好几首诗看来，其用词用意，和他寄赠诸故旧的诗多有相通相近之处，可以规知。至其《八哀》诗中赠严武一首有句云“诸葛蜀人爱”，严武歿后以诸葛比而颂之，则在严武生前杜甫以诸葛重望于他也是很明显的。注家以为严武在蜀，唯有破吐蕃、收盐川为当时第一功，认为以诸葛比严武也不为过。杜甫有一首《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诗，诗人亲自听到农村父老赞美严武，“语多虽杂乱，说尹终在口”，他也深感欣慰。“诸葛蜀人爱”，严武能得蜀民之爱，杜甫也就写了这篇著名的诗。

二

读杜甫咏诸葛亮的许多诗，深感他对诸葛的评论至为精当，他的诗笔亦即史笔，一词一句皆褒其所当褒，不作空泛颂美之辞，语语都有所本，有所指；也不作依违两可之语，句句话都带有论断性质，有自己异乎寻常议论的独特观点。应该说杜甫是以良史之才成绝妙之诗。自有咏诸葛的诗以来，无人能够超越杜甫。杜甫咏诸葛的诗识见高超，辞采典瞻，一言片语也感人至深。寻绎杜甫赞扬诸葛亮的地方其主要的约有数端：

一为刘备与诸葛亮君臣间鱼水相得，精诚相孚的亲密关

系。封建帝制的君臣关系，很难作到两无猜忌，君专任无移，臣效忠不二；往往是“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即如唐太宗《诸葛亮、高颀为相公直论》（《全唐文》卷十）一文中与诸葛亮并举的高颀，初为隋文帝所倚，“委以心膂”，颀常坐槐树下听事，其树不成行列，有司将要伐树，文帝“特命勿去，以示后人”，其见重如此。“三军谄慕，皆取断于颀”。虽被谗间，而“亲礼愈密”。但是后来仍遭猜疑，至被囚禁，“除名为民”；最后炀帝即位，以高颀谤讪朝政，下诏诛之，“天下莫不伤惜”。像这样的史事是太多了。也有这样的君臣，表面上关系很好，保全始终，但君则乾纲独断，臣则唯阿取容，溷迹宰辅，伴食而已。唐朝在玄宗晚期和肃、代之际，或者任非其贤，李林甫、杨国忠败乱天下，或者贖非其罪，房琯、李光弼含恨以终，像这样的事诗人也是看得太多了。所以诗人在《遣兴五首》中早就明著其词：“嵇康不得死，孔明有知音。”为嵇康悲，为孔明庆，知音难遇，尤在于君臣之间。“大哉霜雪干，岁久为枯林”，臣不得其君，虽挺霜雪之姿也不免终为枯林。又在《诸葛庙》中说，“君臣当共济，贤圣亦同时”，在《古柏行》中说，“君臣已与时际会”，一再兴感，其赞美和歆羨之情，彰彰可见。蜀中人民也深仰昭烈与武侯君臣关系之难得，故有昭烈祠庙的地方总是同祀武侯；有武侯祠堂的地方也总是昭烈并祀，二者几不可分。于此可以谛见蜀民之心，也可以深思昭烈、武侯的君臣关系了。诗人也就把这一情况表而出之，形于吟咏，“一体君臣祭祀同”（《咏怀古迹之四》），深赞其君臣之如一体。“忆昨路绕锦城东，先主武侯同閼宫”（《古柏行》）都是情萦

意绕的唱叹之声！难能可贵。诗人抚今思古，尤感其难，所以在昭烈与武侯亲密的君臣关系上大书特书，也借古以喻今。

但是关系的亲密，终始的信任，并不等于任何意见都一致。刘备与诸葛亮也有意见不合的地方。其大事是，诸葛的战略路线是联吴灭魏，隆中之对，早有决策，但先主不忍于关、张之被戕，骄兵伐吴，一意孤行，卒致猇亭之败。后世论者，多致惋惜之意，清初王夫之说得很好“伐吴之举，诸葛亮曰：‘孝直若在，必能止主上东行。’公之志能尽行于先主乎？悲哉！公之大节苦心，不见谅于当时，而徒以志决身歼，遗恨终古。宗泽咏杜甫之诗而悲惋以死，有以也夫！公之心必欲存汉者也，必欲灭曹者也。不交吴则内掣于吴，而北伐不振，此心也，独子敬知之耳，孙权尚可相谅，而先主之志异也”（《读通鉴论》卷十）。王夫之还以为刘备的信诸葛不如信关羽，而且不如孙权之信鲁肃，对诸葛还是有所疑。王船山自然是有所见，但通观刘备与诸葛之交，其君臣关系总的说来是亲密的。说关系亲密也是相对而言，并非一无间然。杜甫还是有见及此，他在《八阵图》这首小诗中却发表了大议论“遗恨失吞吴！”以刘备伐吴为非，致遗诸葛终身之恨，按《八阵图》诗，自来有好几种解说，自以苏轼之说（见《东坡志林》）为当，合于杜甫本意。杜诗《咏怀古迹五首》之四咏刘备，首联是“蜀主窥吴幸三峡，崩年亦在永安宫”，窥吴即崩，造成不可挽回的失利，细玩诗意可见。至于白帝城临终的顾托，说者不一，王夫之云“先主之疑，盖终身而不释”，要说完全无疑，当然也未必；必说托

孤是一种权术，也不免是臆度之词，从整体而言，先主与诸葛的关系应当说是精诚相孚的。杜甫正是从刘备与诸葛之交的全部过程看，从大处着眼，从历史的比较而论，并以蜀汉两朝的具体事实为依据，赞扬其君臣相得的关系且为之讴歌。

这里还应指出的是，诸葛不仅得于君也得于民，杜甫“诸葛蜀人爱”一语可尽之。《三国志·诸葛亮传》：“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犹在耳，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远譬也。”浦二田读杜诗《蜀相》引《方輿胜览》云：“武侯初亡，百姓遇节朔，私祭于道。”这也说明武侯能爱民而深得民爱，杜甫对此也是热情地形于歌咏的。

二为诸葛亮忠于事业，至死不易其节的崇高品格。这也是杜甫对诸葛所作评论的又一重要方面。杜甫本人便是一生忠君爱国，其实质是忠于自己窃比稷契的理想，虽然不得于时，但此物此志，至死不衰。唯其如此，杜甫乃能深知诸葛之大节，为诸葛一生行事所感动，有息息相通的心灵，才有念念不忘的咏赞。《蜀相》一诗是诗人初到成都时所作，概括了诸葛的生平。论定了诸葛的功绩与节操。^②“三顾频频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千古以来，口不绝吟。论者对于上句尚无不同之说，对下句则有不同的解释，各执一辞。一般都把“两朝”解作先主与后主，但也有人解作汉高祖与汉光武。例如王嗣奭便持此说。他说“论老臣之心，直欲追光武之中兴，恢高祖之鸿业，如两朝之开济而后已”，我以为杜诗此句中的“两朝”还是以指先主和后主为当。盖“三顾频频天下计”言刘备与诸葛相交之始，“两朝开济老臣心”

言诸葛之佐刘直至终了，开济乃开基济美之意。两朝开济弥见老臣之苦心。若然，则杜甫此诗正是评定诸葛功绩甚伟而节操不易，与那些二三其德、中道易守者大相径庭。《武侯庙》诗：“犹闻辞后主，不复卧南阳”其意更明。《仇注》引朱鹤龄之评，说“武侯为昭烈驱驰，未见其忠；唯当后主昏庸而尽瘁出师，不复有归卧南阳之意，此则云霄万古者耳。”较能得少陵诗旨。《三国志裴注》引袁准的话早就说过：“及其受六尺之孤，摄一国之政，事凡庸之君，专权而不失礼，行君事而国人不疑，如此即以为君臣百姓之心欣戴之矣。”杜诗又云“志决身歼军务劳”，志决，即是志不可夺；身歼，即是死而后已。诸葛辅刘，两世不改其忠，这也就是他严于操守，忠于事业，义无反顾，大节凛然。杜甫在《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中自言其志，深有感慨地说：“非无江海志，潇洒送日月”、“终愧巢与由，未能易其节”。杜之不能“潇洒送日月”，正与诸葛之“不复卧南阳”其心相同，都是“未能易其节”！

三为诸葛亮深谋远虑、奇才盖世的雄伟智略。这也是杜甫评定诸葛亮的一个重要方面。杜甫《咏怀古迹五首》之五“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肖曹”一联已可当一篇诸葛传赞。杜甫以为诸葛的才德固在伊吕之间而肖曹何能及！杜诗此一联已论定了诸葛亮在历史上应有的地位，侔孔明于伊吕，晋张辅《名士优劣论》已有此见。张辅说：“夫孔明包文武之德，刘玄德以知人之明，屡造其庐，咨以济世，奇策泉涌，智谋纵横……孟子曰‘闻伯夷之风，贪夫廉’。余以为睹孔明之忠，奸臣立节矣，殆将与伊吕争俦，岂徒乐毅为

伍哉！”（《艺文类聚》卷二十二）伊尹、吕尚的地位几与周公相近，孟之称伊尹为“圣之任者”，司马迁谓“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谋计居多。”杜承张辅之论以评诸葛，其“伯仲之间”一语较张辅之言更为明达。后之论者，对此没有什么异辞。宋刘克庄说杜甫此诗把“诸葛济之伊吕伯仲间，而以肖曹为不足道，此论皆自子美发之，考亭、南轩，近代大儒，不能废也。”其说甚是。“指挥若定”固不仅指“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不仅就军事上的指挥而言。特别是在先主崩殂之后，诸葛力任国政，宏纲细目，皆若预定，至于用兵布阵，自然是井井有条，致令司马懿行其营垒，观其遣事，也不得不赞为“天下奇才”。观陈寿所评“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袁准所论“亮之治蜀，田畴辟，仓廩实，器械利，蓄积饶，朝会不华，路无醉人，”种种善政，都是指挥若定，深谋远虑。杜甫以“指挥若定”一语来概括、标举，寥寥几个字所蕴含的意义是很多很大的。《八阵图》的“功盖三分国”诗句也与“指挥若定失肖曹”相为补充。“功盖三分国”是作横的比较并世无与其俦；“指挥若定失肖曹”，是作纵的比拟，与伊吕相伯仲。杜甫《古柏行》云：“大厦如倾要梁栋，万牛回首邱山重”。栋梁之材，邱山之重，诗人对诸葛之景仰至矣！

关于诸葛亮之北伐，历来论说纷纭。赞之者以为诸葛尽其力而为之，天假以年，未必不可胜。惜之者以为孔明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尽人事而已。今略举两家之说：宋叶适论诸葛亮有云：“夫以孔明之智，非不知其不可也。且天下之

心已去汉而安为曹氏之臣矣，虽其子孙，安得而强之！而况于徒托其义以为名者乎？……而今年出师，明年出师，驱其民于必死之地以求不可必之功此何为者耶？”（《水心别集》卷八）叶适以为孔明有三代君子之资，不幸不遭其时，借兴汉之名以自见，故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然唐尚驰则以为“使武侯常存，殷若二敌国，胜于本朝百万之师，北向争衡，司马懿复惕息而不敢战，足明中原非曹丕所有也。”（《唐文粹》卷五十五尚驰《诸葛武侯庙碑铭》序）观杜甫“出师未捷身先死”诗句，也偏重在设使诸葛不死未必不可捷。当时魏君臣有猜忌之心，司马氏畏蜀如虎，诸葛指挥若定，后方安谧，则胜败固未能定，事在人为，岂可断定诸葛的北伐为毫无意义之举？故杜甫之见差胜。又，帝蜀帝魏，说亦多端，杜甫并不斤斤于此，其云“运移汉祚终难复”，盖承认事实，先主既以绍继汉室为名而称帝于西蜀，诸葛复以讨贼为本身职责而六出祁山，义自正大，但志决身殁，其身先陨，则汉祚终难恢复，深可叹惜。不以成败论人，也并不是从蜀汉为正统的观念出发而称美，这也是比较恰当的。后人又何可引杜甫的诗而证成其蜀汉必为正统之说？

杜甫咏诸葛的诗，情感既炽烈，识见亦高超（按唐裴度所作武侯祠堂碑铭的序言中所举武侯的四个方面，杜甫咏诸葛的诗中都早有所论）。诗人以乾元二年十二月底来到成都，次年春即访游丞相祠堂作《蜀相》诗，此后屡见于题咏，屡系念于武侯祠，“久游巴子国，屡入武侯祠”（《诸葛庙》），“武侯祠堂不可忘，中有松柏参天长”（《夔州歌十绝句》之九），固已情见乎辞。诗人以光芒万丈的诗篇，画出了诸葛

孔明的崇高形象，特别是“万古云霄一羽毛”一语，自时间、空间言之，万古为不尽的时日，云霄为不尽的空间，在茫茫不尽的时空之中，乃有此一片羽毛，至高至洁。这也就是千古一人的意思。庄周有言：“计四海之在天地之间也，不似垒空之在大泽乎？计中国之在海内，不似稊米之在大仓乎？号物之数谓之万，人处一焉……不似毫末之在于马体乎？”（《秋水篇》）杜甫这句诗也是这个意思，但诸葛崇高的形象是万古云霄仅此一羽，所以又推尊之极（按此诗另有以威风一羽为解者，可参）。诗人评定了诸葛开基济美的丰功伟绩，揭示了诸葛力任艰难的苦心孤诣，而且诗人在一些疑难问题上都以他的诗篇显示了令人信服的论断。并为诸葛也是为天下后世像诸葛这样的悲剧人物、英雄豪杰倾泻出一腔热泪，“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使历史上受屈含冤、生遭不幸的有志之士引起强烈的共鸣。杜甫的诗卷长留天地，最好诗篇也易于家传户诵，杜甫吟咏诸葛的诗传千万人之口，入千万人之心，这也就使诸葛亮的形象更加丰满，更为人所了解和喜爱。

杜甫吟咏诸葛的许多诗既是一往情深，而且对于诸葛也是千秋论定。这里借用《咏怀古迹》中的一句诗，“武侯祠屋长邻近”，自唐以来，在成都的工部草堂与丞相祠堂也相去不远，愈觉其后先辉映，光照千古；他们不同时而同心，益令人无限景仰。

1986年1月

注：

①清张澍所编《诸葛忠武侯文集》，征引历史资料较多，但唐太宗之论失引。

②参见拙著《万古云霄一羽毛》一文。

万古云霄一羽毛

——读杜甫诗《蜀相》

杜甫在四川所作的诗数量不少，名篇很多，其中《蜀相》一诗，把诗人的思想感情表现得极为深刻。它的内容主要是怀古，并借古以喻今。作出了通观古今、以古为鉴的良例，写出了古与今的同声一慨。这首诗是：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
三顾频频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蜀相》作于唐肃宗上元元年，即公元760年。那时正是杜甫经历了“安史之乱”，写过了《奉先咏怀》、《北征》和“三吏”、“三别”等伟大政治诗篇之后，也是他长期播迁，不遑启处，最后由同谷而举家移蜀，在成都稍得安居之际。急剧变革中的社会动乱生活和充分暴露出的唐王朝腐朽本质，给予诗人以巨大的刺激、磨练和教育，使他更清醒地观察和对待社会现实，更担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也更为广大人民的痛苦生活而深表同情。正是在这个时候，他于公元759年十二月从甘肃的同谷县来到四川成都府，那已是岁暮残年了。

从作诗的时间上看，似乎杜甫定居草堂，稍作料理之后，第一件事就是要趁着烂漫春光去寻访三国时代西蜀丞相诸葛亮的祠堂。这首诗的头两句“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用自问自答的语句，一开口就提出“丞相祠堂”四个字，语气庄严而仰慕之情可见。“何处寻”，反映出了急欲寻得的心情。这不仅是诗人欲从前哲的踪迹来探寻，而更是想从往古的盛衰而求索；无心学扬雄的解嘲，^①有意师诸葛的用心。“锦官城外柏森森”，写远远望见了的祠堂景色，林木茂盛，气象肃穆，诗人喜悦之情也溢于言表。“何处寻”，见蓄之已久；“柏森森”，表望之弥亲。情景相融，浑然不可分。

起联是远望，第二联便是近观。“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这是写丞相祠内的景物，着墨不多，既画出了初春时候庙宇内的庭院风景，色彩鲜明，也显现了祠堂里的宁静气氛，引人动思古之情。一个“自”字，一个“空”字，使人如闻诗人慨叹之声。碧草春色，映衬着闲阶；黄鹂好音，隔藏于密叶，眼前的景物是美好的。但是，思古，却不见祠堂主人的容颜；观今，又只见四郊戎马的纷驰。抚今思古，这“春色”和“好音”与乱离的社会和自己寂寥的心情是多么的不相称啊！这两句已收烘云托月、借景抒情之妙。由此音调益高，更是直抒胸臆，直论古人。“三顾频频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这第三联的十四个字，可以说是对诸葛亮一生中政治生活和满腔忠愤之情的高度概括。

“频频”是连属的意思，与下句的“开济”成对，都是

并列结构的词。“开济”是开基济美^②之意。刘备接连三次顾问诸葛亮是为了同定天下大计，志气不凡；而诸葛亮在几十年间实行在隆中所定之策，辅佐先帝刘备开基于前，又扶助后主刘禅济美于后，真是掏尽了老臣的一片忠心！

杜甫的怀古之作，无不是借古以观今。《蜀相》是怀念诸葛，也是感慨唐朝。唐自安史之乱以来，地方藩镇大臣逐渐跋扈自雄，各怀异心。杜甫到四川不久也就感到蜀中的局势并不比其他地方好，深可隐忧，唐朝大一统的局面岌岌可危。诗中所说的“天下计”正表现出了他希望当世能够有像诸葛亮那样的济美之才出而“整顿乾坤”。从杜甫入蜀前后的许多诗中可以看到诗人对他所崇敬的几位大臣和老友评价很高，属望甚殷，有些诗句简直比他们为诸葛孔明或谢安石。例如悼念房琯诗的“孔明多故事，安石竟崇班”，又如《别房太尉墓》诗的“对棋陪谢傅”，《奉待严大夫》诗的“殊方又喜故人来，重镇还须济世才”，《奉送严公入朝》诗的“四海犹多难，中原忆旧巨”，《八哀诗·严武》的“诸葛蜀人爱”。可惜这些一往情深的为国家重爱人才和责望贤者的至意，都扼于时势而不免落了空！

末联承前而更高昂，声裂金石，泪洒苍昊。“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既是叹古，又是忧今。诗人不仅对他所景慕的诸葛武侯挥洒了一掬同情之泪，也对同时代的有志之士深抱隐忧。处于那样的昏暗朝廷之下，他们往往是长才莫展，壮志难酬，岂不是深可悲痛的吗？

“未捷”和“先死”，集中地写出了死非其时，死不瞑目的遗憾。人固有一死，但死在应捷而未捷之先，能不悲痛？

“长使”和“泪满”，又概括地写出了对古往今来一切英雄人物，尤其是有志莫遂的英雄人物的同情与共鸣。泪为诸葛亮流，也是为一切类似的历史悲剧而流。

自古论人论世的好诗句，往往会超越时间的界限，具有广泛的历史意义。《蜀相》末联，这迸发而出的悲叹之声，特别震撼着在长期封建社会里一心为国家民族建功立业，却受扼、含冤而一筹莫展或成败垂成的志士仁人之心，成为他们同声悲叹的共同的语言！

事实正是如此。就在杜甫作《蜀相》诗后的四十几年，唐顺宗时永贞革新的领袖人物王叔文，当他深感顺宗皇帝不可辅、事已不可为而忧心如焚时，他口无他语，只是朗吟着杜甫这两句诗：“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③又如在360多年后，屈辱的南宋王朝时期，龙图阁学士、知开封府，坚决抵抗金人侵略的民族英雄宗泽，由于投降派的阻挠，事不可为，他又“疽发于背”，命在旦夕，他召集众位将官议事，作了一番部署和勉励。在送走诸将之后，他独自一人长声叹息道：“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④

诗人这些如生铁铸成一般的诗句，以及“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等等，都有着巨大的历史意义和感染功能，掷地作金石声。

杜甫吟咏诸葛的诗不少，如《咏怀古迹》中的“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肖曹。”对诸葛的评论甚允。又如《谒先主庙》中的“杂耕心未已，欧血事酸辛”和《古柏行》中的“落落盘踞虽得地，冥冥孤高多烈风”，对诸葛的叹惋极深。后来的李商隐、

温庭筠、杨升庵等诗人也都写了些有关诸葛的好作品。但是从俯仰今古，感慨万端，沉痛独绝说来，杜甫的《蜀相》诗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杜甫诗中的丞相祠堂，即是今天成都的武侯祠所在处。祠内诸葛亮殿的殿壁上有一通《蜀相》诗的大石碑，是清代周厚辕所书，书法学唐代颜鲁公。众多游人往往在这个诗碑面前观赏、诵读和议论。

《蜀相》诗气魄雄伟，形象鲜明，结构大起大落，音调如歌如泣，对仗精工而自然，讽喻切合而无痕。于此可见诗人在律诗创作上工力之深，也符合他作诗“毫发无遗憾”的自觉要求，“万古云霄一羽毛”，我愿借诗人的这句赞颂诸葛的诗来赞颂他的《蜀相》诗。

1983年春

注：

①杜甫的《堂成》是《蜀相》前的一首律诗，其末句为：“懒惰无心作解嘲。”

②《左传·文公十八年》：“世济其美，不陨其名。”意谓后世承前世之美而扩大之。

③见《通鉴》卷二百三十六。在《通鉴》上，杜甫的姓名也仅见于此。

④见《宋史》卷三百七十（宗泽传）。

杜甫与文天祥

杜甫的诗及其为人对后代的诗风和诗人影响至大。就唐宋两代言，可以说是牢笼中晚诸家，开启宋人两派。王闳运在他为工部祠所题的联语中便有“将平生硬语愁吟，开得宋贤两派”的话。盖一派指以黄山谷为代表的江西诗派一派，另一派则指以陆游为代表的南宋诗中一派，这个论断是符合杜甫对唐宋诗坛影响的实际的。不过“硬语”一词用得不一定妥贴，已有同志辨析。^①黄山谷一派主要是接受并扩大了杜诗“瘦硬”诗风的艺术特点，陆游一派则继承并发展了杜诗为君国而“愁吟”的思想倾向，这是为自来的论者所同意的。南宋末年爱国诗人文天祥，其诗品、诗风自是属于陆游一派，他远承杜甫爱国爱民的精神，近继陆游抗侮御外的节烈而发扬光大之，当然成为我国历史上民族的、爱国的、进步的伟大诗人。但世之论者，敬仰其民族大节以其为历史上伟大的民族英雄者多，推尊其诗以其为南宋时期的大诗人者则罕见。这里就文天祥所受于杜甫的深刻影响及其对南宋诗风的重大关系，论说于下。

一是诗篇意义重大，立大题目，写大题材。

杜甫之所以被尊称为诗史、诗圣，这首先与他的写重大题材获得成功分不开。王国维说过，“境界有大小，不以是

而分优劣。‘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何遽不若‘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②这从境界有大小，都各有其美，不宜因此而分优劣为说，自然是对的。但是从诗人一生的全部作品看，大小题材的多少、大小境界的多少那是有关系的。如果杜甫的诗十九都是“细雨鱼儿出”之类，那就是另外一个杜甫，不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杜甫了。清人纪昀曾说杜甫“流离凡十六年，唐中叶衰矣，却只成就得老杜一部诗也。不知终始不乱，老杜得时行道如姚宋，此一部杜诗不过如其祖审言能雅歌咏治象耳；不过皆何将军山林、李监宅等诗耳，宁有如今一部诗乎？然则亦可发一慨也！”^③说得很好。杜甫自己曾说“不敢废诗篇”（《归》），这正是指不敢不写有关君国和人民的重大事件的题材，或题材虽小而言近旨远。掣鲸鱼于碧海，固不必废看翡翠于兰苕，但是诗人终生以之、性命所系的是掣鲸碧海。元人刘壘《诗说》提出了“当以斤两论”之说，引赵中丞的话说“如‘齐鲁青未了’，如‘乾坤绕汉宫’，如‘吴楚东南坼’，如‘天兵斩断青海戍，杀气南行动坤轴’，如‘白摧朽骨龙虎死，黑入太阴雷雨垂’等句，是多少斤两！比‘风暖鸟声碎，日高花影重’，即轻重见矣。”这虽然说的是一些句子，但这些很有斤两的句子都关系着大题目。其中有物，积健为雄，绝不同于某些大而无当、徒事叫嚣的作品，如前人讥明七子诗云：“甚好四平戏，喉声彻太空。人人关壮缪，出出大江东。锣鼓繁而振，衫袍紫又红。座中脑尽裂，笑乐杀村童。”^④外瞻中枵，当然不是斤两重。立大题目，写大题材，掣鲸碧海，杜甫之为百代师者正在于此，杜之小诗，也往往是小中见大。宋代 300

年，以杜为师，能得其心者，陆游、文天祥应是最为突出的。杨诚斋早就指出放翁是“重寻子美行程旧”，这当然不仅是说放翁入蜀，经历子美的行程，实兼指放翁的戮力学杜。清人姚鼐曾说：“放翁激发忠愤，横极才力，上法子美，下揽子瞻”。^⑥赵翼也说“放翁诗凡三变，宗派本出于杜。”^⑦近代的改革家魏源也认为“陆游学杜吟君国。”^⑧他们都瞭然于陆游与杜甫的继承关系。但陆游的尊杜、学杜，他自己似乎说得更清楚：“天未丧斯文，杜老乃独出”^⑨，直尊杜甫上继风骚，又隐然以杜甫的继承者自许。他看重于师杜甫之志，其《城东马上作》有云：“杜老何妨希稷契，孔明本自陋袁曹”。其《读杜诗》云：“看渠胸次隘宇宙，惜哉千万不一施。空回英概入笔墨，生民清庙非唐诗。向令天开太宗业，马周遇合非公谁。后世但作诗人看，使我抚几空嗟咨。”正因为它能够对杜甫不“但作诗人看”，能看到“诗人”以外的杜甫，这才是真知杜甫。正如他深知“功夫在诗外”（《示子遯》），才是深知作诗的功夫一样。放翁已老，还发出“残躯未死敢忘国？”^⑩“白发萧萧卧泽中，只凭天地鉴孤忠”^⑪深深的慨叹，这也正是杜甫一饭不忘君国。“盖棺事则已，此志常耿耿”执着精神的再现。清人张谦宜《砚斋诗谈》以为“放翁诗浑厚雄健，真得杜髓”，“放翁似杜处，全是性情与他一般，不在字句临摹”。这说到了陆游学杜的根本所在。《宋诗钞》也说得好：“宋诗大半从少陵分支，故山谷云：‘天下几人学杜甫，谁得其皮与其骨？’（按此二句诗系东坡《次韵孔毅甫集古人句见赠》中句）若放翁者，不宁皮骨，盖得其心矣。所谓爱君忧国之诚，见乎辞者，每饭不

忘，故其诗浩瀚举袂自有神会。呜呼，此其所以为大宗（刘后村谓放翁当为一大宗）也欤！”

自来论陆游学杜者不少，但陆游以外，南宋末年以文天祥为代表的学杜的杰出诗人则少有人论及。谈文天祥诗与杜诗一脉相承的思想渊源者尤为罕见。前人大抵从政治上、特别是从民族大节上来论文天祥，致其崇敬之词，以为文公不需以诗为重，并没有把文天祥作为南宋很重要的一个诗人来论述，也更没有评论他是晚宋的一个大家。例如胡应麟《诗薮》云：“大抵南宋古体当推朱元晦，近体无出陈去非。此外略有三等：尤杨四子，元和体也；徐赵四灵，大中体也；刘戴诸人，自为晚宋。而谢翱七言古，时有可采焉。”并未提到文天祥。又云：“南宋之末，忠愤见于文词者，闽谢皋羽，瓯林德咏，皆有集行世。”也未论及文山。胡氏在本条后面论到宋遗民之作，认为他们“大半学杜，时逼近之，亦一时之异也。”亦独不及稍前于遗民的文丞相。元初方回的《瀛奎律髓》录宋人诗不少，陆游的诗也多，未录文天祥的诗。“道不同，不相为谋”，方氏降元，对坚决抗元的文天祥的诗自然不录，也不敢录。清初吴梦举父子和吕晚村共同选订的《宋诗钞初集》，选入了文天祥的诗37首，题为《文山诗钞》，并在文山小传中说：“自《指南录》以后，与初集格力相去殊远。志益愤而气益壮，诗不琢而日工，此风雅正教也。”又云：“呜呼，去今几五百年，读其诗，其面如生、其事如在眼者，此岂求之声调字句间哉！”可以算是文山的异代知音。但所选取亦未尽允。厉鹗的《宋诗纪事》，纪事少，选诗多，实际是宋诗较全备的总集，文天祥的诗入选者仅16首，除《金陵

驿》、《乱离歌》外，许多颇有“斤两”的重要篇章都未选进，也可能是有顾忌而然。当代钱钟书同志的《宋诗选注》，选诗精严，选10首以上者仅几家，文天祥的诗选了4首，能显示文山的精神。钱钟书同志说：“他从元兵的监禁里逃出来，跋涉奔波，尽心竭力，要替宋朝保住一角山河、一寸土地，失败了不肯屈服。拘囚两年被杀。他在这一个时期里的各种遭遇和情绪都纪载在《指南录》、《吟啸集》里，大多是直书胸臆，不讲究修辞，然而有极沉痛的好作品。”这几句话很恰当，勾划出了文天祥及其诗歌作品的轮廓。“有极沉痛的好作品”，这正是文天祥诗的真正价值所在。杜甫后期的诗，悲壮是其特质，陆游亦然。陆游的沉痛之作，绝无颓唐之音，愈沉痛愈激励，仍是悲愤之作。文天祥受杜甫的影响是大的。这从他的《读杜诗》七律可以概见。诗云：“平生踪迹只奔波，偏是文章被折磨。耳想杜鹃心事苦，眼看胡马泪痕多。千年夔峡有诗在，一夜采江（采，当系耒字）如酒何！黄土一丘随处是，故乡归骨任蹉跎。”道出了杜公平生抱负及杜诗的主要方面，亦即文天祥所以学杜的地方。文山在囹圄之中，还集杜诗以纪事、言志，得五言绝句200首之多，尤足见其对杜甫倾慕之深，对杜诗通于性命，古今实罕有其比。文天祥的学杜，也是在大纲大节之处，他的诗也是写大题目的多。早在陆、文之前，北宋王安石对杜诗就深有领会。这一位改革派的政治家兼文学家，对杜甫有关政治的大题目的诗或题目虽小而能因小见大的诗，他是别有会心的。荆公的一些诗篇有着高出他人的独特见解，如《桃源行》、《明妃曲》都是。对于杜甫，则《杜甫画像》一诗中的许多道理都为前人（如

韩愈、元稹)所未道。这诗一开头就说“吾观少陵诗，为与元气侔。力能排天斡九地，壮颜毅色不可求。”这是指出了杜诗最高的境界和成就。下面对杜甫的理想、抱负、忧国忧民之心作了精确的概括和揭示，超过了北宋其他诗人对杜诗的理解高度。就王安石对老杜的认识而言，那是在陆游之前就探骊得珠，能知杜之所以大。不过王安石所处的时代及其本人的遭遇，毕竟比陆游、更比文天祥好得多，没有陆游、尤其是没有文天祥那些生活实践，所以也终究产生不了在思想内容上像陆、文那些激昂悲壮和沉痛的诗。但王安石所提出的“与元气侔”确实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宋诗纪事》卷六十五载杜旃《读杜诗斐然有作》一诗，亦云：“夫子握元气，大音发胚腓。”与王安石所见同。元人元好问《杜诗学引》也说：“今观其诗，如元气淋漓，随物赋形；如三江五湖合而为海，浩浩瀚瀚，无有涯涘，如祥光庆云千变万化，不可名状。”元气之说，似乎有些玄妙莫测，但细审王、杜、元好问之言，也不过是如扬雄《解嘲》所说“大者含元气”，极言其大。元气也诠释为气之始。其大无所不包，浑浑灏灏，与天地俱。杜诗《奉先刘少府新画山水障歌》：“元气淋漓障犹湿，真宰上诉天应泣。”其意也谓大自然本来之气。这也与陆游《和伯子》诗“文章最忌百家衣，火龙黼黻世不知。谁能养气塞天地，吐出自足成虹霓”相通。文天祥《正气歌》就说得更为明白：“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所以元气即客观世界存在着的大气，诗与元气侔，即是能因物赋形、大气包举。体现在人类社会伦理上，则是儒家所说的天道，亦即宋儒所云为

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意。从作诗者主观世界说，就是孟子、放翁、文山所说的养气——养浩然之气。孟子说“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④诗人就应当有这种“功夫在诗外”的养气之功。王安石能窥杜甫之大：许身稷契，至死不移。陆、文亦是如此，所以才能写出惊风雨、泣鬼神的壮大诗篇。归根结蒂，是能以自己的毕生经历、自己的生命、血肉来写诗。如果没有这种理想和实践是绝对作不到“与元气侔”的。与文天祥同时的贾似道也能诗，也可写出《梅花》、《芍药》、《闺怨》等诗，甚至貌为恬淡地写出《归葛岭旧居》“息影堤边树，清心湖面波”这样的诗。但是要他写出有关国家安危、人民苦乐的大题目和宏伟抱负、坚毅精神、至大至刚的诗这就根本不可能！所以是什么人才能有什么诗，“与元气侔”、“元气淋漓”不是可以伪装得来的。但这也与时代有关，“士穷乃见节义”，“时穷节乃见”，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处于相对的升平之世也是难于写出激越诗篇的。南宋一世，屈辱艰难已极，陆游、文天祥挺生其间，上受前哲熏陶，下为生民激励，写出了极具时代特征的重大诗篇。思想、艺术，两臻上境。为南宋诗风开辟新境界，显示新精神，这是不可以低估的。

二是诗篇震撼力强，深入人心，感人至深。

王国维《人间词话》中曾引尼采的话：“一切文字，余爱以血书者”，认为“李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其言固是。但李后主以血泪写出之词犹是一人一家一王朝之血泪，杜甫、陆游、文天祥的主要作品，无不载满血泪，“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遗民

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从今别却江南路，化作啼鹃带血归！”则是写出了天下之至悲，人间之大愤。几位诗人把民族的血泪、人民的血泪与自己的血泪融会为一，喷薄而出，所以千百年来一直感人至深。而且使读其诗篇的人思想得到净化，志气得到磨砺，希望于以产生。引人深思，促人上进。近人黄节谒岳墓诗云：“从来忠愤使人伤”，在忧伤憔悴之中，也使人淬砺奋发而不是颓唐自弃。《人间词话》说“后主则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此言纵是，也是从推想中来。而上述几位诗人的作品，则确实实担荷着国家民族的灾难、人民的灾难，而且担荷着民族、历史所赋予的责任，伸张正义，保持气节，也就是为人类的尊严而苦战，不必以释迦、基督为喻而自成其伟大。韩愈《祭田横墓文》有言：“事有旷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非今世之所稀，孰为使余歔歔而不可禁！”异代相感，一则由于今世之所稀，稀为贵，故倾慕不已；一则还由于今世之所同，今昔世事有相似之处，今昔人心复有所相通，所以杜甫之慕宋玉、诸葛、庾信、陈子昂，转益多师；陆游、文天祥也以杜为师，倾慕仿效，形诸梦寐，都由于世事有相似、思想感情更有所相通之故。

文天祥的诗，早年中状元后多应酬之作，常为星、相题诗，此虽风气使然，但此种诗在文山全部诗歌中所占的比数也并不为大。真正代表文山诗的作品是其后的《指南录》（共179首诗）、《指南后录》（共194首诗）、《吟啸集》（共87首诗），共计有460首诗。这个数量已不算小，此外还有集杜诗200首。所以仅从诗的数量来说，文山的诗也不为

少，若再从质量看，从思想内容和写作艺术看，文天祥无疑应是南宋大家。文山诗歌感人之深，世人习知者为《过零丁洋》，诗如下：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抛絮。
身世飘摇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此诗传诵之广，影响之大，在我国诗歌史上也罕有其比。此诗几乎为各阶层的人所喜读也易读，它教育、鼓舞了自宋以后各个历史时期在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中以生命捍卫真理、正义的英勇战士。此诗据文山自记是在被敌人幽囚中强令其作书招降张世杰，文天祥答以“我自救父母不得，乃教人背父母可乎？”遂写此诗付敌，敌亦无如之何。他所说的“父母”，即指民族、国家，大义凛然而又非常从容自然。道出了人生的真谛，屈原“虽九死其犹未悔”，司马迁“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历史上舍生取义、坚强勇毅的人他们面当死生之际都有如此的伟大胸怀。这诗的末联以极通俗的词语写出了极崇高的品格。丹心、汗青之词，也并不是单指身后声名，而是说应当留取一寸丹心为茫茫的华夏史册增辉，而决不能作玷污历史和族类之事；这也是说要为后来人在生死取舍之间留下一个好样子，勿忝厥生。这种态度，这种诗，对于敌人简直比刺胸的利刃还锋利，对他们也是轻蔑之极。所以敌人“但称好人好诗，竟不能逼”（拙作《文天祥词》七律第三联云：“人生自古谁无死”，后世师公代有贤。——即极致崇敬之心并表文公此诗之巨大教育效果）。文山的七律，类此者还多，几乎首首都好。如《指南

录》中的《至温州》、《题苏武忠节图》，《指南后录》中的《登楼》、《赣州》、《越王台》、《万安县》、《隆兴府》、《金陵驿》、《早秋》、《睡起》、《中秋》、《读杜诗》等等。其中的句子如“烈士丧元心不易，达人知命事何嗟。”（《题苏武忠节图》）“满地芦花和我老，旧家燕子傍谁飞。从今别却江南路，化作啼鹃带血归。”（《金陵驿》）“春事暗随流水去，潮声空逐暮天回。”（《越王台》）“独自登楼时柱颊，山川在眼泪浪浪。”（《登楼》）都悲壮苍凉，感慨淋漓，也极有沈郁之致。其五律如《吟啸集·除夜》：“门掩千山外，孤灯伴不眠。故乡在何处，今夕是穷年。住世真无系，为囚已自然。劳劳空岁月，得死是神仙。”此为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七年（庚辰，公元1280年）在狱中作。一年以后至元十八年（辛巳，公元1281年）的除夕，又作《除夜》（在《指南后录》）一首：“乾坤空落落，岁月去堂堂。末路惊风雨，穷边饱雪霜。命随年欲尽，身与世俱忘。无复屠苏梦，挑灯夜未央。”又，前两年己卯除夕，文公已在狱中，曾作《己卯岁除》五古一首，有云：“至情讵可迁，微躯不足恋。真人坐冲漠，死生一乘传。日月行万古，神光索九县。”是则在狱中竟三历除夕，且皆有诗，其坚强而又从容如此！文公没有在狱中过第四个除夕，壬午年（公元1282年）十二月初九日至死不屈，殉国于燕，年仅46。文山七言绝句如《发高沙》：“城子河边委乱尸，河阴血肉更稀微。大行南北燕山外，多少游魂逐马蹄！”《扬子江》：“几日随风北海游，回从扬子大江头。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二诗均被囚前辗转途中所作，其途中经历，多以七绝写之。文天祥的诗，五古、七

古也不少极佳之作。篇篇都有新内容、新见解，都为溅泪迸血之诗，比如《言志》、《发高邮》、《发淮安》、《彭城行》、《歌风台》、《远游》等数十篇，置之杜甫集中也是上乘作品。又如《指南录》中的《高沙道中》一诗，长达860字，当为学杜《北征》、《奉先咏怀五百字》而能神似者。其《六歌》亦仿杜，各有酸辛。至于《正气歌》一篇，煌煌大笔，严整精警，直是前无古人，即杜集中也没有这样的作品，因为没有他那种“厄于阳九”长处囚牢的生活体验。文山集中另有一种类型的诗为“集杜”。集古人诗自王荆公始喜为之，但前人不喜者多。清人《载酒园诗话》曾说“佳者仅一斑斓衣，不且补破衲也。”但如王荆公集唐诗《胡笳十八拍》竟“略无掇拾之迹”（亦《载酒园诗话》语），亦为难能。文信国公也有集句《胡笳十八拍》，却集的杜诗。汪水云慰文山于囚所，援琴作蔡女《胡笳十八拍》，索文山诗，文山乃集老杜句成拍，写一生经历和出处大节，尤为难得。如第十三拍云：“三年奔走空皮骨，三年笛里关山月。中天月色好谁看？豺狼塞路人烟绝。寒割肌肤北风利，牛马毛零缩如蝟。塞上风云接地阴，咫尺但愁雷雨至。”尤其使人惊叹的是，文山在狱中竟集杜句成五言绝句200首。这200首集杜，每首都标有小题，有些还有几句序言。200首始终一贯，历叙国家大事，己身艰苦经历，成长篇自传性史诗，也是南宋末年至亡国以后的一部信史。这更是空前绝后，震古铄今的。文公自序有云：“凡吾所欲言者，子美先为代言之。日玩之不置，忘其为子美诗也。乃知子美非能自为诗，诗句自是人性情中语，烦子美道耳。子美于吾隔数百年，而其言语为吾

用，非情性同哉！昔人评杜诗为诗史，盖其以咏歌之辞，寓记载之实，而抑扬褒贬之意，灿然于其中，虽谓之史可也。予所集杜诗，自余颠沛以来，世变人事，概见于此矣。是非有意于为诗者也。后之良史，其庶几考焉。”文公的心迹可以觐知了。如《京湖两淮第二十七》有序云：“东南兵力，尽在江北，金城汤池，国之根本。高以荆州降，夏以淮西降，李死，淮东尽失，无复中原之望矣，哀哉！”诗云：“荆扬风土暖（《秋行官张望督促东渚耗稻》），大城铁不如（《潼关吏》）。秦山忽破碎（《登慈恩寺塔》），流落随丘墟（《五盘》）。”又如《幸海道第三十》对张世杰也有微词。其序云：“自三山登极，世杰遣兵战邵武大捷，人心翕然。世杰不为守国计，即治海船。识者于是知其陋矣。至冬闻警，即浮海南去，天下事是以不可复为，哀哉！”从当时的形势看来，文山的议论是颇有识见的。再如《江行第八十五》：“畏途随长江（《白沙渡》），万里沧浪水（《忆郑南玘》）。游子去日长（《成都府》），壮心不肯已（《戏赠友》）。”《第一百六十三》至《第一百九十一》都是“杂然又自写其本心”的抒情、书愤诗，弥足感人。如“仰看八尺躯（《别张建封》），不要悬黄金（《八哀·苏源明》）。青青岁寒后（《枯棕》），乃知君子心（《八哀·张九龄》）。”“高歌激宇宙（《衡山县学》），岁晚寸心违（《赠韦赞善》）。忠臣负怨恨（《八哀·李邕》），奸雄多是非（《咏怀》）。”运用得如此自然高妙，不啻若自其口出，如非与杜诗通于性命，浹于骨髓，是不能作得“裁缝灭尽针线迹”^⑥的！文山后期诗，也不免有率意处，但为数甚少，因为他每首诗都是言之有物，有为而发，都是用自己的

寸寸生命在写，所以都耐人吟咏，偶有浅率之处也不足为病。他也有一些题材甚小的诗，如《吟啸集》中的《西瓜吟》，除了形容西瓜和吃西瓜辞精句丽而外，其结尾也颇有寓意：“长安清富说邵平，争如汉朝作公卿”。对那些为富不仁的当代公卿有所讽刺。文山每有怀念诸葛的诗，如《怀孔明》云：“至今出师表，读之泪沾胸。”深致感叹。这也是与杜甫、陆游一脉相承的。

文天祥的诗见民族的大义，表黎民的切望，都是时代的歌声。思想性既强，艺术手法也高，实具备兴、观、群、怨的社会功能，诗教、诗史，兼而有之。

三是诗歌声气广，互相呼应，蔚然成风，同声相应。围绕着文天祥，则有汪元量、谢翱、林景熙、谢枋得、俞德邻等人。一些人虽然一部分时间生活在南宋灭亡以后，但他们的行谊、诗歌都应属于宋，不属于元。若论南宋诗，他们也是颇有关系的人物。今观汪元量《水云诗钞》，悲愤忧伤，是真血泪写成。如《答方石田》云：“南朝千古伤心事，每阅陈编泪满襟。我更伤心陈野史，人看野史更伤心！”《石头城》云：“一片降旗千古泪，前人留与后人哀！”《潼关》云：“事去空垂悲国泪，愁来莫上望乡台。”其言虽近于俚，其情则沉痛之至。汪水云与文天祥政治上一致，私人交谊也甚深，受到文山的影响当然是很大的。汪元亮的《湖州歌》98首是南宋末年以诗的形式写出的一部信史，记载详而评论确，足以垂戒后人，不仅使人阅之伤心也。谢翱也是奇崛忠义之士，他曾经投入文天祥的抗元军，在文山殉国后，曾挾酒登浙江子陵钓台，设天祥神主于亭隅，再拜号哭，以竹如意击石而

悲歌，作《西台恸哭记》。还有《西台哭所思》诗：“残年哭知己，白日下荒台。泪落吴江水，随潮到海回。故衣犹染碧，后土不怜才。未老山中客，惟应赋《八哀》！”《书文山卷后》有句云：“死不从公死，生如无此生！”^④真是呼天号地之声。足见其对文公情义之笃。信仰之专。谢翱的诗最为后世忠愤之士所爱读，亦因其品格高尚，情意真挚，使人敬慕。钱钟书《谈艺录》说：“《唏发集》能立意而不为词夺，文理相宣，唱叹不尽。”林景熙的《白石樵唱钞》，也属陆文一派。其《天柱峰》云：“谁作孤蜂紫薇颠，流泉一脉到宫前。却怜千尺擎天柱，不拄东南半壁天。”《题放翁诗卷后》云：“天宝诗人诗有史，杜鹃再拜泪如水。龟堂一老旗鼓雄，劲气往往摩其垒。……诗墨淋漓不负酒，但恨未饮月氏首。床头孤剑空有声，坐看中原落人手。青山一发愁蒙蒙，干戈已满天南东。来孙却见九州同，家祭如何告乃翁！”末联尤为感慨万端，警策之至。胡应麟亦谓“林德旸七言古不多见，而合处劲逸雄迈”。谢仿得，号叠山，门人谥之曰文节先生。其集中《武夷山中》云：“十年无梦得还家，独立青峰野水涯。天地寂寥山雨歇，几生修得到梅花。”亦见忧思之深。叠山曾参加弋阳起义兵，军溃，隐于闽，后被迫胁至燕，不食死。再如俞德邻《偃韦斋集》，风格亦近。其《秋日客中》云：“百年三万六千日，半世东西南北人”，也是慨当以慷了。《宋诗选注》在汪元亮的评语中说：“在宋代遗民叙述亡国的诗歌里，以他的《湖州歌》98首和俞德邻《京口遣怀一百韵》规模最大。”此诗颇有關於宋末史事，可资考证者多。再如李谨思《题文丞相〈吟啸集〉》^⑤云：“南人不识两膝贵，曲摺百态卑且劳。斯

人护膝不护头，故以颈血沾君刀。……”说得透彻、痛快。凡此诸人，都为陆、文一类，有些虽是江湖派诗人，论其实质、主流，应与陆、文同调。所以互相呼应，前后增辉，自陆迄文，经历一二百年之久而蔚然成风，为论南宋诗者所决不可忽。

以上对文天祥诗所受到杜诗的影响及其与南宋诗风的关系谈了几点。文天祥的诗题目大，除了早期的一些应酬诗而外，几乎首首都是写大题目，显示大道理，首首都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大事，其集杜 200 首，被誉为“文山诗史”，所谓诗史，盖不仅是以诗作史，纪录了许多真实史事，可以补史之阙，纠史之谬，以诗证史，而且对历史事实通过诗歌写作作出了精辟的评论，慨乎其言。这些正是文天祥的诗颇类于杜诗之所在。当然，文天祥的诗并不只是集杜之作才可称为信史，其《指南录》、《指南后录》、《吟啸集》诸作都是信史。文山诗歌之感人也与杜诗同，明王世贞论杜诗曰：“使人慷慨激烈歔歔欲绝者，子美也”。文天祥诗也正是如此。杜诗对后世影响极大，此自不待言，文山诗在当世就形成风气，在后世“时穷节见”之时也每有学文山之为人并学其诗者。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天祥的诗自成其为爱国诗歌一派而源远流长。在我们今天建设精神文明的时代要求中，文天祥诗尤能发挥出亘古常新的有益的作用。

文天祥学杜甫的诗，师杜甫的为人，集杜甫的诗来表现自己的胸怀，这在历史上亦罕有其比，他的学杜，是学杜甫最高的思想境界，学杜甫诗歌的精髓，不在于形式上的追求。文山诗多近体，七言绝、律多，集杜诗全是五律，五、

七言古甚少，这当是由于当时斗争的需要，在极其尖锐、紧迫的斗争和极为颠连、困苦的生活中自以迅写短篇的可能性更大。文山殉国时年仅46岁，这也应当是他的诗歌数量不甚大、诗体方面也不广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像《正气歌》这样的诗，在体制上也应是创新之作。

文天祥学杜甫的忠心，主要是学杜甫的忠于国家民族，热爱人民，决不是只忠于一两个皇帝。杜甫是如此，文天祥也是如此。观《文山先生纪年录》，正文乃文公在狱中所书者，其“宋祥兴元年”所记答博罗丞相劝降之语有云：“德祐吾君也，不幸而失国，当此之时，社稷为重，君为轻，吾别立君，为宗庙社稷计，所以为忠臣也。从怀愍而北者非忠，从元帝为忠；从徽钦而北者非忠，从高宗为忠”。固知其非仅忠于一家一姓，实乃忠于国家民族，以国为重，大义凛然，致使“博罗语塞”。又如《五月十七夜大雨歌》（《指南后录》卷三）写他“居园土中”而遭大雨，“忽如巨石浸，仓卒殊彷徨。”“炎蒸迫其上，臭腐薰其旁。恶气所侵薄，疫病何可当！”在这极其难堪的囚牢环境中，乃能遗一己之苦痛而念及天下人民，其结句云：“但愿天下人，家家足稻粱。我命浑小事，我死庸何伤！”这与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结句又何其相似啊！盖不仅词意相似，原本精神相通。万瑞楠同志所作《文天祥传》指出，文天祥的《集杜诗》“起自《社稷第一》，以社稷为第一，也就是以国家为第一。第二才是《理宗、度宗》。这种摆法，便表明了文天祥的心在哪里。”这个说法是很有道理的。杜甫和文天祥对朝廷的内政、外交、用兵诸端都多所建白或发为诗篇以书感，尤其是

文天祥更是以丞相的身份，谋救国之大计，数十年忧国忧民，固不仅3年狱囚，从容殉国，才见节操。济燃眉的应急之策，即如文天祥己未年上理宗皇帝书中，提出了具体的四事：一曰简文法以立事，二曰仿方镇以建守，三曰就团结以抽兵，四曰破资格以用人。这符合于当时形势的要求，兼为治本治标之计，以冀为恢复大业奠定基础、作好准备，的确是意美法良，但是并未得到采纳。

文天祥学杜甫，其精神与杜甫一脉相承，其行谊与杜甫易地而皆然，其诗篇是为以陆游为代表的南宋人学杜的一派，而且较陆游更有所发展。文天祥应是南宋一大家，他的诗篇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研究。

1986年春

注：

- ①见《草堂》创刊号屈守元同志《杜甫美学观琐谈》。
- ②王国维《人间词话·八》
- ③方回《瀛奎律髓》卷二十九录杜甫《岁暮》诗，纪昀评语。
- ④清吴乔《围炉诗话》卷六。
- ⑤见姚鼐《今体诗钞》之《五七言今体诗钞序目》。
- ⑥赵翼《瓯北诗话》卷六。
- ⑦见《魏源集》：《题包慎伯文集》诗。
- ⑧陆游《宋都曹屡寄诗，且督和答，作此示之》。
- ⑨陆游《新年书感》。
- ⑩陆游《书愤》。
- ⑪《孟子·公孙丑章句上》。
- ⑫杜甫《白丝行》
- ⑬谢翱《晞发集》
- ⑭见《宋诗纪事》卷七十六。

陈子昂与杜子美

我国初唐、盛唐的历史上，陈子昂与杜子美这两位都曾官居拾遗的诗人，政治思想和诗歌写作上，从杜甫说来，对陈子昂是由衷地景仰。善于继承古代优秀文化传统，“不薄今人爱古人”“转益多师是我师”，集历代诗歌成就之大成的杜公，陈子昂对他就有影响。在政治思想和诗歌写作上都比较明显，有其思想渊源，或者说有其相通相类的许多地方。要说明这个情况，首先是要对陈拾遗作一个比较全面的理会与表述，那么，自然就能体会到陈、杜二公相通相类之处。对于诗圣杜甫，自古及今学习、评论者不少，对陈子昂则不是这样，而且还存在着一些误议；当然对杜甫之尊陈也就不一定能理解得更为深入。

陈子昂比杜甫早数十年，是唐代初叶的政治家、文章家、诗人。梓州射洪人。他出生于唐高宗显庆元年丙辰（公元656年）。死年不详，约40多岁。对陈子昂的整体形象，我想到《史记》记载孔子见到了老子，心悦诚服，说了几句极其精彩的话：“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至于龙，吾不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见老子其犹龙耶！”陈子昂在政治上处于女皇统治之期，朝政成败兼有，用人贤愚相混，战伐多舛，酷刑泛滥，民生多苦

的时日，他能细辨泾渭，深察时机，为国图安，为民请命，直言敢谏，不畏刑戮，澄之不清，搅之不浊。在文学上处齐梁余习犹盛之时，独能树立风骨，扇扬骚雅，继往古而启来哲。对于这样的伟大历史人物，即使以孔子称美老子的话来赞扬他，也不为过。

但是历史上从来杰出的人物，总不免毁誉相伴，甚且横遭贬斥，往往不为人所理解，受到不公平的对待。陈子昂自也不能超然于物议之外，特别是有人把他的某些文章等同于剧秦美新，或认为子昂文章纵佳，其行殊不足道，甚至置之为“遗诟万年”。虽然也有人之为之解说，但或者语焉不详，或者对陈子昂的用心亦未能深体，对女王专政之事总不免囿于陈见，所以王夫之、陈沆对子昂的独特见解，也没有产生出很大的影响；陈子昂在政治上、文学上应有的崇高地位也始终未能得到。陈子昂生屈、杜之间，而昔人之尊子昂者，也总不欲把陈子昂与屈、杜并称。或者不能正确对待其“瑕”，或者未能充分评价其“瑜”。大抵如此。而且陈子昂在吾蜀众多先贤之中，实为大有功也大有光于吾蜀的极为难得、极可尊崇的历史人物，过去也似乎未曾受到足够的重视和尊崇。这些都是不可不辨的。

我首先想谈论的是陈子昂的德行。集中的一点就是，他究竟是不是一个谄媚无行的人。在封建社会里，一个谄媚、唯阿、贪生怕死的臣子，在政治上不可能有什么重大的成就；在文学上也同样不会有什么光彩。陈子昂之被诋为谄，主要是由于他的几篇文章。《新唐书》子昂传赞已提出，“子昂说武后兴明堂太学，其言甚高，殊可怪笑。后窃威柄，诛

大臣，……子昂乃以王者之术勉之”。宋子京讥子昂为聋瞽。《郡斋读书志》谓之为“无风节”，《直斋书录解题》谓之为“大节不足言”。清人王士禛《香祖笔记》则谓子昂《大周受命颂》等文，甚过扬雄的剧秦美新。清代修《四库全书》，翰苑之臣对《陈拾遗集》则更加诋毁，说什么“譬如荡姬佚女，以色艺冠一世，而不可以礼法绳之者也”。并且说“立身一败，遗诟万年”。出自纪昀之手的《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也说“其人则献媚武后，殊不足道”，其《大周受命颂》诸文“至今为儒者诟厉”。对于这些非议，辩驳得最直捷的是陈沆的《诗比兴笺》。他说“请考子昂所立之朝与同朝之人，并考子昂立朝之节与去朝之日，而后质之以《感遇》之什，则心迹终始日月争光矣！”他的意思就是，要从一个人的平生大节及其言为心声的诗歌作品来全面地衡量一个人，才能得其人之真。决不应只是摭拾几篇文章，几句话来论断一个人。陈沆还指出，处武后之世，“顺例进贺之表，应制颂美之什，诸公亦岂能独无？”还举狄仁杰诸大臣的诗文为证，更举出孔子当时“见楚越之君亦必称之为王”为说。

平心而论，子昂既仕于武周之朝，自不能不奉其正朔，从其称谓，同时的狄梁公诸正人也是如此。将欲使其治国而安民，行诸善政，则给予必要的肯定与称颂，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未可厚非。陈沆说的“今既不能议诸公之仕周，乃犹谓仕周而不当从其称谓”这句话，亦是此意。他还说“彼宋狄诸公，当日语言文字，其敢直斥武士彠乎？”这也问得很好。根本问题还在于中国士大夫的传统观念是反对“牝鸡司晨”。则天当朝，自称皇帝，千古未有，这在不少封建士大

夫的思想上是认为应该从根本上予以彻底的否定。当武则天在位之时，并没有几个敢于同她激言抗争之人，而武则天成为历史陈迹之后，则甚多悠悠之论。如果以屈身异朝来指摘为官武周的人，则晋宋以来，改朝换代频繁。其历仕两朝之人，未见一一深责，又何以独责于经唐历周的人。如果说出仕于周可以，但不应该作文章来颂美它，这也说不过去，正如陈沆所说，随例、应制，在所难免，既仕于其朝，又岂能不承认它。最重要的问题是，承认它而使之行善政，使之有利于国家人民，这才是大节。狄仁杰和陈子昂都正是这样作的。正是重在大节，重在生民，而且子昂的出仕其重点本在则天掌权时期，也更与历事二姓者有所区别。归根结底，是要看他究竟对武氏的所行所为持什么态度。则天当政，有功也有过，那就应看陈子昂对则天的过失、罪恶，是长君之恶还是直指其非，是阿谀取容还是不避灾祸。这才是重大的考验，也是事关大节的问题。陈子昂在这种严重的考验面前，他是经得住、作得出，敢于直言谏诤，而又切中时弊，不计身家性命的利害安危。这正是孟子所说的“大丈夫”，是历史上的伟大人物。清代的某些翰苑之臣，知鱼知鸟知兽而不知龙，且横加丑诋，则也是不足为怪的！

其次论陈子昂的政治。作为政治家的陈子昂与作为文学家的陈子昂同为突出。从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看来，政治与文学盖不可分。未有政治上卑卑不足道而在文学上大有成就者。如果其人政治上昏庸甚且为人卑劣、险恶，即使有一点好的诗文作品，那也不过如欧阳修所说，“草木荣华之飘风，鱼兽好音之过耳”，决不能有真正有关世道、有裨人群、震

撼人心的大好作品出现。看陈子昂也必须首先看他的政治。作为政治家的陈子昂其成绩皎然。《旧唐书》列陈子昂于《文苑传》中，《新唐书》不列子昂于《文艺》而单独成传，体例较胜，更合实际。

说到陈子昂的政治，还是需要先谈他的谏诤之道。古代的大政治家都敢于建树，敢批逆鳞。前面已经说到从子昂敢于谏诤看来，他决非阿谀之臣。新旧唐书陈子昂本传都重视到这一点。《旧唐书》全文载入了子昂的《谏灵驾入京书》《谏雅州讨生羌书》，已着重子昂之谏，但稍觉载文少了一些。《新唐书》所载陈子昂之谏疏有六篇之多，虽有所删节，但对子昂的直谏精神和他的政治见解显示得更全面，于此也可看出欧、宋的史识。《资治通鉴》于武则天太后专政之初，垂拱元年，首著麟台正字陈子昂上疏议任使、用人及知危机三事（近人高步瀛谓子昂此谏当在垂拱四年，见《唐宋文举要》）。又于垂拱二年著麟台正字陈子昂谏滥用刑罚之疏，节取其文章要点，明彰其忠正有识，足见后代史官对陈子昂的崇重。

敢谏难，善谏尤为不易。大率古来的谏诤者有几种情况，一种是见理不深，论事不周，但敢于直言不畏死；一种是在谏诤之中夹杂着个人沽名之念，以敢于顶撞为高；也还有一种是限于智能不足或囿于门户之见而谏其所不当谏，对于应当切谏之事反而噤不肯言；还有一种至可钦敬的则是既敢谏，又善谏，谏其所当谏，对受谏者不是一味指摘，既善规、又善谋；对所谏之事既见得透彻，又议得精当；胸中唯有天下安危，人民祸福，而一己一家之利害全非所计；既无

沽名之念，也不涉意气之争，这才是非常难能可贵的。陈之昂便属于这后一种。

我们看陈子昂自己的话：“臣西蜀野人，本在林藪，幸属交泰，得游王国，故知不在其位者不谋其政，亦欲退身岩谷，灭迹朝廷，……所以敢触龙鳞，死而无恨，庶万有一中，或垂察焉！”（《谏灵驾入京书》）。又说：“赴汤镬而不回，至诛夷而无悔，岂徒欲诡世谄俗，厌生乐死者哉！”（同上）。“臣非不恶死而贪生也，诚恐负陛下恩遇，臣不敢以微命蔽塞聪明”（《谏用刑书》）。这都是说为了国家政治的昌盛，自己不怕死，也不敢惜一死而使朝庭闭塞；不是干誉，也更不是诡世谄俗，厌生乐死。他还以唐太宗与魏征之事为劝，说：“臣伏见太宗”“能容魏征愚直，获尽忠诚……贞观以来，此实为美”（《答制问事》）。于此尤可见陈子昂的理想抱负，即后来杜甫所云“致君尧舜上”者。他还说“与君子言犹且不妄，况蒙天子之问，敢不悉蝼蚁之诚，真实罄尽！”“披露肝胆，不知忌讳”（《答制问事》）。这更是披肝沥胆，言无不尽，忠国之心昭然若见了！至于其谏书的内容尤其是全面而深邃，都是为政的大端，也是当时朝政症结之所在。

今天所能看到的陈子昂的文章只可能是一部分。《全唐文》及《唐文拾遗》所载陈子昂的文章共 110 多篇，其直接有关政治的文章在 20 篇上下，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奏疏，而且是谏书。如果粗略地就其所论事类划分，则有关用兵，防边，行政，任贤，措刑，治国之本和富国之方皆具。这与前朝贾、董，后世韩、柳以及宋代王、苏等人的奏议相较，无论从方面之广、论事之精和篇幅之大说来，都未为逊色。洵

足为初唐时期一个重要的政治家。

今观陈子昂的书，感到他在政治上的重大成就，略言之，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为重申民本思想，二为坚持贤人政治，三为力主安边政策，四为严斥酷刑统治。这几个方面对于几十年后的杜子美都有显著影响，尤其是前三个方面，在杜甫的诗歌中彰彰可见。第四个方面由于杜甫所处时期不同，在诗中反映出严斥酷刑统治的思想不大见到，但也不是绝对没有。现在从这几个方面来考证陈子昂的思想与功绩。

一为重申民本思想。国以民为本，本是儒家政治思想核心之所在。周孔发其端，孟轲道其详，后世君臣能真正信从者甚少。六朝政治腐败，尤不知此理。唐太宗创业之君，其大过于人之处，在其能知民为国本。观《贞观政要》，太宗君臣互相议论的话可以确知。此书开宗明义第一章《君道第一》便记太宗之言“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又《务农第三十》记太宗说：“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政体第二》记太宗对待臣说：“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这些“人”字都是“民”，因避太宗讳，改之）。说得很明白。而且太宗循此理施政，也很认真。所以贞观盛世的得来，实有其根本原因。但是武周之世，则天虽然也作了一些好事，却予智自雄，自以日月当空，不恤人言，不思民本，更多的心思是放在如何排除异己、巩固自己的皇位上。唐高宗时便有陈硕贞、白铁余等农民起义先后爆发。武后当朝，迄未得安。陈子昂生当其时，供职未久，却能从根本大计上进言，欲导引则天深知民为邦本之理，不惜

一再申述，这正显示出一个大政治家的风范。他在《谏政理书》中说：“臣子昂西蜀草茅贱臣也，以事余暇得读书……历观邱坟，旁览代史，原其政理，察其兴亡，自伏羲神农之初，至于周隋之际，驰骋数百年，虽未得其详，而略可知也。莫不先本人情，而后化之”。此所谓“人情”即是“民情”，为政必先本于民情。并在《书》中历引古代失民心而致丧败之事为证。子昂之意就是说要善于察民情，深知民情，毕顺民情，一切以民情为出发点，即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子昂在《人机》一论中，所言尤为透彻而具体。人机即民机，“知几其神”，为政贵在知民机。他说：“臣闻天下有危机，祸福因之而生。”“夫百姓安则乐其生，不安则轻其死。……人不可使穷，穷之则奸宄生；人不可数动，动之则灾变起。”子昂的主旨在于为政必须安民和富民。他慨乎其言说：

当今天下百姓，虽未穷困，军旅之弊，不得安者，向五六年矣。夫妻不得相保，父子不得相养，自剑以南，爰至河陇秦凉之间，……莫不或被饥荒，或遭水旱，兵役转输，疾疫死亡，流离分散，十至四五，可谓不安矣。

他更针对现实着重说：

愚臣今所以为陛下更论天下之危机者，恐将相有贪夷狄之利，又说陛下以广地强武为威，谋动甲兵，以事边塞，陛下或未知天下有危机，万一听之，臣惧机失祸构，则天下有不可奈何也！诗不云乎，“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故臣愿陛下……以息

天下之人，务与之共安（《上军国利害事》）。

子昂并且指出隋炀帝正由于不解民之为本，不知天下有危机，胡作非为，使天下百姓穷困，民不堪命，“机动祸构，遂丧天下”。指出武氏伐吐蕃为“大失策”，其失即在于不能安民，不顾民情。子昂可以说是识大体，知大本。并世罕有其匹。杜甫的民本思想，晚岁尤著，直接间接，多有表露。我在其他文章中也有所论及。他曾说，“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甚至曾说“盗贼本王臣”，显示出人民是国家的主体的认识。盗本是民，逼而为盗，失其主体地位也。

二为坚持贤人政治。唐太宗的知人善任，重用贤才，历代有心郅治的君臣奉为楷模，传为美谈。应当说余风犹存，唐高宗也曾有思贤之念，任贤之心。永徽一朝，也曾举用过贤能之士。但他阉于朝政，大权旁移，没有什么建树。新旧《唐书》对他的评论都很不好。武后临朝之后，虽然也有爱才重贤之心，曾经信任一二贤臣，但是她受了群小的包围，又自以为是，对于任贤举能的重要性认识很不够，而又酷于刑罚，贤者远避。所以能否任贤这个问题在当时是十分突出的。陈子昂有鉴及此，故一再进言，劝其任贤。子昂虽未执掌中枢，但他的政治主张是坚持贤人管理政治的贤人政治。陈子昂认为“官人唯贤，政所以理”，这就是要使贤人当政。他对于贤人政治有一系列的主张。其大旨在于首先要知贤。关于知贤，司马迁在《屈原列传》中曾慨叹说：“人君无愚知贤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为，举贤以自佐，然亡国破家相随属，而圣君治国累世而不见者，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所以首要在于知贤、识贤。至于如何方能知

贤，昔人议论不多。陈子昂说：“议者皆云贤不可知，人不可识，臣固以为贤固可易知，人固可易识。但是议者不精思之耳”（《答制问事·明必得贤科》）。他谈出了主要的办法在于平时的观察和考验，观人于其全。认为“贤人之道，固可预知”。这自然是比较笼统地希望国君能求贤。任贤则更进一层。既知贤就要任贤，他说：“天下之政，非贤不理；天下之业，非贤不成；固愿神皇务在任贤。”还提出了这样一个可贵的原则：

既任须信，既信须终，既终须赏。夫任而不信，其才无由展；信而不终，其业无由成；终而不赏，其功无由别。必神皇如此任贤，则天下之贤云集矣（同上）。

子昂还明确指出当时为什么对于有些人始信终疑的缘故，客观上也由于某些人如裴炎、刘祎之等的“背德辜恩”。这是从两方面看问题，不完全归结到人君的品质上。但是子昂指出，人不可以因噎而绝粮，“亦不可以谬贤而远正士”。

不能任贤是一个问题，用人太滥也是个问题。武后朝廷这两个问题都存在。史学家刘知几曾上书表陈四事，其三为“陛下临朝踐极，取士太广……若遂不加沙汰，臣恐有秽皇风”（《通鉴》卷二百五）。唐张鷟所著《朝野金载》记：“景龙中，斜封得官者二百人，从屠贩而踐官位”。又记：“伪周革命之际，十道使人天下选残明经、进士及下材教童蒙博士，皆被搜扬，不曾试练，并与美职”。以致“庸才者得官以为荣，有才者得官以为辱”。又，张鷟为谣曰：“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杷推侍御史，椀脱校书郎。”（《朝野金载》卷四）。足见其滥。陈子昂在《对三事》中也曾指出用使之

滥，说：“今使且未出，道路之人皆已指笑”。又如武则天三次付与市井小人薛怀义以讨突厥的重任，都非常可笑。陈子昂早已有鉴于此，他在论吏治时说：“窃见吏部选人，补一县令，如补一县尉耳。但以资次考第从官游历，即补之，不论贤良德行可以化人”。“所以天下庸流，莫不能得为县令。庸流一杂，贤不肖莫分”。还说：“自有国以来，此弊最深，而未能除也”（《上军国利害事·牧宰》）。其言较知机之论，尤为痛切。

综观陈子昂任用贤才、主张贤人政治之论，在当时君主专政时期，确有其治国安民的进步作用，惜乎武则天多未采纳。陈子昂之论，实际是较全面地总结了自春秋、战国以来在任用用能上成功与失败的经验。他的议论包含着任用与培选，也是属于我国历史上的人才学范畴。人才学的问题，司马迁谈论或显示得不少，诸葛亮也谈论得多。在我国历史上，实际存在着部内容极其丰富的多人合著的“人才学”，而陈子昂在这一部合著的大“书”中写出了甚为重要的篇章。杜甫于贤人政治的思想继承和具体主张上尤为明显、肯切。痛贤才之不遇，哀贤才之多难，勸贤才之有为，颂贤才之建功诸方面，都在诗篇上屡有显示。不仅及于唐初，而且溯于前代，一往情深，反复不能自己。其《陈拾遗故宅诗》曰：“位下何足伤，所贵者圣贤”。又曰“终古立忠义”。其尊贤、望贤之心昭昭然，而子美与子昂思想感情的一脉相承也明示无遗。

三为确定安边政策。终武后之世，外患孔多，几无宁岁。突厥、吐蕃，肆意侵袭。一方面固由于外族骄悍，反复

无常，自唐太宗以来已有难于对付之处，而另一方面，武则天本乏御远之才、安边之术，对边事譬如，任人唯亲，处置边事每不得当，有以致之。陈子昂本为新进之臣，但他对于边事素来就很重视和留心，对问题有真知灼见，所以能作出颇有分量的言论和深中肯綮的主张，提出了大有裨益于对外政策的意见。他关于安边除患的议论，今能见者有五六篇。现在就他这篇《为乔补阙论突厥表》略作分析，可以看出他在安边政策上的贡献。此文虽是代言性质，但实际是表现了子昂的才识。

陈子昂在这篇文章中说：“匈奴为中国之患，自上代所苦久矣！”文章写出了经过调查了解的突厥的近况，“突厥离乱事迹，参验委曲，穷问往来，窃有以得其真”。其严重的现状是“莫不自相鲸鲵，遞相吞食。流离饿残，莫知所归”。深入按察，知其实情，了解其内部矛盾。他又“以往古之变，考验于今。”于是作出判断，“乃知天亡凶丑之时，陛下收功之日”。认为只要不放过“时”“机”，乘势讨伐，便可胜券在握。他继又从时间上作纵的观察，历引古事，言简而赅。他说秦不能服匈奴，乃北筑长城，“徭役烦苦，人（民）以不堪”。汉高窘迫于白登，汉文致献金帛，但求善和，贾谊所以为之哭，痛“汉文以天下之盛而卑事戎狄”。汉武帝首尾三十余年专以伐敌为务，“中国骚然，大受其弊”，竟不能制单于之命，使之一日臣服。汉宣值匈奴内乱，稽首来降，北方乃无兵革之事。直至哀平得安。于是得出结论：“然则匈奴未灭，中国未可高卧亦明矣！”然后引而论之，其主旨在于待敌之弊；今当敌弊，则正是除患之时。并引古语说

“天与不取，反受其咎”。继又以亲察、亲问得来的大量实情，叙述甚至描绘突厥族类狼狈之状，“自有九姓以来，未曾见此饥饿之甚”，且其内部已现上下瓦解之形。文章确凿地论定了突厥大不利的形势，而大有利于我之征伐。“指挥之间，事业可致，则千载之后，边鄙无虞”。说得未免过分乐观。则又以近世李靖“因机逐便，大破虏庭”之事为证，说不能让李靖“独成千载之名。”夷考其实，在当时尚无最善的对外政策和民族政策的情况下，为了谋比较长时间的安定之计，对突厥的战争既不可永远避免，则必须选择掌握恰当作战时机，庶可收事半功倍之效。子昂对我方的地利条件和军费筹划也有所论述。且突厥外患主要造成者是其族掌权、握兵、野心甚大的统治者，而不是族众。子昂的文章也已显示出这一事实，所以用兵也是为了双方之安。如欲图苟安则终不得安。子昂的文章论此理甚透。问题在于什么时候用兵和如何用兵。子昂的文章深入地剖析并鲜明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所以难能可贵。他对如何治兵、用兵，也提出了言简意赅的意见，就是主将要选，士卒要练。如果“主将不选，士卒不练，徒如驱市人以战耳。故临阵对寇，未尝不先自溃散。遂便夷狄乘利，轻于国威，兵愈出而事愈屈”。这都是切中当时军中积弊的话。

又如陈子昂的《上西番边州安危事》，其论衡形势，权利害，定方略，计长远，也极为精到。此疏是则天垂拱元年所上，子昂甫29岁。其谏则天以十姓君长不奉玺书，妄破回纥部落为理由，不许十姓朝觐事，以为“非善御戎狄制于未乱之长策”。且以自己在甘州所见，“察其志意，所望殊

高；与其言宴，又词多不顺。今更不许入朝谒，疑之以罪，与回纥部落复为大仇，此则内无国家亲信之恩，外有回纥报仇之患，怀不自安，鸟骇狼顾，亡叛沙漠，则河西诸蕃恐非国家所有”。“且夷狄相攻，中国之福，今回纥已破，既往难追，十姓无罪，不宜自绝”。均斟酌恰当之言。文中又谏“以同城权置安北府”之事，以为事不可行，剖析细微，详计利害，亦复精当。他以为若照则天之敕书办去，“则甘凉以北，恐非国家所有。后为边患，祸未可量”。文长不具录。又文中论河西诸州，以为甘州形势极为重要，“观其冲要，视其山川，信是河西扼喉之地”。且“北当九姓，南逼土蕃”左右受敌，但兵不足，粮不积，甚可危虑。“河西之命，今并悬于甘州”。认为“甘州宜便加兵，内得营农，外得防盗。甘州委积，必当更倍”，方能兵食足而边境强。凡所言论，可以说都是全面地看待军事问题和边事问题的观点，而决非就事论事的片面之词、或空谈道理、不切实际的肤泛之论。他如《上军国机要事》、《谏雅州讨生羌书》、《上蜀川军事》、《谏曹仁师出军书》等，或长篇、或短论，都有确切的事实根据，从实际利害出发，着眼全面，计及长远，提出具体的意见和办法。综其所论，是一部活生生的军事学著作和安边之策，在历史上亦应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新唐书·陈子昂传》载入了《上西蕃边州安危事》，并说：“其后土蕃果入寇，终后世为边患最甚。”是则陈子昂安边诸论的历史价值更有所证验了。

杜甫一生关心边事，对陈子昂这些有关边事的上书和献策，当然熟悉，有助于他对边患危机的警觉和在诗篇中向有

关方面多次提出警告。自安史之乱以后，无日不忧，所言多中，因时因地而亦有所不同，面对诸方，各成体系。也可以说在边患大事的对待上，杜子美也是陈子昂的识见和对策的继承者。不过杜不如陈之尚能有其位置，他没有能够作更为实际的调查并且肯切上书，缺乏这方面文章的遗留。他在成都所写《登楼》诗“西山寇盗莫相侵！”情见乎辞，也只能发出几声慨叹了！

四为严斥酷刑统治。武则天专政数十年，自朝廷大臣、唐室宗支以至天下百姓，其无辜受戮、罗织成罪、明珠暗害者盖以万计。《资治通鉴》卷二百五载，周兴、索元礼所杀各数千人，来俊臣所破千余家。索元礼残酷尤甚，太后最后不得不杀之以慰人望。这个杀人的数字已很惊人，而他们入人之罪的手段及杀人的办法尤其使天下后世的人骇异。《通鉴》在垂拱二年就有记载，武则天铸铜柜以受天下密奏，首开告密之门。索元礼等撰《罗织经》数千言，教其徒网罗无辜，织成反状，构造布置，皆有支节，真是一个大“发明”！于是罗织有经，生民无命。“中外畏此数人，甚于虎狼”。他们于酷刑也多所“创造”，残酷刑具特多，所谓“请君入瓮”法，不过是千分之一二罢了。“罗告”一词，于以产生；来俊臣、周兴等人的罪恶行为，史不绝书。仅看乔知之仅因一美妾碧玉之事，触犯了武承嗣，武承嗣竟“讽酷吏罗告，族之”，遭到族诛之惨，便足以想见武后朝的暗无天日到何等地步了！此实我国历史上昏暗时代之一，这种酷刑统治，罗织成罪，也是我国历史上最大污点之一。但是当时的士大夫怎样呢？或者高蹈求安，远避矰缴；或者噤口不言，委屈求

全；或竟助纣为虐，逢迎酷吏。能直言上书者极少。王夫之曾经说过，陈子昂陈酷吏滥杀之恶，求为伸理，言天下之不敢言，而贼臣凶党，弗能加害，固有以服其心而夺其魄者（《读通鉴论》卷二十一）。说得很痛快。他又说，“子昂与苏安恒、朱晋则、韦安石，皆犯群凶，持正论而不挠。”今所见者，唯朱敬则有《请除滥刑疏》（《全唐文》卷一六八），然观其言，谈历史事实多，说一般道理多，只有篇末的几句话说到了武后朝的酷刑之政。他说：“伏愿改法制，立章程，下恬愉之词，流旷荡之泽，去萋斐之牙角，顿奸险之锋铓，杜告密之源，绝罗织之迹，使天下黎民，坦然大悦，岂不乐哉！”的确是大气凛凛，直声震朝。又姚崇《对问冤狱疏》曾说“故天下号曰罗织，甚于汉之钩党。虽陛下使近臣复讯，彼尚不自保，敢一摇手以悖酷吏意哉！”也是一针见血之词，但仍未深论。

只有陈子昂之谏滥刑才是直论再三，而且抓住不放手，说得更细更切。信如陈沆所说，历考武后一朝，唯子昂谏书屡见。子昂有《请措刑科》、《谏刑书》、《谏用刑书》、《申宗人冤狱书》等文。其《请措刑科》为回答武后问事的《答制问事》中的一条。子昂所议论的大事共为八条，而他把“请措刑”作为第一条，可见其意旨和胆识。实与武则天的朝政针锋相对。其意若曰，如不能措刑，废除酷刑、罗织的统治，则其他一切都谈不上。《请措刑科》曰：“臣复见近来诏狱推穷，稍复滋长，追捕支党，颇及远方。天下士庶，未敢安止。”则天下骚然、人人惴惴之状可见。他要求“勅法慎罚，以省刑典”。反对“专务威刑”。严正指出“杀一人则千人恐，

滥一罪则百夫愁”。其《谏刑书》则尤为直指无讳。他说“比者大狱增多”“陛下务生宽典，狱官务在急刑”。“今者系狱囚徒，多极法者，道路之议，或是或非。陛下何不悉召见之，自诘其罪？罪真实者显示明刑，罪有滥者，严诛狱吏”。此数语含讥刺显然。试问一个皇帝岂能自诘天下之狱，明明是做不到的事却望则天来作，这就是说武则天的那些狱吏没有一个不是戕害善良的人，都应当严诛！而且“系狱囚徒多极法者”，足见冤死者之多。滥刑到了这等地步，实在是历史上所罕有。陈子昂不得不提出警告：“夫狱吏不可信，自弄国权，自古败亡，圣王所诫”。陈子昂又在《谏用刑书》中指出：“专任刑杀，以为威断，可谓策之失者也！”明言朝政之失策。又历指酷吏之罪行说：“有迹涉嫌疑，辞相逶引，莫不穷捕考讯，枝叶蟠拏”。“至有奸人荧惑，乘险相诬，纠告疑似，冀图爵赏”。“顷年以来，伏见诸方告密囚累百千辈”，“及其穷究，百无一实”。“一人被讼，百人满狱，使者推捕，冠盖如云”。这简直是铸鼎象物，对那些罗织人罪、屠杀无辜的凶残之徒，穷其形而尽其相，揭露无遗。他还说“文深网密，则共称至公”，更是对朝庭绝大的讽刺。

上述四事，可以说是陈子昂在政治贡献和政治成就上的犖犖大端、衡诸往哲，盖贾生、诸葛丞相之伦。其德行、政事皆足继美前贤，楷式后世。

尚有不能已于言者，厥为子昂在政治上对其乡里西蜀的关注和裨益。陈子昂于其《上蜀川安危书》《上蜀川军事》以及《谏雅州讨生羌书》诸文中，都深思熟虑，为蜀川的免于战乱，蜀民的免于剥夺作了不少实情的分析和长策的建

白。其要旨在于制止官人贪暴，减省军费开支，对羌族勿轻启衅，对蜀财应加保护，使民能活命，国无隐忧，如是等等。其言曰：“蜀中诸州百姓所以逃亡者，实缘官人贪暴，不奉国法，典吏游容，因此侵渔。剥夺既深，人不堪命。百姓失业，因即逃亡。凶险之徒，聚为劫贼（按此即后来杜甫诗‘盗贼本王臣’之意）。今国家若不清官人，虽杀获贼终无益。”又云：

伏以国家富有巴蜀，是天府之藏。自陇右及河西诸州，军国所资，邮驿所给，商旅莫不皆取于蜀。又京都府库，岁月珍贡，尚在其外（按此亦杜诗“珠玉走中原，岷峨气凄怆”之意）。此诚蜀国之珍府。今边郡主将乃通轨一军徭役弊之。使百姓贫穷，国用不贍，河西陇右，资给亦减。臣伏维松潘诸军，自屯镇以来，于今相继，百十余年，竟未闻盗贼大侵而有尺寸之效。今国家甘心竭力以事之，臣不知其故。……

敢于提出最尖锐的问题。其下则以自己在蜀之所察及耆老之平议来分析这一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实为有功于国，造福于乡。其《谏雅州讨生羌书》，列举七事以证成其说，务在息边鄙，休甲兵，勿轻诛无罪之戎而遗全蜀之害。名言说论，语重心长，洵为有益于国家、有利于边鄙、有功于桑梓的一代大文章。清康熙皇帝也曾评此文曰：“子昂本蜀人，故言蜀用兵利害，警切动听”（见《全唐文纪事》所载康熙《古文评论》）。

再其次论陈子昂的文学。先言对陈子昂文的我见。历代及今之论者对陈子昂文章的评论，意见差别不大，但有些问

题还可以深入探讨。最早收集陈子昂诗文的卢藏用所说的一段话颇为知言，也很有代表性。他说：

孔子歿二百岁而骚人作，于是婉丽浮侈之法行焉。汉兴二百年，贾谊马迁为之杰。宪章礼乐，有老成之风。长卿子云之侑，瑰诡万变，亦奇特之士也。惜其王公大人之言，溺于流辞而不顾。其后班张崔蔡曹刘潘陆，随波而作，虽大雅不足，其遗风余烈，尚有典型。宋齐之末，盖憔悴矣。逶迤陵轍，流靡忘返。至于徐庾，天之将丧斯文也。后进之世若上官仪者继踵而生，于是风雅之道，扫地尽矣。《易》曰，物不可以终否，故受之以泰。道丧五百岁而得陈君。……崛起江汉，虎视函夏。卓立千古，横制颓波。天下翕然，质文一变。……故其谏诤之辞，则为政之先也；昭夷之碣，则议论之当也；国殇之文，则大雅之怨也；徐君之议，则刑礼之中也。……（《右拾遗陈子昂文集序》）

这一段议论是陈子昂的知交对他的文章的论定，主要是说他“横制颓波”、“质文一变”。但评陈子昂以前的人也有不尽公正之处，如对徐庾。《新唐书·陈子昂传》的这几句话“唐兴，文章承徐庾余风，天下祖尚，子昂始变雅正。”也与卢文意近。韩愈谓其“始高蹈”（《荐士诗》），柳宗元称其著述比兴能兼（《杨评事文集后序》），旨意皆近。近之论者如高步瀛亦宗《直斋书录》解题之说，以为“韩公以前，文章复古之功，不能不推原伯玉已”（《唐宋文举要》）。岑仲勉谓“唐文起八代之衰，断推子昂为第一”（《隋唐史·第十七节》）。其他论者尚多，无庸具录。

总之，论者以为变骈俪为散体，制颓波而尚朴质，革浮侈而宗风雅，从内容和从形式言，文学起衰弊而倡雅正之功，断推陈子昂为首。这当然是不错的，由此也可证明陈子昂在文学史上应有其崇高的地位。我觉得有三点应当注意到：一是不宜单纯从骈散形式上来判论优劣；二是对陈子昂与其他诸家之文宜作比较的探索；三是对陈子昂的各体文章亦应既掌握其总体趋向又省览其分体差异。我曾篇篇细读陈子昂及同时诸家之文，反复讽诵，深感子昂之文确有大过于人之处。但是其优胜的地方决不只由于他能易骈为散或骈多散少，仅从形式上看问题。骈文自梁陈以来，但重辞采、拘声律、罗典故、求整饬，卒至气板滞而不舒，意晦涩而莫达，语虚浮而无实。而更主要的是它的内容贫乏，大有背于经国大业之旨和便世利民之用。但是也有一些内容充实的文章，义丰辞达，气盛文美，如庾子山的有些作品。初唐王勃等人的某些文章亦然。不过由于骈俪之文越到后来越更追求形式之所谓美而不问言之有物、有益于世与否，所以为不少有识之士所不满。但隋文帝、唐太宗欲以政治力量来改变文风，终因积重难返而变易甚微。初唐四杰，例如王勃，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有志于文风之改变，他在《上吏部裴侍郎启》中，振振有词的说：“自微言既绝，斯文不振，屈宋导浇源于前，枚马张淫风于后。谈人主者，以宫室苑囿为雄，叙名流者，以沉酗骄奢为达。故魏文用之而中国衰，宋武贵之而江东乱，……天下之文，靡不坏矣！”厉言以往文章之弊而思所以振之。在这篇文章中还说：“夫文章之道，自古称难。圣人以开物成务，君子以立言见志”。足见王勃其志

甚大，其力或不逮。杨炯为王勃的文作序，很赞成他对文章写作的意见，但略有异词。足见四杰未尝没有改革文风的意向，今观王勃的文章，共有 90 多篇。绝大部分是骈俪之辞。文字的确是十分精工，某些长篇大作，气势亦盛。但是题材不广，赞佛之作不少，语多浮幻。游览山水之作又占一部分，虽然也有清新之言，但总觉佳句多而精义少，套语多而独特见解少，求如《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的词义俱佳亦不可多得。王勃死时才 28 岁，其精通佛理，多闻故实，辞采粲然，实属未易企及。所以杜甫称四杰之作为“当时体”，誉之为“不废江河”，决非偶然。若就赠序、游记这类文章说，陈子昂写这些题材的文体也无以异于四杰，仍是骈文底子，略有变化，其内容也很少有独特的地方。所以不宜单从文体的改变与否来看问题的实质。《四库全书总目》说：今观陈子昂的集子“惟诸表序犹沿排俪之习，若论事书疏之类，实疏朴近古”。这个评论是对的。但更重要的还在于子昂这类文章，如王勃所言是：“开物成务，立言见志”，而非只是文辞上的“疏古”。而《文献通考》论陈子昂除诗以外“其他文则不脱偶俪卑弱之体”，则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

全面看陈子昂的文章。他各种体裁的文章今存 120 多篇。赋颂之文不过数篇，可以存而不论。表有 40 篇左右，正如陈沆所言，这些都不外乎是“顺例”和“应制”之作，不足以代表子昂之文，也应除开。但如《为乔补阙论突厥》也是极好的文章。他的上书、奏议、论这类文章有 20 多篇，序约为 14 篇，碑铭墓志将近 20 篇，祭文有几篇。这些才应算是子昂文章的本体（其他还有几篇杂体之文，不计）。在这些篇幅

中，他的上书、奏议等二十几篇又是最重要的。论文体，已变俚偶之习，纯真自然。论内容，则都是有物有则，利国利民之言，超越八代，直追先秦、西汉。但又不是一切复古之论，而是针对当时混浊之世的客观现实，匡谬治弊，篇篇皆有为而发。这一方面，本文前一部分论陈子昂的政治中已经有所论列。论文格，则逻辑极严密，条理极清沏，不为支离、模棱之辞，浮泛不经之语，侃切周至，古朴安雅。此所以陈子昂的文章实为处文风正在转变之时，而以其实绩开风气之先，卓然有成，成为文章著作发展转折关键时期之代表人物，而占有无可动摇的历史地位。所谓“唐有天下二百载，而文章三变，初则广汉陈子昂以风雅革浮侈”（《全唐文》卷五一八梁肃《补阙李君前集序》），正在于此；“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亦在于此。这些文章所达到的思想高度，后来“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也还有不及的地方。而这些文章对有唐一代以及后世的政治文学影响都很大。

陈子昂文章的另一部分——“序”，则不仅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说“犹沿排俚之习”，其内容也显得单调平凡一些。但与子昂以前的作者相比，初无板滞之失，较有疏宕之气。这些文章佳句也多而精义较少。如《薛大夫山亭宴序》：“闭门无过，对黄卷以终年；高论不疲，逢故人而永夜”。《送吉州杜司户审言序》：“朝庭相送，驻旌盖于城隅；之子孤游，渺风帆于天际”。其写景物也很有清新之句，如“参差池榭，乱山水之清阴；缭绕阶庭，杂峰崖之异势”（《晖上人房饯齐少府使入京府序》）。至于《金门饯东平序》中的“残霞将落日交辉，远树与孤烟共色”则已先于王勃的“落

霞孤鸞”的名句，后于庾信的“落花芝盖”。如果认为这些佳句都不过是六朝滥调，那也没有什么，因为子昂文章优胜之处本不在此。他在这一类的序文中也偶发议论，如云：“岁月易得，君子疾没代（世）不称；功业未成，君子以自强不息”（《饯陈少府从军序》），也没有特别的地方。

陈子昂的墓志碑铭之作，成就及影响亦大。善发议论，如《九陇县独孤丞遗爱碑》有云：“夫官不必贵，政惟其才，独孤丞上迫宰君，下杂群尉，文墨教令，不在其躬。然力行务仁，推诚爱物，讴吟者不歌其宰，颂议者必归于丞，岂欺也哉！”为芝麻小官吐了一口气，也长了志气。韩愈也有一篇写县丞生活的文章《蓝田县丞厅壁记》，却是寓愤懑于诙谐之中，旨同而趣异。又如《临邛县令封君遗爱碑》云：“夫蜀都天府之国，金城铁冶，而俗以财雄，弋猎田池，而士多豪侈”。论蜀情甚确。此文论为政之道甚细。另外如《汉州雒阳县令张君吏人颂德碑》，此文甚长，煌煌大作，历叙张知古为政之劳苦，施政之多方及政绩之显著。事皆徵实，语无浮泛。气势磅礴，议论精严。如曰：

然则国有大小，政有污隆。遭其和平，则循理之功易；值其凋瘵，则革弊之业难。况罹乎荐瘥，救其涂炭。力倍于中，而功不半之；利尽其仁，而泽未全洽。则我府君当钦明之世，承苛愿之终，緝颺靡之余，遂能抚宁殄残，溥耀敦懿，改制立宪，昭德显仁。奇迹光乎曩贤，惠风穆于兹日，我行千里，而得一贤。传曰：夫用我者，而岂徒哉！

朴实而又浩瀚。又如叙汉州等地荒政之一段云：

噫嘻！昔者苛政未作，封境保安。兹都冲要，矜带全蜀。百濮兼错，万裔之衆。宝利珍货，尽四海矣！迨残猛聿至，蠱贼内江。始于硕鼠之侵，终屠饿狼之喙。杼轴既尽，郛邑殆空。悲夫仲尼云：苛政虐于猛虎。岂猛虎而已哉！

此文当为初唐时期碑文冠冕之作。同时的姚崇、宋璟、崔融等人皆不逮也。例如姚崇的《十事要说》，文亦廉悍，《遗令教子孙文》识见亦高，但远不如子昂文章方面之广、气度之雄。宋璟之文陈词殊多，清气不足。崔融多应制之作，贺瑞之文，其文更远不及子昂。稍后的张说，固然是大手笔，其文典丽矜皇，大半都是骈文之佳什。其才力富赡，但有裨于世道者毕竟不多。子昂其他文章，如《国殇文》之可比于屈原《国殇》，《谏灵驾入京书》为韩愈《论佛骨表》之先导，皆文质并胜之作。故陈子昂为当世文章之伯，其论说、碑志之文影响及于后世者亦至大。近及二张（说、九龄）二李（邕、华）、肖颖士、独孤及、元结诸作者，稍远则更于韩、柳之身而得更大发扬。遗芬不歇，远达宋元以后。这都是彰彰可见的。

陈子昂的诗同他的文章一样也起到了革旧树新的历史作用。他自己就表示得很清楚，他在《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的序言中曾说：“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采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足见他所不满和要变革的是齐梁颓靡的诗风而要树立的是有所兴寄、扇扬风雅之作。序文还说：“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足见他所向往的是这样的诗风。与子昂同时的人

和后世之推崇子昂者，其所议论，也大抵不出于这个范围，大同而小异。他的好友卢藏用论得最早也最好。卢在《右拾遗陈子昂文集序》由文说到诗：“至于感激顿挫，微显幽幽，庶几见变化之朕以接乎天人之际者，则《感遇》之篇存焉”。值得注意的是他作出了“感激顿挫”这个评语。陈子昂自己既说过“顿挫”一词，而又与杜甫自认其诗为“沉郁顿挫”，意义相似。这已经道出了陈子昂的诗对于后代、特别是杜甫的显著影响，而为研讨杜诗渊源者所不可忽。后世以元遗山的对古人每有讥刺，也认为陈子昂扫除齐梁遗风有功，“论诗若准平吴例，合著黄金铸子昂”（元遗山《论诗绝句三十四首》）。明胡震亨《唐音癸笺》引《吟谱》说：“陈子昂初变齐梁之弊，一返雅正，其诗以理胜情，以气胜辞”，提出了理气之胜。清翁方纲《石洲诗话》也说子昂“聿兀英奇，风骨峻上”。其他论者，大率类此。然如卢藏用在一首五古中怀念陈子昂说他“铿锵哀忠义，感激怀知己”（《宋主簿鸣皋梦赵六，余未及报，而陈子云亡，今追为此诗答宋兼贻平昔游旧》，按卢藏用今只存诗八首）。这与杜甫的《陈拾遗故宅》所云：“位下何足伤，所贵者圣贤”及“终古立忠义，感遇有遗篇”。已更深一层地论及陈子昂的心怀忠义，志在圣贤，接触到了为诗的根本在于为人这个道理。综观诸家之言，细读子昂之诗，其诗变革齐梁颓风，固然算得是赫然“平吴”之功，但是子昂之所以能立此赫然之功，最重要的在于他的诗植根于忠义，感激慷慨，皆有为而发。身当混浊之世，胆识过人，忠义形之于吟咏，理、气贯充于诗篇，念在圣贤，情继骚雅，此所以成就甚大而影响至远。故读子昂

之诗必须从圣想之想、忠义之思，清刚之气骨、渊懿之辞采来看它，方能善体作者之心而愈感知其甚大价值之所在。

陈子昂的诗今存 110 多首。以五言古诗最多，约 60 余首。其次五律约为 30 首。五言长律亦约 20 首，以短篇为多，七言甚少。从体裁论，陈子昂的诗主要是五古，是代表唐诗的古诗。钟惺《唐诗归》评张说《杂诗》云：“唐人古诗，胜魏晋者多，今人耳目自不能出时代之外耳”。陈子昂的古诗固不同于齐梁，也不是魏晋诗的再现，而自有其唐诗的风格，是初唐时期最优秀的古诗。

他的古诗，《感遇》38 首占一半以上。杜甫早已赞誉于前，“《感遇》有遗篇”。后人论者甚多，我以为陈沆《诗比兴笺》讲得最好。《诗比兴笺》诚然有些地方失之于穿凿附会，但陈氏解陈子昂的《感遇》诗却很精到。良以陈子昂身处昏暗时期，理想无从实现，抑郁于怀，心有必发之情，而口有难言之苦，托之于比兴、出之以隐晦而为诗，也是很自然的事。信如陈沆所云，杜子美的两句诗“千古立忠义，感遇有遗篇”实为“牙旷”。僧皎然及朱鹤龄“并能缘少陵之词，窥射洪之隐”。而陈沆从史观诗，以意逆志，尤能窥见子昂《感遇》诗篇之所实指。虽然不能说是语语中的，但已可以说是十得八九。此自不同于为李商隐作索隐之难。其他论《感遇》诗者亦不外乎此（例如现代人施蛰存有几首解说亦有所得）。

子昂《感遇》之什，篇篇皆有所指，有为而言，固然可以当作一种“诗史”看，但从诗歌的艺术说，爰引古事及神话传说，不即不离，亦乐亦哀，或云中稍露鳞爪，或雾里忽

见峰峦。或一著痕随即撇开，或一兴言便成深叹。“词旨幽邃，音节豪宕”（二句朱熹语），远师屈原、阮籍而有所发展，篇幅辄短而兴味无穷。其艺术性也是极高的。王夫之认为“风雅源流，于斯不昧”（《姜斋诗话》），良然。子昂其它古诗，如《鸳鸯篇》即物兴感，摹写细微，托意深厚，“岂若此双禽，飞翔不异林。刷尾青江浦，交颈紫山岑”。有一唱三叹之致。论其影响，已开杜子美“杜鹃”之咏。《修竹篇》与《鸳鸯篇》异曲同工，皆词旨幽邃之作。其云“春木有荣歇，此节无凋零。始愿与金石，终古保坚贞”。志节可见。此等诗也可以说是开了杜甫、白居易吟咏草本诸篇之源。《西还至散关答乔补阙知之》及其他赠人之什，也都是弥见风骨之作，如云“功业云台薄，平生玉佩捐”。“还汉功既薄，逐胡策未行”（《题居延古城赠乔十二知之》），都是慨乎其言。乔知之也有赠子昂之作《拟古赠陈子昂》五言古诗，情胜而气骨不足，比较自见。但如《酬晖上人秋夜山亭有赠》《酬晖上人夏日林泉》诸作，清微淡远，似又下启王、孟。其《同宋参军之问梦赵六赠卢陈二子之作》，这篇五古20韵，备见子昂才气，其用韵数句一转，又为一例。其《送别出塞》诗，则又拔剑四顾，叱咤生风，有影响于盛唐的高岑诸人。此诗云：

平生闻高义，书剑百夫雄。言登青云去，非此白头翁。
胡兵屯塞下，汉骑属云中。君为白马将，腰佩骍角弓。
单于不敢射，天子伫深功。蜀山亦方隐，良会何时同。
另一首《登蓟丘楼送贾兵曹入都》亦极精警。

东山宿昔意，北征非我心。孤负平生愿，感涕下沾巾。

暮登蓟楼上，永望燕山岑。辽海方漫漫，胡沙飞且深。
峨眉杳如梦，仙子曷由寻。击剑起叹息，白日忽西沉。
闻君洛阳使，因子寄南音。

陈子昂的五律约 30 首。五律则初唐四杰已定其型，沈宋继起，门户开张。子昂近接诸人，遥领盛唐，影响之大，也不下于他的古诗。即如胡震亨所论，已可见一斑。胡氏认为“野戍荒烟断，深山古木平”（《晚次乐乡县》）、“城分苍野外，树断白云隈”（《度荆门望楚》）等句，“平淡简远，王孟二家之祖”。陈子昂五言排律也有 20 首，多六韵之作，也有八韵以上者。其《白帝城怀古》《岷山怀古》诸作与后来杜甫长律之诗，颇有气息相通之处。五言长律，尤重气骨，且须开阖动荡，层次严谨而转折自然。杜甫五排之作，古今罕与伦比，子昂之作已对杜甫有直接的影响。兹不备论。

陈子昂《登幽州台歌》，古今叹为绝作。论者不少。近见郑临川同志分析此诗（见《南充师院学报》），直闖诗心，评论此诗何所为而作，“古人”“来者”，所指为何，颇有见地。但对于“来者”一词，自来也有人解为此系子昂指后于他而生的后人（孔子说“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来者即指后生。屈原的“去者吾不及兮，来者吾不闻”。都是指生于吾前及生于吾后之人或过去及未来之时间）。我以为两说不妨并存。伟大的诗歌作品往往其客观效果更大于他的主观意愿。情动于中，则形于言；言之既出，又往往大过于他始发之情。有时作者之情意也并不是那么单一；也有时作者之情意为读者以自己所感而补充之、生发之，其效果或感应转大。从这首诗来说，必如郑临川同志之所考证分析，

乃不落空。但这篇诗的确意境深广，所感者也似乎不局限于一时一事。子昂从彼时彼地而发此宏大深远之思（如郑文所详析者）但俯仰天地，慨叹人生，情又生情，感复增感，似又不限于一时一事。子昂此诗，直是问天而呼天。

屈原《天问》是对宇宙及人世之不解者而问之于天；司马迁有言，“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子昂不仅是诗人，也是哲人，感尘世之混浊，哀人生之短暂，志虽大而力莫逮，意虽长而时不与，故呼天而问之。古人往矣，吾不得而见；后人未来，吾亦不得而见，念天地之悠悠，而吾生之忽忽，志士惜日短，则不禁悲从中来，怆然涕下矣！也可以说陈子昂《登幽州台歌》是一个欲大有为之士对无情造物的一声抗议，是茫茫宇宙间感叹人生、感怀人类历史的一曲悲壮之歌。但并不消极。古人吾不得而见，来者吾不得与之言，则唯一可以把握者唯有吾生，寸阴是竞，自不可怠忽已！屈原说：“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李白说：“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杜甫说：“冉冉征途间，谁是长年者”，苏轼也说：“哀吾生之须臾，羨长江之无穷”都是此意，也都不是消极之辞。盖唯有清楚地认识人与宇宙的关系，有涯与无涯之关系，乃能甩勉人生，愈奋发而有为。我想，后人之读此诗者，往往会于百感横生之后，拔剑而起，仗剑而前行！从前王闿运称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孤篇横绝，遂成大家。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不是孤篇，但是仅此一篇已足横绝千古了。

陈子昂文学对后代的影响，前面已逐处论到，宋人陈后村说：“太白韦柳继出，皆自子昂发之”盖广泛而深远。但

是，应以对杜甫的影响为最著，前面亦已论及。在神不在貌。心同迹则同。子昂与子美同为有致君尧舜的理想，又同居不可有为之世，子昂谏书屡上，杜甫亦有谏言，心同热而官同冷，子昂遇害而卒于壮岁，杜甫则愁病相侵亦未尽其年。其于文学，又同有起衰扶弊、开时用世之心，圣贤之志，豪杰之情，使二人在文学上皆大有成就。杜甫来蜀，游于陈拾遗的故里，流连低回，盖不忍去。子美入川以后诗，尤可见其受陈子昂之影响者大。子昂的“凤凰”之作为有影响于子美“杜鹃”之咏；子美的“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即子昂“不然拂衣去，归从海上鸥”（《答洛阳主人》）及“凤歌空有闻，龙性讵能驯”（《酬李参军崇嗣旅馆见赠》）。他例尚多，盖不仅词语上有渊源，更是思想感情及诗歌风格上的相通相承。昔人说，陈子昂“能独起一格，为李杜开先”（《诗概》），实则对杜诗的影响尤大于李。

而前人对陈子昂的了解，也应杜子美之言为最深最实。杜甫侨居巴蜀，对蜀中历史人物，景仰者多，但在政治人物方面以对诸葛亮为最，在文学人物方面则以对陈子昂为最。有关陈子昂的诗有《冬到金华山观，因得故拾遗陈公学堂遗迹》《陈拾遗故宅》，兹引后者以结束此文。

陈拾遗故宅

拾遗平昔居，大屋尚修椽。悠扬荒山日，惨淡故园烟。
位下何足伤，所贵者圣贤。有才继骚雅，哲匠不比肩。
公生扬马后，名与日月悬。同游英俊人，多兼辅佐权。
彦昭超玉价，郭振起通泉。到今素壁滑，洒翰银钩连。

盛事会一时，此堂岂千年。终古立忠义，感遇有遗篇。

此诗题目是《陈拾遗故宅》故所写决不脱离“宅”，大屋修椽，素壁银钩，可以想见。但主要是人，对陈子昂作了较为全面而甚精当的评定。“位下”一联，即孟子重天爵而轻人爵之旨，贵在圣贤，杜于子昂为知心，而尊重子昂者亦至。“有才”四句，指出了陈子昂在我国文学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及其继承关系。“公生”一联则指陈子昂在蜀中的地位，屈指可数，乃杨马后的一人。其下数语，以“盛事会一时”了之，以为秉权不过一时，而真有益于国者乃有千古。“终古”一联为结语，明示“忠义”一词以论定子昂，盖不仅称其文学之美而更赞其德行、政事之高。

陈子昂，无论在政治上、文学上都在中国历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固然他不是也不可能没有缺点，例如其颂扬明天朝庭的某些文句，虽属随例之作，但过重的话也是一瑕。其文章局于时限，某些篇什也未能摆脱齐梁余习，诗歌在新体制的创造上发展不大。这些都可以说是不足之处。但一瑕岂能掩全瑜。陈子昂在我国政治历史上及文坛、诗坛上所已经起到的拨云雾而现光明，革颓靡而树风骨，御暴虐而称善政，疾强权而重民生的多方面作用在当时是芒寒色正，对后世是泽远声宏。

陈子昂与杜子美两位拾遗，先后辉映，永照千古文坛与诗坛。陈子昂未能见到杜子美这样的“来者”，但作为杜甫的先行者应当无愧；杜子美作为陈子昂的后来牙旷也终始无负。故合著二者于篇。

1988年3月

锦江春色来天地

纪念杜甫诞生 1250 周年

“锦江春色来天地”^①，才过了元宵灯节，成都已经是春浓如酒了。

成都郊区大部分是蔬菜田，一望无涯的各种菜蔬，葱葱茏茏，油光水滑，像绿色的丝绸覆盖了大地。偶有一两块油菜田，像黄金的岛屿呈现在绿波中间，黄灿灿、金晃晃地射人眼睛，越显得春光明媚。“二十里中香不断，青羊宫到浣花溪”（陆游诗）。浣花溪，百花潭，树密而水清。溪水曲折萦回、饶有情意地穿流在菜田花树之间。两边岸上，新栽的杨柳枝枝弱，才发芽几天就抛出了万缕绿丝，好似十五六岁的少女，晞发于阳光之中。“村村自花柳”，我傍着清流，来到了草堂。

成都春浓，草堂的春色更浓。高大的楠木、松柏和许多经冬不凋的乔木，各以它们高标挺秀的老干新枝伸向天宇，洒下了满园绿阴。草堂民族形式的平房建筑，亭台廊馆，都静幽幽地荫庇在大木千章之下。工部祠后面有万竿修竹，“苍翠拂波涛”，绿篠摇动，白云在上面飘流，远远望去，似乎是绿波中的点点归帆。竹外的桃花、李花，玉兰开得正好，光艳照人。草堂里的密叶繁阴，稠花乱蕊，把玻窗、画

屏都映照得五彩斑斓。我特别留意的是那些桧木树。草堂内外约有 5000 株桧木树，是成都市少年儿童在好几年前为了体现“桧林碍日吟风叶”的诗意而栽种的。果然，“饱闻桧木三年大”，它们早已成林；春天，又长出了新的嫩叶。我想当年种树的少年儿童，大概也快要长大成人了吧？

这时游人不多，草堂分外宁静。只听见春鸟飞鸣，树叶低语和参观者偶尔一两句交谈声。“心清闻妙香”，不知从哪儿吹来了一阵阵的香风，——这是幽兰的芳香。我们怀着“高山仰止”的心情，升堂（诗史堂），入室（杜甫纪念馆）。

杜甫纪念馆的一部分展室内，全是杜甫诗意画。一跨进门来，就走入了一座艺术之宫。这儿是具有特殊新颖色彩的画廊。集众家的手笔，绘出一人的诗意，反映了 8 世纪唐帝国的一个动乱时期以至漫长的中国封建主义时代。它们记录了祖国壮丽的名山大川，淳厚的民情风俗；描绘了在残酷的封建压迫下劳动人民伤心惨目的景象和封建贵族荒淫无耻的生活；也画出了诗人笔底的成都草堂和栩栩如生的花卉、翎毛。

杜甫的集子内有不少题画的诗，但诗人绝不肯仅仅为应酬而作。在一幅佳作的面前，他总是“兴与烟霞会”，“对此兴与精灵聚”，那么地聚精会神，刻意创作，对画题诗。而我们的画师也“不是无心学”，特别是解放后的画家都是有心人，都能深切体会诗人的爱憎，对诗情诗意，心追力摹，传神于丹青，为诗作画。诗情画意两相结合，使你流连忘返，举步难移。

我惊佩于《又呈吴郎》的工细。这幅画把诗人晚年更加

同情贫苦人民的深厚感情以生动的艺术形象再现了出来。堂上，诗人似乎在劝说吴郎：“堂前扑枣任西邻”，“不为困穷宁有此！”堂下，“无食无儿一妇人”，手持竹竿，背倚枣树，似乎在窥察堂上的动静，有所希冀也有所畏惧。但是诗人恳挚的姿态，使人感到堂上堂下，了无遮拦，诗人的感情与人民的感情正相交流。“只缘恐惧转须亲”，从前读此诗如闻其声，现在通过画师的创造，更使人触摩到诗人对穷苦老百姓的深切同情和无限体贴的伟大胸怀。而诗人周览宇内，“正思戎马泪沾巾”的精神也溢于纸上了。已故的齐白石老人，94岁时画出了诗人在草堂所吟的诗“细雨鱼儿出”、“枇杷对对香”等四幅诗意图。其中的“枯棕”，本是诗人寓意之作，刺剥削者剥民有如剥棕，使本具岁寒之姿的棕榈，竟先于蒲柳而凋丧。这张画难于落笔的地方是一个“枯”字，尤其是要通过“枯棕”的表现，反映出诗人“使我沉叹久”的心情。我们的老画家意在笔先，苍劲的几笔饱含怒意，并题上杜甫诗句“有同枯棕木”，掌握住了这篇诗的精义所在，给人的启发不少。而“荔枝”一幅，朱实累累，丰腴可爱，画的是《病橘》诗中的两句诗意：“忆昔南海使，奔腾献荔枝”。它有着深广的历史意义。两句诗一经题在纸上，荔枝的颜色愈鲜，而封建统治者的齷齪荒唐便愈觉可憎。诗画相成，达到了血肉不可分离的境地。

草堂管理处搜集并征求了杜甫诗意图和墨书数百件，新作品还在源源而来。我们的画家用他们风格各殊的画笔，萦绕着历史的风烟，映带着草堂的花月，更蕴含着伟大诗人的激情和血泪，绘制出了各有特色而又统一于杜诗的总的情意

中的诗意画；构成了琳琅满目、百花齐放的民族画廊，亘古常新的锦江春色。

看了诗意画，时已当午，窗外的阳光分外耀眼，我的心里也感受到一种巨大的热力。想到我们的诗人最伟大的地方就在于他的“热”。那一种愈老愈挚也愈老愈炽的“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热”。从诗人几十年的诗歌创作中，使人深深感到他对祖国、对人民、对家人故旧、对文学艺术莫不是满腔热情，满怀热望；有时他悲歌流涕，也流的是满眼热泪。

诗人火一般的热情，植根于他对祖国、对人民一往情深、真心真意的爱；植根于他的强烈的爱憎和分明的是非感。如果说诗人早年的“穷年忧黎元”、“下悯万民疮”，基本上还是站在客观立场上的热烈的同情心，那么，在被遣归家后的“请为父老歌……四座泪纵横”，已进一步趋向于人民。在成都时，遭田父强邀饮酒的“欲起时被肘”，以至在夔州时对一贫老归人的“只缘恐惧转须亲”，则是更进一步地与田父野老亲如挚友并感到与穷人有相同的命运了！

诗人对人对物也都是热其所当热。他对李白是极热的。那不仅因为“白也诗无敌”，清新俊逸，令人倾倒；还更由于李白的“嗜酒见天真”；由于李白的蔑视一切权贵，佯狂可哀；由于“世人皆欲杀”。他对自己的妻子是热的，那不是一般的“笃于伉俪之情”；还更由于“老妻寄异县，十口隔风雪。谁能久不顾，庶往共饥渴”，遭逢乱世，同受苦难的命运，把他们的心紧紧联系了起来。草堂内的花木禽鱼，都得到诗人亲手的培植和爱抚，高楠，丁香，黄莺，蜻

蜓，他都巨细不遗地为他们唱出赞歌；而“新松恨不高千尺”，虽然这是有寄托的诗句，但诗人对于良木嘉树无比热爱的心情也情见乎词了。

诗人对诗歌创作是炽热的。他的热诚真到了“诗成泣鬼神”的程度。诗人是以诗为史，将身许诗，对诗歌创作有着自觉的、极强烈的责任感，这是与封建社会里的不少士大夫大异其趣的。他曾说，他“不敢废诗篇”。请听，这是何等坚决的、出自内心的诗的誓辞！只有忠于祖国和爱人民的诗人，才会对诗歌如此的炽热。而表现在创作的时候是“学诗犹孺子”，“新诗改罢自长吟”，“语不惊人死不休”；十分的虚心，百倍的努力，绝对的执着，无穷的爱和火热的心！

诗人纵使在“羁旅病年侵”、“天地日榛芜”的穷途末路中，对祖国和人民也依然满怀着热望。诗人垂老之年，虽然情绪有时不免衰飒，但是壮心未已，希望人民过几天安乐日子的迫切心情从总的说来是至死不衰的。诗人在草堂所作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那种宏伟的志愿是不用说了；在夔州所写的“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这种伟大的幻想也不用说了；就是在湖南所写的《风疾舟中伏枕书怀》这一篇绝笔之作也还谆谆道及“公孙仍恃险，侯景未生擒”，疾恨于杨子琳、臧玠等一般乱世军阀，隐然有投军有北、拨乱反正的殷切期望。

诗人的热泪总是流向国家人民，“少陵野老吞声哭”，“痛哭松声回”，都不是绝望的眼泪，在涕泗长流中更认清现实，关怀祖国，靠近人民。而“邻人满墙头，感叹亦歔歔”，“歌罢仰天叹，四座泪纵横”，更是与人民的热泪相交流。晚

年登岳阳楼，戎马关山，凭轩流涕，这是我们的诗人把几十年的家国忧伤之感和千万人民的号泣痛苦之情，凝聚在一把眼泪之中而洒向白浪滔滔的洞庭。使人悲歌，使人慷慨，给人以冲击、鼓舞的力量，这一把眼泪，它蕴藏着多么巨大的热力啊！

诗人也有“冷”的一面。那是对那些不仁的贵人，炙手可热的权臣，纵暴杀人的将军，酒肉腐臭的朱门和黄金浪掷的恶少。总之，是当时封建朝廷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那些残民以逞的“鸱枭”、“虎狼”之徒。对于这些人，诗人完全不是什么“温柔敦厚”、“宽厚和平”，他是“嫉恶怀刚肠”。对人民越热，对这些人越冷。诗人对他们冷眼相觑：如说，“唐尧真自圣，野老复何知？”“自古圣贤皆薄命，奸雄恶少皆封侯。”而更多的时候是出之以冷嘲，予以无情的揭露：“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是刺明皇、贵妃，“独使至尊忧社稷，诸君何以答升平”是刺朝廷诸大臣。再如“熊黑咆我东，虎豹号我西。我后鬼长啸，我前狻又啼”，这更把黑暗社会阴森恐怖的形象描绘无余。有时简直是横眉冷对：“但觉高歌有鬼神，焉知饿死填沟壑”，我行我素，宁死不移的精神也跃然纸上。至于“恶竹应须斩万竿”，则是对残贼之人大张挞伐、除恶务尽的战斗精神的充分流露了。

诗史堂上悬挂着陈毅同志所书的一幅对联，就是杜甫的这两句诗：“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陈毅同志认为这是杜甫最好的诗。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诗人未能彻底突破封建思想的束缚，未能深察人民痛苦的根本原因，这也表现在某些诗篇上。但是，这不过是荧煌光焰中的几点轻

烟，减不了杜诗的光采。“不废江河万古流”，我们的诗人以诗为史，秉笔而书，翻起了诗歌艺术上的热浪和巨澜，波裔云丽，源远流长，而沾丐无穷。诗史堂的正中有朱德委员长撰书的对联：“草堂留后世，诗圣著千秋”。这是对诗人最恰当的评定。

纪念馆内还陈列着毛主席来游草堂的一组照片。毛主席的来游，给草堂带来了光辉。草堂和纪念馆正是在党的无微不至的关怀下而得到发展和建立起来的。为了了解近一两年来草堂的进展，我又来到草堂管理处。

草堂管理处同整个草堂一样，也是春色与诗意交融。管理处的后院内有一树盛开的垂丝海棠，嫩绿的叶子陪衬着粉红的花朵，千丝万蕊，临风摇曳，它的右上方是置书万卷的藏经楼。上面几间平房窗明几净，墙壁上满是杜甫诗意画。管理处的同志热情讲述了近年来草堂的新发展。

草堂现有自宋迄今的杜诗注本 155 种，连同其他有关杜诗的图书共 400 多种；拓片、实物、诗意画、法书等各项文物 2200 多件。每一种书和每一件文物都来之不易，由于管理处的辛勤搜集和全国各地的积极支持，才使他们荟萃一堂。其中如元刻杜诗多种和明人画《饮中八仙歌》都是海内仅存的珍品。藏经楼宽敞幽静，诗卷与文物相倚，有如“珊瑚碧树交枝柯”^②。管理处的工作人员，既要整理文物，布置展览，编辑资料，培养花木，还要接待从全国以至世界各地不远万里而来的参观者，几年来接待的客人数以万计。他们还要解答来自各个方面所提出的有关诗人及其作品的种种问题，逐渐形成杜诗研究的一个中心点，充分发挥所藏资料

的作用。又还要“重寻子美行程旧”（陆游诗），亲到各地探寻诗人的遗迹、遗事。目前除陕北和甘肃还没有直接派人去过外，其它凡是杜甫走过的地方，都已经“步履随春风”，一步一探寻，发掘和搜集到的“地下矿藏”与“口上碑文”不少。他们还愉快地担负起传播和普及历史文化的责任，使杜诗精华为广大劳动人民所掌握和吸收，诗人的高贵品质为人所了解和学习，以促进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发展。除安排各种展览和出版通俗读物而外，还经常组织赛诗会、赛画会、赛歌会，一年四季，花开不断，热闹非常。今年纪念诗人诞生1250周年，他们还有一系列动人的计划。我深深感到：他们工作的严肃、活泼、新鲜和富有创造性，本身就是一首好诗。

怀着激动的心情，我来到工部祠内诗人的塑像前，从祠内望出去，草堂真是风日清美，花木鲜妍，房舍整洁，文物粲然。在我眼前忽然展开了我童年时候来到这里的景象：塑像还是这一座，颜色却旧得多；草堂内有十几张茶桌子，几个和尚在卖茶；草堂各处的墙壁都被污损，竹子树木也被雕坏，写满了某些游人的“大作”和“大名”，甚至诗人的衣衫也被涂抹和刻削。我至今还记得我的父亲游草堂诗中的一联：“煮茗嗔僧懒，题诗笑客勤”。我的眼前又展开了另一番景象，那是解放前夕的草堂：花木被摧残了，楹联被烧毁了，诗人一身难保，塑像也被破坏了，诗史堂变成马圈，工部祠住着伤兵，草深没胫，游人绝迹。当时的人曾有这样几句形容的话：“草堂草堂，有草无堂。荒烟蔓草，败壁颓堂。”

我更想到1200年前，诗人始到成都，“主人为卜林塘幽”，得到几个朋友的帮助，在草堂定居下来。可是草堂的修建，主要是靠他自己的惨淡经营。他常常写信出去觅桃树，觅桤木，要松树秧子，要绵竹，自然有送来的也有未送来的。他在草堂的一段时间，虽然锦里春光烂漫，花柳无私，但是“恒饥稚子色凄凉”，也常常厨灶无烟。最后不得不被迫离开。1200年后的今天，“为卜林塘”的主人，却是新中国人民；杜甫草堂虽然处在成都一隅，却为全国人民以至全世界人民所想望；草堂的光辉照耀着世界上为人民的事业而歌唱的进步诗坛。波兰作家协会副主席的题字说得好：“中国人民把诗歌放在这样高的地位，这点很重要。”是的，只有今天的中国人民才真正懂得诗歌的巨大意义，更加热爱为人民说话的诗人，才会把诗歌放在这样高的地位。我们今天可以说：“杜甫草堂天下稀”^④。

我仿佛看见，诗人杜子美已经离开了自己的座位，他走向人群中，他在倾听赛诗会上宏亮的诵诗声，他在观赏众美如云的诗意画，他在抚摩少年儿童为他栽种的青青的桤木。1200年间事，有如噩梦初醒。他惊叹于今天才真正是“锦江春色来天地”，他迎着春光，离开了草堂，经巴峡，穿巫峡，下襄阳，向洛阳，重游齐赵，再历咸阳，他的足迹遍于中国。他要把自己的第二度生命再献给祖国，献给诗，他以自己的凌云健笔，写出波澜老成的格调，最清最美的诗句，为新中国写出最新的篇章。

1962年

注:

- ①杜诗《登楼》，其他凡未注明的皆杜诗。
- ②韩愈《石鼓歌》
- ③杨慎《泛舟浣花东臯》。

不废江河万古流

——纪念杜甫诞生 1270 周年

时光真如流水，前一次纪念杜甫诞生 1250 周年的情景还历历在目，转瞬之间，便过了 20 年。记得当年写过一篇以《锦江春色来天地》为题目的纪念性散文，为草堂的浓郁春色录了相，为我们新社会所创建的杜甫纪念馆的特殊成绩唱了颂歌，为我们的诗人的伟大情操和不朽诗篇发出了由衷的赞叹。20 年前，我一直是带着激动的心情游览草堂，参观纪念文物，写纪念文章，参加纪念会。前思古人，后思来者，怀抱着无限景仰的心情，更怀抱着无限信心和希望。

历史并没有欺骗人，与历史前进轨辙相符合的希望也永远不会落空。20 年后的今天，我们又在党的领导下以更加激越、更多感慨的心情，来筹备以更为充实的纪念内容纪念这一位“不废江河万古流”的伟大诗人，同作馨香之荐。

前度刘郎今又来。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关心草堂的同志和广大游人都带着一种获得胜利的喜悦之情重游草堂。他们详问草堂的遭遇，细览草堂的风光，谛视诗人的塑像，寻读草堂的楹联，都感到放心了，满意了，可以向还未来游的亲友们欣然转告了。他们都点头而笑，而又昂首以思。

人们思量着在那些“眼前列柵械，背后吹笙竽”^①的岁

月里，1200年前的诗人也竟然在劫难逃。那些时候，草堂笼罩在愁云黯雾之中，花木奄奄无生气或大被摧残；匾额、楹联被那种比卷掉屋上三重茅还大的风通通刮走了。例如工部祠内清代尊经书院山长王闾运的一副联语，祠外清代名书法家何绍基的一副七字短联，为历来游人所称道，也都无影无踪，许多杜甫诗意画和杜诗书法也不知何往。连陈毅同志两次书写的最能表现强烈爱憎之情的杜甫诗句“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的对联，也早已隐身不见。除了“草堂书屋”那几个字的“左书”^②安然不动而外，遍草堂几乎成了一座没字碑！——不，说它是没字碑也太不公道，它从头到脚，遍身皆字，到处是巨幅标语、口号。斗大的字加上许多比铁锤还大的感叹号。黑森森一大片，好像要攫人！

“词林根柢颇摇荡”^③。被人发现还没多久的中国诗歌历史上的“双子座”中的一颗星，一霎时竟黯无光彩（其实另一颗星也未增辉），杜甫在中国历史诗坛上的地位岌岌可危，因为他绝对不能忝列“法家”之数，只能是被当作批判对象的“儒家”一流。有人煞费苦心地想在诗人的政治见解和诗歌作品中，嗅出一点“法家”气味来为他辩护几句，当然也不能自圆其说，毫无实效。大学中文系对杜甫不敢作公正的评价，连中学语文课本上本来少得可怜的几首杜诗也被夷夷殆尽，中学生不知杜甫为何人。岂止蚍蜉撼大树，影响所及，有时连著名学者也竟不免附和。诗人1260周岁的生辰，当然只有深夜静悄悄地过去了。

但是人们的心却并不平静，在草堂工作的同志也并没有屈服于邪恶势力。他们相信党，相信几十年来在党的教育和

影响之下，觉悟甚高，坚决跟着党走的人民大众，相信乌云终会过去，阳光岂被长掩。他们在心里一次再次地暗诵着陈毅同志曾经挟着愤怒之情为草堂大书特书的杜诗条幅“不废江河万古流”！坚信江河不废，诗圣杜甫及其诗歌就抹煞不了；春兰秋菊长无绝，草堂的一花一木也必将长久地欣欣向荣于和风丽日之中。

“四人帮”被粉碎了，草堂里的大小楹联首先就从他们潜藏着的地方站将出来，各就其位。如王壬秋、何子贞回到工部祠，顾复初回到大廨，而诗人的五律一联“万里桥西宅，百花潭北庄”依然饶有诗意地悬挂在草堂正门，浣花溪前。游人才恍然大悟于草堂工作人员的苦心孤诣。尤其有趣的是，我们的一位老师塾江李植（字培甫）先生，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的参加者，大学校的老教授，他曾经应草堂之约，为工部祠补写了匾额。篆书三个大字“工部祠”奕奕有神，端凝厚重，字如其人。似乎幸运地一直未被取下，但李先生的名字却不见了，看起来好像原本就未署名一样。但在“四害”被驱除后又过了一段时间，“李植补书”四个字和印章，像魔术师玩魔术一般忽然又显现了出来，颜色朱红，笔画完整，无一点斧凿痕，真是令人惊异、佩服，更感到草堂工作人员也算得是“其操心也危”！可见公道自在人心。

杜诗屏联、条幅、诗意画和杜诗各种板本也大体无损，又陈列得井然有序，使有心的参观者都有如见故人的亲切感。特别是藏经楼上的藏书，珍本、孤本，完好无缺。这真是“叱呵守护疑有神”^④。而其实是由于人的竭力守护。工作同志，篝灯值夜，夹壁藏书（用大幅“语录”构成的夹

壁)，缥缈处处，备见丹心颗颗。听说最近将由政府划拨专款，为草堂修建一座设备完善的书库和最方便的阅览室，以飨杜诗的阅读者和研究者。

说到杜诗的研究，十年动乱中也并没有完全停止，有些人还是在背地里暗下功夫。黄钟终不会毁弃，瓦釜只能是暂作“雷鸣”，不废江河万古流，人们的心里是有数的。当1980年好雨知时，花重锦官城的时候，在党和政府领导同志的建议、倡导之下，破天荒第一次在锦官城筹备并成立了“成都杜甫研究学会”。据说关于我国古代文人及其作品研究学会，除了曹雪芹和他的《红楼梦》而外，在当时还没有第二个。

杜甫当年在成都草堂有诗云：“岂有文章惊海内，慢劳车马驻江干”；我们今天要说，正因为诗人大有文章惊海内，诗卷长留天地间，所以在今天才会是江干车马，翩翩来集。花径柴门，呈现出许多光景；曲栏水榭，吸引着远近宾朋。不仅惊海内，而且惊海外。十年动乱后，不少仰慕杜甫和研究杜诗的海外同胞和国际友人都寻途而来，不辞万里。他们都惊叹于草堂的风光依旧，声誉日隆；惊叹于1200多年前的古诗人在诗歌创作上能有这样高的成就和如此深远的影响。他们或续草堂的旧梦，或访杜学的新知。而邮寄有关书册和图片者尤为不少。记得前年初秋，日本早稻田大学中国古典诗歌研究访华团专程来访，草堂和学会组织了几个同志作主人，虽然主客大半语言不通，但学习、研究杜诗的共同愿望使大家弥觉情亲，唯见翻译同志口不暇给，不觉花砖日影之移。后来这个访中团的团长还从归途中寄来访问草堂的

七言绝句，我们也报之以诗。诗有句云：“宇宙蜀城不再偏”。这纯系写实。杜甫在草堂时曾说“幽栖地僻经过少”^⑤，后来又有诗说“宇宙蜀城偏”^⑥。但是，随着这几年来的拨乱反正，还由于蜀中山水的雄奇，尤其是杜甫的精神感召，国内外来游、来访的人，日见其多。去年学会开年会，湖南耒阳县文化馆同志也应邀前来，他的发言辨伪求真，使与会者都很感兴趣。牛肉白酒，自有当地的遗闻；荒草空坟，也为四方所关注。耒阳同志谈千年前的诗人旧事，好像就发生在昨天；而我们对千里外的诗人遗踪，也倍有亲切之感。幽栖不再僻，蜀城不再偏，子美的远近行程也都历历可瞻。去年夏秋间草堂和学会还组织了一些同志分向西川、东川二路，步诗人行踪，探幽访古，证史证诗，颇有所获。

有“红学”，自应有“杜学”。由于党和政府的倡导、鼓励，人民群众的关怀、期望，专家学者和一般杜诗研究者们都深深感到在杜诗研究领域中也急需弥补十年动乱中所受到的种种损失，澄清十年中被搅浑了的许多问题。定要在前人研究的成果上不断前进，做出新的成果来。仅从成都杜甫研究学会在两个春天中所开的两次大会收到的许多篇研究稿件来看，都恍如春水乍生，使人眼明。汲古得修绠，有一定的深度；3月桃花浪，也相当的宽广。我觉得很多研究者都是解放了思想而又出之以公心，虽然论文也可能有精粗深浅的不同，但都是为了学术的发展，本着热爱诗人的感情，文章也的确有不少创见。在互相研讨之余，都更感到杜甫虚心称道他人的诗句“不废江河万古流”，他自己就当之无愧。

而过去对他的诗毕竟研究得还很不够。随着我们国家的兴隆昌盛，世界文化的不断交流，向杜甫学习，对杜诗研究，将会发掘愈深，方面愈广。日月逝矣而光景常新，江河不废而求索靡已。关于杜甫的研究，必将有新时期中高潮的到来，而其椎轮当在今朝。

重游草堂，老冉冉其忽至，思乙乙而若抽。来的次数不少，想得也愈多。记得20年前在《锦江春色来天地》那篇文章中我曾说，读杜甫诗使我感受最深的，是他那种对祖国、对人民、对朋辈、对诗歌创作都一往情深的热烈的感情。“叹息肠内热”是此老一生的心性，愈老愈热，愈老愈执着。但他也有冷的一面，那是“疾恶怀刚肠”，诗人对人对事是并不含糊的。我觉得我们今天要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和文艺，诗人的品德也有很多值得我们注意、借鉴和学习之处。杜甫对于诗歌要作到“毫发无遗憾”，对人则“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严于律己而乐观人善。如果说“文人相轻，自古而然”（这句话当然不一定恰当），这在杜甫的立身、行事和写作上却找不出半点这种恶习的影子。他对屈原崇敬，对宋玉、贾谊也同致仰慕之忱；也正因为对宋玉的赞扬，遂招致“抑屈扬宋”之讥——这只能是误解。对曹植称之为“波澜阔”，而对魏武也甚尊重。对陶潜虽然似有微词，其实是深有所喜（黄山谷以为《遣兴》诗乃藉陶以解嘲）。《羌村三首》，有人认为颇似渊明，也并非无据。对鲍照等六朝人物都有极其恰当的评论，而且学其所当学；评鹭的话句虽然不多却甚有分寸。对于不太为当时人注意的阴铿也能独抒己见。对庾信更是反复致意，不以一眚掩诸

美，且许之为萧瑟江关。对唐初的陈子昂极钦企，谓为“公生扬马后，名与日月悬。”但对四杰也并无偏见，且能力排纷纭的众议，扬美而辨诬。评价之高，非大胆、卓识者不能作。对同时的李白，尤寄关心、倾慕的深情。“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实闻慨叹之深；“匡山读书处，头白早归来”，益见关注之切；而“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又完全可见以切磋琢磨、无所假贷期望于相知者的至乐与高谊。对王、孟、高、岑以至苏涣，无论相游短长，交情深浅，都能窥人之长，扬人之善，有悱恻的情意，无傲岸的辞色。他与高适的进泪幽吟、人日酬答，更传为历史文坛上的佳话。对苏涣的倾倒、谦挹，使今世的论者也不得不叹服。凡此种种，不仅可窥诗人识见的卓绝，而且可见诗人品德的高超。

“转益多师是我师”，故能成就杜甫之大，昔人已有杜诗集大成之说。杜甫对前代和并世诗人的一长一善和民间诗歌的优良之处，都能不捐不遗，且以为师。这种广阔而谦虚的胸怀，在历史人物中是比较少有的。但转益多师而能翼翼独造，不受时世拘囿，不为优孟衣冠，在诗歌创作上能够多方面地探索，而有日新又新之境，此物此志，到老不衰。“语不惊人死不休”，正在于主要是这种独创精神要使人惊。如果是大而无当之语，人云亦云之辞，一成不变的格调，四平八稳的章句，那又有什么值得使人惊的地方呢（“为人性僻耽佳句”的“佳句”，似乎不宜单纯地理解为个别的句子）！此所以杜甫对唐宋的诗歌至少是笼罩了中、晚诸家，并开启了宋人两派（王闿运的联语有句云：“将平生硬语愁吟，开得宋贤两派。”意指黄、陆）。正是由于我国历史上有不少人

具有像老杜这种不断求索、戛戛独造的精神，才使我国历史文坛的花朵与日俱新，而历史文坛的步伐与时同进，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严于律己而乐观人善，转益多师而戛戛独造。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做学问、搞创作的人最值得向杜探究、以杜为师的重要方面。

几声啼鸪，把我从沉思中唤醒过来。眼前已是一片春深。清明才过，一番风雨，桃花零落；浣花溪水水西头，垂柳万丝金。这时草堂游人不多，清幽独胜。林树恰如新沐，庭院深深几许。我不禁自语道：草堂真是个好地方！想到自己，自少至壮而至老，观尽了草堂四时的景物，也看到了它数十年间的沧桑。犹记国庆10周年时，应报社之约写了文章，记叙了草堂四时之景。现在很想看一看当时是怎样一个景观，翻检带来的旧报，纸已泛黄，果然有如下的一些句子：

现在的草堂真是幽深静蓊，诗意满园。春天，“桃花逐水，柳絮随风”……夏天，一到草堂，你就会爱上那万竿修竹，一天凉意。在翠柏、高楠的密叶浓荫之下，草堂真是一碧无尘。……到了秋天，又是一番情况，“秋水才深四五尺，野航恰受两三人”，好像是今天才写的诗句，那么新鲜。严冬天气，梅花开放，草堂管理处苦心搜集来的各样名种，如绿萼、白梅、粉团、朱砂之类，一时盛极。秾香艳色，又不是“江路野梅香”所能比拟……

23年过去了，草堂今日的风光，却也不下于昔日，也

许还有过之。主要是由于草堂主管者的刻意经营，草堂花工的辛勤培植和各方面的热情支持。但有些地方也许还不如50年代，那便是人们对花木和环境清洁的爱护。现在往往会看到草堂花木的枝干有新的伤痕，地面多痰唾、果皮。50年代那种有如“会须上番看成竹”^⑦和“不唾青城地”^⑧的自觉爱护之情，现在比起来是很有些逊色。但随着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入开展，已经大有改变。“儿童莫信打慈鸦”^⑨，如果人们仔细玩味诗人那种“爱物之仁”（《杜诗镜铨》注语），当会增长人们惜花、爱鸟之心吧！

诗人笔下的花鸟虫鱼，许多人都说是栩栩如生。有人说“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何遽不若“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王国维语）。是的，草堂内外的景物几乎无一不为杜甫所题咏，而每咏皆工。1200年后的今天，虽然唐代的“新松”无存，“高楠”早毁，“丁香”不在，“花鸭”难留，但是诗人笔下的万类万物，还活鲜鲜地呈现在我们的眼前，还依稀在草堂内外。诗人咏物皆工，除去别有寄托不论，单就他的状物技艺而言，确已突过前人。其奥妙可能在于他的通观万物的情趣和善与物游的精神，当然读书破万卷自有其功。能够不失其赤子之心，才能运大匠的斧斤于极细微之处。诸如“远鸥浮水静，轻燕受风斜”“圆荷浮小叶，细麦落轻花”，都是描写尽致；而“不如醉里风吹尽，可忍醒时雨打稀”^⑩，简直是体贴入微了。由于诗人题咏甚广，许多诗句都留在后人心中，故来游此地的人，往往很自然地把眼前景物与心底诗篇联系起来。过柴门，入花径，抚翠筱，近白鸥，是耶非耶？今耶古耶？都不禁有伊人宛在之感。

我们要感谢诗人，给我们留下了一千几百首宝贵诗篇，又给我们留下了这一片“圣地”，诗化了成都的西南郊。至今浣花溪，百花潭，万里桥，蜀相祠，都满含诗意。就是无可寻觅的黄四娘家和田翁的门户，也都好像去人不远。天下的名园不少，但像草堂这样入得园来便如行诗卷里的园墅还是不多，其原因固然由于杜甫其人及其诗，但与后人的因思慕而营建，特别是解放后党和政府的关怀、重视分不开。诗人当年在此，也不过是几间茅屋，一片林园。当时乡郊地广人少，因而草堂面积大，林木多，这也不足为奇，更不能以此说明杜甫过的就是地主生活。草堂不同于裴公绿野，更不是石崇金谷，它是“柴门不正逐江开”^①而“园翁溪友肯卜邻”^②的普通的客馆，由于诗人的辛苦经营它才成为幽胜之地，这又有什么可以訾议的呢？！像今天这样众多的亭榭，繁艳的花木，自是后人，特别是今人的踵其事而增华、爱其人而托物的一番成就，难道这不是最好的事情吗？

我蓦地想起 20 年前在纪念杜甫盛会的前夕，我来游草堂，在草堂管理处庭院内所见到的那一株千丝万蕊、临风摇曳的垂丝海棠，曾写它入文，不知它现在还怎么样？于是我立即去寻觅。有木依然，也临风茂畅，却已经不是那株海棠，而是另一种树棵，不免有点怅惘。但又想，那株海棠可能是被“十年”所破坏，或者移植别处，或者自然地死去了。这也正如世人一样，一人去了，千万人会接踵而来。你纵目四望：诗史堂、诗意画馆、工部祠、俯青亭，……许许多多亭台馆榭前的千花万木，芳香艳丽，浓密蓊郁，而且许多花木都是按照杜诗的内容而布置栽培的。借助于诗篇，又

加以想象，名园胜境，可喜可观。至于盆景园、苗圃等地方，又是奇花异草，观之不尽。难道这还不足以怀抱为君开吗？

不多几日，纪念会和学会的年会将相继开会，预想定有一番空前盛况和更深入的研讨，这又使我雀跃不已。最近写了一篇纪念四川诗人吴芳吉逝世 50 周年的长诗，碧柳先生就是学杜而有发展、有成就的一个现代诗人。他曾有诗说：“近古有诗人，君爱杜少陵否？骑驴飘忽半生，君国一腔白首。我曾荒宿草堂，解衣长望南斗。愿绕池树追凉，与君为俦为友。”^①可惜吴碧柳在三十几岁时就去世了，如果还在，也定会来参加草堂的盛会，与众多的杜甫纪念者和杜诗研究者俦为友、谈诗说艺的。

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②。任何事物都是变动不居，或兴或废。但是废中自有不废者在，那便是我们要纪念的诗人杜甫及其诗歌，是一切有功于世、有所增益于历史和值得人们长久思念的人物，是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废江河万古流！

1982 年 4 月于成都大学

注：

①杜甫《草堂》诗句。

②“草堂书屋”四个字是康生的左手书。

③黄庭坚诗《次韵文潜》。

④陆游《绵州录参厅观姜公画鹰少陵为作诗者》。

- ⑤杜甫《有客》诗。
- ⑥杜甫《得广州张判官叔卿书使还以诗代意》。
- ⑦杜诗《三绝句》中咏笋。
- ⑧杜甫《丈人山》诗。
- ⑨杜甫《题桃树》。
- ⑩杜诗《三绝句》中咏楸树。
- ⑪杜诗《野老》。
- ⑫黄庭坚《老杜浣花溪图引》。
- ⑬《吴白屋先生遗书·论诗答湘潭女儿》第三首。
- ⑭刘禹锡《乐天见示伤微之、敦诗、晦叔三君子皆有深分因成是诗以寄》。

天下朋友皆胶漆

——纪念杜甫诞生 1280 周年

“人生七十古来稀。”“冉冉征途间，谁是长年者？”诗人早已慨叹于人生寿命的短促，能年满七十的人古来也就很少。先师孔子历数他一生的几个阶段所到达的思想修养境界，说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而止，不能再说下去了。梁木其坏，泰山其颓。何况诗人的生命航船，竟还未到达孔子所说的“耳顺”一程。心煎百虑，身托一舟，寂焉而逝。但是，逝者是诗人的形体，其不逝者则是诗人的精神。所谓精神不灭，应当是指一个人留存或附托在客观世界、人类社会的事物与影响不会消灭。我们是范缜一派的“神灭论”者，认为神随形而必灭。“子敬子敬，人琴俱亡”，此诚人生之可痛。长瞑之后，其人必一无所知，此人人之所同然，但是其遗留于人类社会者则又因人而异。这又不能简单地以人亡名存来解说。历史是人民所造成，而造成历史的广大民众，多属劳动人民，其人生前往往没有名字，呼牛呼马，一任他人。更未能、也未想到在一砖一瓦上留下自己如牛如马之名于身后。试看万里长城，岂不壮观，但砌砖挑土者流何尝有一名一姓，勒在城身？秦始皇有泰山刻石，巍然赫然，足以骇世，区区小民，何能及此！故精神不灭，本不

在于有名与无名。屈原“恐修名之不立”意在为君导路，为民纾困，不在求一己之名。诗人杜甫，诗卷长留，固为名高百代，然其道德、议论、诗歌、行为，早有影响于当世，有感召于后人，即使其诗卷不幸而未存，其人其德，已自彪炳往古，激励来兹，况其诗卷长留天地，读其书而尚友其人者代有多人，歆歆追慕，沾丐力学，穷诵精研不能自己而各有所得，世代相传，故至今日而益盛。

诗人生年尚不及上寿 120 岁（依《左传》注）之半，而其逝世迄今，已十倍于上寿之数。羲轮不辍，时日长驰，有呼吸之生命有限，一弹指耳；而无呼吸之生命江河永流，固无涯涘。一个人如果大有益于世，甚有感于人，则年之长短，名之有无，似皆为身外之事，不足计较。善以有涯（个人生命）付无涯（人民生活），名不求而自强，力出己而无媿，我想，这应是作人的基本要求，也是学杜的重点所在。这是我在纪念杜甫的会前会后想得较多的。

30 年前的春天在成都杜甫草堂纪念诗人诞生 1250 周年，我曾写过一篇散文《锦江春色来天地》；其后 20 年，“文化大革命”之后，纪念诗人诞生 1270 周年，又曾以“不废江河万古流”为题写散文一篇。到现在又已 10 年，杜学丕兴，杜甫草堂的风光亦不减于昔日。仅以四川杜甫学会而言，创刊并续出专研杜甫及其诗歌的刊物《草堂》与《杜甫研究学刊》先后达 30 期之多。又曾几次举行研究年会，并在 1988 年初夏，远去湘江，与湖南省杜学研究同人联合召开杜甫湖湘诗讨论会。由湖南省出版了《杜甫在湖湘》学术论文集。有我写的《论杜甫湖湘诗》论文。我们游湖南清绝

之地，读少陵先生湖湘诸作，亦不免仰万古而长嗟（杜诗《祠南夕望》：“湖南清绝地，万古一长嗟”）！但是时移世异，思古而歌今，亦有以告慰于先灵。登岳阳楼，我曾有词云：“子英雄篇，希文卓论，浩气苍冥塞。”又云：“我辈登临时世异，不再心惊落叶（念奴娇）”。三年过去，不觉又到了应该筹备纪念杜甫诞生 1280 周年的时日。四川杜甫学会和杜甫草堂乃与杜甫的故乡及其诞生之地河南巩县（现为巩义市）的同志联系。他们也正欲开会纪念，于是欣然来观成都杜甫草堂，共同商定 4 月中旬在巩县召开。本于杜诗“天下朋友皆胶漆”之宏旨，较广泛地邀请了海内外研究和爱好杜诗的专家学者莅临斯会。同时在开会前的几个月当中成都及巩义市各自举行了有关纪念的活动。巩义市举办了关于杜甫、杜诗的常识测验竞赛和杜诗灯谜猜射，又出版了《杜甫行迹》画册，启迪并教育杜甫的乡人特别是青少年一代。这种普及性的社会活动，极有意义，必不可少。记得 1985 年秋天，江苏金坛县召开纪念段玉裁先生诞生 250 周年学术会议，他们也是普及工作作得好。我到了那里，曾经向几个小学生试问段玉裁和《说文解字注》，他们竟能争先恐后地回答我的问题而无差错。黑板报、墙报到处都有，乡人聚观，颇感兴趣。我又看见一个卖茶的中年人在柜台上细看《说文段注》，尤以为异。我曾有几首金坛开会的绝句，有句云：“县人喜读说文注，童子能言段玉裁”。这次巩县同志也能重视民间工作，令人高兴。杜甫的伟大诗歌作品本是属于全体人民共有的历史文化财富，普及宣传工作，实有赖于今之文化教育工作者。

杜甫学会和草堂也于壬申年正月初七日，即公历1992年2月10日，在草堂开展了盛大的人日游草堂并纪念杜甫诞生1280周年的活动。这一天“立春才七日”（100年只有几次的正月元旦立春），是一个久雨之后的大晴天，柳丝已含点点黄金小芽，梅花尚未遍开，但已树树有花，幽香四散。草堂泥土略现润湿。竹叶清风，令人意爽。四方游人，欢喜来集。人日游草堂，这是旧有的成都风俗，也显示了成都人民不忘杜甫的深情。在纪念会上，杜甫学会会长刘开扬先生说：“‘人日题诗寄草堂’的确也是令人向往的草堂当年的大事。高适的原唱和杜甫的追和都是辉煌杰出的诗篇。”他建议“草堂博物馆最好能将这两首爱国忧民的伤时之作，请书法家写出，装裱后挂在工部祠里显著的位置，或者诗史堂上，供八方游客鉴赏，并用以教育后代。”我觉得这一建议很好，现在学会应当作的事就是要一方面推动杜学的精研；一方面就要努力通过种种方式使杜诗普及于人民大众。比如高、杜的酬答，学者自然知道，但一般游人所知甚少或竟完全不知。“四郊多垒，此卿大夫之辱也”。杜甫及其诗歌与广大群众之间还存在着许多不太费力便可以推掉的墙，这也应当视为学会和草堂同人之耻。刘开扬同志发言的题目是“与国家共命运，与人民共呼吸”。这确实是研杜、学杜的根本。纪念会上还有好几位同志发言。李维嘉同志说，当年在民族战争和阶级斗争中作地下工作的时候，每每读杜诗而增加战斗的力量；读杜诗也俯仰兴嗟。如当年哀悼战友就往往长吟“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诗句，不禁感慨歔歔。萧菊人同志说，下一次的纪念会将在下一世纪

2002年开，我们在这一世纪中，也就是在近几年中应当抓紧时间把杜学的研讨更推进一步，取得更大的成绩。我在发言中谈到前几天看到90多岁的张秀熟老同志，他是创立杜甫学会的倡导人之一，10年前的纪念会他参加了，还讲了话，而这次会他已因行动不便不能来参加。他很关心草堂，关怀学会，很赞成今年4月到杜甫故乡与河南、巩县的同志联合举行纪念会，他说可惜他不能去。还有八十几岁高龄的前会长缪钺老同志也因行动不方便不能出席这次会，他已写了贺词，表达心意。我想，纪念杜甫诞生的会，今后将会10年一开，谁也不能次次都参加。但杜甫诗卷长存，我们纪念杜甫的一片心也能因世世相传而存在，特别是深体杜甫的伟大精神而落实在自己的生命、工作、研究诸方面，这就有极大的意义。我觉得今天要深体“天下朋友皆胶漆”“窃比稷与契”“穷年忧黎元”“不敢废诗篇”“新诗改罢自长吟”这些诗的深刻意义；体会并学习诗人广阔的胸怀、爱国爱民的思想感情、对诗歌作品的社会作用和艺术创造执着追求、探索、实践，引为己任至死不衰的伟大精神。

开纪念会的时间不长，在工部祠前早已布置好了人日吟诗会的会场。我在前两次纪念散文中多次谈到的工部祠，今天就在它的前面大家吟唱诗篇。在吟诗会上刘开扬和白敦仁两先生吟唱了高适寄杜和杜甫追酬的诗。“人日题诗寄草堂”和“自蒙蜀州人日作”。诗意诗声萦绕于工部祠前、柴门、花径。一则曰“龙钟还忝二千石，愧尔东西南北人”；一则曰“东西南北更堪论，白首扁舟病独存”。这种生死不渝的情谊、乱离身世的慨叹，尤足以震撼人心。女学士祁和暉先

生读杜诗《月夜》，细吟密咏，情托于声，抑扬宛转而感人。朗吟自己所作诗以献于杜甫之灵者，则有马识途、王仲镛、陶道恕、李国瑜、张志烈、刘友竹诸位先生。王仲镛先生唱道：“年年载酒向西郊，人日梅花作雪飘。今年元旦伴春来，破红露白初满梢……”情见乎辞，是一首歌行。李国瑜先生两首律诗有句云：“千载遗编酬盛代，草堂鱼鸟最相思”。又云：“万里山河归大统，九州翰藻颂祥麟”。盖忆古而歌今。其他不一一。我也吟诵了自作七律3首，其中有两句“工部祠堂春日永，猗猗绿竹笋班班”，是取杜甫的诗意“无数新笋满林生”以赞美杜学研究的青年同志。张大成先生吟唱了他的新诗《人日草堂即兴》：“昨夜春雨潇潇，为工部祠庭除洒扫；晨起阳光灿烂，红梅开了！红梅开了！草堂人日晴正好。……题诗寄草堂的高适来了，书写‘锦水春风’的何绍基来了，石壕村逾墙而走的老翁来了，新婚别的征夫来了，还有我们这些20世纪的诗爱者，也扶老携幼，乘车步行来了。”很有激情，颇能表现出今日草堂的盛况和今古诗心。

工部祠内坐着三位古诗人：杜子美、黄庭坚、陆务观。工部祠外，吟唱会前，除了参加吟唱的数十人外，更有数以百计的游人立在周围观、听。88岁的老画家赵完璧先生，也正在观众群中，他也朗读了即兴吟成的七绝一首。我走向人丛中去，听听人们的笑语。忽然看见成都大学一位教化学的女教师胡同志，她向我说，前两次杜甫诞辰纪念我所写的散文她都读过了，这次也应当再写一篇，前后30年，不可省略。殷切的期望使我感动。看来爱好杜诗、关心杜学者是

大有人在的。除诗歌吟唱外，还有书画、音乐等有关活动，参加的人更多。

北辕就泾渭。过了清明（4月4日）七天，正是成都春色最浓的时候，我和学会副会长丁浩、理事曾亚兰同志，先走一步，坐火车向西安前进，次夜到达河南巩县。接着从各个地方来的与会者在15日前纷纷到达。巩县是隶属郑州市的一个县，现为巩义市，地方虽不太大，经济发展却好，古迹也多，特别是这里是诗圣杜甫的故里，又是杜墓所在地。久已向往，今始到来，一山一水，一桥一巷，都使人感到新鲜而亲切，总要联想到杜甫少年时的居止与行踪。

15日上午在市文化馆礼堂，纪念杜甫诞生128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隆重地开幕。市长孙兆青先生致欢迎词，他以杜诗“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的诗句来表达他和巩义市人民热诚欢迎与会来客的盛情。四川省杜甫研究会名誉会长屈守元先生致开幕词，王利器先生等几位海内外学者在大会上讲了话，各有精义，兹不备述。屈先生在他的开幕词中说到1962年纪念杜甫诞生1250周年时世界和平理事会提出纪念世界四大文化名人，杜甫即是其中的一个。他引了杜甫的许多诗句说明“杜甫希望人民能够有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让他们从事生产，这就是他同情人民、关心人民疾苦的一个重要内容。”说得很对。我联想到今年3月下旬我出席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听见国务院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其中“关于国际形势和外交工作”作了很精辟的分析，提出了具体的有利于保卫世界和平的根本原则和主张。使与会者愈加感到争取世界局势的稳定，保卫世界

和平以利于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的进展，有着特别重大的意义。当时我在报上看到有人介绍大画师毕加索画和平鸽的故事，足以振奋人心。我当时在北京就据此写过一篇《和平鸽歌》，其起句是：“纳粹不亡战不止，欧洲烽火连天起。巴黎世界之名都，一夕沦亡蒙国耻。山慈姑花失艳容，凯旋门陷烟尘里。……”毕加索就是现代保卫和平的一位文化战士。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团结国际友人，保卫世界和平在今天对全世界、对我们国家都极为重要。“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今天就是要团结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朋友，如胶似漆地凝结在一起同挽天河，长洗甲兵！要充分作到邓小平同志所说的“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研究杜诗，勿忘此意。

这天下午，与会全体同人，掬诚来到诗圣的故里巩县南瑶湾笔架山前。暮春三月的阳光，火热如仲夏。到了这里，首先望见的是穿着各色新衣的巩县乡民、围观欢待的群众。再往上看，才看到虽不太高却形象逼似一座笔架的山峦。平坝里号声鼓声齐作，久久不绝。这是许多少年儿童正伫立欢迎来客。他们红馥馥的面庞、壮实的身体、庄严的神色，使人深感诗人的故乡后继有人。杜甫最爱儿童，从他的诗中屡屡可见。解放初期成都的少年儿童曾经为“落实”杜甫在草堂所作“饱闻桤木三年大”的诗意，在杜甫草堂内外为诗人手种桤木 5000 株。现在这些儿童都是四五十岁的人了，正是国家的栋梁之才，肩负着重任。眼前巩县的儿童们，将更会受到杜诗的熏陶，“三年”可大，百事能当。他们正是诗人“月是故乡明（此句杜诗注家还另有解说）”中皎洁的万

顷月光，是“夜雪巩梅香”中芬芳的万树梅花。我为诗人的故乡庆祝并颂祷。

传说杜甫出生在笔架山前一个窑洞里。大家都进窑洞去绕行一匝，又出来在窑洞前小庭院里忙着照像。有一次是三个人拍照，中立者高，左右稍矮，端正挺立，四肩相倚，这形象极似就在他们背后的笔架山，观者发出了会心的微笑。韩国东国大学名誉教授李丙畴先生，黄衣邴然。有人问他，他说：“我学习研究杜诗已40年，所以谒参杜甫故里和陵园，必穿官服、戴儒巾”。有人借笔架寓意，联想无穷；有人以窑洞为题，运思不尽。俯仰兴怀，情难自己。巩县的同志还宣读了《瞻仰杜甫故里祝辞》。我则想到能以有生之年来到平生所仰慕的诗圣杜甫出生之地，可以说是不负此行也不负此生了！至于室迩人遐或伊人宛在的想像，那都是很自然的。庭前枣树，虽未必可凭；窑后青山，却端然无恙，这是可以告慰于诗人之灵也引以自慰的。后来我对杜甫故里敬献了一首律诗。这诗是：发轫嵩邙笔架山，黄河伊洛水萦环。凤凰入咏非凡鸟，翰墨登场似汉班。故里闲闲人永隔，征途冉冉客行艰。孩童枣树空追忆，老病孤舟竟不还！

但是，孤舟虽未生还，旅棹终能返里。唐元稹及宋江少虞有关的文字可以窥见端倪，而杜公后人的孝思必无可疑，千回百折，终究负其棺木归葬于故里，衡情度理，大有可能。现在巩县傅永魁先生的考证，较能说明问题，可从（兹不备引）。那么，我们在拜谒杜甫故里之后又来瞻仰位于邙山的杜甫陵园，就更是时隔千载而与诗圣的遗骸近在咫尺之间了。本来，“魂气无不之”“是处青山可埋骨”，倒不必斤

斤于必以归葬故乡为当，但实事求是地在众议纷纭之中求得更为近似、更令人首肯的答案这也是很有意义的。诗人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而大喜欲狂，他逝世前不久所写的诗“十载江湖客，茫茫迟暮心”（《凭孟仓曹将书觅土楼旧庄》）王嗣奭以为“盖有首丘之思”（《镜铨》引《杜臆》），此亦自然之理。杜公生欲还乡，终未遂意；死希归葬，差能不负，亦足以稍慰于九泉。墓前有碑，大书“唐杜少陵先生之墓”，是乾隆己亥（乾隆四十四年，公元1779年）所立。其前原田廛廛，松柏青青，巩县政协领导敬读杜墓祭文，与会同人，肃然拜墓。同人们情动于中，多有佳作。我想到杜子美忧国忧民，以“东西南北之人”而能归葬家山，诚为幸事，但“不眠忧战伐”（《宿江边阁》），九泉有知，恐亦难于瞑目。相对而言，只有在今天新社会里，又在“十年”之后，才得以魂安而目瞑吧！我也作了七律一首：忧患平生念在民，长眠人是不眠人。青冥风恶终垂翅，碧海波翻本绝尘。骥子孝情坟侍侧，北邙山色柳经春。层云飞鸟今含笑，浩荡中华万物新。

当国事日新之际，又正值春风畅好之时。中州处处都百花盛开，前后相续。巩县的纪念杜甫会上，学术论文也如华实生树，笙磬齐鸣，计共收得论文60余篇。学术组同志把全部论文研阅之后，分之为七个方面，认为在数量上、质量上都获得了大丰收，研究的领域非常广阔。几天来大会小会的交流，谈者意诚，听者色喜。由艾方平等同志创作的电视连续剧《诗圣杜甫》的主要内容也在会上作了介绍。将由郑州电视台和巩义市政府合作拍摄，诗圣的形象即将在千家万

户的荧屏上显现光华。

“重与细论文”，“熟精文选理”，这是诗圣杜甫对挚友的相期和对爱子的切望。于前人文章之理，即今所云思想性、艺术性者，必须沉潜探求，既熟习且精透；而议论文章之事，即今所云文学评论、学术研讨者，又必须反复辨析，能深细，不粗浮。这次的杜学研讨会，可以说大体上符合诗人此一基本要求。春阳煦煦，夏屋渠渠，会场的气氛热烈而思议沉至。比之于曲水流觞，似更令人神往。“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朱熹诗），觉鹅湖遗芬，去人不远。19日下午，巩义市副市长王香典先生致了闭幕词，大会幕落。

会中气氛热，会后的游览也很热。宋皇陵，白马、石窟、少林诸寺，龙门、伊阙，开封龙亭、吹台、包公园都先后往游，而以洛阳王城公园看牡丹为曲终奏雅。某些胜迹，辄令人有杜甫曾先我来游之感。而今日游人之多，竟是如浪如潮，于此也可见国运的兴隆，国人的欢乐。如果诗人生在今日，定将写出大量新的诗篇以反映这一伟大时代的时代精神和愿望，推动时代前进，与他从前所作的诗定当异曲而同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杜甫早就如此，他自觉地“不敢废诗篇”。白居易乃揭而张之。这两句话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应当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置之今日而必遵！

与会者除当地主人外都忙着收拾行包，先后离开巩县。我同草堂几位同志便经由西安回成都。到西安当天，住大雁塔附近，大家登了大雁塔。次日，几位同志都去看兵马俑并

到临潼温泉。两处我都已去过，不想再去。趁着晓风凉爽，我一人再向雁塔行去。雁塔前身的慈恩寺塔，今虽不存；杜甫《同诸公登慈恩寺塔》诗，却炳耀千古。我正边走边吟诵“高标跨苍穷，烈风无时休”，无意间看见雁塔近处有一个“蔷薇园”。这是一个新发现，我便买票进去。票价甚低，里面也没有什麼楼台设置，但是园子很大，广植花木，草本尤茂。园中一隅，牡丹开得正畅。这时草间露湿，曲径无人，好像只有我一个人正在这里踱着。我想到前几天的盛会忽已过去，现在东望中州，杜墓、杜居都已在云山远处，萋而不见。我静坐在正对着几丛蔷薇的一条木椅上，“天下朋友皆胶漆”这句杜诗又浮现在我的心头。

纪念会得以隆重召开，收获丰富，正是由于有天下朋友，广大杜学研究者、杜诗爱好者的热情关注与合力举行（其中巩县同志出力最多）。专就杜学研究而言，今后亦有待于全国人士以至全世界友人的共同重视与努力，使杜学大昌，更有裨益和影响于当代及后世。如胶似漆的友谊，也正是在共同的目标之下和共同的活动中而结成。如果是这样，那么互相间的团结一致与砥砺切磋就非常重要和需要。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相重勿相轻，相长勿相消，相念勿相忘。进一步说，国政的改革开放，祖国的和平统一，两个文明的建设，文学艺术的继承与发展，终至小康社会宏伟目的的完全达到，皆非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天下朋友皆胶漆”莫办。杜甫的这句诗出于他在梓阆间时所作《忆昔二首》中，表现了他对自己称之为“开元全盛日”的往昔的肯定和留恋，及其对已经由盛到衰的唐王朝的中兴期望。但是“飘零迷哭

处，天地日榛芜”（《哭台州郑司户、苏少监》），“天下朋友皆胶漆”的宏愿又安能实现？在今天，才有可能也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宜宽不宜窄”，共同前进和创造——当然也必须坚持原则。这是我们应当深长思之的。

面对着鲜艳的几丛蔷薇，想起黄庭坚的《清平乐》词句：“春无踪迹谁知，除非问取黄鹂。百啭无人能解，因风飞过蔷薇。”我不觉笑了，我们当前的情况与山谷老人的词句恰恰相反。当前是春有踪迹，阳春有脚。我在前面所想到的“天下朋友皆胶漆”那些道理，自是人人能解，解得比我更深。正不必问取黄鹂，劳它百啭，也决不会一阵风便飞走了。于是我立起身来，活动一下肢体，长吸了几口新鲜空气而形神皆适。

1992年初夏

简谈杨升庵论杜甫诗

杨升庵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诗人，同时也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诗歌评论家。仅从他的《诗品》来看，就有不少精到之处。与升庵同时的何良俊就以为“杨升庵谈诗，真有妙解处，且援证赅博”（《四友斋丛说》卷二十四）。

《升庵外集》有《诗品》十二卷，《词品》六卷。《诗品》共有 600 条之多。它泛谈历代诗作，考其源流，论其体制，辨及古代名篇一词一字的真伪和前人谈诗者一言一论的得失。这篇短文只简谈升庵《诗品》关于杜甫诗的评价中深可称道的几点。

升庵《诗品》专论杜甫诗的有四十个条目，其它涉及杜甫诗的还有几条。其数量超过他对任何一个古代诗人的评论，而且不少精义。足见升庵对杜甫及其诗篇的喜爱之忱与研究之功。他认为杜诗“初年甚精细，晚年横逸不可当”（《学选诗》条）。说杜诗“‘上感九庙焚，下悯万人疮。斯时伏青蒲，廷争守御床。’其忠荃亦可嘉”（见《称许有乃祖之风》）。但杨升庵对于杜诗也有误解之处，如《滕王》条：“杜子美《滕王亭子》诗：‘民到于今歌出牧，来游此地不知还’。后人因子美之诗，注者遂谓滕王贤而有遗爱于民，今郡志亦以滕王为名宦。予考《新、旧唐书》并云：‘婴为刺

史，骄佚失度，太宗崩，集官属燕饮歌舞，狎昵厮养；巡省部内，从民借狗求置，所过为害；以丸弹人，观其走避则乐……’其恶如此，而少陵老子乃称之，所谓诗史者盖亦不足信乎！未有暴于金洪两州而仁于夔州者也。”按此乃升庵思之未慎。观杜在夔州所作《滕王亭子二首》，辞工丽而旨幽深，其“人到于今歌出牧”一联，也并没有歌颂滕王之意，信如仇注所云“末二句一气读下，正刺其荒游，非颂其遗泽也”。这明明是刺其盘游无度，不过语气较为委婉，抚今感昔，意在言外。试与杜作《九成宫》比并来读，两诗意境有相似之处，不过那首诗是明斥“荒哉隋家帝”，这首诗则是隐刺。同写凄凉之景，发感叹之情，佚游纷华，而今安在，寓刺于吊，并非赞颂荒暴之徒，且元婴在金、洪二州之恶，本极昭著；杜又岂能不知，又安能知之而反颂之？升庵更不应凭此一首诗竟怀疑到杜诗的诗史价值。^①

升庵论杜诗数十条，其精当之处，约有数端：一是纠正俗本的谬误。杜诗本子很多，遭到俗人妄为改字的地方不少。升庵《诗品》《书堂饮散复邀李尚书下马赋》条云：“杜云：‘湖月林风相与清，残樽下马复同倾。久拼野鹤如双鬓，遮莫邻鸡下五更。’湖上林中，地已清矣；湖有月，林有风，景益清矣，故着‘相与清’字。俗本作‘湖上’，或作‘湖水’，皆浅。既有湖，不须着水字；若云‘湖上林风’，不得着‘相与清’字。”按升庵所引杜甫此诗的诗题是《书堂饮既邀李尚书下马月下赋绝句》，俗本改“湖月”为“湖上”或“湖水”，其谬特甚，升庵揭其不通之处极当。古人诗中以风月属对者比比皆是，诚不知其何以妄改。升庵《寄徐用

先、程以道》诗：“梦绕卢龙明月易，书随鸿雁朔风难”，又《桂湖曲送胡孝思》：“湖风向客清，湖月照人明”诸句，也是风月并举，都很工美。又《步檐》条指出“步檐倚杖看牛斗”的“檐”即“簷”字，是用相如《上林赋》“步檐同流”之语。“俗子不知古字，乃改‘檐’为‘檐’。且上句有‘新月犹悬’而此又云‘步檐’，太重复。况‘步檐’乃时俗举子坊牌腐语，杜公诗宁有此恶字面耶？”这都不仅是一个字的考订问题，而且是为杜诗的高格辩证。

一是探寻杜句的渊源。杜诗无一字无来历，前人论者很多。但升庵不只是在辞语上寻觅出处，更是在思想意义上别具只眼，深识杜诗之妙。此如《雕菰》条：“杜诗‘波漂菰米沈云黑’，言人不收取而雁亦不啄，但为波漂云沉而已，见长安兵火之惨极矣！……《西京杂记》：太液池中有雕雁，紫箨绿节，鳧雏雁子，唼喋其间。《三辅黄图》云‘宫人泛舟采莲为巴人濯歌’便见人物游嬉，宫沼富贵。今一变云‘波漂菰米沈云黑，露冷莲房坠粉红’，读之则菰米不收而任其坠，兵戈乱离之状具见矣。杜诗之妙在翻古语，千家注无有引此者，虽万家何用哉！”（在升庵后的钱注杜诗引了《西京杂记》）又如《杜工部荔枝诗》条：“侧生野岸及江蒲，不熟丹官满玉壶。云壑布衣鮐背死，劳生害马翠眉须”（此为《解闷十二首》绝句中之末首）。升庵以为此诗“盖纪明皇为贵妃取荔枝事也。其用‘侧生’字，盖为庾文隐语以避时忌，《春秋·定、哀》多微辞之意，非如西昆用僻事也。”“侧生”本于左思《蜀都赋》“侧生荔枝”，升庵以为此乃庾文隐语以避时忌，深有见地；不同于西昆之用僻事，这一指出也

很重要。杜诗句多有来历，但皆不是为用事而用事，更不是拮据僻事以为佳。升庵论这首诗的末二句还说：“末二句盖昌黎感二鸟之意，言布衣抱道有老死云壑而不征者，乃劳生害马以给翠眉之须，何为者耶！其旨可谓隐而彰矣。”此解也精当。升庵不以黄山谷对此诗的解说为然，亦是。他说山谷曾谓“云壑布衣指后汉临武长唐羌谏止荔枝贡者”，“此俗所谓厚皮馒头夹纸灯笼”，这有点近于戏谑了。^②

一是从杜诗的用意和风格上作了比较正确的解说。杜诗的用意深，这是自来论诗者所共同承认的。但对杜诗某些具体作品的旨意有的论者或求之过深，不免穿凿附会；或停在表面的理解上，又不免望文生义。升庵论杜各条，常能正确理解诗人的深旨和苦心，能够从诗人及其诗篇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寻绎、评论，避免师心妄谈，这的确是难能可贵的。例如《袁绍杯》条于举出史事之后作出论断说：“袁绍杯公以玄（郑玄）自比，为儒而逢世乱也。”一语破的。接着对刘须溪的评语“此引袁绍事不晓”加以评论说：“须溪眯目之言，不晓真不晓也。”对王洙的评语，亦以为“尤无干涉”，都足以服人。又如《落月屋梁》条：“‘落月满屋梁，犹疑照颜色’，言梦中见之而觉其犹在，即所谓‘梦中魂魄犹言是，觉后精神尚未回’也。诗本浅，宋人看得太深，反晦矣！传神之说非是。”又《子美赠花卿》条，升庵以为“杜公此诗，讥其僭用天子礼乐，而含蓄不露有风人之旨”，这也与杜甫当时的用意和此诗的风格完全符合。升庵且以此篇为杜诗绝句第一，他说：“公之绝句万余首，此为之冠。”再如《不嫁惜娉婷》条：“杜子美诗‘不嫁惜娉婷’，此句有

妙理，读者忽之耳。陈后山衍之”云云，也是符合当时诗人情意的。对于杜诗读者的理解这些诗句颇有启迪。他如《巫峡江陵》条，对比李杜而评论，以为李太白“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尽，扁舟已过万重山”与杜甫的“朝发白帝暮江陵，顷来目击信有征”“优劣自别”。且以为“今人谓李杜不可以优劣论，此语亦太愤愤”。玩升庵之意，盖以为李杜某些具体诗篇亦有高下、优劣之分，可以作出比较。升庵并不是以为一定要从总体上把李杜分个优劣。观《评李杜》条，“余谓太白诗仙翁剑客之语，少陵诗雅士骚人之词。”也未尝有所抑扬。

以上不过略举升庵《诗品》中论杜诗的数则，以见升庵之论杜诗确有其创获之处，足资杜诗研读者的参考。升庵论杜的条目中也有不尽完善之处，这里就不具论了。

注

①《诗品》中别有《诗史》一条，不同意“诗史”这个称谓，那是升庵认为此称谓本身不确切，不宜使用，其意也并非贬低杜诗。

②黄山谷之论见《豫章先生文集》卷六。

1983年10月

《仇注杜诗引文补正》序

清代顺治至康熙年间学者仇兆鳌（公元1638年—1713年）先生所著《杜诗详注》，汇集仇氏以前各家注本，益以补缀之力，“广搜博证”，多历岁时，甚有功于杜诗。前人论之已悉。但是瑜不盖瑕，其书缺失之处也不少，常蒙指摘。如最为通行的浦起龙的《读杜心解》、杨伦的《杜诗镜铨》、对于仇注都每有訾评，各于有关诗注中涉及。不成系统。十几年前中华书局出版的《杜诗详注》其《出版说明》曾言仇注“有一些穿凿附会、陈腐无聊的地方”，也说仇注引书常有错误，举了几个例子，自然也语焉不详，并说“我们在标点过程中发现就加以改正，但无法一一查对原著，也不再出校”。这“无法查对原著”的麻烦事情便自觉地担负在谭芝萍的肩上。

谭芝萍是重庆一师校高级讲师，中国民主同盟老盟员，四川杜甫学会会员。她多年学习、研究杜诗，有鉴及此，早就想一一就仇注所引典籍察其根源，辨其得失，补其不足之处，写《仇注杜诗引文补正》一书。谭芝萍同志以其设想就商于我，我很赞成，也向她提了一些编著体例的建议。谭芝萍初写出的部分稿件经学会副会长丁浩先生审阅后，曾在

《杜甫研究学刊》发表，读者反应良好。我向谭芝萍说，此一著作应是仇兆鳌的诤友，也是他的功臣。谭以为然，说要努力作去，早日编成。还说要尽量体会仇注的原则及其每一处的用意，要防止把仇注本来不错的地方误认为是错了。我说这一点最要紧。

但是谭芝萍编著此书是十分困难的。困难不在于她的学力，她的学力足任此役。而且她极有毅力，自己缺少什么书便在重庆图书馆或高等学校借阅。为了搜索一两条注文往往通读全书，也颇感兴趣。自己决定不了的地方便请问于人，务求其当。她的难处是在于身罹重疾，医药罔效。这种情况我一直不知道，她在信中是一直不谈的，我在成都和到重庆见到她时也从未听她讲过。迄今我从篋中检出谭芝萍两三年中的来缄二十多封（不全），信上所谈皆是写书的事，有时也谈诗词。谭芝萍能诗，每以所作见示，求为推敲字句。她对拙作论文及诗词，总是有见必读，且必以读后感相告。记得她收到拙作散文集后，10日后来信说：“我把一切事情放下来，专读大作，精读细思，历时一周之久……”所以我只知道她精力旺盛，虽然已是七十几岁的老人，却与中年人无殊；完全不知道她是在带病著书，而且病况日增。直到前年下半年，我没有再接到信，正以为异，忽于12月5日得到谭芝萍的长子汪洋来函，才知道谭芝萍已在10月23日因癌症逝世。汪洋的信上说母亲虽开刀两次，仍然写稿不停；坐在病床上也不休息。她曾说，只要能够延长我的生命三个月，我就可以把这个著作完成了！著作算是基本完成，还不能说是全竟其功，但谭芝萍已与其数十年间患难与共、相濡

以沫的夫婿汪寿康先生和她的一家长别了！汪洋信中还说她的母亲常常向家人谈到我，表示感激，其实我对谭芝萍老师及其著作关心是很不够的。我很悲叹于谭君的不幸，看了她的讣告，知道她早岁从事革命活动，解放后作育人才，成绩显著，是好教师！虽经中岁坎坷，其志不懈。她在给我的一封信上曾这样写道：

解放后，任师范学校教师，终岁忙于课务又兼家事儿女之累，未得认真读书为憾。五八年，复罹鸣放之祸，“坎坷失盛年”，一蹶二十载！直至七八年始应重庆师范学院约，于中文系任教一年。后回市一师任高师班历代文选课五年。其间始重操旧业。虽盛年已过，不可再得，但既逢盛世，人寿河清，桑榆之拾，犹未为晚。年来退休闲居，日夕以书为伴，颇得其乐。以上琐琐，俾先生知我也！

这信是1990年1月8日写的。当时她已是七十三四的人，犹欲追回时间，鼓足精力，为《杜诗详注》这一部学杜研杜者必读之书任查对补正之劳，力御恶疾，全耗余年，为杜学与仇书而尽命，三易寒暑，其著初成，而其人已逝。这真是太令人感动的事！

前年12月，噩耗传来，我既惊且悲，曾作五律二首，寄托哀思：

哀悼谭芝萍同志

探海笈仇注，倾河哭左芬。功臣兼诤友，热泪托寒云。
遗稿深哀见，垂危痛语闻。佳儿能继志，梨枣定偿君。
草堂春昼永，盛会识君初。欲下玄亭拜，频传字水书。

芜篇劳细读，知己世难如。从此徽音绝，怆然守敝庐。

注：余曾向谭芝萍同志言：“君为仇注之功臣亦诤臣”。芝萍同志弥留之际犹喃喃自语云：“再给我三个月、三个月，我就可以把《仇注杜诗引文补正》核定”。

谭君曾来函欲称我为师，余惶恐辞谢。君住重庆，数年间常来书商讨艺文。

后来汪洋将他母亲的遗稿寄给我，我即转托杜甫学会丁浩副会长为之整理遗稿，汪老先生与汪氏弟兄也亟想早日出版此著，生者心始得安。于是联系付印。俾于印行之后更可求正于多人，亦为杜学研究者之一助，庶不负作者的一片诚心。补充修订，留待异日。汪老及其家人要我为这书写一篇序言，我当然不能推辞。便把前几年我在认识谭芝萍老师之后，对于她写作这一部书我所知道的一些情况直写出来，以为对读者的汇报和对作者的祭奠。

时 1995 年 6 月 11 日，于成都。

注：该书已由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 年 10 月出版。

稷契方知稷契心

——读《小平同志来草堂》书感

我于今年3月16日从北京开会回来，即见3月6日《成都晚报》上所载《小平同志来草堂》一文，很是感动。此文署名是“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询之副馆长丁浩同志，知道参与写作者是有有关的领导同志及其他同志，是集体创作。执笔者为贾兰同志。

这篇文章实际上表现了杜甫草堂博物馆现在在岗者和已离岗者曾经见到小平同志到来的同志和所有的工作人员，并且包括那几次小平同志来到时正在草堂游览的众多游人在内，对小平同志的一片爱心。文章的文字好，意义尤为重大。我读后受到启发，有一些体会。

看了这篇文章才知道小平同志曾经五次来到草堂。第一次是在1958年成都会议期间，其时为国为民，劳心焦思，缅怀诗圣，怅望千秋，可以想见。60年代第二次来到草堂。1978年2月第三次来到，并为草堂题词。1982年7月小平同志陪同金日成主席第四次来到。小平同志第五次来是在1986年正月初五（公历2月13日，星期四），是我国“七五”计划期间。正是小平同志多次讲话指示必须积极进行改

革、开放的时期中。《小平同志来草堂》写道：“一位在1982年为小平同志作过解说的同志回忆说：他老人家陪同金日成主席游览草堂时，曾多次称杜甫是‘诗圣’，杜甫草堂是块‘圣地’，并向金日成主席介绍《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是杜甫在草堂时的作品，此诗反映了杜甫忧国忧民的思想。”丁浩副馆长曾在1986年春节期中，人日前两天，有幸接待过小平同志，文章记下了他清晰、欢悦的回忆。他说：“小平同志和夫人、子女、孙儿、孙女十多人来到草堂。他老人家精神矍铄，很有兴致，一进门就对大家说‘杜甫草堂是个好地方，到成都不到杜甫草堂等于没有来成都。’”小平同志“对草堂的布局了如指掌，一路走，一路兴致勃勃地给大家介绍。”当丁浩在杜工部祠介绍工部员外郎是什么官衔时，“小平同志诙谐地说：‘相当于现在的科长吧！’”小平同志还在梅花吐艳，幽香满园的梅园里，拍了一张“全家福”照片。文章写道：“草堂一位职工抱着自己的孩子也在赏梅，小平同志看见了，主动走上前去慈祥地逗孩子乐。当时春节刚过，游园的群众很多，‘邓主席来了’的消息不胫而走。见到小平同志，人们激动地热烈鼓掌；小平同志不断亲切地微笑着向群众挥手。临走时草堂的工作人员依依不舍地向小平道别，并希望他老人家再游草堂，谁知这竟是小平同志最后一次到草堂了！”文章说：“这段往事深刻地铭刻在草堂职工的心中。”

上面是我基本照录的《小平同志来草堂》的前一部份，小平同志的伟大形象以杜甫草堂为背景鲜明地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我真不敢对这一大段回忆文章稍有省略或概括，生怕

走了样。还看到草堂博物馆提供的小平同志 1978 年 2 月在草堂博物馆参观的照片。应当感谢草堂领导和工作人员们。文章的后半幅写了杜甫草堂同志的感想、体会和所表决心。

阅读这篇文章，我似乎是在看《邓小平》大型文献纪录片中的一个部份，不禁浮想纷呈。我想到杜诗“元戎小队出郊垌，问柳寻花到野亭。……”（《严中丞枉驾见过》）当时的景况未知何如，但挚友驾临，亦足欣喜，因展怀抱，并致希冀。杜公之于严武，友情甚深，决不是只从一己一家着想而望其照拂，也不仅望其援引，俾能更有作为。更是对于这位两川使节、高官厚禄的故人，望其利国福民，大有造于斯世。“致君尧舜”的宏愿，冀其能与己同，且更优于己，杜所不能为者，严能为之。所以对严期望至殷且大。《奉送严公入朝十韵》情见乎辞，其末语“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朋友赠言，爱人以德，于兹为极。直是责望之言，特著于这一首五言长律 10 韵的结尾处，更见份量。望之至切也更增加对严的友爱，其“远送从此别，青山空复情。几时杯重把，昨夜月同行”一律（《奉济驿重送严公四韵》），弥足感人。致令后人以为“使人不忍卒读”（见《仇注》）。这都表明杜之于严情浓理正，理增情，情亦促理，为古今不可多见者。惜严武未曾作到杜公之所期托；厄于世事也难于作到。终归是一个社会制度的问题。而且杜甫对严武很大程度上也是以民为归，“民之所爱爱之”。试观《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一诗，对于成都近郊的这位田父，真是写得令人如见其面，如闻其声，中心在于这位田间父老“酒酣夸新尹”“说尹终在口”，喜人民之所喜，诗人也因田父之所喜而大

喜。灵感所至，激情所生，写出了此一名篇！我自然想到：惜乎古人见不到今天。今天的“元戎”，今天的“令尹”（国家领导人），自非严武可以比拟，而“夸尹”“说尹”者直是全中国亿万人民。中国人民今天悼念小平同志的至情和深识、坚信与力从，那是中国历史以至世界历史上空前未有的！1200年前的诗人杜甫自然想像不到这样的人伦高度。他梦寐以思的有限度的明君贤相也终于求索不得，唯有寄托在古人身上。

另一方面，诗人的一片苦心，他的理想，抱负，他梦寐以思的人间盛世，他的诗心，并世和后世也很少有人理解、同情，同其步武，继其遗志，全面地继承其诗歌精髓而行之于世。不是没有这样的人，是很少。《南征》诗：“春岸桃花水，云帆枫树林……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诗人已经明白言之。这里的“知音”，不止是知其高山流水，巍巍然，浩浩然；而诗人所最期冀者是知其所负的诗责，所守的诗德，所希的诗用，所蕴的诗情，整个说来就是他的诗心。后世如中晚唐的元微之，对杜是知音，推崇甚高。虽然我们不同意元遗山所评，微之只是识其瓠珠，但微之所评，于杜仍有一间，则是事实。从历史上看来，或知其一体，或者某一面，求能全知深知，如宋之陆游、文天祥，明清之际的顾炎武，知其心髓又能继武者盖寡。大抵每在国事艰危、民生涂炭之秋，则思杜、尊杜、学杜者渐多，其品格崇高、诗艺有独创性者乃亦有人。如明清之际，如清代鸦片战争后，林则徐之诗，“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是真得杜诗之心者。忆解放前我在川大中文系时曾为文谈林诗与杜的

继承关系兼论清末就义诸君子。以为吉光片羽亦有很大的教育意义。迄至“文化革命”中竟有把杜甫列为“应当批判的”对象者，那就更不必言了。只有在邓小平同志肩负国家领导重任之后，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诗圣杜甫也才能得到公正的评价，偏言曲解、秽语恶辞，得以逐渐澄清。杜甫学会的建立和杜甫研究的广泛开展，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杜学宏开的艺文气象。饮水思源，自应感谢小平同志。今观《小平同志来草堂》一文，更知小平同志前后曾到草堂五次。据文中所记细节，小平同志真正是深知杜甫，从而对草堂评定很高——是一块圣地，“到成都不到杜甫草堂等于没有来成都”。……故从诗人1200年前“未见有知音”的叹息直到如今，知音亦代代有人，但应以邓小平同志为最。因为只有知道并且实践把中国的品位臻于历史最高层次，使中国人民逐步进入小康生活境地，中华民族逐步跻于富强康乐、民主自由的高峰，使中国矗立于世界，进一步瀚雪国耻，达到国家统一，两个文明同时上升，实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小平同志才是最高意义上的“稷契”。应把“稷契”视作一个代名词，就是不同时代中，体现不同时代的特点，爱国家、爱人民，把自己的一切献给时代的人，或者有这样的先进理想而言行基本相符的人。总归一句话，稷契方知稷契心。

当然不能混淆历史上存在着的差异。不能即古即今。历史上的先进人物，圣贤，豪杰，不能完全等同于今天的马列主义革命者，有本质的不同。但从爱国爱民基本要求说来，那是有一脉相承、不能割断的内在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

必然是稷契方知稷契心。自新中国建立以来，杜甫草堂早已得到毛主席、朱总司令的称许，小平和陈毅同志及其他领导同志都对杜甫评价高，是诗人的知音者。这也就是对杜甫草堂和全国学习、研究杜甫、杜诗的人的一种鼓励和鞭策。故对小平同志五次来到杜甫草堂这件事情及其内容，杜学同人都不可以不深长思之。

杜甫在仕宦经历上是受黜者，他应试被弃，为官被谴，流离潦倒，未得片时之安，难伸寸衷之志。但是他不在其位，亦谋其政；不临于民，亦爱其民（就整个时间言）。垂老不衰，至死不易。他的诗歌出自肺腑，熬成血泪，感动、教育、激励、鼓舞、抚慰了天下后世许许多多英雄豪杰、志士仁人以及一般的读其诗者。他是个不屈不挠、有守有为的人！历史上的贤人多半受黜、受屈、受害，已成通例，而能始终不屈不颓者不多。小平同志，三起三落，也就是三受黜。我们读江泽民同志在邓小平同志追悼大会上所致悼词，其中说到小平同志三次受到严重挫折，他所表现出的伟大精神那一长段话，对小平同志无比崇敬，这又不是历史上的伟大人物所可比并的。

《小平同志来草堂》写小平同志第五次来是一家人同来，还照了“全家福”像。那天的游人很多，也必定有很多“全家福”的幸福照片。杜甫由陇来蜀，定居草堂，也是全家人，但他的“全家福”会是怎样的呢？愁苦的多，欢娱的少。“痴儿不知父子礼，叫怒索饭啼门东。”（《百忧集行》）可以想见。至于入蜀前，《北征》《羌村》等诗，入蜀后《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的形象就更是“全家灾”了。一张照

片，关系时代，决不简单。想像小平同志在草堂梅花下那种群众同乐的场面，真令人心向往之。

最重要的纪念和悼念，是要化悲痛为力量，也要把欢乐幸福的回忆作为策励，把杜甫博物馆的工作和杜学的研究与学习小平同志著作密切结合起来，也就是要在小平同志思想指导下更好地展开学习、研究和文化教育工作。小平同志如此重视诗圣杜甫，稷契方知稷契心，我们岂可不更加全面深入、卓有成效地研究杜甫，弘扬杜甫精神以为今日发展精神文明之一助和一种必不可少的借鉴！读了这篇《小平同志来草堂》文章，我写了八首七言绝句以表衷情。现在把它写在下面作为本文的结束。

（一）草堂新岁遍梅花，剪雪裁冰万缕霞。拍得“全家福”彩照，与民同乐庆春华。（二）蓬门今为小平开，妙语如环和且谐。到得成都不访杜，还如未到锦城来。（三）朝鲜元首金日成，花径偕行笑语声。细为嘉宾说“诗圣”，频言“圣地”见深情。（四）茅屋歌声万古传，少陵遗恨越千年。邓公谈说当时事，此地曾吟不朽篇。（五）沙碧竹寒今古同，青郊茅宇路西东。休言地僻经过少，五度来临忆邓公。（六）“萧条异代不同时”，景仰前贤杜有诗。岂意千秋风雨后，元戎真赏更无疑。（七）田翁夸尹杜欣然，况值今朝百福骈。若使少陵灵不远，挥毫洒墨满云天。（八）昔日南征一痛吟，百年未见有知音。不同其道难为语，稷契方知稷契心。

1997年3月

附 录

有 关 诗 词

钟树梁

念 奴 娇

成都杜甫研究学会成立

千秋诗史，访幽棲，一片竹寒沙碧。玉垒浮云今古变，多少匆匆过客。不废江河，常怀稷契，无恙连城壁。柴门花径，草堂何限春色。原异小队郊垌，江干车马，端为文章集。愿起高岑崔魏辈，共说少陵形迹。樽酒细论，长绳深汲，庶可鲸鱼掣。捧公诗卷，朋侪天下胶漆。

注：成都杜甫研究会，成立于“文化革命”后，在1980年4月。

南歌子二首

为杜甫纪念馆 30 周年作

广厦千间梦，孤舟万里行。一腔忠愤负平生，回首锦江
悽止最关情。花径春风暖，黄鹂绕树鸣。时移世换气纵
横，纪念杜陵新馆日峥嵘。

曲折回廊静，馨香三十年。斑斓文物映诗篇，令我一回
瞻视一欣然。惨淡经营久，辛勤设置全。魂兮重返草堂
前，也定举觞青眼白云边。

浪 淘 沙

纪念杜甫诞生 1270 周年

天地一沙鸥，浩荡东流。眉攒万国贮深愁。全盛开元长
已矣，热泪谁收！锦里暂遨游，水碧花稠。草堂诗卷足千
秋。荐食寒泉今可慰，春满神州。

注：黄庭坚《老杜浣花溪图引》：“醉里眉攒万国愁”。

高 阳 台

杜甫研究学会第四次年会

鸠唤平畴，莺飞暖树，匆匆谷雨还过。罨画成都，草堂游履偏多。百年漫说歌心苦，有知音、来访烟萝。会重开，北秀南能，日丽风和。纷纷疑义相探析，谈夔州诗咏，流恨江波。《秋兴》《八哀》，难禁涕泪滂沱。五更鼓角声悲壮，听声声、响彻关河。待商量，杜集精编，杜学深磋。

注：杜甫《南征》：“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此次年会主要研学夔州诗。“五更鼓角声悲壮”，是杜在夔州所作《阁夜》诗句，我以为杜甫夔州诗亦可以此一诗句概之。

浪 淘 沙

悼念成善楷先生

长倚仲宣襟，笼鸟归林。困穷身世寂寥心。垂死不忘笺杜笔，夜月沉沉。一别怅人琴，秋草谁寻。百花潭水又轻阴。地下若从工部语，终是知音。

注：成善楷先生系学会理事，本刊顾问，四川大学教授。不幸于1989年7月病故。逝世前犹写作《杜诗笺记》不辍。成君《发洪泽湖》诗云：“笼鸟羨新天”。又云：“一生失盛年。”

学 杜 诗

杜甫学会成立10周年时作

功夫在诗外，精魂寓诗内。稷契道自比，风雅义不坠。
至愚乃至仁，布衣张旌旆。一洗凡马空，万古清光最。诗履步草莽，热肠缠象魏。九死吾未悔，孤舟泛苍蔚。北望京华心，南流洞庭泪。终成涕作霖，人间咸霑霈。

童稚黄犊如，枣树上千回。老来犹纵马，不惜坠尘埃。
常保赤子心，岂期画角哀。每被蜀翁肘，曾共羌村杯。嗜酒见天真，鱼鸟无疑猜。诗人有至性，高楠非浅材。谤伤何为者？伎疾生蒿莱。

诗篇千四百，毫芒落人间。只此一毫芒，槎枿撑肺肝。
至大者无外，浩然苍冥宽。天地为低昂，鬼神为汎澜。不惜歌者苦，知音旷世难。知音世亦有，各领其一端。善得杜陵心，务观与文山。焉知千载下，草堂琴重弹。

草堂拾遗居，村村自花柳。柴门犹仿佛，花径亦若有。

或曰古草堂，瞻前忽在后。考据不妨精，仰止无株守。秋风破茅屋，丧乱增衰朽。颓然穷儒卧，忽作雄师吼。广厦千万间，其声雷霆走。广厦今渐多，魂兮能返否？

去今十载前，学会于兹立。冠盖聚花溪，芒屨亦来集。曰绝学须探，曰疑义当析。绠汲竞持论，管窥各有获。复闻诵诗声，渊然鸣金石。撰著继前修，岁月成新帙。终惧业未宏，有损公真质。翠筱冀拂云，保此青青叶。

十载共探求，所拾花几片。荡荡上林春，江河同浩瀚。曾读两川诗，日星极绚烂。曾读夔州作，苍凉老弥健。亦有湖湘会，泪下平江岸。江汉思归人，青鞋何由办。魂气无不一，精灵在诗卷。展卷咫尺间，一唱复三叹。

众宾远道来，主人今不作。鱼跃百花潭，鹰隼从天落。沈寥秋气清，思君望宏廓。千秋一旦暮，少陵只如昨。古今无畔岸，志气为锋镞。同尽爱国情，亦是倾阳藿。词翰薄重霄，怀抱踵芳躅。云门曲可奏，齐心弘杜学。

壬申暮春，杜甫诞辰纪念会及杜学讨论会在河南巩义市召开，纪盛

天下朋友皆胶漆，竹林新笋正娟娟。事关诗圣千秋会，

时异开元正德年。已见黎民蒙大庇，益欣杜学得精研。嵩山高翠灵如返，布袜青鞋望俨然。

巩县谒杜少陵先生墓

忧患平生念众民，长眠人是不眠人。青冥风恶终垂翅，碧海波翻本绝尘。骥子孝情坟侍侧，北邙山色柳经春。层云飞鸟今含笑，浩荡中华万物新。

访巩县杜子美故里

发轫嵩邙笔架山，黄河伊洛水萦环。凤凰入咏非凡鸟，翰墨登场似汉班。故里闲闲人永隔，征途冉冉客常艰。孩童枣树空追忆，老病孤舟竟不还。

步少陵秋兴韵八首

1993年6月1日至15日参加三峡水利工程考察团，考察川鄂有关各地。至奉节，抚时感事，敬步少陵《秋兴》韵成诗八首。节非秋日，事异前朝，然爱国念民，其情固相通也。

登临极目望青林，白帝城高气象森。吴蜀烽烟寻往迹，夔巫夏木息层阴。防洪治水千年眼，兴利安民百世心。士女勤劳善歌舞，不闻月下万家砧。

藤萝秋月影横斜，尚想斯人恋物华。志气难销依北斗，情怀不乐泛南槎。年年燕子随孤蝶，处处江潮咽暮笳。回首锦城居止地，诸邻看遍满园花。

东流峡水映晨晖，五岳三山有显微。御侮惊犀狮大吼，富民强国鸟争飞。海通岂许疵醇混，货殖莫将矩矱违。市肆满城热浪涌，江鱼议价计鲜肥。

泱泱国事一盘棋，勿使江崖老幼悲。九域腾飞同有责，东川开发正当时。蕴藏富厚畴人聚，山路崎岖信使驰。审势知机诚至道，不眠欹枕更沉思。

晴空飞鸟度遥山，船舶浮游日夜间。一老常筹天下计，“万夫莫敌”古来关。深维今世需新略，再赴长征发壮颜。十二名峰云雾绕，瑶池诸娣列班班。

庾信江关易白头，少陵高咏及清秋。诗心直溯三唐远，众议能消百姓愁。迁计纷陈期上驷，县民日作异闲鸥。定须安置孚群望，咸庆汪洋水国州。

经营寰宇世人功，同在阳乌大庇中。飞艇遥遥登宝月，

潜流处处带腥风。技科突进丛篁茂，道德低沉败叶红。历史前行何所往，长思孔子马恩翁。

注：此首感世界形势。

中华前辙亦逶迤，狭径柴车至广陂。国势龙骧升九有，吾生蝉洁寄一枝。勤吹玉瑄期无负，老守青毡未可移。诗卷行行通世事，衡门归理竹帘垂。

再步秋兴韵八首

四川杜甫学会第八届学术年会 1994 年 10 月下旬在奉节县召开，以弘扬杜公精神为重，成此书怀。

重来瞩目尽秋林，尚记前游夏木森。楠梓未凋全旧约，峡湖将变惜分阴。画船几度曾耽景，诗稿穷年不易心。思古情多翻引梦，月明仿佛听霜砧。

注：去夏曾参加三峡考察团到奉节，曾步秋兴韵成诗八首。

风吹芦竹影常斜，终古诗人感岁华。杜老夔巫常伏枕，东坡江海欲浮槎。青峦望望迟高躅，白鸟依依惜暮笳。却羨田家安稳住，涧溪风叶艳于花。

当时臣甫对朝晖，忠悃长思比与微。殷室倾颓忧莫济，
洛阳阻隔病难飞。唯余诗酒供驱使，忍向方輿问顺违。喜听
山谣堪自慰，老羊羸瘦小羊肥。

斧柯断烂不停棋，攘夺纷纷世代悲。蛙井梦多亡大道。
麝香云暖亦佳时。山花插鬓姿容淑，峡浪兼天岁月驰。古往
今来乡俗改，负薪无女总萦思。

夔门四望万重山，赤甲白盐在两间。星斗文章为世忌，
蛟龙窟宅每心关。汉貂七叶从金日，神女千秋护玉颜。丛菊
自芳人自淡，不劳崔魏拟扬班。

注：“金日”即汉武帝时金日磾。

滚滚长江不掉头，巴东三峡已深秋。防灾有术纾民困，
行路仍难动客愁。尽逐冥顽韩愈鳄，莫驯浩荡杜陵鸥。消除
魔障培元气，一叶夷犹任九州。

移民日日望成功，昨夏曾观溽暑中。宜共川湖凫雁苇，
岂容南北马牛风。衣添半臂吴棉热，霞散千林桔子红。秋水
溯游人宛在，未须黄口盼成翁。

芒鞋独步路透迤，石径遥通到广陂。细浪游鳞穿水草，
晴皋翔鹤拣霜枝。昭昭白日无潜匿，岳岳苍崖有转移。天壁

长留云自在，少陵诗卷万年垂。

注：杜甫夔州诗“东得平冈出天壁”。

临危莫爱身 悼锦州市委书记张鸣岐

杜甫昔送严武行，勸以“临危莫爱身”。《礼》曰“临难毋苟免”，爱人以德期其仁。锦州书记张鸣岐，一挥手间成波臣！书记治洪与众谋，荧屏展现面含忧，涉水前行探灾情，水过腰身行不休。次日电波报说涛灭顶，张书记已无踪影。几人失踪万姓愁，四川人亦心惶惶。心知此事大不祥，锦里锦州望茫茫。果见报章传噩耗，书记寻得尸已僵。同探洪涛几同志，不同时生同时逝，无愧党旗下宣誓人，好勤务员好书记！锦州人民皆痛哭，“说走就走”^①去何速！回思书记功劳多，“为官要与民造福”^②，共产党人当如此，为人民生为民死。其去也速其意专，其灵犹在凌河水。信是“临危莫爱身。”，万难千危吾往矣！悼诗敬写望辽东，肺腑之言二三纸。尤望全党全民学鸣岐，党风所被、清者益清勇益勇，贪者能廉懦者起。苍松翠竹千山万山里。

1994年7月

注：①锦州市老工人哭说：“我们不相信这么好的人说走就走了！”

②张鸣岐常说：“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湘 月

乙亥人日在草堂，忆已故刘孟伉诗老 1964 年
《湘月》（即念奴娇）《人日草堂》之作，今次其韵。

常寻杜宅。怅诗人去久，梅萼仍发。却忆刘公曾题咏，
深惜一林红白。工部吟章，浣花溪水，映照同清澈。吟魂一
缕，千年几个探得。人日还聚今朝，风流未替，游侣来阡
陌。寢叟长髯非耶是？独坐幽篁清绝。望古情隆，歌今韵
逸，俊彦闲谈说。草堂故事，续成湘月新阙。

注：刘老《湘月》有句云：“一自斯人归后，早空过、一林红白。”“寢叟”是刘孟伉别号。“寢”一作“吃”。

丙子人日集工部祠步杜公 《送高三十五书记》十六韵

九逦观世术，艰难为人师。抱瓮自无患，滋兰岂易为。
望云群鸟过，惜罕黄鹄飞。趋鹜驳不纯，涂染及童儿。传道
与授业，蒿然仁者辞。爱心导先路，在德不在威。勿任郑卫
求，须启雅颂知。肃肃杜公字，寂寞失清仪。徒见宝康瓠，
未睹扬灵麾。不知有汉魏，遑言唐贤思。治国必兴学，勿令

失其时。河伯犹叹羨，汪洋浩无涯。荡摇到根本，沦没生戚悲。喜今重诗教，上振下亦随。初解辨薰莠，歧路欲觅归。春风闻鼓瑟，同读少陵诗。

木兰花慢

四川杜甫研究会第九届年会，省内外学人与会者不少，青年研究者复多

草堂重雅集，奉诗圣，郛筒杯。看南国云航，北疆铁軫，四海偕来。崔嵬，窗含岭雪，又蓬门今日为君开。伫望新松荣茂，休嗟我马虺隤。

高才。十五尚童孩，六十蜕尘埃。算赤子存心，黔黎在抱，多病登台。徘徊，百花潭水，振少陵诗铎响惊雷。展卷思通千载，何曾寂寞书斋。

注：①《诗经·卷耳》：“陟彼崔嵬，我马虺隤”。

②我谒杜墓诗有云：“孩童枣树空追忆，老病孤舟竟不还。”

③杜诗《冬日有怀李白》：“寂寞书斋里”，今反用诗句意。

东西二祠行

丙子端午节，偕北京周汝昌先生赴大兴县新建曹雪芹祠庙瞻游。周谓杜为诗圣，成都有杜甫草堂，曹为稗圣亦当之

无愧，冀东西二祠能多所研讨，发皇杜学、红学。余亦亦然，写此长篇。

子美草堂在蜀西，诗圣曾居浣花溪。萧条异代有稗圣，心通千载功相齐。驰高丘兮上重霄，拭目通观文海涛。波裔云雨亿万里，中有二圣杜与曹。江山代代贤哲兴，前辈后辈各飞腾。所操者异其归同，要为生民衽席登。杜为诗圣即情圣，饮冰一言燃千灯。红楼三纲情其一，周子创之我服膺。雪芹全翻《水浒》文，历历百八是钗裙。吮毫立传哀巾幅，自我作古追典坟。少陵混茫兼众美，笔参造化诗即史。妇女诗篇尊以庄，全殊浮薄与轻毁。每怜西邻打枣妇，或伤夔州老女子。虚幌闺中双照难，日暮佳人修竹倚。唯有曹公共素心，独挥妙笔歌兰芷。脂粉英雄赞女儿，高情卓识世难比。大而化之之谓圣，继往开来集大成。作者殊列繁星灿，别饶光焰射晶莹。

杜老一生流寓多，同谷、湖湘发悲歌。曹公局促辕下驾，何尝萧洒西山阿。成都茅屋草木青，八月风恶撼效垞。“人或不知公故里，人谁不识草堂灵。”此非我言冯至语，遐迩来瞻挹芳馨。曹公俊伟原侔杜，词源一脉谐韶濩。稗书灏灏高峰居，大言炎炎秋雨注。生前痛写干红窟，身后谁植一株树。二百年间何所留，空劳宋玉《招魂》赋。时维丙子端午节，我从锦里趋京国。同贤父女莅大兴，雪芹祠庙岿然立。嘉木绿阴湖水深，周翁题字标门额。“神皋奎耀”祠上悬，无远弗届无斩泽。升堂得拜雪芹像，“文采风流”书素壁。旅进旅退齐仰止，仪型仿佛清光接。怡悦明眸观“四

友”，辛酸零泪含双睫。女儿身现脂砚斋，青埂峰耶人倚石。逝者如斯堂构起，时移世改须宁息。

主其事者为梅子，从事诸君咸戮力。草创谘周其虑醇，钻燧改木其役毕。敦敏敦诚翰墨存，曹氏家族遗谱牒。碑廊罗列诗书画，八方风雨集于北。梦园春草梦中生，亦见新编陈奕奕。尚想当时多叹嗟，圣贤寂寞身后事。杜言“未见有知音”，曹作“谁解其中意”。风飘万点正愁人（杜句），沁芳流尽无人庇。今观杜学日以兴，岂仅膏馥重教诲。红学排难知本末，求真指伪除芜秽。试思文网酷无疏，化奇为腐曹高配。戴盆何以见青天，滋兰能不萧艾刈。北普陀前行复止，万千心事萦肝肺。夙夜修书报草堂，杜祠曹祠各芬芳。天下朋友皆胶漆（杜句），况乎二公日月光。世间正道贵合辙，风兮风兮怀先德。杜诗曹梦细探寻，情动于中各识积。

注：“四友”，谓敦敏、敦诚、脂砚斋、张宜泉四人之像，周汝昌谓可称为“四友”。

草堂茅屋重建歌

秋风不为诗人让，茅卷三重气凋丧。长夜沾湿何由彻，彻之至极发高唱。广厦千间寒士乐，吾庐独破死亦足。何曾突兀见此屋，志士不忘在沟壑。欲使风雨不动安如山，苍生环堵皆欢颜。一别成都不再还，孤舟出没风涛间。羁魂难返锦城西，百花潭柳草萋萋。后代招魂灵何在，祠宇两楹亦幽

棲。柴门花径与林塘，诗人回首一茫茫。屋舍俨然忽复异，茅屋茅屋将焉忘。今日茅屋构成逾金阙，不在裔皇在亲切。恍见诗人正开轩，老妻画纸棋局设。稚子钓鱼鱼可数，邻翁呼酒酒同吸。茅屋坚牢无吟呻，况已广厦初庇黎民身。人日归来何只何爨叟，少长咸集乐诗酒。涪翁、放翁久矣祠堂坐，亦伴杜公茅屋走。归真返朴仓庚鸣，草堂梅花香盈盈。回首一千二百载，茅屋重见锦官城。

1997年春

杜诗研究丛稿
钟树梁 著

责任编辑·彭学云

封面设计·李文金

出版发行 天地出版社
(成都市盐道街3号 邮编 610012)
印 刷 四川锦祝印务所
版 次 1998年9月第一版
1998年9月第一次印刷
规 格 850×1168 1/32
印张 11 字数 220千
印 数 1-1000册
定 价 15.00元
ISBN 7-80624-216-3/I·48

杜诗研究丛稿

•钟树梁•

ISBN 7-80624-216-3



9 787806 242162 >

ISBN7-80624-216-3/I·48

定价：15.00元